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沙汀评传

——中国现代作家评传

eBOOK
网络资源 中国风

引言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为序章，何等壮丽辉煌。20年代后期关于革命文学的讨论也曾掀起一阵风浪，但在创作上却并未扬起波涛。到了30年代，在鲁迅等深刻批评了革命文学倡导初期的“左”倾以后，左翼文学观念有了调整，一批文学的弄潮儿涌现了，文学的长河又才形成波澜壮阔的局面。

这批弄潮儿率先纠正了革命文学的幼稚倾向，取得了可喜的创作成果。他们给左翼文坛以至整个30年代文坛增添了光彩。他们中有些人还被鲁迅称赞为优秀的左翼青年作家。

这些优秀的青年作家中，有一个就是沙汀。

这是一个来自四川西北山区小县的“苕哥儿”。他在闭塞的、有着浓郁地域文化特色的环境中长大。到成都上学期间补上了新文化思潮重要的一课，接着于学业结束后投身四川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受到了初步的锻炼。大革命失败后，他也曾陷入惶惑，有过一段罗曼蒂克的恋爱插曲。但很快就奋蹶而起，离家东出夔门，到了现代思潮的漩涡中心、左翼文学的大本营上海。时空迁移引起的反差感，促使他拓展了视野和境界，激起了他创造的精神和从事文学创作的欲望。在与当年剪烛西窗的挚友艾芜重逢以后，便一起携手并进，在闸北的亭子间里契阔涂鸦。可是他们采取的题材“究竟对现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呢？他们感到迟疑和犹豫。经过“几度地思量之后”，鼓足了勇气，联名写信向鲁迅先生请教。鲁迅先生热情的复信，给了他们莫大的鼓舞。他们坚定了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毅然走上了献身文学的道路。

沙汀最初的作品富有生气又十分幼稚。有些作品甚至是出于表现“时代冲击圈”的意念，“凭一时的印象以及若干报纸通信拼制成”的。非常幸运的是，当他的第一部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一出版，就得到茅盾的关注。这位与鲁迅并肩战斗的“左联”领导人在肯定“这是一本好书”的同时，毫不含糊地批评了其中所“不怎么喜欢那种印象式的写法”。这个切中肯綮的评析，推动他深刻地反省，“在周围响着的喝采声中逐渐地清醒”。他联系创作的成败重新学习了鲁迅的教导，决心“重新来过”，并意识到应该把取材的重点转向熟悉的故乡生活领域。

正当沙汀强烈地感到必须“改换作风”并有了“新的起点”的时候，造化为他提供了契机。他接到家乡的来信，叫他回乡料理母亲的丧事。于是他在这具有重要意义的故乡之行中，重温了那乡土味浓郁的大书。用汲取的现

鲁迅：《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鲁迅：《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沙汀：《〈兽道〉题记》。

茅盾：《法律外的航线》。

沙汀：《感谢》，原载《文哨》第1卷第3期。

沙汀：《感谢》，原载《文哨》第1卷第3期。

沙汀：《感谢》，原载《文哨》第1卷第3期。

沙汀：《感谢》，原载《文哨》第1卷第3期。

代思潮和左翼文化思想反观他所熟悉的宗法制的农村社会，以具有一定艺术经验的作家的眼光审视那一片文化积层深厚的土地。他深化了对乡土文化环境的认识，加深了自己的感受，增强了表现的欲望。此后，他把题材、审美取向完全转到了与艺术气质契合的生活的沃土，创作了《兽道》、《代理县长》、《在祠堂里》、《龚老法团》等一系列优秀的短篇小说。他在创作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以一批别具一格的沉实之作屹立于左翼文坛。

抗日战争爆发后，沙汀为上海前线战士服务的壮志未酬，回到大后方四川。1938年秋奔赴延安，接着随贺龙去了冀中。从冀中回到延安不久，又于1939年冬重返四川。延安、华北去来，对他的创作有着特别的意义。他扩大了生活和题材领域，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随军散记》、系列散文、短情报告《敌后琐记》，以后又创作了中篇小说《闯关》。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政治视野更为开阔。对他后来站在更高的角度冷眼看恶有着深刻的影响。

1940年，沙汀在重庆南方局领导下做联络工作。亲切的巴蜀文化环境，文化界人士之间的交流，促使他认真总结抗战三年来的创作经验。他联系到1938年开始的关于“暴露与讽刺”讨论中汲取的教益，根据自己对时局和社会生活的认识，坚定了“从具体的民族需要入手”发展讽刺艺术的“自信”。

正是在有了更清醒的历史意识之后，在充分蕴蓄的基础上，他在创作上开始了新的井喷。他推出了乡土讽刺的力作《在其香居茶馆里》，着手《淘金记》的写作，迈步向新的艺术高峰。

1941年皖南事变后，沙汀按照南方局的安排，在做好重庆文化界人士的疏散工作以后，回到故乡隐蔽。从这时起到1949年底，他除了两次短期去重庆，大部分时间在安县西南边境山乡睢水蛰居。他躲过了一次又一次搜捕，伴着寂寞和贫苦，以极大的韧性写作。他续写完了长篇小说《淘金记》，创作了长篇小说《困兽记》、《还乡记》，一个中篇小说，三十多个短篇小说。这是他自况的“文思泉涌”的年代。是他创作的丰收期，是他创作的黄金时代。

新中国诞生，历史揭开了崭新的篇章。沙汀满腔热忱跨到新的时代。他鼓励自己：“面临一个新的时代，对于生活和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都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探索”。他的热情是可贵的，可是他的“探索”并不遂意。他在建国初到1957年间，也写过一批较好的小说，反映了时代的变迁，触及了新与旧的矛盾，但有些作品却停留在生活表层的描写上。从1958年到“文革”前八年，创作更是出现了窘困。一些作品受农村“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背离生活本质的真实，甚至连独创的文学语言系统也被打乱，混杂着枯燥的报章语言和干部腔。他对自己的境况并非毫无自觉，曾不只一次地在日记中倾诉过“苦闷”和“烦恼”。1962年文艺政策和文艺思想调整期间，他还强烈地意识到应该去写多年酝酿的、确有把握的题材。但当八届十中全会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他又把自己业已成熟的计划丢在一边，到农村中去“寻找”“阶级斗争新动向”，吃力地写那些虚假、浅薄的作品去了。这位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成熟的作家，在五六十年代又正当盛年，可是在“文革”前的17年里才只有一本20来万字的、经不住评说的《过渡集》。他的“过渡”如是之艰难，难道仅仅是他划桨不力吗？他的“过渡”是根本性的

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载《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

《〈沙汀选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失算吗？后来者究竟应该引出什么样的教益呢？

十年浩劫，沙汀身陷囹圄。获得自由、躬逢盛世，可惜年事已高。不过他仍旧葆有早年的那种韧劲，仍然壮心不已。他以巨大的毅力重聘径寸之翰，于写作文学回忆录的同时进行创作。从《青枫坡》到《木鱼山》到《红石滩》，一部部中篇小说，标志着他现实主义艺术的回归。尤其《红石滩》的问世，如同一个优美的定格，表现了他艺术的青春焕发。

沙汀自 1931 年走上文学之路至今将近 60 年。他是一个有着漫长文学生涯的作家，是一个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的作家，是对现、当代中国文学都有着独特贡献的作家，是一个经验和教训都十分丰富、深刻的作家。

他是在成为革命战士之后参加到文学队伍的，是在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下走上文学道路的。他继承了鲁迅“听革命前驱者命令”的传统、始终跟随时代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他感知和把握生活的基本方式是把革命全局的宏观鸟瞰同局部社会环境的微观把握紧密结合。在关注全局发展的同时，以特有的艺术敏感感知全局在自己的生活领域里具体的曲折的反映，创造既有时代精神又有独特地域特色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以此来感染和唤起人们认识自己的环境，激发人们改造环境的自觉。无论在旧时代还是在新时代，他的文学活动，他的作品都体现了创作的初衷：表示对时代应有的助力和贡献。

他是地域文化高等的画家。他把主要的心血和功力用在了描绘川西北乡镇社会风俗画上。他创造了一幅幅有独特地域文化蕴藉的生活画面，创造了一个个凝结了这种文化特色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这些画面和人物不只在地理环境和眼饰习俗等文化外相方面带有乡土特点，更主要的是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地域文化特色。这些画面和人物是作家在艺术与生活契合的基础上完美的审美创造，是现代意识与川西北沉滞的社会风情最佳结合的产物。它们以其独创的特色给文学史增添了历史性的艺术画幅。其中的许多典型人物形象如白酱丹、林么长子、邢么吵吵、方治国、贺熙、龚老法团等等，丰富了文学史的人物画廊。

他是一个卓越的讽刺小说家。他创作的不少小说是讽刺小说。其中有些是带讽刺性的作品，有些是完整意义的讽刺作品。它们是作家的气质、才华与特有的生活阅历、意识到的历史要求相结合创造的艺术之花。是深入开掘黑暗和丑恶本身“底面不符”的喜剧因素，带着冷峻的笑将其上升为一种具备特殊审美形态的艺术品。这些作品在表现现实、刻画人物、安排结构、语言方式上达到了尖锐性与喜剧性、真实性与深刻性的完美的统一。对黑暗和丑恶本身的喜剧性矛盾开掘既深，却“无一贬辞而情伪毕露”。它们丰富和发展了讽刺美学。

他是创造了独特“沙式”模式的短篇小说艺术家。他在中、长篇小说创作方面成绩卓著，在短篇小说创作上更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的一百余个短篇小说，大多数遵循了鲁迅要求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艺术原则，取材精当，旨意深沉，叙述含蓄，结构谨严，辞气拙美，语言简约。他是茅盾高度评价的继鲁迅之后“不少卓特的短篇小说的作家”之一。他的短篇是“货真价实的短篇”，它们“严守绳墨，无懈可击”，“结构谨严，行文细密”。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茅盾论创作》第 539、586 页。

他为短篇小说文体的发展创造了经验，作出了贡献。

每一个杰出的作家都是一本丰富多彩的书。沙汀是一本多卷的长篇巨制。这本书是现代意识与浓郁的乡土社会生活结合的辉煌之作，是富有时代气息而又有着地域文化特色的色彩斑斓的乡土画卷。它是时代造就的史册，是才情迸发蔚为大观的现代才子之书。它的情节迭宕，有紧凑也有舒缓，有高扬也有低回，会给读者以感染、启迪和教益。这本书还未完卷，还在继续写下去。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书》序
陈涌

—

现代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革命就其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不同于过去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因为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个新的特点，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方面也得到了映。

从“五四”开始，在西方为革命作准备的思想，在中国已经显露出它的矛盾，一方面，这些曾经表演过革命作用的思想已经为取得统治地位的西方资产阶级所抛弃，或者遗忘，但它在迟到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国还能继续保持着它的革命的启蒙的意义，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还能继续发挥它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又暴露出自己的脆弱无力，这在西方革命时期和革命的准备时期，还不是明显的，在中国却令人清楚地看到它经不起严酷的现实的检验。

鲁迅，是现代中国第一个在自己的作品里直接反映出被压迫的农民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他写于1925年的《伤逝》已经揭示出脱离人民，脱离整个社会解放的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只能以令人黯然的悲剧告终。这象征看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要求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实际上也呈现出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住终归破灭的主题。尽管以个人为中心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在以后当它面对封建压迫的时候，还能继续发生它的冲击作用，但它的局限，它的矛盾，它本质上的脆弱性也随着人民革命运动的展开面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新的人民革命时代的流向，也为另一个有敏锐的历史感的作家所觉察。郭沫若最初也是以个性解放作为自己的诗歌的基调的，但他在1925年就说自己“在最近一两年间”，“完全变了”：

我从前是个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文艺论集》序）

只要我们站在现代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高处，就有可能对“五四”前后的文化思想的变迁，做出正确的观察和评价。过去就有不少人看到，各种西方的思想都被引进中国，其中不少都曾经发生过程度不同的积极作用，但他们都像是走马灯一样很快过去了所以有人说，西方经过几百年完成的思想历程，在中国一二十年间便走完了，原因正在于，时代毕竟不同了，原来在西方曾经起过革命作用的思想，人性论，人道主义思想，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刚才提到的个性解放思想，它们在中国刚一抬头，便发现中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屹立在它的面前了。这是西方英、法等资产阶级在他们革命时期所没有碰到过的。

欧洲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在文学上都推出过自己的伟大的杰出的作家，但在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以至无产阶级已经出现，已经走向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虽然无产阶级文学已经产生，已经出现了“宪章派”诗人和“巴黎公社”诗人，但真正

伟大作家的产生，还要等到无产阶级革命到来的时代。19世纪为俄国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出现以前世界文学的最先进的部分，一大批伟大杰出的作家像灿烂的群星一样涌现出来，他们不少人不是自觉的至少也是在实际是与俄国人民解放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虽然马克思主义也很早被介绍到俄国，由于19世纪直到八九十年代无产阶级才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这就使得当时俄国最先进，最伟大，最杰出的作家，也没有可能转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正如列宁所说的，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伟大的人物，也没有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面前停住了。俄国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是在19世纪末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经到来以后产生的高尔基，他同时也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是发生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是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在长期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过程中产生了大批具有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优秀的杰出的作家，而且他们当中最先进的最有才能的那部分人，都陆续地走进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是许多中国作家所走过的道路。中国最伟大最杰出的作家都是属于广大人民的，属于无产阶级的，其中像鲁迅、郭沫若、茅盾这样的作家，他们不但在思想上站在我们时代的最前列，而且在艺术上也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有现象，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不曾有过的。

二

但在整个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过程中，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应该是统一战线的。解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所谓“两头小中间大”的国家，就人数来说，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是少数，而中间阶层却是人数众多的。反映中间阶层的思想情绪的作家，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也是多数，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大都有民主要求，他们在文学方面的代表人物对生活有自己熟悉的方面，其中不少人还有比较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中间阶层的作家，尽管在思想上有弱点，但他们都程度不同的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他们是文学上的重要的力量，他们中的优秀的杰出的作家，在文学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共产党员的作家应该和一切具有民主性和现实性的中间阶层的作家合作，正确地评价他们的作用和贡献，承认和尊重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完成中国艰巨的革命文学的任务。

中间阶层的作家的思想通常有两重性，因此，在统一战线内部思想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只有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求得解决。只有对少数投靠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作家，才应该坚决加以揭露和抨击。

但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初期，我们一些刚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艺界的左翼积极分子，却对鲁迅、茅盾也加以错误的批判和打击。鲁迅不但早已是激进的民主主义作家，而且当时正处在走向共产主义的转折时期；茅盾在1925—1927年以前便是共产党员，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党员之一，只是在1924—1927年革命失败后，产生过悲观、消沉的情绪，但他并没有脱离革命。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对鲁迅、茅盾的批判斗争是违背党的正确

政策的。以后对小资产阶级倾向的“第三种人”的批评，无疑有它的必要性，但除了鲁迅、冯雪峰少数人外，也有“左”的、过火的缺点，这也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的。

尽管思想强弱的程度不同，各个不同的时期表现各不相同，但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便存在着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分野。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大体上是属于民主主义的，他的《人的文学》被认为是“五四”文学运动中的“思想革命”的一面旗帜。他从“人”的观点提出反对中国中世纪的黑暗的问题，虽然这不过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迟缓的回响，但在当时，却确实使人耳目一新。但也和一般抽象人道主义思想一样，它总是幻想不经过革命的方法便使人和社会臻于至善。他的这篇“思想革命”的宣言书也没有忘记向富人劝说从善。他也曾经在中国传播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但时候已经到了20世纪，这种“新村主义”只能说是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贫弱的漫画化的表现。如果说，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也幻想不经过阶级斗争到达人类生活的福地，但在当时是一种不成熟的阶级关系的反映，有它产生和存在的充分的合理性；那么，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现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的人民革命运动正在勃兴的中国，这种“新村主义”还能有什么样的积极意义，实在是一个疑问。

周作人在20年代末以后，便越来越倾向于自由主义，他后来的公开倒向敌人的怀抱，是他自由主义思想，或者说民主个人主义思想恶性发展的结果。

林语堂也和周作人一样，也有过从民主主义转向自由主义的变化。他在20年代中国黑暗专制的军阀统治下，曾经做过勇敢的战斗，也因此，他和鲁迅有过密切的战友的情谊。以后他创办《论语》，提倡“幽默”，主张“闲适”，主张所谓抒写“性灵”，也倒向了自由主义。这个时期他不但完全失去了民主的战斗的精神而且在“杀人如草不闻声”的中国最黑暗的时期，实际上起了麻痹群众革命意识的作用。鲁迅曾经耐心地对林语堂做过劝导的工作，也做过针锋相对的原则的斗争，在他认定林语堂无法扭转后，才终于和他决裂。

但林语堂以后在国外，致力于创作和学术研究，仍然做过对中国文化建设有益的工作。

我们不能不看到，尽管在第一次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中国的中等资产阶级整个说来，是倒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中国的革命统一战线，主要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在这时候像徐志摩、沈从文这样的作家，就其思想的实质来说，是属于自由主义的，或者说是民主个人主义的，但他们的创作活动，还具有民主性和真实性，特别是沈从文，在小说艺术方面有重要贡献，我们的理论批评工作和研究工作的任务，就在于如实地评价、记载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三

从“五四”以后，叙事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是主要的，而且，鲁迅在现实主义创作方面的伟大成就，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继续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尽管这样，我们也不能认为现在主义是唯一的创作方法，不能独尊现实主义。如果说，在文艺创作上正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需要有在形式和内容、

思想和幻想的广阔的天地，也就是说，需要在共同方向下的广阔的创作自由，这不光是指选择题材的自由，风格流派的自由，而且也应该包括艺术方法上的自由。

在文学艺术的历史上，历来存在着文学艺术的两大潮流，这就是现实主义的潮流和浪漫主义的潮流，原因就是人类生活当中，同时存在着现实的方面和理想的方面，就个人的气质、性格来说，也有倾向于求实和倾向于理想、想象和幻想的差别。这反映到文学艺术上来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差别。中国文学艺术中所谓的写实和写意，大致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简要的提法。不论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不论是写实和写意，只要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的，都有可能真实地反映生活，它们各有千秋，应该把它们看作是可以并存，也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结合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过去曾经有一种看法，认为只有现实主义，才是合理的，才能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只有革命的现实主义，才能用革命的世界观来观察生活和反映生活，而浪漫主义却往往歪曲生活，是唯心主义的。这种看法是不合事实的。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从“五四”开始在中国文学上便是并存的，也是互补的，这从鲁迅和郭沫若同时出现，也可以得到有力的说明。鲁迅和郭沫若，无论个人的气质，性格，生活经历，所受的文化艺术的承传，以及由此所走的艺术的道路，都是很不同的，但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成为两峰出云，互相映照的景观。

鲁迅更倾向于求实精神，他比别的许多人都更深刻地领会过去的革命——资产阶级领导的脱离人民的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痛苦的教训，这使他从“五四”一开始，便进入深沉韧性的战斗。尽管在他年轻时代，也曾热衷于浪漫主义，他的《摩罗诗力说》主要推崇的正是浪漫主义诗人，但从辛亥革命以后，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辛亥革命的经验就成了他的思想活动的中心点。他清楚地看到，中国过去封建主义的历史无论怎么变化，都没有越出封建主义的范围。过去的历史不外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历史。他激切地呼唤新的“第三种时代”的到来。但他采用的艺术手段是现实主义，他比当时任何一个作家都更深刻理解，也更沉重地承受我们民族和人民的苦难，这使得他的作品在揭示现实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产生的根源方面，都达到中国前所未有的现实主义的高度。

郭沫若却以和鲁迅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现。如果说，鲁迅的现实主义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相联结，是符合中国新的民主主义革命方向，那么，郭沫若的浪漫主义也是这样。郭沫若在“五四”时期也同样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甚至比鲁迅的热情更高昂，用更激越的声音呼唤中国的“再生”，呼唤中国的新时代的到来。但他更多的是依据自己的艺术家的敏感，他敏锐地感受到那个时代沉重的苦闷的气氛，也敏锐地觉察到新的时代正在他的面前展开。他的浪漫主义的长处并不在于对现实矛盾及产生的根基做具体的表现，但在他的《女神》里，在体现那个时代的精神、理想方面，在作家的主观热情方面，是无与伦比的。

鲁迅之于现实主义，郭沫若之于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可谓各极其长。他们两人典型地集中了新时代到来的中国现实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这就是现实的方面和理想的方面。我们不能用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浪漫主义，或者相反。鲁迅和郭沫若都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伟大的杰出的代表。

四

和过去一样，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都是经历了人生之后再去创作的，因此，他们大都总是以写自己最熟悉，最倾心的题材开始，而一个作家当他生活在历史的激流里，或者至少他感受到时代的脉搏，觉察到时代发展的征兆的时候，写他自己熟悉的题材，便有可能到达艺术的现实主义。20年代末，发生了很大反响的茅盾的《蚀》，和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便都属于这样的作品。

茅盾从20年代初开始，便不但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个勤于写作的文学评论家。20年代中期，他生活在当时中国大革命的激流中，他当时并没有想到创作，但在革命遭受挫折、流产时，他痛定思痛，在不得已于言的强烈的内心要求下，开始执笔创作。一方面，革命的失败，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困惑、迷惘，以至消沉、悲观，这在他的作品里留下了不轻的阴影，但即使这样，这位深受写实主义影响，坚持真实地反映生活的信条的作家，却在他的三部曲《蚀》里，给我们留下了这次大革命的很大程度的真实的画卷。

《幻灭》，表现几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期间的种种幻灭感，但三部曲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是第二部《动摇》，它对一个县城的令人惊心的阶级搏斗的描写，至今，仍然以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使人激动，使人信服。这部作品对1924—1927年大革命的“解剖麻雀”式的正面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第一次，而且，至今可说还是唯一的。

《蚀》的第三部《追求》，表现大革命失败后一群灰色的知识分子的动向，他们各有追求，但又都终归幻灭。这部作品令人感到作者更深沉的悲观情绪，但同时，作者的现实主义也使得它在革命转入低潮以后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得到相当真实的表现。这里写到的几个知识分子都各具特色，其中章秋柳是更具特色的一个。

从章秋柳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五四”以后，一部分知识青年对性解放的理解。这类思想当然首先是对封建贞操观念的束缚、遏制的反拨，但在她身上已经变成对两性关系的放纵，变成类似俄国十月革命后一部分青年的“杯水主义”。章秋柳在爱情问题上也确实像喝一杯开水一样地平淡和随便。但如果茅盾的表现到此为止，那么这个人物只不过是一个放荡的女人。但章秋柳在她周围的知识分子中是有着比较深沉的内心世界的，她对当时革命低潮时期的悲剧气氛，是感触最深，愤激、同情、悲悯的感情也最深的一个。当地看到自己的朋友简直不知道怎样排遣自己精神的空虚苦闷的时候，当地看到自己的一个要好的女友王诗陶竟至于出卖自己的肉体，而使自己的青春完全萎谢了的时候，她愤激了，认为这是令人“惊人的美之衰落”，“她想起许多朋友的青春的生命都被灰色的环境剥蚀尽了，只剩下一些渣滓；王诗陶不过是许多中间的一个例子而已。”这是一个思想感情境界高出于她周围的灰色环境里的同辈们，她的“热烈的生活欲”，她对朋友的真诚的关心，成为激起对方重新生活的勇气、动力的女子。她周围的同辈大都失掉理想或者本来没有理想而显得平庸，而她还能够成为那个灰色环境里的一线光亮，她的性格是复杂的、矛盾的。她是茅盾早期的一个艺术的发现。

但在表现那些以个人为中心，追求个性解放、人的解放的民主知识分子的形象，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主角，看来更深刻，更集中，更有典型性。“五四”时期更典型的民主知识分子是觉慧型的，尽管巴金的《家》

是在 30 年代创作的，但觉慧这个觉醒的知识分子，它的典型意义更是属于“五四”时期的。那时具有个人主义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面对着的是封建主义。他生气蓬勃，勇往直前，充满自信，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局限，他的内心世界是比较单纯的，能够保持“五四”思想解放时期的先进人物性格的完整和坚强。像前面所说的《蚀》里的章秋柳的复杂矛盾，在他身上是没有的，尽管从思想本质来说，觉慧和章秋柳是一样的——一样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只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历史情势，使得同样性质的思想有着不同的历史命运罢了。在章秋柳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不但有她个人和社会的矛盾，而且也有她自身的矛盾，这就是说，不但有民主思想和周围的封建主义的矛盾，也有民主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自身的矛盾，准确些说，后面这种矛盾本来是这类知识分子所固有的，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突现出来。这归根到底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第一次大革命遭受挫折、流产，而阶级搏斗却更加深化、残酷，人民革命更加深入，处在中间状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剧烈的冲击的结果。

但这时候，章秋柳虽然也表现出复杂的矛盾的性格，她毕竟还没有像丁玲所创造的莎菲女士那样矛盾已经发展到异常激烈的程度。一方面，莎菲对周围的平庸、腐朽的世界是敌视的，当她发现她钟爱的凌吉士“热心于演讲辩论会，网球比赛，留学哈佛，做外交官，公使大臣，或继承父亲的职业，做橡树生意，资本家……这便是他的志趣”！这时候，她蔑视他，鄙弃他，认为他有一个“卑劣灵魂”。但是，像凌吉士一样，能够在上流社会，更具体地说，做各种体面的活动，能够出国“留学哈佛”做外交家，或继承资本家家庭的事业的男子做自己未来的丈夫，不正是半殖民地世俗妇女的人生理想么！但莎菲对此却表示极端蔑视和鄙弃，看来她已经和她周围的那个旧世界决裂。但她这个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更可靠的精神支柱。因而凌吉士的美貌和“丰仪”仍然继续激发她的爱情的狂热。她的人格分裂，精神极度空虚。她反对平庸，但她自己也陷入平庸，她反对旧世界，但她自己也不能不属于这个旧世界。

莎菲的矛盾是即将破裂的矛盾，她面临的是濒于绝境的精神危机。这个人物当然不能代表当时历史的潮流，但在她身上，不是从一个角度也令人感受到历史潮流的汹涌，听见社会前进的足音么？

“五四”以后，在她之前，像莎菲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正是因为这样，就使得这个人物成了“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史中知识分子形象系列的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环节。

茅盾在《从粘岭到东京》里已经预告：“……我希望我能够振作，不再颓唐；我相信我一定能的，我看见北欧命运女神中间的一个很庄严地在我面前，督促我引导我向前！她的永远奋斗的精神将我吸引着向前！”

事实也正是这样。茅盾很快就从困惑、迷惘、悲观、消沉的低谷重新振作。此后他写了一系列思想情绪与《蚀》完全不同的作品，而《子夜》成了他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峰。

茅盾对他这部作品曾经做过自白，说是为了回答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问题而作的。这个问题在当时中国引起广泛激烈的争论。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实际上是如何认识中国国情的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等一系列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茅盾这部作品，在广阔的画面，从各方面显示出现代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击破

了当时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社会，或者说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等等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错误观点，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政治意义，在中国引起广泛的反响，是左翼文学的一个重大的收获。

正是有深厚的艺术准备和艺术经验的作家，才有可能创作这样大规模的反映现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的作品。这部作品许多部分许多人物都具有艺术的真实性，是一直为多数论者，也为多数读者所承认的。人们不能不看到，茅盾这部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很大一部分在过去是没有作家涉足过的。在没有先例，没有可资借鉴的情况下，他为我们提供了吴荪甫等一系列中国的各种类别的资本家的比较真实的形象，而且至今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做到。我们评价茅盾这部作品不能不考虑到这点。

但《子夜》却又确实存在着一个对社会主义文学说来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作家，通常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都把文学看成是总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看作是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手段。这在原则上是不应该有什么疑问的，而且任何比较重要的作家，不论他的观点怎样，总是要面对现实生活的迫切问题，并且通常总会得出自己的答案的，这也不难理解。问题只在于艺术家有自己接近问题和回答问题的特有的方式。艺术家当然也可以同时是理论家，但是如果他在艺术创作的时候，不是把理论思维渗透到艺术思维中去，成为它的有机部分，而是让理论思维排挤乃至压倒艺术思维，让理论思维占优势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削弱艺术的真实。

艺术要从特殊悟到普遍，而不是寻找特殊的东西来表现普遍：这微妙的差别显示两种不同的艺术方法的分野。

《子夜》一开始，吴老太爷一到上海，便经不起上海五光十色花花世界的刺激而很快死去，用这来象征封建僵尸一见空气便腐烂，这类表现不能说在《子夜》是普遍的，但也并不是个别的。整个说来，这部作品的形象不够丰满，作品的思想倾向往往过于直露，不少时候浮在艺术形象的表面，而不是溶解、渗透到形象里面。瞿秋白在这部作品出版不久，便说，“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子夜与国货年》）。稍后，朱自清肯定《子夜》是一部“真能表现时代”的作品，但同时也说，这是“细心研究的结果，并非写意的创作。”

瞿秋白正确地评价了《子夜》，创作的特点，它的意义和价值，但他也不自觉地说出了这部作品隐含着的缺点和弱点。朱自清也

高度评价了这部作品的特点，但含蓄地指出了它的缺点和弱点的所在。这个缺点和弱点在整个革命文学历史上可说是带有一般性的，这实质上是一个思想倾向性和艺术真实性的关系问题。

八政治和艺术，倾向性和真实性，是社会主义文学几乎每天都可以碰到的一个根本问题。过去文艺指导思想所出现的“左”的和右的偏向，主要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向，主要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从两个相反的方面出现的偏向；或者从思想、政治这个方面去排挤以至否定艺术真实，或者用艺术真实这个方面去排挤以至否定思想政治。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有无数经验反复证明这两种偏向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的。

这个问题，要从文艺思想上着手解决，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在深入到生活中才能得到彻底解决，为什么不少经过了思想变革，具有革命的世界观的作家，问题往往出在艺术真实是否充分这个方面？一个作家，如果他的思想

方向是正确的，同时又有比较雄厚的生活底子，就是他能够创作思想和艺术都有较高水平的作品的条件。当然，我们还不能忘记，艺术上的准备，一般文化修养也是不可少的重要的条件。这是自不待言的。

茅盾在创作《蚀》和丁玲在创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时候，都是经历了人生之后再创作的，这使他们有更饱满更深厚的生活基础，因此，也容易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求，作者下笔更容易得心应手，写出来的作品自然也更容易令人觉得真切、自然。茅盾、丁玲这西部早期作品，便都是这样的。当他们思想已经逐渐跨进了新的世界观的门坎以后，他们当然仍然可以在新的世界观的对照下继续写他们过去熟悉的生活，但是，大多数像他们那样

已经逐渐实现了思想变革的作家，却会同时考虑到创作范围的扩展和更新，不会满足于固守本来已经熟悉的生活。但要这样做，单是世界观的变化是不够的，要进行新的内容的创作，需要有新的生活，新的人生经验。茅盾和丁玲在 30 年代以后，都有一个从经历了人生去创作到为了创作而去经验人生的变化过程。

如果说，《蚀》、《莎菲女士的日记》，在艺术上有些重要方面，是茅盾、丁玲后来的创作所不及的，而他们在思想变革以后一些创作中的一些弱点，正是他们早期创作所未见的，那我们也不能得出经过思想变革，确立了革命的世界观，有了新的创作方向，反而不利于创作的结论。我们只能说，要表现人民的生活，不但要有革命的世界观，要理解新的方向，而且还要懂得人民的生活，为此就要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去，而这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正是毛泽东在文艺方面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

茅盾熟悉 1924 至 1927 年时期的风云变幻的生活和斗争，而且其中更熟悉知识分子的动态。他进行创作。在艺术方法上也是符合艺术应该真实这个根本要求的，因此，他写出了艺术上有相当高的真实性的《蚀》，这部作品至今仍然是反映那个时代的杰出的作品。当时茅盾在思想上的缺憾不免削弱了这个作品的艺术真实，这也是事实。茅盾在创作《子夜》时，在艺术方法上存在着如前所说的弱点，给这部作品带来不算很轻的，因此也不难发现的影响。但茅盾自己也知道，他熟悉金融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的生活，因此这两部分人在艺术上就有比较真实的表现。他的弱点表现得更明显的是他笔下的工人农民的斗争，他自己也说，这是他不熟悉的，是根据第二手材料写出来的。那些连第二手材料也不易得到的部分，虽然在现实中很重要，他也只得割舍。

丁玲，对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感情、情绪可以想见是反复经验过，感受过，是她最熟悉的。对早期的丁玲来说，知识分子的题材，大约也是她最喜爱的题材。这方面的人物，她写来也会感到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不会感到内容贫乏。这可以认为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真实性的最重要的保证。

七

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的丁玲的早期创作结束以后，丁玲的生活、思想、创作都经历过曲折的变化，胡也频的牺牲使她的思想有了新的觉醒，使她成为共产党员。最著名，也最能代表她后期的思想和艺术的作品是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尽管土地改革过去是她从未经验过的，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她参加土改工

作也只有极短的时间，但这部作品的特点，它取得的成功，是有她过去的艺术生活做准备的，它继承了丁玲自己已经形成的创作个性。没有像她那样一进入文学生活便开始显露的独立观察生活的禀赋，没有长久形成的她的敏感和深沉的眼光，这部作品不可能成为至今仍然是中国表现土地改革斗争的最好的作品。

这部作品显著的特点就是表现了农村的复杂的阶级关系。不同的阶级，包括敌对的阶级都会因为姻亲关系等等而互相交错，而且这种情况也不能不使人们的思想感情随之复杂起来。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应正视这种复杂性，已经有了丰富的人生经验的丁玲正是这样做的，因此她这部作品比同样题材的其他作品，更少简单化，更接近生活的本来面貌。

丁玲创造了黑妮这个人物，使她的创作的个性、独创性，更有力地显露出来。她是土改斗争的主要对象的地主的侄女，5岁时便死去了父亲，母亲改嫁，她在她伯父家里实际上等于女佣，她的思想感情更倾向于贫苦农民本来不难理解。丁玲是带着自己的深情，自己对妇女的命运深切的关怀来表现这个人物的。但过去很长一个时候，丁玲的这种表现，是作为一个作家的阶级立场问题被提出来批评的。但正是这些地方，使人们看到，丁玲在最尖锐的问题上，也能保持忠实于生活的真正艺术家的勇气。

但丁玲的这部作品，也有它的弱点，这个弱点在丁玲也如同茅盾的《子夜》一样，是在一个作家思想转变之后产生的。但茅盾的《子夜》问题是出在他太急于用文艺作品来回答社会科学所要回答的问题，以致他有些艺术形象是为了证明他的观念而刻意安排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却是另一种情况，作者丁玲并没有要求自己的作品去回答什么既定的问题，她的主要注意还是写生活，也和早年写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一样，作者是重视自己的独创性，要求自己独立地观察生活的；如果不是这样，她也许想不到黑妮这个人物了，黑妮在这一点上和莎菲女士是一样的，她们都体现出丁玲在艺术上的独创性，她们虽相隔时间很久，但都是丁玲的艺术的发现。但整个说来，丁玲对农民的理解，不如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因此，当我们看到，丁玲对莎菲女士的内心世界能够深入细致的刻画，而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现的农民，虽然也各具特点，但对他们却未能像对莎菲一样，深入到对象的灵魂的深处。看来丁玲还未能完全做到切身处地去体会她所写的农民的内心世界，就像她设身处地去体会她写的莎菲的内心世界一样。

八

对文学的问题，不但要考虑到意识形态的一般规律，也要考虑文学艺术本身的特殊规律。否认对作家进行阶级分析，否认作家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但如果不考虑到作家的主观思想、主观愿望、意图，并不等于他的创作的现实意义，如果认为每一个作家，它的世界观都在他的作品当中照样得到实现，认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创作，简单地依据他的世界观的性质来衡量作家，简单地贴上政治标签，简单地做出政治判断，这也是错误的。文学艺术比其他意识形态通常更需要，也更有可能面对周围客观的感性世界，即使是个唯心主义的作家，他对生活愈敏感，经验愈丰富，便愈有可能克服他的主观独断，在客观上，在他的作品中显示出生活的真实。

曹禺在写作《雷雨》、《日出》的时期，就世界观来说，还不是无产阶级的，他还没有能够摆脱唯心主义的宿命论的观点的影响，但他的严峻的现实主义，使他在反映现代中国生活的本质方面，达到当时很少人能达到的高度。在《雷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力量，在周朴园的家庭悲剧上得到深刻的体现。周朴园是个资产阶级人物，是个家庭的暴君，但他给他家庭造成的悲剧，并不只是取决于他个人的动机。他迫使繁漪吃药，我们都看到这是他对繁漪的令人心悸的迫害，但他的主观的愿望却并不能说是恶意的，在他看来，这是繁漪治病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对她的关心。他和周冲的两代人的鸿沟显然是无法填平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他对周冲完全没有作为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心。悲剧正在这里。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曹禺在他们的关系当中，深刻地表现出连周朴园也无法理解，也为之困惑和苦恼的一种力量在钳制着他，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的力量，不以周朴园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连作家自己暂时也未能意识到的历史力量。即使对待萍，当周朴园以为她已经死了，在家里保持她住室的原貌，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对待萍怀念的心意，只是当侍萍重新出现在他面前，威胁到他的声誉、他的利益的时候，就完全暴露出他的本质的丑恶和伪善。

现实主义要求真实地表现现实，按照历史本来面目表现现实，即使在表现一个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时候，也应该看到剥削者和压迫者也是一定的客观历史条件的产物，他本身也是受一定的客观历史规律的制约，他本身也没有所谓意志自由，也不能是随心所欲的。但另一方面，这不能当成对剥削者压迫者的阶级和个人的本性，为它的道德品质做辩护、开脱的理由。这就正如列宁所说的：“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恰好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由意志的身上”。曹禺对《雷雨》的描写所以能够达到别人少有的深度，正在于他对历史的必然性和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人的行为的辩证关系，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刻画，尽管曹禺自己在当时未必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但现实主义却使他对周朴园的行为没有仅仅着眼于个人的动机，而显示出一种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历史的必然性在控制着他，同时也没有因此失去了对这个人物的尖锐的揭露和批判。

在曹禺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候，左翼文学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左翼作家已经出现了不少，但是左翼作家也并不都能像曹禺那样深刻地理解生活，并不都能像曹禺那样深刻地掌握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正因为这样，他们尽管较早接近先进的世界观，也未能达到像曹禺那样的艺术现实主义的高度，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个结论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仅仅有先进的世界观，如果脱离生活，或者对生活本质没有真正的理解，也是不可能创造出真正现实主义作品的。

但同是现实主义的作家，有不同的现实主义特点，不同的形态和色泽，而且还有现实主义强弱和深浅的差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但和作家的世界观的性质和水平有关，还和作家的艺术才能、个性、作家对生活的态度、对生活的理解和忠实的程度有关。

文学历史上有过许多作家，同时又是思想家，像歌德、席勒、海涅、高尔基、鲁迅、郭沫若这些都是比较显著的，但曹禺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思想家，因为他未必善于对事物做抽象的概括，他的主要工作也不是根据新的历史发

展，新的经验和问题，对过去的思想材料，进行改造和加工，他面对的首先是他周围的具体的感性世界，他的工作是在个别的具体的感性事物里发现一般，也就走典型（典型的人物和典型的事物）。典型是带规律性的，能够创作出很高的典型的作家，不但要有相应的艺术才能，而且要有相应的思想才能，但他的思想才能是熔注在他的艺术创作中的，他并没有离开个别的具体的感性生活，也不以抽象的概念出现。一个作家在艺术上的思想表现，未必都是完全自觉的，以至在文学中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有不少作家，他所创造的典型的意义，他所呈现出来的客观真理，可能是连他自己也没有完全意识到的。

曹禹便是这样的作家，他的《雷雨》便是这样的作品。曹禹忠实于自己熟悉的生活，忠实于艺术规律，忠实于艺术必须真实的要求，从他的作品便可以看到，他对他所表现的生活都是进行过深层的艰苦的思索的，加上他比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有更充分的艺术准备，这就使得在我们面前出现了现代文学史上这样一种现象，尽管曹禹在思想上还不是站在当时时代的最前列的，但他的艺术的现实主义的力度，他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活的深度是超过了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先进的作家的，成为耸立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高峰；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曹禹的世界观的缺憾在他的作品中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留下它的影响，他的《雷雨》一方面如前所说的，实际上表现了历史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深层次上反映出那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历史力量支配着人的意志和行动，这种客观的历史力量的表现，在曹禹那里又和他的宿命论的影响纠缠在一起。这里有过多的偶然性和过多的巧合，除了作者为了戏剧效果的要求而有意设计的，还令人感觉到仿佛真有一种神秘的不可捉摸的天意在支配着人间，因而给他的这部作品带来宿命的神秘的气氛。曹禹的世界观的缺憾和局限在他以后的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例如，他根据巴金的原著改编的《家》，在艺术上无疑比巴金原著更成熟，更炉火纯青，但另一方面，改编本比起巴金原著来，那种强烈的反封建的激情，那种义无反顾的反封建的精神是明显地减弱了。如果说，巴金的原著曾经教育了一代青年，把他们推向进步的道路，就因为这部作品的主角觉慧那种对封建主义的青年式的进攻，成了许多要求向上的青年的榜样；那么，在曹禹的改编本里，觉慧就从主角退居到配角的地位，而且已经很大程度上失去它的锐气了。这部艺术上经得住人们反复考验的作品，和巴金朝气蓬勃的原著不同，它仿佛一个老者，多少带着怀旧的心情，回忆和咀嚼自己的往事，已经不很为热血的青年所吸引了。

九

从小生活在湘西边远地区的沈从文，有他自己独特的，往往带着传奇色彩的生活经验，他在艺术上也走着他自己的独特的道路，在他所描写的那些边远地区的乡村和小城镇，一般地说，封建宗法关系比较松弛，那里有水路可通，和外界大城市也有交往，外国的商品也流入到那里，但这些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还保持着自然经济的平静纯朴的生活风貌。

沈从文熟悉的正是具有这种地方特点的普通人的生活，而且看来他也吸收了楚地的浪漫的富于幻想的风情，因此，他除了产生许多善于细微观察生活的如《边城》、《长河》等写实之作外，还留下了像《神巫之爱》这一类

的内容和手法都奇幻诡异的倾向于浪漫主义的作品，但不论是写实的，或倾向于浪漫的作品，都体现出沈从文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个有过自己丰富经历的作家，他和下层人民是有联系的，对下层人民有纯朴的真挚的感情，他的理想所在，看来也正是人民纯朴真挚的生活和感情，他对于那种还没有受到封建的资本主义的门阀和金钱腐蚀和侵扰的淳厚的民风，表现出他的倾慕和赞美，以及他对少男少女暂时还很少受到束缚的爱情自由的歌颂。沈从文在艺术上的特点主要在于现实主义描写的真实性，和语言风格的民族特色。

沈从文写过大量的短篇小说，其中有不少是优秀的作品。《柏子》就是其中的一篇，这是表现一个船工，把积存的钱，都完全花在和自已相好的妓女身上，此外就是吸毒。但是即使这样，作者还是为我们展示出这个人物性格当中的劳动者的本色，这个人物诚实地劳动，性格开朗真诚，他的生活的堕落，是现代文明，是旧中国给他带来的“赐予”。作者带着同情的眼光注视这个人物，他使我们看到像柏子这样的劳动者，即使找不到真正合理的生活方向，沾染了旧社会的坏习惯，但他和那个妓女的关系本质上还是比上流社会那种腐化堕落虚伪的婚姻爱情关系，要纯洁真诚得多。

这篇作品的人物是现实的，表现方法是现实主义的，他和有些作家刻意歌颂人民的原始性的做法不同，他并不执著于用原始性去和都市的堕落的文明对立这个观念。

对那些边远的小城镇的妓女生活的理解，是沈从文的民主性和现实性的一种表现。在他看来，这些妓女，并不是生性注定她们操这种“贱业”，她们有些原是乡村小女子，因为对家庭不满，

出走在外，没有出路，才走上这条道路，有些是因为生活贫困，农民甘愿让自己的妻子到城镇当妓女，赚了钱来养家，这种悲惨的命运，男女双方都习以为常。《丈夫》正是表现贫苦农民这种悲惨境遇的，丈夫看到妻子受欺凌侮辱，也似乎像看到一件平常的事一样的平淡，只是到了夜深连和妻子亲近一会，说些私话的机会也得不到，她和他才感到不能忍受，终于一起回到乡下去了。尽管在那种极其反常的，被异化了的生活环境里，贫苦人民的纯朴的夫妻感情也并未泯灭，沈从文是站在贫苦人民的一边来表现贫苦人民的。贫苦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又多少是愚昧麻木的，但还有着人的感情，还是渴望着过一种人的生活。

《月下小景》，很大程度是沈从文的想象之作，但也明显的体现出作家的思想的积极方面。这表现一个偏僻的山区，一个“为人的历史所忽视所遗忘的残余的种族”，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这篇小说写得像梦一样的虚幻飘忽，但这里所表达的人的合理的感情、愿望，和愚昧卑鄙的习俗的冲突却是现实的，作者同情和肯定这对为爱情而终于赴死的青年，同时也谴责了那种野蛮的陈规陋俗，沈从文在这里表达这样一个主题：这对青年虽然死了，但他们的爱情却是胜利了。

沈从文有些作品尽管没有把他所倾慕的人民的诚挚真实的感情和理想，直接和污浊的旧世界对立起来，但实际上这也是对旧世界门阀和金钱的关系的一种反拨，这类作品也终究会汇合到中国现代民主文学的总潮流中去的。

生活对每一位作家都是基础，都是创作的源泉，都是不可或缺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这个真理，在沈从文身上也同样得到证实。沈从文终究是因为有他自己广泛而独特的生活准备，终究是因为打下了丰厚的生活基础，而这

部分生活又是这样斑斓、瑰丽（不但为多数其他作家，而且也多为外地人所不熟知的），这才有可能使他成为一个吸引人的作家。

但沈从文看到的和寻找的主要是生活中和谐、欢娱、平静、调子轻快、迂徐、远离纷争的那一面，他在边远的，多少保持着远古的纯朴民风的遗存的地区，找到了他的理想的寄托。在这方面，他在艺术上无疑达到今人惊异的诗意和真实。如果说，在艺术上也如同在生活上一样，真实是有不同层次的，那么，沈从文所表现的，似乎更接近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这个层面。至于生活严峻的苦重的，以至人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起而抗争这一面，整个说来，沈从文是隔膜的。这就使我们看到他在艺术真实上——就叙事散文来说是艺术现实主义——的不足。

这种情况的出现，和沈从文的自由主义思想有关，和他的生活经验的局限也有关，沈从文和现实的政治是疏远的，他的艺术才能超过了他的思想才能，他缺少例如像曹禺那种习惯于深沉的思索，那种力求探究生活的底蕴的个人的禀赋。他的创作主要依据艺术家的才能，他有敏锐的艺术家的感觉，善于感受周围的感性的世界的气氛和动态，但他不善于概括，他给我们带来许多真实的生活画面，但并不是许多时候都能做到对生活的本质的把握。他的作品缺少深刻的典型，未能像曹禺所做到的那样。

沈从文也缺少像鲁迅、曹禺那种强烈的道德感，我们只要回想一下《祝福》、《日出》这两部作品，试拿它们和沈从文的《雪晴》比较一下就够了。

《雪晴》写了一个寡妇因为爱情问题被认为伤风败俗，以致被“沉潭”的事件。作者相当细致地描写了这个妇女接受这个极端野蛮残酷的处罚的过程，但令人不容易理解的是，作者在整个描述的过程中，虽然也令读者感到他心绪不宁，但对这种非人所能忍受的人民的苦难，却缺少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缺少由于强烈的道德感所激发的激情，而这正是鲁迅、曹禺，也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里经常表现得异常突出的

十

根据过去的经验，像象征主义这样一种艺术潮流，真正有成就的象征主义作家，都没有完全背离过去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法国的波特莱尔，后来许许多多象征主义作家都承认他是象征主义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但实际上他的创作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仍保持着继承的关系。波特莱尔是个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他思想颓废，追求官能的陶醉，沉醉于病态的激情，但另一方面，他并没有脱离过去法国的民主传统，也没有脱离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这就是波特莱尔象征主义能够保持他的艺术生命力的重要原因。比较后来许多象征主义作家，波特莱尔的唯一主义神秘主义的东西是比较少的，他的作品，并不晦涩难懂。

但象征主义在19世纪末成为一种艺术思潮，不能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中国在20年代末，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处于低潮的时候，象征主义开始在一部分诗人中发生影响，当时他们的困惑、迷惘、消沉的思想情绪，正好在带有颓废倾向的象征主义艺术里找到寄托。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戴望舒。他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最早的成员之一，他写过宣传唯物史观文艺观点的著作，也发表过有关十月革命苏联诗坛状况的译本。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写的《断指》和《我们的小母亲》等较早的诗作，

是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内容的。但显然，以后的戴望舒便“由外向内”，回到他狭小的自我中去了。

不只是波特莱尔，而且魏尔伦、凡尔哈伦、里尔克等等象征主义的诗人，他们丰富了诗歌艺术的语言，扩大了艺术的表现方法和手法，从而也扩大了艺术真实和艺术美的概念。戴望舒也和现代中国的许多重要诗人（如艾青、冯至、卞之琳）一样，从他们那里摄取营养，西方的象征主义诗歌对中国现代的诗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戴望舒的诗，有比较重要意义的部分，是那些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或者说民主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的精神记录。这个知识分子真诚正直，但和人民有着不小的距离，因此，软弱无力，在经受历史的严峻的考验时，不能和历史一同继续奋进，但事实上又不能不带有历史的苦痛，于是一个人寂寞、孤独而忧伤地吟唱。诗人无疑有过理想和追求，有过对于未来的向往，但现在他觉得自己是一个“黑暗的街头的踟蹰者”，“好像寻找什么”，但他又发现自己：

真的，我是一个寂寞的夜行人
而且又是一个可怜的单恋者。

他也曾经是热烈的“寻梦者”。但这时候他的思想已经变成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民主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这使他无法解决个人幸福和社会理想的追求常出现的矛盾。他不得不为此而苦恼。他看到尽管自己的“梦”能够实现，但那时自己已经“衰老”，梦带来的欢欣和幸福已经是迟到的了。（《寻梦者》）

而且，他对遥远的乐园也不能没有怀疑，他看着无休止地飞翔的“乐园鸟”发出这样的疑问：“这是幸福的云游呢？/还是永恒的苦役呢？”他甚至忧伤地问道：“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经荒芜到怎样了！”

在《古神祠前》这首诗里，诗人用象征手法回顾了自己过去的“心路的历程”，仿佛这是他以后思想和艺术的新的开端之前的一个总结。他描述了自己过去的理想和追求如何生出了羽翼，如何从“小小的”蜉蝣变成翩翩飞舞的蝴蝶，接着又化为一只云雀，后来变成为鹏鸟”作九万里的翱翔，/前生和来世的逍遥游”，但他还是感到自己是孤独的，最后的理想“终于绝望地，/它疾飞回到我的心头，/在那儿忧愁地蛰伏。”

我们在这里看到中国一个有血性的，但脱离了人民的知识分子真诚的深沉的悲怆的自白。但因此，他也就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人们也可以由此觉察到时代的脉搏的跳动。

戴望舒的诗作，大部分都是关于爱情的，它的境界往往狭小。如果一个作家，在昏天黑地的世界里，他关心的主要是爱情，我们会不满意他和时代的脱节，和正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生活和斗争的隔膜，而且难于协调；但戴望舒的爱情诗，毕竟是对爱情的诚实的歌唱，是自己心扉的真挚的坦露，那也终究是当时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毫光，是令人感到亲切、喜悦的。

戴望舒有极少数的诗歌是直接表现人民生活的苦痛的，《妾薄命》便是其中之一。但恰好在这类作品里，未能像他的表现自我的诗歌那样有更真切的感觉，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使他关心艺术的形式，更甚于关心这些形式所要表现的内容。这种情况，在许多深受象征主义，或其他现代主义影响，后来转过来表现人民的生活的诗人，一时难于避免的。

为了表现人民生活的更加广阔的内容，形式不能不有所突破，在抗日战

争以后，我们看到，这位诗人由于思想的更新，由于自觉地卷入人民斗争的热流，在艺术的形式上也有了很大变化，他这个时期的诗集《灾难的岁月》，许多优秀的诗章，构成了他的创作的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高峰。《我用残损的手掌》，至今仍然是现代中国优秀的诗篇之一。它使我们看到，包括象征主义在内的现代主义，只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而不是全盘照搬，只要根据新的生活内容加以必要的变革，是有可能给文苑带来某种新的生机的。

十一

在“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的传播，对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决定性的影响。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从组织上把许许多多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团结在一起。鲁迅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他的文艺观点，他的文艺批评活动，实际上已经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艺实际相结合的体现，对推动革命文艺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其作用是巨大的。

但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艺实际更紧密的结合起来，成为系统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带来了“五四”以后，在文艺上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

从“五四”开始，文学革命便是整个思想文化革命的突出的部分，在长时期的整个革命斗争过程中，革命文学始终站在思想文化斗争的第一线，革命文学在整个思想文化战线上一直处于显要的地位，国民党蒋介石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很大程度是针对革命文学的。

在国民党蒋介石极残酷的文化围剿下，在国民党地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越来越困难重重。文学通常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的思想倾向通常表现得比较含蓄隐蔽，它一方面在群众中发生文艺特有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比一般的传播革命思想的媒介容易迷惑反动当局的检查官的眼睛，这就使得文艺在国民党压迫下，对促使群众革命化，能够发生更大的作用。中国的革命文学，首先像鲁迅、郭沫若、巴金这样的作品，曾经教育了不只一代的青年，促使他们觉醒，把他们推向革命的道路。中国的许多青年，都是在革命文学的影响下走向革命的。现代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没有受过革命文学的影响，没有受过鲁迅、郭沫若、巴金的影响的，是很少的。

但是，另外一面，中国革命的文艺界不少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出身，他们的环境，和他们所受的影响，使他们还存在着许多弱点，这主要就是需要克服，还没有克服，或者没有彻底克服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

中国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作家，包括共产党员的作家，他们对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比较坚决的，不少人在主观上还相信共产主义，但是，他们往往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加以克服。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它的主要的核心的东西，不外是主观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毛泽东说到有不少知识分子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没有入党，主要指的就是他们还没有完全抛弃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每一个真正决心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的作家都有必要用无产阶级伪思想来代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当时延安的整风运动，在思想上主要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在文艺问题上，主观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主要表现为脱离生活、脱离人民，不承认或者不理解生活是文艺唯一的来源，不承认或者不理解，或者不完全承认和理解知识分子有和人民结合的必要，对文艺首先要反映广大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这个革命文艺的首要任务，也同样存在着不理解的问题。

从“五四”开始，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中国革命文学已经走过20多年的路程，但是文学对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反映，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斗争比较起来，还有着不小的差距，真正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还不是很多的。现代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曾经发生过许多惊天动地的，震撼世界的事件和斗争，例如五卅运动，1925—1927年第一次国内战争，土地革命，但在文学上都得不到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些伟大斗争的表现。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有它许多原因，特别是在国民党压迫下，作家到群众当中去，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地区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地区，被完全隔绝，也给革命作家不能亲身体验和表现革命地区的生活和斗争以很大的困难。但是，不能不看到还有如上所说的作家自己的主观原因。

中国许多革命作家，需要解决深入人民生活，解决和人民结合的问题，需要克服主观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问题。在抗日战争以后，许多作家到延安，到了当时中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中心延安以后，这个问题就更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有许多革命作家到延安以后，不知道不但是到了另外一个地区，而且是到了另外一个时代，这就是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地区，和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时代。

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解放区的作家虽然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文艺脱离生活，脱离人民的现象还是相当普遍存在的。当时能够比较自觉地到群众当中去，并且反映他们的生活的作家，只是少数。

文艺来源于生活，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这个问题很长时间在很多作家思想上没有解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艺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文艺创作不能离开这个传统，离开这个规律。许多作家的创作，总是从受到前人的作品的启发开始，甚至是模仿前人开始，这就很容易颠倒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为向前人学习是最重要的，而忘记了作家虽然不能离开过去的文学遗产，不能不向前人学习，但归根到底只有生活才是创作的真正源泉，只有群众的生活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正是毛泽东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作了彻底的解决，而作家自己在和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相结合的实践中，就更加认识到作家和人民相结合，文艺和人民相结合的重要性。这是继“五四”以后又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又一次文艺观念的大更新。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像艾青、丁玲、欧阳山、刘白羽、周立波、萧军、田间、马加、草明这样一些老作家，都能够深入到生活当中去，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血液，带来了新的艺术生命，带来了他们新的创作高潮。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也鼓舞那些本来就劳动人民比较接近，较早地决心为他们服务的如像柯仲平、赵树理这样的作家，坚定了他们的信心，使他们的创作取得更大的成就。与此同时，一大批年青作家脱颖而出，其中贺敬之、柳青、马烽、西戎、杜鹏程、郭小川，是他们当中

在创作上有显著成就的。

自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首先是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家的实践经验，证实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的道路。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出现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创造了为过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经验，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也难免出现新的问题，这在前面对一些作家的论述里也提到过的，但这是新的事物在前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然，也是不应该忽视的问题，它是完全有可能在总结经验中加以解决，我们希望这套《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书》，在总结每个现代革命作家的思想和艺术生活中，也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总结我们新的人民文学的历史经验。

沙汀评传

第一章童年和少年时代：一颗浸润乡土文化的文学种子 (1904年冬—1921年夏)

沙汀生长在四川西北部丘陵的一个小县。乡土文化像遗传密码一样编织进了他的生命。开放的童年、少年赋予了他对世事、民俗、俚语特殊的敏感。过早地介入社会使他涉猎了较多的世态人情。他的故乡，他早年的生活成了他文学生命的源泉。

当然不能说沙汀生长的乡土环境是他成为乡土作家的决定条件。沙汀之所以成为沙汀是他和时代的选择。但是他诞生地地域文化环境的影响，他早年特殊的生活经历，与他后来文化性格的形成、艺术取向的确定和创作的风格特色有着密切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强调要联系人文背景来认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绘画艺术的繁荣和特征。恩格斯在致爱因斯特的信中还明确指出不要只是机械地从阶级关系方面，也要从斯堪的纳维亚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影响来考察19世纪挪威文学的兴盛和特色。沙汀也曾将他和艾芜作过比较，希望联系到乡土文化环境来研究他的作品。他说：“艾老的家在川西坝子，离成都只有三、四十里。我的家乡在偏远的川西北半山区。艾老长期离开家乡，作品也大多不是反映家乡生活的。我却不同，我与安县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写的东西也主要是反映家乡的。”“我认为，搞评论的，研究作家作品，一定要把作家所写的那个省、那个县的风土人情了解清楚。全国的。全省的政治形势，要通过那个县才反映得出来。这个意见，我曾向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的负责人谈过。”

面对沙汀文学学流涓涓汨汨的长河，让我们溯洄而上，去探看它的源头。

一 地僻而景常新 世远而人不没

假如你驱车从四川省省会成都出发，沿川陕公路向北行百余公里到绵阳，然后折向西行约20公里，就进入了沙汀的故乡安县县境，再向西北行30公里，便到了沙汀故居所在地安县县城安昌镇。

从行车的方向就可以意识到，安县在四川西北。它在川西盆地边缘。东与绵阳县、江油县毗邻，西南与绵竹县、德阳县接壤，西北同茂汶羌族自治县、北川县连界。地势从东南向西北逐渐增高，渐次为平坝、丘陵、山区。平坝和山区面积各约占总面积的18%和35%。中部丘陵面积最大，约占47%。平坝海拔不过600米，山区却将近900米，而千佛山主峰高2942米。

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它在先秦是羌族的一个部落国，与茂汶、理县、北川等同属冉駹夷。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统一冉駹，在这里设置了汶川郡。以后汉人逐渐迁入，于晋孝武帝时（公元373—396年）将属地建置为晋兴、益昌、西充国三县。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为龙安、西昌、神泉三县。元中统五年（公元1264年）并三县为州，称安州。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降州为县，开始称为安县。因为境内有龙安山即今的大安山蜿蜒如龙，故有此名。

1985年6月7日，沙汀在重返故里途中对随行人员的谈话，由仲呈祥录音，仲呈祥与笔者整理。

安昌镇坐落在安县中部山丘环抱之中。它背倚巍巍的圣灯山，面向火盘山与五云山连袂的丘陵。由北川县入境的苏包河，从城北向城西南奔涌而来，由茂汶入境的茶坪河，从城西向城南悠悠而来，相汇于城南，名曰安昌河，又名汶江，浩浩荡荡向东流入绵阳县境，汇入涪江，向南流入长江。

这个镇也有 600 多年的历史。它早在明洪武七年（公元 1374 年）开始筑建。明末曾毁于大火，于清康熙九年（公元 1670 年）重建。以后几经扩建，逐渐形成了城镇的格局。迨至清末，沙汀出生的那些时候，虽也遭到过水患、兵燹，但旧貌略无改变。其城垣顶宽丈余，可以驰马。外墙连雉堞高约两丈。城墙有东西南北四门。门各有楼，楼下各有栅门。城内主要街道有 6 条，还有一些小街小巷。不过街道部又短又狭窄。沙汀的一些以县城为背景的作品，描述街道之短，说在南门城楼上撒泡尿就会撒到北门城边的毛坑，从东边栅门跑到西边栅门不管你身上不会出汗，虽属艺术夸张，但也有一定的生活依据。至于街面之古朴，作品的有些描写与县志记载的情况，可以说基本相符。

街面是石头铺的，中间是红花石板，两边是饭碗大小的青色鹅卵石。大约年岁已经很久远了，这些铺石通是油光放亮的，尤其是在接连几天的大雨过后，再碰到出太阳，那景色就更加奇丽。

沙汀在谈到早年对故乡的印象时，总是作这样的概括：偏远闭塞，民性强悍。30 年代初修订的《安县志》也称此县：“地僻可景常新，世远而人不没”。这个县在川西盆地并数的“安绵德梓罗，温郫崇新灌”诸县中显得比较偏远，生活节奏总要慢一拍，但是民心却从不自甘落后。

仅以沙汀诞生的年代清末民初为例。

1895 年，成都爆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成都教案”。7 年后，川西一些县的义和团、红灯教举行起义，围攻并进入了成都。又过 6 年，即 1908 年，安县草鞋街义和团举事，捣毁教堂，同清军团练展开激战。次年 3 月，安县西北乡石泉、秀水乡红灯教又聚众习拳，相约起义。这一次次义举不免都遭到封建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仅石泉、秀水一次就有 80 多名红灯教徒惨遭杀害，但民众的反抗之声仍此起彼伏。

辛亥革命前夕，成都爆发保路同志会起义，“保路风潮”席卷川西平原。稍过些时候，安县同志会的人也暗中活跃起来。他们在邻县绵州人、同盟会员李实“排满革政”的思想影响下，参加了江油起义。接着桑枣、秀水乡一带还集合千余之众，在首领何鼎臣的率领下揭竿而起。他们都感到“光复”以后，服饰需要变革，却又不知道如何改变。一个个喊着反清的口号，身着“勇”字号褂，打着靠腿，手执戈矛、大刀、火枪，形同川戏舞台上的将帅出朝。这支队伍进城游行之后，经绵阳开到成都，与别县的同志会民军汇合攻打将军衙门，直到武昌起义才班师回乡。经过这次政治风暴以后，尽管县衙仍换汤不换药，但民众中“言共和而诟专制”的人逐渐多起来，一些封建宗法家族中，也开始“有失序而尊卑上下无分者”。

19 世纪末，成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初步发展，安县也办起了在全省数得上规模较大的织布厂，兴起了采矿业。拥有一定机器设备的资本主义生产，与大量落后的手工纺织、原始的人工采矿形成对比。

20 世纪初叶，随着成都的兴办新学，安县也先后办起了高等小学堂、培

沙汀：《某镇纪事》。

30 年代修订版《安县志》卷 55。

英女子小学堂。以教学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为主的“洋学堂”与遍及城乡的、供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的私塾竞相招徕着学生。好不容易有一批由新学堂培养的知识青年，打破“诗书济世长”的旧传统脱颖而出。他们中的佼佼者还曾东渡日本留学。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至发式、衣着给闭塞的县城带来许多喋喋不休的话题。据沙汀童年获得的印象，安县男子头的解放（剪辫）、女子脚的解放（放脚）都是在这些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开始的。辛亥年即沙汀6岁多的那一年，有个李复之的从成都归来，在城里最热闹的十字口一家茶馆里喝茶，引起许多人围观和街谈巷议。他的时称“拿破仑式”的发式新颖别致，比城里一般知识青年剪掉辫子后的发式显得更加漂亮。市民们有啧啧称羨者，有好奇者，也有哼哼唧唧骂个不休者。反正以后“剪辫子运动”广泛展开。警察、团丁把守城门，大剪除辫。自然，有欣然就范的，也有掩饰被识破而痛泣不已的，还有宁肯终年不窥户牖也要保住那长尾巴的。

这就是沙汀出生那个年代的文化环境。是一个充满了新旧矛盾的文化环境，是一个旧思想、旧习俗积层很厚的文化环境。

二先前那好听的伏伏声没有了

沙汀先祖原籍并非安县，而是湖北黄州。祖祖辈辈以农为业，曾屡遭饥荒，朝不虑夕。到了杨启梁这一代，适逢清乾隆帝继续推行康熙十九年开始的移民垦荒政策，鼓励湖广之民迁徙四川。杨启梁便束带川资，在“湖广填四川”的潮流中入川。他行至安县南乡即今河清镇龙湾子地带，见这里林森竹茂，足可安居，就出银向陈姓的富户买了田地房屋，在此立足。此后代代繁衍。到了祖父杨仁和这一代，杨氏的这一支开始发迹。也即当地人所说，这时候杨家老坟园长起了弯弯柏树。

据沙汀回忆，他出生时祖父已经去世，仅从神龛上看到过祖父的画像。他头戴清朝红缨制帽，身着清官朝服，正襟危坐，目光炯炯，俨然一尊威严的神。祖父很有学问，又擅长书法。遗留的墨迹中，有一幅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功力不凡，曾使后辈无不称赞。祖父曾在政府的粮房、户房供职。后来病逝于任内，遗体由大队人马前呼后拥抬回故乡，安葬于杨家老坟园，竖立了约两米高的墓碑。祖父任职期间，添置了两百多亩田产和一院阔绅的街房，将家属迁至城内居住。从这以后杨氏遂与农业生产劳动完全脱离，坐收租谷过活，以读书致仕传家。

祖父膝下有5子。长子杨义质即沙汀的生父。父亲在儿子的印象中也比较模糊。他在沙汀5岁时即已去世。他曾受祖父悉心栽培，也有一定的学识。曾在科举的岁科两试中居一等前列，取得了廪生名位，成为资历较深的生员。担负过具结保证乡里应考重生，无身家不清、冒名顶替等弊端的职务，每月可以从政府领到一笔补贴。他性情随和，有点书呆子气和一尘不染的味道。按当地的风俗，大庙会野台班唱戏，开始的那天要接灵官菩萨镇台，撒一种殊砂点染过的纸钱即“红钱”，捡到此物可以避邪和保吉利平安。每逢撒钱时，人们争先恐后拾捡，可是父亲却袖手旁观，即便钱落到他面前也不肯低眉折腰。父亲这样清高、散淡的人，上有先辈荫蔽，身处社会和世风衰败的王朝末年，自然是上也上不得下也下不得。文也文不得武也武不得。

杨氏购置的街房在县城西街22号。是一座三进的大院。当街的一进有五

开间宽。中间是八字龙门，左右各两间店铺。龙门典雅庄严，门坊上高挂着“岁进士”金匾。第二进是四合头院落。有宽敞的大厅，曲折的回廊，幽雅的庭院。厅堂的神龛正中挂着祖父的画像。两旁有祖父手书的楹联和本地著名书法家李森林题写的“闲中立品无人党”之类的联对。庭前有深不可测的井，有石砌的水池，有枝叶扶疏的腊梅、石榴。最后一进是一片宽阔的空坝。四周环绕疏落的竹树，中间有菜畦、果园。园中错杂地生长着梨、橙、石榴和两株高大挺拔的皂角树。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12月19日，即农历甲辰年冬月十三日凌晨，在那腊梅、石榴掩映的右上房内，沙汀呱呱坠地。

沙汀是老二。他哥哥杨朝缓，字印如，比他大三岁多。他取名杨朝熙。朝是班辈，熙含有光明、吉祥之意。两字连在一起，朝读女 chāo，则有向着光明、向着吉祥的意思；朝读如 zhāo，则又有早晨的光明和吉祥的意思。这当然是饱学的父亲挖空心思的创作。当时杨氏的门面还勉强撑持着。“杨公馆”有租收，有俸禄，仓廩实、衣食足，雇用着保姆、女佣。孩提时的沙汀过着优裕的生活。他的一应衣食起居，都有唤做朱大娘的保姆专职侍候。可是，沙汀的父亲和二叔父、二叔母几根支柱一倒，杨公馆就分崩离析。孩子的名字再怎么考究，也帮不了他的忙。

沙汀的父亲虽不具体管理家业，但由于他在五弟兄中居长。兼之有点功名，还多少有点威信。二叔为人忠厚，精于算计，受长兄委托管家，兢兢业业，堪称杨氏门中的台柱。三叔、四叔、幺叔均是好吃懒做的闲汉或只顾吃喝玩乐的公子哥儿。沙汀的父亲、二叔、二叔母去世后，几个叔父就争夺家财，吵闹分家。

其实在街邻的印象中，四叔、五叔都是很精灵的人。四叔喜欢养鸟，一双眼睛像百灵鸟的眼睛一样机灵。宠爱的一只百灵鸟死了，他可以伤伤心心地哭一场。幺叔懂得阴阳，会看风水，擅长捉蛇。安县有乌梢、翠青、黑眉锦等各种各样的蛇。其中赤链蛇最多，头黑，背暗红，有数十条红色斑纹，性极凶猛，常在与人造遇时发动猛烈袭击。所有这些蛇，在幺叔手下都只得摇尾乞怜。可是，两个叔叔成天游荡，酗酒，赌钱，抽烟，嫖妓。幺叔尤其阴险毒辣，被称为“杨五毒”。每当他招摇过市时，就会有人互递眼色：杨五毒来了，像伙又要下哪个的烂药了！两个叔叔为满足吃喝玩乐的需要，不免要变卖家产，也就理所当然地要受到长嫂的干涉。于是他们就把沙汀的母亲视为眼中钉，一再寻衅滋事，一再吵嚷分家。而每大吵大闹一次，沙汀的母亲就要痛哭一场，就得央人伸张正义。到了无可奈何的境地，只得同意分家。叔子们满以为可以占到便宜，殊不知母亲请来亲朋好友、本地名流詹棠、谢健卿、吴雨人等主持公道，不仅分得应有的一份家业，还因为沙汀曾过继给无子女的二叔，顶了一房人，又分得一份。这以后，叔叔们不得不哀叹失败，为遗产问题经常找母亲惹事生非。

大家庭的纠纷，使幼小的沙汀心里蒙上阴影。分家后债主的逼债，更使他童稚之心受到压抑。由于叔叔们的坚持，分家时给沙汀家分了大量的债务。据认为，这些债务大多是因为办理父亲、二叔、二叔母的丧事和修缮房屋欠下的，由沙汀家偿还是责无旁贷。每逢年节，债主就上门逼债来了。有个焦姓的大债主，雇佣了几个流徙此地的陕西人当管事。这些“老陕”见过世面，精明强悍，工于心计，能言善辩。他们背起褡裢打上门来，童稚的沙汀，既切齿愤恨，又心惊胆战。

“杨公馆”由兴旺走向衰败了。沙汀幼年那种养尊处优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那后院里的两株皂角树，在沙汀充满稚气的眼里，曾经是那么高大。它那伸入云霄的枝柯栖息过多少乌鸦。每当太阳西斜它们“放风”的时候，便伏伏地飞扑着。飞到街对面天后宫的皂角树上，又从那儿飞了回来。可是，曾几何时，皂角树的枝桠残败了，乌鸦也少了，那好听的伏伏声再也听不到了。有时夜深了，还传来一阵阵单调的聒噪。大人们就用异样的声音说：那是不吉祥的叫声，……

杨家的变故，叔叔们的吵吵闹闹，母亲的四处投诉，分家时的纷争，“老陕”那一张张凶神恶煞一般的脸，还有那皂角树上乌鸦的聚散和啼叫，都给年幼的沙汀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鲁迅曾经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是鲁迅从少年时代得到的人生体验。很凑巧，同属鲁迅后辈的巴金、艾芜、沙汀三位同龄作家，也有过大体类似的经历和体验。巴金的经历稍有不同。他眼见了一个罪恶的封建大家庭的崩溃，早年就恨这个家庭，养成了爱思索、忧郁和孤愤。艾芜倒是经历了由小康人家堕入困顿的途路。他的少年老成，就同这种境遇有关。青年时代爱好诗歌，也多少有借以排遣忧郁的成份，不过他总有一些童年、少年美好的回忆。沙汀同样尝到了家道中落的滋味。他与巴金、艾芜不同的是，他还幼小，又有一个能干的母亲的庇护。他没有那么多忧郁。可是家庭的动荡，人情的冷暖，也促使他较早的省事，影响到他独立、执拗的性格的发育和形成。

三最难忘怀是母亲

很少有作家不颂扬自己的母亲的。沙汀每忆及母亲，总是一往情深地称赞：我母亲很了不起，很能干，很有男子气概。

沙汀的母亲名叫郑妙贞。她并不是父亲的原配。父亲的第一个妻子姓陈，花菱乡豺狗坝人。母亲是城里人，祖辈也以诗礼传家。叔祖父郑香园还是举人，曾在甘肃为官。只是到了母亲的父辈家道才开始衰败。母亲12岁时，生母不幸逝世，父亲接着续弦。继母对她和弟弟郑慕周异常刻薄。她好不容易苦熬及笄。她一出嫁，血气方刚的郑慕周就离家出走。她到杨家来也没有过多少好日子。两个孩子才几岁就死了丈夫，孤儿寡母备受欺负。好在生活的磨难没有使她消沉，反而锻炼了她的胆识。她在邻里心目中，外表温顺，内里刚强。她虽也吃斋信佛，在祭祀和“庆坛”时十分虔诚，对人处事却很有主见。父亲去世后，叔子们一再生事，目的是逼她改嫁，以便侵吞家产，谁知她年纪轻轻就守起寡来。叔子们吵闹分家，以为她可以欺负，不料她没有退让半步。

分家后，母亲独立撑持长房门面，里里外外一把手。本来这房人拥有近百亩田产，有宽绰的住房，可以坐守家业。但她认为不能坐吃山空。大约在沙汀离开故里不久，她听说魏家碾房准备转卖，就往那里苦用心思。魏家碾在安昌河对岸，有源源不断的河水，从太平经大石崖流到大总滩，冲动水轮，带动碾磨碾米磨面。俗话说：家有团团转，胜过做知县。只要经营好这种成本低廉的粮食加工企业，就会有可靠的经济收入。于是她毅然卖了街房，买

了碾房，并且又卖了一部分田产，借贷了一笔资金，在碾房附近修建了一座两进的大瓦房，举家搬迁到那里。

碾房的原主十分狡诈。卖了碾房，却死乞百赖不交课升。母亲思忖再三，为不致因小失大，付出许多银元，交了课升。大总滩一带大部分属杨茂轩所有。这个恶霸也难对付。他肆无忌惮地侵占河边的地盘修房建屋，租佃给人开店设馆，坐收租金。为避免涨水时冲毁房屋，就修筑河堤，把水撇向碾房，威胁碾房的安全。母亲又不屈不挠地同恶霸斗争，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母亲把弟弟郑慕周当做重要助手。郑慕周从小离家当脚夫，做小贩，在淘金中当下苦力的金伙子，替人守店铺，睡人家的柜台，母亲痛念手足之情，把他叫到自己身边。沙汀8岁那年，母亲筹措了一笔钱，打造了两条木船，让郑慕周到涪江跑水上运输。谁知才去两三次，就空着一双手回来了。沙汀11岁时，母亲又给郑慕周一笔钱，叫他去川、陕边境买卖大烟。没有多久，仍徒劳而返。母亲并不多加责备。她的大度给沙汀的印象很深。后来郑慕周帮人经商，在哥老会中厮混。由于他秉性刚直，很讲义气，结交了许多朋友。母亲也因此扩大了社会关系，提高了社会声望，不再轻易被人欺负。

遇有危难，母亲也敢作敢当。有一年，同郑慕周共过患难的谢象仪因仗义替人复仇，杀了一个经常同袍哥作对的差役，犯了“刀案”。正临近大年，东躲西藏，无处栖身。郑慕周将此事告诉母亲。母亲没有半点犹豫，慨然允诺“案犯”到家里躲避。恰好保姆朱大娘的女婿陈炳正是城里的警察。母亲就叫朱大娘央求陈炳正趁晚上值勤之机，提起巡逻的风雨灯将谢象仪掩护到家中，藏在一间放坛子等杂物的后房内。约莫藏了一个多月，风声过去了，才转移到别的地方去。那些时日，幼小的沙汀经常去探看“案犯”，还缠着他“摆龙门阵”。他不怕什么“窝藏案犯”。他只是好奇，还觉得有点神秘，值得自豪。

母亲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每当受到家族的欺负之后，她总要含泪对着孩子说：只要把你们两个“冤孽”盘大了，我的心愿就了了。两个孩子，老大块头大，像母亲，可是胆小怕事，见生人还脸红；老二矮小，却胆大调皮，总爱惹事生非。她开初喜欢老大，不喜欢老二。后来见老大遇事总是很懦弱，而老二很爱动脑筋，记性又好，又喜欢老二，不喜欢老大。她同许多普通妇女一样，喜爱中往往包含着溺爱。她喜欢甜酒，也放纵孩子喝。沙汀的嗜酒从小时候就开始养成了。她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很强，认为无论娘家婆家都是书香门弟，子孙后代只有读书才是正道。两个孩子一到读书的年龄，她就不惜一切代价聘请塾师教读。不过，少年沙汀长时间都不用功读书，还因为贪玩、逃学，常常受到老师的批评甚至体罚。母亲对此心情曾十分矛盾。她希望老师严加管教，但当老师对儿子施以重罚时，又忍不住出面说情。沙汀12岁那年的一天早晨，该起床读书了，他却赖在床上不肯起来。母亲气急败坏，掀开被盖就狠狠地打。可是才打几下就住手了。她泪如泉涌。说她是如何如何地省吃俭用，乃至拖起账也让他读书，谁知他竟这样不争气。老二是不怕母亲的，此时也有几分畏惧了。

这就是母亲。母亲对小时候的沙汀影响是很深的。她的外表冷静、内里敏感，她的自主精神，她的敢担当风险，以至她爱吃酒之类的嗜好，对儿子都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四有意栽花花不发

沙汀两兄弟都是破蒙之年就“发蒙”。

当时安县已开办新学，但私塾仍遍布城乡。私塾有散馆、专馆两类。散馆由塾师在家中或租房、借庙宇设馆。每年农历正月十五过后，在馆门贴出择吉于某月某日上学大吉的通告，孩子的父母前去面议修金以后，即录取孩子入学。专馆是由东家聘请塾师坐馆教学，修金优厚，代价昂贵。塾师的启蒙教育，大多是从教读《三字经》后页的八句开始：“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接着教授《三字经》、《千家诗》、四书、五经。还教一些杂书，写字，作文。

先是沙汀的哥哥发蒙。母亲尽力为哥哥开设了专馆。聘请的塾师姓王，乐兴乡人，年近花甲，读书不多，没有功名，精通医术，常为人拿脉治病。王老师的膳宿、聘金由沙汀家负担。邻居中有送子弟前来附读的，按家景和年龄的不同多少付一点聘金。不到6岁的沙汀还没有入塾，但他常与学生们厮混。有时还同老成持重的王老师开点玩笑。例如躲在室外发出几声怪叫，突然向室内撒一把泥砂，气得老师摇头叹息。

沙汀一满7岁也上学了，自然仍旧是专馆教读。教他的第一个老师叫孙永宜，桑枣乡人，在一所初级小学任教，兼任专馆塾师。他教没多久，因为家里劳动力缺乏，就辞职回家了。他在家乡也教过一段时间小学，后来受排挤，一气之下，辞去教职，种庄稼、卖小菜度日。这个启蒙教师给少年沙汀印象很深。他很有骨气，不像一般的读书人。

第二个老师蒋品珊，也是桑枣乡人。他是前清的秀才，当地知名的书法家。县城南门外天星楼的匾额就是他的手笔。他教沙汀兄弟俩的时间最长，对沙汀爱好书法的影响很大。他要求沙汀每天都写几篇“核桃字”，弄得这个蒙童喘不过气。有一件事给沙汀的印象极深：有一次他的书有一页破损，其中又有几行必不可缺的注释，蒋老师叫人替他补好。他说他不需要别人帮助，由自己动手。蒋老师对这个贪玩的学生很不相信：你能够补好吗，你补好了，我给你半天假。结果，他拖延了半天，于次日把书补好了，蒋老师果然让他玩了半天。

蒋品珊之后，又一个老师是于瑞武。本城人，也是秀才。他的性情比较开朗，有时很有兴致地给学生讲《聊斋》故事。少年沙汀听得似懂非懂，但觉得那些狐精鬼怪的故事比诗书有趣得多。

沙汀十二三岁时，因为给舅父跑交通、运武器，一度辍学。后来舅父从军走了，又才安心继续读书。母亲一连为他聘请过两个老师。一个是从中江县高价聘来的游春舫。此人脾气古怪，架子很大，不满一年就不干了。一个是谢健卿，沙汀二婶娘的兄弟，给沙汀兄弟俩补习国文。他的教材多选自《古文观止》，还试行命题作文，少年沙汀还有兴趣。

在这些时候，街邻中也有少年沙汀的不是老师的老师。如街对面有个张著成的，就曾辅导过他。张著成对川戏有研究，能唱须生，会打小鼓。他借了许多川剧剧本给沙汀看，带沙汀去“摆围鼓”。他还擅长书法，常应邀给人写门对、挽联。他知道沙汀系杨氏大书法家的苗裔，对沙汀格外器重。他要沙汀同他一起临摹黄庭坚的《松风阁》。教沙汀练悬腕、用悬笔。先是请人打造一支铁笔，在沙盘上练习，而后提笔在纸上驰骋。每晨必写几十个字才吃早饭。他告诉沙汀，安县过去有个名叫伍生辉的县长，因“黄体”字写得极好，后来成为成都的“五老七贤”之一。此人最初从陕西到成都候缺时，

曾在望江楼写了一副对联：“枯井冷斜阳问几树枇杷何处是校书门巷/大江横曲槛占一楼烟月要平分工部草堂”。碰巧成都的一些官员到望江楼游览，见此联出手不凡，查问下来，才知道是一个入蜀候缺的人所为，立即决定放他到安县当了县长。这个故事给了少年沙汀很大的鼓励。

沙汀从发蒙到17岁去成都读书，10年中有8年多在私塾就读。他读私塾的时间之长是少有的，享受专馆教读的特殊待遇也是不多见的。可是他说不上自幼饱读诗书。他除了对书法有兴趣外。对习诵诗书的生活一直觉得枯燥无味。他常常旷课，常常以各种借口逃学。他早年接受的文化教育为他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础，这自然对成为作家有用，但总的说来意义并不大。他的书法倒不错。后来的写作几乎全是漂亮的蝇头小楷。母亲为儿子的读书煞费苦心，眼巴巴地望儿子走读书致仕的路，谁知生活中往往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五一本本生活的活书

少年沙汀常常逃学，他逃到哪里去了呢？

他由贪玩、好奇的驱使，到热闹、好玩处转游，跟舅父瞎混去了。

天气晴好的日子，他头戴瓜皮帽，身穿蓝布长衫，外套羽纱马褂，牵着黄花小狗，在街上游荡。看老母猪拖着臃肿发红的肚皮穿过街道，看狗们四脚长伸地躺在檐前打盹，无所顾忌地调情交尾。

遇到落雨的时候，他戴上大人的斗笠，赤裸着双脚，在街上迈步。街面的红花石板，经雨水洗涮，光滑如镜，踩在上面惬意极了。

十字街口是他常去的地方。那里有酱园铺、杂货铺、烧腊摊、茶旅店。店铺前的街檐边，有卖花椒、竹笋、皮蛋、鱼虾、灰硷的小贩和山民。往南拐弯的一间公共厕所的墙壁，是全县的新闻发布处，经常张贴官方的告示，私塾的通告，拍卖的启事，庙会的喜讯。刘家酱园掌柜的白胡子老头，神情是那么凶恶，可是卖的酱油是那么香、那么稠。卖豆芽的“老陕”，是在陕西犯了“命案”逃亡到这里来的。他抚养的那个十来岁的孩子，是那么可怜，那叫卖的声音是那么凄楚，可是卖的豆芽那么嫩、那么脆。卖凉拌猪头肉和薄饼的萧大汉儿，身材魁梧，浓眉大眼。他原是巡防军“吃粮的”，保路风潮杀赵尔丰的时候，趁火打劫，抢了许多银元和一支五子快枪。后来银元输光了，枪也被袍哥大爷下了，但是他仍旧那么神气。他常常将自己打扮得像威武的行者武松，鬓角拖着水发，背上背一把锃亮的宝剑，吹他在成都的传奇故事和所见所闻，招引来许多孩子。摆糖饼摊的陈麻子，总是那么专心致志地守着他的营生。他端端正正坐在草蒲团上，右边摆着一张方形的摊桌，上面铺着油光可鉴的汉白玉石板；左边放着一只小火炉，连接着木质的风箱。他呱呱达达地拉着风箱，火苗就一闪一闪，炉子上铜勺里的红糖便滋滋响。他将糖汁倒在石板上，用铁质的工具抹压卷折，铸成各种各样的鬼神：鸡脚神、吴二爷、胖官、小鬼；各种各样的动物：鸡、鸭、鱼、龙。线条清晰，栩栩如生。茶馆前那个外地来的修眼镜的，也是一个“眼镜”。他将工具箱放在哪里，随身的那只狗就守在哪里。他忙活计时，狗沉沉酣睡。他上厕所或去食店端面，狗就昂起头来，机警地看着周围的一切。谁要是走近工具箱，它就呲牙咧嘴，狺狺狂吠。“眼镜”说，他先前是带过两三个徒弟的，不料他们都偷他的钱、物溜了，现在再也不带徒弟了，这世道狗比人还有情有义。

街上的茶馆，舅父常去，少年沙汀也经常跟着去。小小县城，茶馆有 10 多家。那眼睑红肿、外号“唐摸王”开的茶馆，那见钱眼开、人称“金眼鸽子”的萧清森开的茶馆，那茶旅兼营的“尚友社”、华泰社，都是很热闹的。这些茶馆各有各的常客，茶客各有大致固定的座位。在上层人物云集的“益园”，不会看到地位低贱的工匠。在下层群众聚集的“古泉亭”，很少有地位较高的斗行老板。泥水匠总是在靠近炉边的一张茶桌吃茶，便于点火吸烟。泥水匠的烟瘾很大，夜里不噙着烟嘴就睡不着觉。有些茶客常常早晨一起床，便一面扣钮扣，一面眊眊然哼着小曲上茶馆。等到卖豆芽的进来，抓几个小钱的豆芽，摊在桌上一根根择理。患结膜炎的茶客，还把茶水当药水，呷过几口茶，捞几片带水的茶叶擦洗着眼睛。一些民事纠纷，也往往拉到茶馆里来解决。发生争端的双方，请来乡绅富贾、名门望族、同宗长辈，评判是非，论断输赢。输理的一方，得开销茶钱。这叫做吃“讲茶”，叫做：“一张茶桌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到了晚上，有的茶铺在短暂沉寂之后，复又热闹起来。那是“摆围鼓”开始了。桐油吊灯昏黄的光照下，业余川戏爱好者们敲锣打鼓唱起了川戏。常常开台锣鼓一响，少年沙汀就溜去了。后来还学着声嘶力竭唱黑头。母亲发现了，怕把儿子的嗓子唱坏，坚决呵斥制止，才渐渐少去了。

城里讲“圣谕”，对少年沙汀也很有吸引力。当时有个李裁缝很能讲。他声音宏亮，表情丰富。常常讲些“段子书”，一些人生的悲欢离合故事，赚得许多听众的眼泪。沙汀 13 岁那年，有个任过女校稽查的寡妇，矮胖胖的，脸油黑油黑的，也不避忌讳，登台演讲。讲到动情处，台上台下一片歔歔之声。可是没讲几次，一些不良子弟前来怪声怪调地胡闹。半夜还去敲门，尖声尖气叫“小寡妇”、“小冤家”陪酒。她只得不再登台，曾使少年沙汀深为惋惜。

县城外南河坝的市场，少年沙汀也常去。每逢场期，那里非常热闹。卖粮油柴草的，家禽家畜的，竹木陶器的，小玩小食的，应有尽有。春天赶梓潼会时，不只本县各乡镇，邻县各区乡以至成都都有大批生意人、手艺人到这里赶会。一时间，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卖膏丹丸散的在摊子上摆个狗熊脑壳。吹嘘他的膏药是真资格的熊油熬制的。卖书的摊开四书、五经、孝经、尔雅，念上一两个精采的段落。有一种叫“牌坊架子”的，一个竹片编成的架子，上面挂满了书，大多是成都的书商印制的川戏和曲艺唱本。有一年，从河南黄泛区逃来一些难民。其中有耍把戏的，有 20 多岁的妇女，有十三四岁的姑娘。她们腰扎红布带，蹬坛子，爬云梯，踩软索。领衔的一面敲铜锣，一面问姑娘们：“小把戏，你们哪里来的？”回答：“河南来的。”“河南来做什么？”“耍把戏。”“耍把戏做什么？”“挣钱哄肚皮。”等观众给了钱，就开始表演。当时的沙汀看得很开心，觉得很好玩。及至年长，回忆起来，不免辛酸。

东门外的灵官楼，布满了少年沙汀的足迹。那是顺着山坡修建的一幢石砌的建筑。面积约 40 平方米，供奉着泥塑的灵官菩萨。楼侧有三间平房，一间住庙祝，两间鞭炮、茶炮作坊。传说手执钢鞭的灵官很灵。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绵竹有名的以“跟门神打仗”（打家劫舍）为职业的浑水袍哥侯国志，带领两千人的队伍攻打县城。城里人纷纷逃难，少年沙汀也随大人连夜坐箩筐“吊城”到圣灯山吴麻子家躲避。驻扎县城的一个连队勉强迎敌。正当侯国志的队伍狂言呼降时，忽然呼地一声枪响，侯国志中弹受伤。侯国志

的兄弟伙惊惶万状：枪是谁放的？子弹是从哪里打来的？顿时军心动摇，慌忙撤退。后来人们都说，这是灵官菩萨显灵。逢年过节，这里常常搭台演戏，有时还演出连台大戏。木偶戏、皮影戏自不必说，经常都有。有个姓蒋的“蒋木脑壳”，表演的木偶戏特别有名，曾使沙汀看得入迷。

北门外的金霞洞，少年沙汀去过多次。步出北栅门，约三里许，便到了那里。它的左手是架有索桥的急流险滩，右手是长满茅草树木的山坡。洞前有一座观音殿。泥塑的千手观音，很像孔雀开屏。洞内幽深莫测，中有奇形怪状的钟乳石，有积水流泉，终年寒气袭人。富有好奇心和冒险精神的少年沙汀，曾备足火把深入洞中，试图探测到底。终因大人反对，没有走到尽头。

圣灯山朝山期间，少年沙汀也曾混迹于敬香的善男信女之中。西望这高高的山峰，蓊郁的树林，诡奇的云彩，闪烁的庙火，曾引起他许多幻想。及至爬上山来，果然如入胜境。山上有一本两枝、两人合抱的翠柏，有年逾500的银杏，有“滚龙抱柱”的普照寺，有石虎眈眈的华荣寺。不愧为“安县八景”的第一景：“圣灯一盏照安州”。可惜好景不常。山上有的和尚，本来早已皈依佛门，却不恪守清规，下山同女人厮混。被捉奸捉住后，庙里不得不砍树木抵交罚款。有些地主乡绅见有机可乘，便给和尚大泼污水，趁此敲诈勒索，指挥人上山滥伐树木。这以后，山上的树本就逐渐稀疏了。

沙汀上十岁时，东门外山坡间又掀起了淘金热。这也引起他的好奇。这地方是在一条叫下街子的栅子门外的左手边，是从灵官楼延伸过去的黄土丘陵，俗称金厂梁子。淘金者搭起一个接一个的棚子，形成了一条街道。其间有各种各样的赌场：摇单双的，掷骰子的，压牌九的；各种各样的食摊：卖油饼的，卖肥肠汤锅的，卖凉粉的，卖烧腊的。山坡间有许多明槽暗洞，衣不蔽体的金佚子挥汗劳作。淘金的经营者都是有权有势的人，或是有权势作后盾的财主。这种既有诱惑力又冒险的行业，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竞争，引起明争暗斗，引起刑事纠纷。沙汀对淘金的知识，从少年时代就有了。

少年沙汀的贪玩好奇，在邻居中是相当有名的。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种贪玩好奇，使他摆脱了私塾的束缚。读到了一本本生活的活书，扩大了视野，活跃了思想，受到了另一种文化熏陶。

六一段传奇故事

沙汀十二三岁时，为给舅父郑慕周跑交通、运武器，介入了社会斗争。

郑慕周在袍哥以后，同许多袍哥头领有了交往，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他尤其得到县城龙头大爷李丰庭的赏识，两人结为拜把兄弟。这时，永安乡的袍哥大爷陈洪顺的势力正在膨胀。此人原是一个大土匪头子，外号陈红苕。在辛亥革命的那年，趁浑水捞鱼，收编了从内战中溃败到安县的“垦殖军”一连多人，扩大了队伍，并自封为司令官。他带领武装，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同时对李丰庭的坐镇县城极为不满，扬言要把乾坤倒转过来。陈、李二人遂由貌合神离到明争暗斗。陈虎视眈眈，步步进逼，李则不免色厉内荏，节节退让。

陈、李二人合伙武装保贩大烟，从中渔利。有一次因分赃不平，陈红苕大为光火，蓄意挑衅。一天，他醉醺醺地从城隍庙出来，见李丰庭擦身而过，转身一把揪住对方，恶狠狠地地质问：“为啥子你李麻子出动的人少，分的红多，我出动的人多，反而分的红少？”接着不由分说，破口大骂，打了李一

记耳光：“老子把你的麻子炒来下酒！”李丰庭见在人众之中，顾全体面，加之本来就胆怯三分，只得忍气吞声，悻悻地走了。

袍哥都是死要面子的。这件事发生以后，李丰庭越想越觉得输光了脸面，认为已无颜在城里发号施令，便悄悄躲到乡下去闲居。已任袍哥执行管事的郑慕周和谢象仪去拜望他，他将详情告诉了两位弟兄，唉声叹气说：“我还操啥啊，我没脸见人了。”谢象仪气愤愤地说：“李大爷，我们给你报仇，你敢不敢承事？”李丰庭说：“只要你们帮我把这口恶气出了，我拿50亩田的财产给你们跑滩。”素有心计的郑慕周默默地看着拜兄，没有多语。

郑慕周和谢象仪曾向桑枣乡的何鼎臣谈起此事。当时何鼎臣已在扩大武装以后担任军职。这个外号“何天王”的鲁直的汉子，向两个年轻人拍拍胸口说：“老子给他陈红苕抹脱，把红苕炖火吧！”他主张诉诸武力。谢象仪对此十分赞成。可是郑慕周却异常冷静，他感谢何天王的侠肠义胆，但认为这事得从容计议。他同谢象仪商量过后，决定改为智取，采用“韬晦之计”。

郑慕周用各种理由同陈红苕接近，甚至不惜抹下脸为陈司令跑腿办事。他本来过去同陈红苕没有个人恩怨，很快就取得了对方的信任。

1917年正月十九，传统的上九佳节。按照安县的风俗，这天赶“上九会”，或称“灵官会”。东门外灵官楼旁的戏台子敲锣打鼓，上演《欢娱楼》。看戏的人扶老携幼，人山人海。11岁的沙汀也跟着母亲，浸沉在欢乐的海洋中。此时，郑慕周、谢象仪、侄子郑志宽等5人却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实施他们密谋已久的“上九行动”。

他们奔南街西南局而去。西南局系安县西南各乡上层人物进城驻足之所。里面设有茶馆、旅舍、烟馆。人来人往，嘈杂混乱。在烟馆的一间内室里，陈红苕正宽衣解带，躺在烟灯前过瘾。烟灯对面斜倚着一个高个子、他的同伙陈么长子。陈红苕的马弁、随从早已经主子恩准，看《欢娱楼》去了，郑慕周来到烟馆前，以目示意，叫谢象仪、郑志宽等在门外警戒，只身进馆入室。他向司令拜个晚年，拱手请安，然后随意攀谈。不一会，陈么长子趿鞋出外小解，郑慕周便以羡慕的口吻谈起司令枕边那支乌黑发亮的手枪。最喜奉承的陈红苕顺手将枪递给他，得意洋洋地吹嘘这支大机头的洋货如何如何的好。郑慕周像摆弄玩具一样端详一阵，于玩笑间调转枪口，对着陈红苕呼呼两枪，打摊在床上，还自言自语：“他妈的，走火了。”此刻，陈么长子刚刚上厕所回来，惊问：“这是哪里在抖簸簸（打枪）？”谢象仪快步上前：“这里在抖！”随手将么长子撂倒在地。听见一声声枪响，局里顿时人声大哗，一片慌乱。郑慕周等人趁混乱出门，高喊：“陈红苕是我郑慕周打死的，与别人无关——都不要害怕！”然后上街通知正在下南街的李丰庭，一道出城过河，沿南塔山梁子转移。

街上已一片混乱。行人逃散，店铺关门。灵官楼看戏的人也正惊惶四散。沙汀的表爷林伯琴在人群中找到了他和母亲，悄声告诉母亲：“是你兄弟把陈红苕打死了，赶紧带起孩子逃走！”母亲拉了沙汀，就近到南街的青云堂药铺躲藏。母亲深知事态严重，心里咚咚直跳。沙汀却并不惊慌。他早朦胧地意识到舅父会杀陈红苕，觉得这是很自豪的事。偶然见药铺里私塾的学友刘佑炳、刘佑昭两兄弟有一本绣像本《三国演义》，喜不胜喜，先看绣像，后看文字，囫囵吞枣地谈起“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来。

陈红苕并没有即刻咽气，抬到永安乡以后，才停止了呼吸。他的部下刘世荣带领约两百人进城，火焚了李丰庭的一座新盖的院子，还要将南街、西

街一并付之一炬。一些袍哥头子出面威胁，官府也进行阻止，这才暂时作罢。但是一连几天派人把守城门，盘查行人。官方也不免出动人马缉拿凶犯。沙汀在药铺里藏了几天，由母亲给他化了装，包了个白帕子，把额颅遮去大半，混过城门口的岗哨，到南塔梁子的林伯琴家中躲避。半个多月后，郑慕周和谢象仪到秀水河，通过叫向莫高的袍哥大爷转告何天王，请由何天王带几连人马，会同西南乡的袍哥队伍 1000 余人开赴县城，才将刘世荣一伙人驱逐出城。沙汀一家人也才回到县城。

郑慕周和谢象仪为防备陈红苕部下的报复和官方的追捕，招募了 20 多个兄弟伙，辗转于石梯子、萧家埝、何家沟等地，准备武装对抗下去。沙汀常暗中去看他。他很羡慕那种惊险的生活，一去就要住两三天，甚至十来天。有时母亲还派他送情报，舅父也叫他跑联络。有一天，已经黑净了。母亲神色慌张地向他附耳嘱咐，赶紧去叫舅父转移，官府已经打听到他的行踪。沙汀踏着昏暗的夜色，跌跌撞撞爬坡下坎，直奔何家沟。沿途有风摇残叶，飒飒作响，似有人跟踪，有座座坟茔，点点磷火，如鬼眨眼睛。他没有害怕。他本来有胆量，加之重任在身，心中有个目标，很快到达了目的地，告诉了舅父。

舅父不断扩大武装，需要增加枪支。他为此事发愁，母亲也为此操心。少年沙汀还出过去抢的天真的生意。那时有军队驻扎县城。有个上尉副官张绍武带着家眷霸占了沙汀家的两间房子。开初母亲坚决反对。俗话说：宁肯让人停丧，也不能让人成双。就是说宁愿外人停放灵柩，也不要让外姓夫妻居住。可是对作威作福的军队有什么办法。何况这副官来头不小，是张凤梧旅长的侄儿。母亲没有了主张，问计于孩子。少年沙汀说：那么，就供个祖先牌位嘛。于是母亲就设立了祖先牌位，上页写着天地国亲师位。其所以不写君亲师位而写国亲师位是因为已是民国，可是少年沙汀好生不解，一再向长辈提出疑问。张副官夫妇住下以后，出人意料，同房东相处得很好。母亲会做盐菜、腌菜、腊肉、萝卜蜜钱，常常请客人品尝。客人也礼尚往来，送给房东糖果瓜子。有一天，张太太忽然悄声问母亲，有没有人买枪？母亲听了，心中暗暗叫好，觉得这真是天赐良机，满口答应转卖。其实副官夫妇凭着与张凤梧的关系，早就大胆做枪生意了。他们的生活如此阔绰，出门坐很漂亮的红豆木轿子，钱财的主要来源就是倒卖枪支。母亲借口转卖枪支，替舅父买了一批短枪。

由谁给舅父送枪？只有胆大、机智的少年沙汀。母亲将他精心打扮一番，换上一身崭新的长衫马褂，让他提着盛挂面、盐肉的竹篮，像小舅子走亲戚的样子。那些礼品下面，隔着一张毛巾，就是乌黑发亮的手枪。少年沙汀就这样往来于城乡之间。这个矮小个儿的孩子，从容地机警地穿行于山丘田野、竹林茅舍，干着惊险的差事。不知怎么没有人注意到，这小舅子哪有那么多亲戚要走。不多久，这买枪、送枪的事让张副官知道了。他问明了原委，了解了击毙陈红苕的经过，不仅没有阻止，反而对郑慕周的侠义行为赞不绝口，对少年沙汀的勇敢也一再叫好。这以后，他竟公开同舅父做枪生意了，还把自己的女儿拜寄给舅父，赠送了一匹马。少年沙汀很快就学会了骑马。驰马下乡，乡村道上，轻蹄得得，跑情报，送东西。舅父拉起了武装，无所畏惧，再也不东躲西藏了。少年沙汀也是轻易不好惹的了。

后来，何鼎臣的预备团被收编为吕超部属的 18 团。沙汀的舅父就带起队伍投奔到他那里，被改编为 18 团的预备营。完全出于江湖义气，舅父推崇谢

象仪当了营长，他自己任连长。何鼎臣死后，谢象仪升任团长，舅父任第三营营长。大约在1920年，吕超的队伍在军阀混战中溃败，吕超跑到广州投奔了孙中山，舅父所部被刘成勋的第三师收编，他当了混成旅旅长。1925年，军阀火并，刘成勋的势力岌岌可危，舅父的一些部属主张倒戈。舅父认为刘成勋待他不薄，不愿做反脸无情的事，遂辞去军职，回归故里。

少年沙汀在为舅父跑联络期间，认识了不少乡镇的头面人物。他对他们不仅有一般的印象，还知道他们的许多生活细节、奇闻轶事。尽管这大多是好奇心换取来的，但不自觉地积累了不少生活素材。如桑枣乡的何天王。此人拉队伍、受整编担任军职以后，因为在防区出色地办了几件大的“刀案”而声名大震。他粗识字，敬重知识，也爱读书。最喜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他吹嘘他早年坐牢时，即使被“猪屎链子”的大铁链拴着，也若无其事地读“三国”。他的脾气也很古怪。赌钱时占了上风，非一分一文逗硬不可，但输家当场向他借钱，他又慷慨解囊。他带队伍袭击盘踞县城的刘世荣土匪武装时，亲自站在滚钱坡前沿指挥。正在此地避难的少年沙汀怀着无比的好奇一瞻风采。只见他精神抖擞，声若洪钟，喝令如山崩地裂。又如秀水的袍哥大爷向奠高，此人浑名向浑，又名向饥荒。据闻每日三餐，餐餐大肥大肉，仍常叫饿得发慌。冬日烤火取暖，火盆烧得通红，还要骑在火盆上烤“霸王火”。早已不能进行房事，还骗了一个漂亮的闺女为妾，弄得来袍弟向履丰后来把嫂子身孕的因由说得神乎其神。他替别人“较梁子”（复仇），被砍断了胳膊，哼也不哼一声，神色自若地叫人用木板将他抬到茶馆里评理。他在成都赶花会期间，到东大街马裕隆百货商店买瓷器，店员叫他不要用手触摸货物，他偏不听招呼，还大模大样地掏出一大把银钱，叫店员取过一套细瓷餐具，随手扔在地上打碎。又如桑枣乡的上财主“萧狠人”。为人吝啬、刻薄。其亲妹想吃一点海椒也不允许，他怕因此增加饭量。两个亲兄弟生活拮据，向他说破嘴皮也借不到一文钱。他的儿子气愤不过，串通沙汀的一个表叔拉他的“肥猪”。他们在半夜将他两眼蒙住，用滑竿抬上在院子里转圈。佯称已到了某地某地，然后将他关在苕窖里，要他供出藏银钱的地方，才把他放了。还有桑枣乡的龙佐卿，城里的杨么大人、钟子吉等等。他们的经历，他们的为人，他们的趣闻，都保存在少年沙汀的记忆里。

由于四处活动，少年沙汀对安县基层政权、帮会组织和其他一些社会势力也有了初步的印象。例如对安县的哥老会组织，有了一些了解。这个组织在清末曾是反压迫的帮会，参加的人大多是社会下层人物：小商小贩，手工业工人，无业游民，少数受恶霸地主欺负的小粮户，破落地主家庭子弟。它每年都要举行“开山”典礼，择吉为新入流的袍哥确定从小老么到一排大爷的名目。入流的袍哥叫“掐了眼睛”，算是成了人样子。这些掐了眼睛们人，有不少都像少年沙汀心目中舅父、谢象仪那样的人，有一种“绿林好汉”的气概。辛亥革命中，他们大部拥护“灭满兴汉”的口号，穿起戏装集会表示支持，后来，许多地主豪绅、基层政权的头头也纷纷涌入哥老会，并且用钱买到袍哥大爷的牌子，这个组织的实权便落到了这些人的手里，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

少年沙汀为舅父当差有一年多时间。他不仅在本县袍哥头头中有名，而且绵竹、什邡一带的袍哥大爷也同他认识，叫他做“杨二”。他介入了社会生活，而当地社会形态也以种种“软件”的形式输入他的记忆。

七及至束发之年

在母亲心目中，少年沙汀长时间都是“不懂事”的。到了将近束发之年，这孩子才渐渐“懂事”。

这些时候，他再也不跟袍哥混了，再也不游荡，不进茶馆了。他开始认真读书。每天黎明即起，诵读诗文。有时晚上还伴着油灯，苦读到深夜，他反复读了《古文观止》，还读了《饮冰室文集》。他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他同本县新学堂的高小生，同在成都、江油、绵阳上学的学生有了来往。他的哥哥杨朝缓虽然在读过两年高小后即加冠受媳，但同新学堂的同学有亲密交往。他通过兄长的关系认识了不少同学。他同他们一起讨论和比较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发现自己的知识结构有很大缺陷。他努力向他们学习，迎头赶上去。

城里的一些社会青年，由李心泉发起组织了一个社团，叫会文社。参加的人有初小执教的教员，做文牍的文书，小学毕业经商的小商，约20余人。大家商订在每年春节举行一次聚餐会，并且合伙开办了一个文具店。沙汀也参加了。他希望同青年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

他还同杨承棋、陈克玺、谢荣华指天为誓，结拜为兄弟。他觉得这几个青年比他有学问，都有远大志向，同他们交往可以激励自己上进。他已朦胧意识到，应该有自己的抱负，将来要干一番事业。他们常常相聚互相切磋，谈古说今，指时弊，表明志向。还以满腔热血披览《史记》。尽管一知半解，但都兴致勃勃。他们还一起练字。陈克玺艺高一筹，青年沙汀要与之比试。后来苦练，请人品评，认为已不相上下。

安县的袍哥组织不断发展壮大。青年沙汀要不要操袍哥？舅父说：坚决不准操。他从舅父所言，也就没有入流。舅父从军后节节升迁，此时青年习武从军之风盛行，沙汀的几个拜把兄弟都怂恿他写信给舅父要求投笔从戎。舅父立即回信阻止。1921年，舅父所部驻防灌县。青年沙汀和谢荣华去当面要求推荐进刘成勋第五师办的一所军校。舅父力劝不要上军校，也不要再读私塾，而要尽快去成都上新的学校。后来，沙汀的拜兄杨承棋、陈克玺从军之志得以实现。杨承棋在邓锡侯部下官至副旅长。解放军入川时率部起义，受到热烈欢迎。解放后一直过着安定的生活，宜至病歿。陈克玺在抗日战争中驻防广州，于敌机的一次轰炸中牺牲。谢荣华极为窝囊。他系谢象仪之子，与少年沙汀同过私塾，与青年沙汀一起进了成都的师范学校。以后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入了党，毕业后在“艺术剧社”混过一段时间。但遭到逮捕即刻自首，后来又在四川一个县的国民党党部工作，作恶多端，解放后依法劳改。

当青年沙汀面临一次次人生选择的时候，是舅父替他作了主。舅父虽系袍哥出身，却不准任何弟男子侄当袍哥，虽靠入伍发迹，但始终认为沙汀不能走这条路。这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磨炼成长的传奇人物，身上有着书香门第的遗传因子。后来在吕超部下与吕超侄子、一个有文化有远见的军人的深交中，又受其思想影响，认识到新一代青年应该赶上时代新潮，取得学业成就，成为一个现代青年。他对青年沙汀的秉赋和个性也似乎有一定的理解，觉得这个外甥应该走读书成才之路。他就按照自己的意志左右着青年沙汀。在这方面，母亲自然是办不到的。

然而，舅父也好，母亲也好，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造就作家的意识。

是造化（当然是社会）按照作家的要求设计了沙汀的童年、少年和前期青年时代。

沙汀是 17 岁离开家乡到成都上学的。他在故乡生活的时间比巴金、艾芜都长。他早年在家乡的阅历比巴金、艾芜广。他以后又多次回归故乡，反复阅览故乡的这本博大精深的书。他成为一个独树一帜的乡土作家绝非偶然。

第二章求学、求索时期：补上新文化思潮重要一课 (1921年秋—1929年春)

青年沙汀到成都求学，实现了思想启蒙，培养了对新文学的兴趣。毕业后北上深造未能如愿，回归故里投身了革命和社会活动。此时他已由当年的“二少爷”、“杨二”转变成一个满口唯物论的现代青年，一个鲁迅精神的崇拜者，一个于偏远故乡“播火”的“普罗米修斯”。

青年沙汀思想精神面貌的这个变化，对他后来成为作家具有重要意义。假如没有这个转变，他最多只能在家乡做一个读读诗书、写写橙联的儒生和开明绅士，比起平庸、懒惰，后来一蹶不振的“大少爷”杨朝绶好不了多少，已有过的那么一点不确切的人生抱负也不会实现。

作家是时代的产儿。杰出的作家之所以是时代的骄子，是由于站到了他那个时代进步思潮的前头，坚持了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强调的、能满足时代要求的文学倾向。青年沙汀已补上了新文化思潮重要的一课，成了时代的弄潮儿，也就为他成为文学的弄潮儿准备了条件。

青年沙汀已站在了人生道路新的起跑线上。他将他的名字由杨朝熙改成了杨只青。他坚信只有朝气蓬勃的青年才有希望。他正在不断追求中焕发青春的光彩。

八赶上时代新潮

1921年初秋，青年沙汀到省立成都第一师范学校上学。与他同去的有他的“毛根朋友”谢荣华。他们注册后被编入师十班。

这所学校坐落在成都城南盐道街。它距成都的中心皇城只有一条街。往西北方向拐一个弯就到少城公园。往南经南门大桥可到武侯祠。往东是学道街，折向北是青石桥，是一个书铺接着一个书铺的文化街。这所学校的历史悠久。它的前身是成都优级选科师范，创办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校址在成都中心地带皇城坝。1909年（宣统二年），校名改为川中师范学堂。1911年，校址被成都军政府征用，迁至后子门糖业讲习所内。1914年，正式改名为四川省立成都第一师范学校，在东马棚街修盖了新校舍。1919年，鉴于校园狭小，在盐道街的高等师范学堂搬到皇城坝后，迁到了这里。

迎面而来的校门高高的。拱形的门楣上有醒目的校牌，两旁有雄踞的石狮。进门是长长的林荫道，间杂地长着枝叶扶疏的冬青、泡桐、丹桂、翠竹。路的一侧是附属小学，另一侧就是师范本部。有一排排整齐的教室，一座座庭院式的宿舍。往北有宽敞的实验室、自修室。东北角有开阔的足球场。在实验室、自修室附近有碧澄的池塘，小巧的石桥，雅致的亭阁。宿舍的庭院中有一眼眼古井，一片片草地。实验室是较新式的砖木结构建筑，其他教室、宿舍均系泥墙瓦屋。

学校的学制5年。预科1年，本科4年。每个年级1个班，每个班30人左右。全校学生100多人，加上教师、职员、工友也不过200多人。担任教学的老师都有一定的水平。教国文的“萧神仙”，教英语的“章英文”，教几何的“王几何”，教生物的“温动物”，教历史的“朱讨口”等等，大多文质彬彬，知识广博，谈吐流利。

校园是宽敞、舒适的。教师是令人满意的，青年沙汀进校后很是兴奋了

一阵子，可是很快就因为自卑而陷入苦恼。

他是舅父托人开后门入学的，总觉得同学们知道他的底细。他们好像随时都在向他投来鄙夷的眼光。他们的每一个似笑非笑的神情，都似乎是针对他的。

他的衣着和生活作风的不合潮流，也使他神经过敏，觉得比别人逊色。这所官费学校的学生大多是清寒人家子弟。一般都穿斜纹布学生服，脚登草鞋或千层底毛边布鞋。不少同学没有棉衣，到冬天还穿着破旧的夹袄。同学们都热心公益活动，参加帮厨，运米，运柴，买菜，择菜。有的同学放假时还典当被褥，将所得收入作为返家路费，开学时再赎回。可是他却一副乡绅少爷的打扮。穿灰或蓝市布长衫，外套羽纱马褂，脚下是青哔叽鞋面的皮底圆口布鞋。他还总是忍不住上馆子，逛戏园子。他渐渐讨厌自己：为什么会是这般模样？为什么就怕艰苦？

最使他泄气的，是他对新文化运动常识的贫乏。当时正是“五四”运动后不久，新文化思潮还激荡着一代年青人的心。每当课余，同学们总要激动地谈起宛如发生在昨天的事件。如当年高等师范学堂袁诗尧怎样拿着载有“五四”运动长篇通讯的《川报》纵身登上饭桌演说，高师的学生怎样在少城公园的万人大会上毁弃日货，1920年出刊的《学生潮》怎样抨击封建遗老，《星期日》的妇女解放问题专号怎样尖锐地批判“三从四德”。同学们在谈话中，大部熟练地操着“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改造社会”、“德先生赛先生”等新名词新概念。有些同学还围绕着国家的危亡、社会的改造、妇女的自主，以至新化街的卖淫是否仅仅因为娼妓的无耻等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青年沙汀呢，他多半只是听人讲，很少能搭上白，有时装出并不关心的样子，实际上很用心地听。

他也曾自忖：如果我对功课能应付裕如，也许我的心情会好些。可是偏偏他的功课也不好。国文课讲古文，乃至讲《古文辞类纂》，因为他毕竟上过几年私塾，还马马虎虎能对付。其他课就说不上了。他的数理化没有基础，听课很吃力，做作业很困难。他的英语更是糟糕。入学前，他也找人教过，仅只认得26个字母，别别扭扭地读得“书”、“这是书”等最常见的单词单句。班上的同学大多能朗声背诵短文，有的还能进行简单的会话。教英语的章琢如老师早年就读于北京，满口流利的伦敦宫廷音英语。采用的教材又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大卫·考普菲尔》选节。依里哇啦地讲得不知所云。上英语课时，别的同学很有兴趣的样子，他却如坠烟云。

青年沙汀在安县还相当自负，到成都上学不久就感到早已落伍。他初进校时还曾经为“三五之夜，明月半墙”的佳句陶醉，很快就觉得“多可喜，亦多可悲”的话声声映耳。然而，他没有自暴自弃。他身上有着故乡民性中那种好强的基因。他的秉性中有着少年时代养成的执拗的个性。好强、执拗与偶然产生的自卑相互撞击而产生的特别的敏感，促使他认真揣忖自己，寻求上进的出路。他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结交一个能鼓舞他上进的人。

他本来同谢荣华是总角之交。可是他觉得这个人的性格太“隔教”了。他对他的固执守旧，对他那种水一般地流到哪里算哪里的隋性越来越反感。他很想有一个功课又好，又不虚浮的朋友，在学业和思想上都能帮助他。他后来描述过当时的心情：

我的处境很坏，那种孤立无助的感觉压迫着我：我开始默默地观察我那些穿着蒲鞋、草鞋以及家造鞋子的级友。我想从他们的言谈态度来决定我的

对象，而若果是看中了，那我便会毫不计及我的腼腆，我的浅陋，钻山寨海的去取得他的信任。

这种求友若渴的心情，是他积极要求上进的生动的反映。这个不甘落后的学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快同级友中的一位佼佼者张君培交上了朋友。

九钻山寨海交畏友

青年沙汀入学不久，就注意到了同学中那令人敬畏的张君培。

他的衣着显得很寒伧。不管气候冷热，总是一身又旧又不合体的斜纹布衣服，一双蓝布袜子和火麻耳子草鞋。他的容貌也极平常。鼻子周围长了不少雀斑，总像没有把脸洗干净过。可是他的独立不羁，他的满怀自信，他的敢于直面批评人，他谈吐的思想锋芒却引人注目。

有一次，几个同学谈起学校附近新化街卖淫的可耻，他插嘴说：“你们只觉得娼妓可耻吗？当嫖客的也同样的不要脸哩，为什么呢？”他脸上浮现挑衅和傲慢的微笑：“因为卖淫并不是娼妓一方面的事情，一定要有嫖客，这个可耻的行为才能成立。”几句话说得同学们无不哑然。

又有一次，几个同学谈到女人的分娩。一个年龄最小的同学笑着说婴儿是从母亲的胳肢窝里出来的。他当即纠正说：“这不对，婴儿是从女人的阴道里出来的。”小同学反问：“你亲眼看见过吗？”他说：“哥白尼说地球绕着太阳走，我们没有亲眼见过，难道就不相信吗？”这个小同学顿时语塞。

学校里的那个蓄八字胡的脑满肠肥的学监，官气十足，庸庸无能，可是很多同学都只是背后议论，不敢当面顶撞，他却故意拦住这个学监的侄儿：“他是你的叔父吗？”“怎么不是。”“是亲的吗？”“当然是亲的啦！怎么样呢？”“是亲的就好，……听说你们家里还过得去嘛，那吗何必要来吃这碗稀饭呢？你最好劝他下学期不要再干好了！”

青年沙汀很快从侧面了解到，这个锋芒毕露的同学原是川东涪陵人，流落到了成都，在高等师范学堂当勤杂工，利用工余时间上了几年夜课补习学校，“五四”运动波及成都时，高师成了四川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心。他参加了学生的游行示威、街头演说、焚毁日货。他的出身贫苦和追求进步引起老师们的关注。后来在刘砚僧老师的帮助下考取了省一师，……

沙汀同他的直接接触是从请教英语开始的。已快到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了，沙汀分外紧张，怕英语考不及格，鼓足勇气请他帮助复习。他非常认真，拼读生词，解释文句，一再领读。经过几次辅导以后，他考问沙汀懂了没有。沙汀为显示自己并不笨拙，也为了安慰对方，不懂装懂。有一次，他见沙汀言语支吾，口气勉强，就一再提问，问出了破绽。他笑了笑，又指着另一个文句：“这一句该懂了吧？我已问过三道啦！”沙汀同样不懂。他哼了一声，嘲笑道：“唉，你这个人的脑筋真要话说！”沙汀顿时恼羞成怒，一把抢过课本：“最凶就是留级了！”不料对方并不退让：“嗨，你这个人才怪。”沙汀也赌气地说：“所以大家都叫我怪物嘛！”说完，气愤愤地转身走了。

事过以后，沙汀很快就觉得是自己错了。他扪心自问：“人家并不是有意羞辱我呀，他的直率是因为他的性格如此嘛！”一个星期天，沙汀怀着疚疚的心到张君培常去的自修室找他。室内空无一人。由于沙汀一直注意到他

有一个文摘本，就留心看这个“知识宝库”放在哪里。碰巧那笔记本就在张君培的一迭书下。沙汀兴奋地翻了开来，见上面满是从《学灯》、《觉悟》等期刊上摘录的妙语警句，立即贪婪地读起来。可是其中许多名词概念，什么人生观啦，圣西门、傅利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啦，似懂非懂。他不假思索地将这个笔记本揣进包里。谁知刚刚出门过天井，跨上连接教室的甬道，张君培在拱门边出现了。他有些手足无措。但迎面而来的却是一连串亲切的问话，他也就轻松自然了。张君培向他道歉，说那天是他得罪了他：“我这个人么，你不来找我就算了，既然找我，我是不肯敷衍的。”他问起沙汀的籍贯。沙汀告诉了他，接着说：“这个县四面是山，风气闭塞得很。什么新文化运动啦，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上年还在读私馆呢！从七八岁起，我母亲就借债请老师教我，可是她从来没有受过教育。”停了停，又说：“我过去的生活环境就是这样，又聋又瞎，……”说着说着，几乎要哭起来。张君培很诚恳地说：“没关系，一个人只要觉悟了就好了。”他联系到自己的身世说：“我原先是在高师当小工，做梦也没有想到能上学呢！我起初只希望找碗饭吃，不至于饿死就万幸了，像我都能奋斗出来，你还有什么话说。”他拍拍沙汀的肩膀，笑着说：“说实在，你这样打扮得公子哥儿一样，我倒不赞成！一个人多享受一分，别人就会少享受一分。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上的东西是有限的，正惟其有一些人很奢华，所以别的许多人便吃不饱，你恐怕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吧，……”他向沙汀讲人生态度，鼓励沙汀努力奋斗。当他知道沙汀拿了他的笔记本，不但没有责备，还答应借给沙汀，给沙汀讲解那些句段。

从此，张君培就经常和沙汀在一起。两人亲密无间，形影不离。学校放假，张君培留校，沙汀也不愿意回家。

张君培多次向沙汀讲起他所熟悉的王右木。这位四川早期的共产党人，留学日本国后，在高师任教。他组织了由他主讲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吸引了高师的许多师生和一些中小学教师、新闻记者、社会青年。他看上去眉目清秀，斯斯文文，讲起话来辞锋犀利，很有鼓动性。他曾在课堂上幽默地说：“同学们，你们看呀，我们教书的，教来教去，穿的一件棉袄猪油（棉花）都掉出来了。”笑得同学们满眼滚动着辛酸的泪花，……经过张君培的介绍，在年青的沙汀的心目中，树立起一个光辉的共产党员形象。

张君培从王右木那里借阅进步报纸书刊，都转给了沙汀。沙汀像海绵吸水一样汲取其中那些精辟的思想观点。王右木主办的《人声报》，号召青年抱“绝对改造的观念”，“把现在所有一切旧社会——腐朽势力所凭借的制度一齐打倒，作根本的改造”，鼓动青年“歼我的敌人，救我和我的朋友！头可断，身可毁！再也不敢放弃这份人的责任！”曾使青年沙汀热血沸腾。

在张君培和校风的影响下，沙汀的衣着也改变了。他脱下了“少爷”的衣履，穿上了斜纹布学生服，登上了麻耳草鞋。舅父托人带来呢质制服、带来皮鞋，谢荣华羡慕不已，他却一一束之高阁。

不幸的是，这位“钻山寨海”结交的畏友，感染上了肺结核。咳嗽，血痰，潮热，消瘦。在那“谈瘵色变”的年代，这自然是很可怕的。青年沙汀深为他的朋友惋惜，尽心竭力地看护他。他嘴特“瘵”，很想吃零食，特别想吃杨麻子的花生糖，沙汀经常给他买。有一天晚上，为出校门买糖，同守门的工友发生争吵、扭扯。可是，无论怎样热心，也没有能把这个曾经从迷茫中挽救过他的朋友，从死神的手中挽救过来。

张君培于1925年病逝。次年清明节，沙汀备办了酒菜，约了班上的同学上坟，祭奠这位朋友的亡灵，寄托自己的哀思。

后来，沙汀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在怀念张君培的文章《播种者》中，称张君培是他思想启蒙的第一个“播种者”，是他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时刻，“第一个全力鼓舞我上进的人”。

十与文学的结缘

青年沙汀在师十班的另一个知己是艾芜。

他同艾芜接近，也是因为这位同学较早地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思想活跃，引起他的钦佩。

艾芜是成都附近的新繁县人。他在本县高等小学读书时，就影《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的热心读者。他敢于蔑视“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把反对白话文的老师称为“老腐败”，并且写了一些白话诗。他以优秀的成绩考入省一师，在同班同学中很引人注目。他已不是一般地喜爱新文学，而是以新诗作者的身份同高三级的、在学校很有名声的刘鹗潮等筹办《繁星》诗刊。沙汀对艾芜开始是佩服，随后就经常往来。他从艾芜那里借阅了康白情的《草儿》集，胡适的《尝试集》。他们常常相约去书店、书社阅览新书报，徜徉在新文化运动知识的海洋里。

他们常去的是华阳书报流通处。那是陈育安开办的，设在成都最热闹的春熙路北口斜对面的昌福馆内。进步的、反动的书刊同展，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读物并陈。有关新思潮、新文化的图书和报刊，如《新青年》、《湘江评论》、《每周评论》、《东方杂志》等刊物，介绍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的图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著作特别使人注目。他们在那里读到了泰东书局出版的《女神》，被那狂涛般的激情，冲决一切罗网的反抗精神激动得心潮澎湃。对其中许多句段，如“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像”这些表现“生命底音波”的句子，倒背如流。他们从《新青年》9卷1号上读到了《故乡》。开始怎么也不懂，经过反复研讨，互相启发，才觉得似乎豁然贯通。他们认为这篇作品虽然写了由隔膜而产生的对“现在”的失望，但作家对“将来”却不曾绝望。那使人向往的“将来”会像地上的路一样：“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过了多少年，沙汀对这次读《故乡》的情形还记忆犹新：

一天，在普益阅报社，读到了鲁迅的《故乡》。我一下就被那弥漫全篇的抒情笔调吸引住了，被小说结尾那诗一样的哲理性的警句征服了。从此，我就爱上了鲁迅的著作。我从他的著作中，受到启发，学会思索问题，探录人生意义和分析接触到的社会现象。

确如他所说，正是这以后，他狂热地爱上了鲁迅的著作。凡这位新文化运动旗手的作品，他都找来阅读。鲁迅进入了他的精神世界，成为他敬仰的精神领袖。

1923年5月以后，《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未名》半月刊、“未名丛刊”、《语丝》月刊、《莽原》周刊、《沉钟》月刊、半月刊等先后出版，沙汀、艾芜几乎一本不漏地购读。《少年中国》一到昌福馆，他们就去争购。其中田汉的《吃了刺果以后的话》、《诗人与劳动问题》，

知识渊博，文笔流畅，曾使他们读得来不住叫绝。商务印书馆以“共学社”的名义出版了许多好书，如苏联、俄国、东欧国家的小说集、戏剧集，他们也都找来阅读。青年沙汀对显克微克的有些作品印象极深。如取材于圣经故事的《你往何处去》，以基督教刚刚产生的时代为背景，描写罗马帝国帝王对教徒的残酷迫害和教徒的殉道精神，其中对教徒彼罗淋漓尽致的刻画，曾使他久久不忘。还有鲁迅编译的《域外小说集》，他也爱不释手。外国文学作品，不断地涌进了这个年青人的心。

因为艾芜的关系，青年沙汀还扩大了活动范围。他们曾一起参加了刘菁潮组织的学生运动。1922年6月，王右木等发起争取教育经费的请愿斗争。刘菁潮发动省一师的同学积极响应。沙汀、艾芜也踊跃参加。6月13日，省一师的同学走上街头，与成都各校的同学汇成数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赴省议会请愿。学生队伍来到省议会门口，遭到议员唆使的轿夫的横蛮阻挠。学生们只得派代表进副议长熊晓岩的“熊公馆”谈判。不料狡猾、毒辣的熊晓岩血口喷人，诬蔑学生代表“擅入民宅”，喝令警察逮捕软禁。学生们忍无可忍，冲入“熊公馆”，捣毁熊宅，救走代表。挤在学生队伍中的青年沙汀，也和几个同学闯进了熊的卧室，愤怒地抱起一个大花瓶砸向了一架穿衣镜。正在此时，几个身强力壮的轿夫追了进来，沙汀见势不妙，赶紧跑出卧室，翻墙逃跑。他藏在一家裁缝铺的案桌下，躲过了追捕。这可以说是青年沙汀首次参加学生运动，兴奋的心情很久都难以平静。

此后不久，沙汀、艾芜和几个同学一起，参加过成都青年会倡导的“平民教育运动”，上街教贫民识字，为贫民读报。这些时日，他们开始热心讨论社会改革。在四川早期共产党人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之后，他们更是热衷于谈论中国的出路和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青年沙汀将姓名改成了杨只青，表示相信只有青年才有未来和希望。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才改为杨子青。

青年沙汀与艾芜在剪烛西窗的岁月里，一直很相好。他觉得艾芜的性格与张君培迥然不同。艾芜沉静，看似沉默、孤僻，可是话一投机却滔滔不绝，在生活上很关心人。艾芜豁达、宽厚。沙汀有时抽烟。张君培一看见，就直言不讳地批评，有时措辞相当尖刻。艾芜见了，只是摇头不赞成，却不多所指责。他总是那句话：“如果我的行为不能影响你，再怎么啰嗦也是白搭。”他的这种性格有一种无声的力量。以至于有他在场，沙汀总不好意思掏烟，更不敢当着面抽烟。

十一在“科玄之战”的推动下

青年沙汀因艾芜的影响爱上了新文学和外国文学，但他并没有完全丢了经史百家，更没有减弱对社会科学浓厚兴趣。他一直热心阅读社会科学读物。在省一师的头三学期，他读了相当多的社会科学著作。

他读的书很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书，科学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书都读了不少。而且许多书并没有读懂，有的还是囫囵吞枣。他究竟应该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世界，还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看世界？改造社会应该依靠代表先进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的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还是依靠少数先知先觉自上而下的改良？经史百家的许多理论、思想、观点，如宋明理学究竟应该怎么看？他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才有意义？他面临着许多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他为这些问题苦恼。到了1923年，即第四、五学期的时候，

在思想理论战线展开的“科玄之战”的推动下，他联系思想实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才初步理清了头绪。

“科玄之战”是以丁文江、吴稚晖、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与张君勱、梁漱溟为代表的玄学派，围绕科学与人生观问题进行的一场大论战。开始是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勱在《清华周刊》上发表题为《人生观》的文章，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接着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予以尖锐地批驳，说张君勱是“玄学鬼附身”。张君勱又撰文反驳。于是，梁启超、胡适、吴稚晖、梁漱溟等纷纷发表文章，参加论战。这场大论战引起思想理论界的广泛注目。青年沙汀对论战两派的许多文章都认真读过。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片面鼓吹“东方文明”，强调东方文化为本，使他不断摇头，不断NO、NO。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长篇大论，洋洋洒洒，举例通俗，说理透辟，使他连声叫绝。文中讥讽玄学家说，这些人鼓吹“东方文明”这也好那也好，可是他们出门时还是要坐火车轮船，而不坐鸡公车，与他内在的幽默情趣一拍即合，令他拍手称快。他为了进一步弄清问题，买了上海大学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讲义，买了《向导》等杂志，孜孜不倦地阅读。

他逐渐有了一种粗浅的认识：科学派基本上是以唯物主义为武器抨击玄学派的，尽管他们并没有科学地阐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的概念，但他们认为各种精神活动和意识都是以物质为基础的，明确指出玄学派的宣扬精神、灵魂的神秘性是反科学的。科学派针对玄学派反科学的社会主张，强调社会进步要依靠物质与文明的发展也是对的，尽管他们主张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的路不切实际，但认为中国应发展物质文明却是有进步意义的。科学派对玄学派将欧洲战争归罪于科学发展的所谓“科学破产”论的驳斥，也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强调“天地间所有现实都是科学的材料”，也有利于科学的发展。科学派对玄学派崇拜宋明理学的批判十分深刻有力，玄学派的提倡复活宋明理学确属复古倒退。对科学派理论的进化论实质，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不切实际，他也是意识到了的。至于吴稚晖、胡适在政治上走向反动，受到鲁迅、章太炎的批判，则是后来的事。

沙汀一直认为“科玄之战”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在省一师的五年中，我的思想情况变动很大。一、二学期，虽然经过张君培和艾芜的帮助，我已开始接触新的思潮，但还谈不上完全接受。直到二、三学年才真正改变了，彻底放弃了对经史百家杂抄之类的爱好，特别是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新的看法，当时看的书也很杂，从社会科学书籍到鲁迅、郭沫若的作品都读，我曾经为人生观宇宙观问题闹得很苦，后来经过“科玄之战”，才觉得有了解决，我记得艾芜二五年离开成都南行时写了个信给我，劈头就说，我们都相信：世界是唯物的。这在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对我们却是一件大事。

青年沙汀正是在“科玄之战”的推动下加强学习，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他不仅从理论上加深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外国优秀文学遗产的认识，巩固了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影响到后来的艺术取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从经史百家的迷恋中挣脱出来，从唯心主义的思想影响中解脱出来，开始关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关心恽代英、王右木等革命先驱在四川的革命活动，关心学生的革命活动。经艾芜提议，他们几个同学还印发过一份

油印传单，猛烈抨击社会制度的黑暗，倡议到工农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当学校的学监罗锐伯为国民党内部的选举奔走呼号，动员学生去冒充代表时，他们严词拒绝，揭露其丧失民心的实质。艾芜南行时给青年沙汀留下的那句坚信唯物主义的话，是他们求索的结论，是他们的宣言。

十二倾向革命的现代青年

……当我想起年轻时候的革命战友时，我的眼前往往首先浮起这样一个形象：高高的身材，两颊经常泛着红色，向左边横梳过去的头发，总是拖一撮在额头上；发觉时便那么敏捷的把头往后一摆。这是沙汀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的一段文字。他描述的这位革命战友，就是比他低一个年級的十一班的同学周尚明。

如果说张君培是他在省一师求学时的第一个鼓舞他上进的畏友，艾芜是第一个影响他喜爱新文学的挚友，周尚明则是第一个别他走向革命的战友。

大约在他上三年级的时候，即1924年，他便认识了这位比他小的同学。第二年，即1925年，张君培病逝，艾芜南行，他和他愈来愈亲密。

周尚明刚进校不久，便引起他的注目。当时同学中有一种旧生欺负新生的不良风气。受欺负的新生，往往忍气吞声，或者敢怒而不敢言，周尚明却敢于斗争。有一次，一个流氓气很重的旧生谩骂一个新同学，周尚明恰好路过，他走了过来，当众对这个旧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事后，沙汀就很注意这个勇敢、正直的同学。他打听到周尚明是成都人，家庭出身清寒，父亲是个缝纫工，已倾向革命，又喜爱进步文艺作品，沙汀对他肃然起敬。

沙汀常去昌福馆，周尚明和十一班的冯棣、刘尔钰也常在那里。彼此发现志趣相投，便互通姓名，很快熟识，一起读书。他们采用一种“分买共读”的办法，即分别购买书刊，一起交换阅读，省了钱，又多读了书。每到星期天，他们就都到了昌福馆，各自将分头要买的书买好，一起到附近的一家茶楼上交换阅读，共同研讨。1925年少城公园图书馆成立，购置了不少社会科学图书，周尚明向学校办了一个通学证，每晚去读书，然后又组织同学们去学习。此时，周尚明还领头创办了文艺性的板报《砧声》，带动其他班级，也纷纷办起了板报，使办板报风行一时。周尚明还在校外组织了少年俱乐部，约了一批同学排演话剧。他们演出过根据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改编的《一个漂泊者》，根据鲁迅的《阿Q正传》改编的《假洋鬼子》等话剧，给沉闷的成都戏剧舞台带来了生气。

当时省一师的学生中，尤其十一、十二班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受国家主义派的思想影响，宣扬国家是超阶级而存在的反动观点，还美其名为中国的“醒狮”。周尚明和沙汀都叫他们是“狗儿”，称所谓“醒狮派”是“狗儿派”。几个同学相约同这些未老先衰的小顽固派辩论。周尚明自然是首领。他的知识面广，思想敏捷，词锋犀利，常常使“狗儿”们一个个理屈词穷，狼狽不堪。沙汀多次充当周尚明的助手，也显示了胆识，锻炼了口才。

其时，周尚明已经入团、入党。以后，还担任了共青团成都市委书记，介绍沙汀入了团、入了党，成了沙汀初期革命活动的联络员和领导人。

这时沙汀正意气风发，生活中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奉命回家完婚。

这完全是母命。女方李增峨是李丰庭的千金，李丰庭在郑慕周替他雪耻

以后，与郑慕周交情更深。但在郑慕周提任军职不久，两人之间发生了猜疑。按当时四川军阀不约而同实行的防区制，郑慕周兼任防区汉军统领，委派各县行政长官，任命李丰庭担任了茂县县长。任职不久，县内发生了一起教案，几个基督教徒被抢，其中一人致死。追究责任追到了县长头上，李丰庭被解职。李丰庭怀疑郑慕周没有替他撑腰，郑慕周又认为李丰庭无端生疑。于是为了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调解，郑慕周的老相好、儿女亲家谢象仪出面撮合沙汀与李增峨的婚事。一直为儿子择偶操心的母亲，对这个姻缘十分满意。她认为李增峨是大家闺秀，相貌姣好，又望儿子早日花好月圆，早生贵子。此时沙汀不过 21 岁，女方也刚刚 17 岁。但是按照传统和世俗的观点，母亲认为她早该抱孙子了。

使同学们不解的是，这个思想进步的杨只青竟然乖乖地接受了由家庭包办的这桩婚事。其实这并不难理解。这主要是沙汀屈从于亲情。沙汀的身世使他同母亲和舅父的感情极深。他事母至孝，视舅父为生身父亲，已习惯了听从他们的安排，很难同他们反目。政治思想上的独立性与亲情方面的依恋关系有时矛盾，有时又和谐统一。艾芜的父母也曾在儿子 11 岁时包办了婚约。儿子在受新文化思潮影响后，认为这十分荒唐，但他怕母亲伤心，长时间默默忍受，母亲去世了，当缺乏感情的父亲企图强迫他践约时，他挺身而出，坚决反抗了。艾芜的抗婚南行，恰好是在沙汀完婚的时候。本来沙汀事前知道艾芜的计划，曾表示一起漂泊。

当他从家乡返校时，艾芜只给他留下了一封告别信。

沙汀是在暑假前夕回家结婚的。当时李增峨给他的印象并不坏。李增峨也是新式妇女打扮，青裙，白绸宽袖短衫。容貌也还好，性情也温柔。然而，可怜这个窈窕淑女屈从于父母，屈从于传统观念，没有外出求学。她没有冲出她的金丝笼，而沙汀已不可能回家做少爷。两人不可能保持平衡。这桩婚姻不可避免会破裂。

1926 年夏天，青年沙汀完成了省一师的全部学业。他由五年前自叹的“时代落伍者”，一跃而成为倾向革命的新时代的青年；由只有一些残缺的诸子百家知识的“私馆生”，一跃而成为具有一定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新文学和外国文学知识的现代知识青年。

生活提供的机遇几乎相同，为什么与青年沙汀自幼同窗、一起到成都上学的谢荣华不仅没有实现思想和知识的飞跃，而且还显得愈来愈落伍了呢？其原因至少有两点，一是由于青年沙汀善于利用客观条件，促成自己上进。他的善于交友就是一个具体的表现。二是由于他具有使客观条件发生作用的内在的积极因素。他少小时的境遇养成的独立性，少年时代早熟造成的自主精神，从母亲、舅父身上感染到的身处困境而奋发的自强心理，天赋的、童年少年时代强化了了的易感、执拗的秉性，等等，这些都是他上进的内驱力，是他把握住机遇的主观条件。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历史的大浪淘沙，必然有前进，也有落伍。

十三匆促、难忘的北方之行

1926 年 7 月，青年沙汀刚刚从省一师毕业，就接连收到舅父和向履丰的来信。舅父叫他到北京报考大学，向履丰鼓吹他到南京读书。舅父已于头一年解甲还乡，正旅居北京，他一直关心着外甥的成长。向履丰是同乡，成都

联合中学毕业后到南京考大学未中，住在东南大学一个同学家里自修，他希望有个伙伴。

此时的沙汀因读书和艾芜南行的影响，很相信“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话，并不觉得非上大学不可。但是他认为也需要出去开开眼界，他所关心的北伐战争不正向北推进么？他敬仰的鲁迅先生不是在北京，还在北大兼课么？于是，他决定到南京看看，然后转赴北京。

一个燠热的日子，他穿一件衬衫，带着简单的行李，动身经重庆出川。同行的又是谢荣华。不过谢荣华是去上海考大学。他们同船到南京下关后，谢荣华和别的两个途中汇合的同学继续东下，他只身上岸进城。

见到向履丰以后，这位同乡把他安排在鼓楼成贤街成贤宿舍住下，然后介绍了东南师范学院、东南大学文科的情况，介绍了对南京的印象。他当面讲的情况与信中所说的大不相同。他甚至也埋怨南京死气沉沉，表示要离开此地到日本留学。当他把东师文科的讲义拿来看时，果然陈腐不堪。沙汀住了10多天，游览了一些名胜古迹，就乘京浦路的火车直达北京。

他到北京后，在石驸马大街太平湖饭店见到了舅父，就在舅父的房间里搭了一个铺。同舅父在一起的有好几个四川老乡。其中有个蔺简斋的，曾是舅父的部下。他对北京的街道了如指掌，就由他作向导带沙汀游览。几天时间，游故宫，逛颐和园，转天桥，上前门夜市，进闹子馆，看京戏，领略了古都的气派和繁华。随后就按先前在途中遇见的校友罗晓云所约，去北京大学西斋会晤罗晓云和毛坤。

没见到罗晓云，只见到毛坤。毛坤告诉他，罗晓云已离开北京。毛坤是省一师高班次的校友。曾因品学兼优受到同学们的尊敬。他毕业后在附小教书，积蓄了一笔钱，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业就读。当他听沙汀说了报考北大文科的想法，非常坦率地谈了他的意见。他说：“学文科还住啥学校啊！订一份《语丝》，搬到沙滩住起，要想听鲁迅先生的课，去旁听就行了！”他还现身说法，说了他的体会，他的一番话，正合沙汀的胃口。他正不想拘束在校园里。而且这时北大的考期已过，即便要报考也只有等到以后去了。回到饭店，他向舅父谈了联系的情况，竭力说明文科自修的好处，舅父也没有多说什么。

他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渐渐觉得连留在北京自修也没有多大意义。当时的北京，早已不像他想象中“五四”时期、“三·一八”时期的北京。《语丝》、《莽原》也不像前两年那样吸引人。鲁迅先生已于8月下旬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同他还谈得拢的毛坤也到武汉的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工作去了。他先后找过几个在北京上学的省一师的校友，但他们大多是学工学农的，都埋在书本里，两耳不闻窗外事，谈话很不投机。他除了有时同舅父一起去看梅兰芳、高庆奎、郝寿臣的戏散散心，多数时间无聊地随意翻翻北新书店、未名社出版的一些书刊。

这时的北伐革命军已攻下武汉，正准备北进。郑慕周、蔺简斋都主张赶紧离京四川。郑慕周就叫沙汀也一道返川。几个人便于10月中旬启程离开北京。

他们乘火车到武汉换乘轮船，滞留了两天多时间。此时，于月初攻占武昌的北伐军士气正盛，不时列队踏着雄壮的军乐从街上经过。声势浩大的学生和市民的游行队伍也震动着这座江城。青年们热情洋溢地挥军旗，撒传单，宣传革命。这是青年沙汀第一次目击轰轰烈烈群众运动的场面。他从早到晚

都处在兴奋和激动之中。这不就是他向往的革命吗！

他随舅父回到安县。没住多久，就再也住不下去了。这偏僻小县的寂寞和单调，与武汉热闹的局面形成多么强烈的反差。他哪能在寂寞、平静中终日枯坐？他终日躁动不安，一心想到成都去：

我在省外，特别是武汉逗留期间得来的一些印象使人静不下来，想找人谈。而成都对于当时革命形势的反应，远比家乡强烈，又容易看到新的革命书刊，所以总想往成都跑。

这就是这个热血青年当时的心情！临近岁尾，他不顾家人的劝阻，去了成都。

他住在舅父的老部下萧维斌家里。不几天。就见到了周尚明、刘尔钰、冯棣。他们又常相聚纵谈革命形势，阅读革命书报。他们读到了颇有影响的浑代英翻译的《共产主义 ABC》，郭沫若翻译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人民周报》、《猛进》、《语丝》上关于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报告。

不多久，周尚明就不常来了。他显然已担任了什么重要职务，忙于领导工作。春节到来，沙汀回家过了春节又来到成都。

3月中旬的一天，周尚明忽然来了。他亲切地问沙汀，是否愿意加入共青团。沙汀异常激动，连连表示愿意。过了几天，周尚明来通知他：“组织上已经批准你入团，以后就由我负责同你联系。”

青年沙汀就在这时候入了团。由于当时党、团员界限不严，实际上也就入了党。

1986年12月，沙汀曾在写给安县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一封信中说：“根据张秀熟的证明，周尚明曾经于二七年告诉我，我已由周介绍入党。他还说，当时周是成都地区团的负责人之一，但已入党，而且当年党员、团员的界线也模糊。”安县党史办的说法是：“沙汀，于一九二七年春经周尚明介绍入团，夏天转党。”不管怎么说，沙汀系1927年入党。他是安县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安县党史办编写的《中共安县地下党组织沿革》第一章第一节赫然写着：安县第一个中共党员——沙汀。——

十四写下故乡党史的第一页

青年沙汀入党不久，就受四川党的负责人刘愿庵的派遣，回安县进行革命活动。

当周尚明通知他去接受刘愿庵的指示时，他很激动了一阵子。他并不知道刘愿庵的具体职务是川西特委负责人兼成都市特支书记，但他早听说过，这是四川党的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几个月前，这个口才极好的领导同志还在成都群众团体组织的一次公开辩论会上发表过演说，驳斥国家主义派李璜的谬论呢！

他按约定的时间，来到春熙路中段孙中山铜像侧面的一间房子里，接着刘愿庵就进来了。这个约莫30多岁的瘦高个子领导人，显得很老成持重。他问过安县的一些情况后，就明确下达任务，要沙汀在安县扩大国民党左派，秘密发展新党员。随后很郑重地以川西特派员的身份，委派沙汀筹建安县国

沙汀：《我所知道的安县早期党组织的情况》，见《安县党史资料汇编》，中共安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均见《安县党史资料汇编》，中共安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民党左派党部。这是青年沙汀入党后首次接受党组织的指派，他连连点头表示坚决服从。

这时川东重庆的国民党莲花池党部（左派），与总土地党部（右派）已公开分裂，但在邓锡侯、田颂尧所部驻防的川西北地区，还暂时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坚持“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还能公开进行活动。而安县县长夏正寅，因深受其兄长、早年在法国入党的党员夏仲寅的影响，倾向于进步，对建立党部完全支持。沙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受任务，进行筹建国民党左派党部的工作的。

经沙汀向夏正寅提出，由县行政会议通过，拨了一幢房和一笔经费，安县国民党党部筹备处的牌子就挂了出来。筹备处任用了两名工作人员。一个负责日常工作，一个做后勤工作。参加筹备活动的有史鸿仪、赵槐轩、李爽亭、曾学渊、刘际唐、王行之和去上海考大学误了考期回乡的谢荣华，都是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县城张贴反列强、除军阀的标语，利用场期登台讲演，宣传“三大政策”，揭露重庆“三·三一”惨案中刘湘、王陵基的罪行，联系本县实际揭露国民党右派魏道三的丑恶嘴脸。筹备处还举行了一些小型的集会，内容也是结合时事宣传反帝反封建和“三大政策”。筹备处的活动给偏僻的县城带来了生气。不久，四川的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安县的局势复杂化，筹备处就没有再进行活动。1928年春，反革命分子向育仁窃踞四川省国民党党部以后，委派国民党右派接管筹备处。此人手持向育仁的委任状耀武扬威，要全县所有国民党员重新登记。登记之前还要恭读“党义教程”，进行党义知识测验，其中的形形色色后来被沙汀用作了《龚老法团》创作的素材。

沙汀在主持筹备党部的同时，进行的另一项革命活动就是协助办好安县的“团务干部学校”。他回安县对，安县已在进行“团于校”的筹备工作。负责筹备的是北京工专毕业回乡的刘炳。他要沙汀任政治教员。沙汀认为这事十分重要，可以利用工作之便发展组织，但对能不能干好没有多大把握，便写信向周尚明汇报，希望加派得力的干部来。不久，就派了高凌来安县。沙汀对此人印象较好，觉得他相当精干，完全可以信赖。他们便一起协助刘炳工作。上级组织对“团干校”抱的希望也很大。主要是由于学员大都是各乡镇的青年武装干部，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可以建立一支武装，控制全县的局面。高凌为“团干校”讲过课，沙汀也去讲过两次课。内容也是反帝反封建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正因为“团干校”这支力量重要，安县的反动势力就想方设法搞垮它。1927年秋天，趁县长夏正寅不在安县，豪绅罗伯卿之流暗中唆使“团干校”的收支（会计）陈南轩卷起帐款潜逃，同时买通一个司法人员，胁迫校长刘炳清理帐目，把贪污的罪名强加在刘炳头上，将其投入监狱。沙汀和高凌判断，罗伯卿等人的用心是在破坏“团干校”的声誉，打击“团干校”的领导人，搞垮“团干校”。他们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把学校办下去，防止那些人抢夺领导权。等到夏正寅一回安县，他们立即向他说明情况，取得他的支持，并由郑慕周等有声望的人士协助，通过县行政会议委派刘巨川代替刘炳任校长。刘巨川是刘炳的亲属，华西中学毕业，住过军事学校，曾在郑慕周手下工作过。当沙汀向他交底以后，他毫不迟疑地表示答应。他们的第二个步骤是在刘巨川任职后，由刘巨川、高凌、沙汀一同将刘炳保释出狱，等到陈南轩捉拿归案，重新清理帐目。经过这一番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挫败了罗伯

卿等人的阴谋。沙汀在这场斗争中表现了一定的组织才干。不过，他和高凌毕竟缺乏斗争经验，没有在“团干校”建立领导核心，没有从根本上控制住“团干校”。不多久，高凌因备受攻击离开了安县，“团干校”也就垮了。

在这段时间，沙汀还担任过安县教育局局长。早在这之前，他就协助舅父为发展安县的文教事业做过不少工作。一件事是办学。舅父回乡后，买下了西街的天后宫，将前面的两进院落修缮为住房，后面的一个大院、大坝改建为校舍，办起了天后宫私馆。沙汀从北京回到安县不久，协助舅父将私馆改建为“私立天后宫小学校”，从校友中聘请了几位同学到学校任教。另一件事是办图书馆。由舅父捐款建馆，他专程请在省一师任过国文老师的张秀熟开列书单，买了一批“五四”以后出版的新思潮、新文化方面的图书。其中有商务印书馆以“共学社”名义出版的全部新书。还有一部李调元的《函海》，一套汉文版的《藏经》。由于他热心家乡的文教事业，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因而在文教界有一定的声誉。当原教育局长杨著成因教师普遍不满，工作失去信心，要求卸任时，县教育局的人就推荐他任教育局长。开初他还犹豫不决，怕自己不能担此重任。高凌、马之祥等好朋友都鼓励他干。恰好高凌因受夏正寅委托去成都，就川西北驻军董长安司令要求派政工人员到司令部工作一事向组织上请示，他就请高凌顺便汇报。不几天，高凌回来，对他说：组织上同意你出任教育局长，并且还给他带来一枚任职所需的私章，悄声告诉他：这还是川西特委高师白刊刻的！

新局长上任的第一件事，是整顿局机关。他将原有的三名督学换掉两名，新任用了王行之和曾学渊。这两人都是贫苦的知识分子，在川西北地区较进步的龙绵师范毕业后，从事教学工作，有实践经验，有服务精神，并且都读过不少革命书刊，思想比较进步。留用的吴聿初，也是龙绵师范毕业生，一个有朝气的青年。他任用李爽亭作文牍，此人虽系秀才，但文笔很好，工作踏实；任用唐绍周管财务，这人熟悉业务，廉洁奉公。他规定了廉洁的纪律。宣布自己不沾银钱。经过一番整顿，教育局机关面貌大变。在许多机关法团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贪污腐败的情况下，教育局机关能有此变化，实属不易。他做的第二件事，是雷厉风行地调整乡镇学校的领导班子。解除了所有乡镇长的兼校长职务，免去了那些知识老化的拔贡、秀才的校长职务，重新任命了一批受过新学校教育、热心教育事业的年青教师为校长。例如县立高级小学校长萧伯镛，拔贡出身，年事已高，予以免职，由谢荣华接任。又如蒋品珊，虽与他有师生之谊，但思想守旧，实无力担任领导职务，只得公事公办。与此同时，他还大力充实了“天后宫小学校”的教师队伍，将学校发展为高、初小齐全的完全小学校，校名改“私立汶江小学校”，新局长上任的“两把火”，在全县教育界震动很大。有衷心拥护的，也有在人事变动上造谣中伤、发泄不满的。他之所以没有遇到大的挫折，没有遭到刘炳那样的厄运，是由于他的所作所为得到多数教师的支持，得到包括舅父在内的、社会上有声望的人士的赞许。

他任教育局长有半年多，安县的县长易人。夏正寅调走，新来了张琳。此人很快就认为他的政治倾向“不对头”。一天，新县长突然告知他，根据上方有关教育局长应回避本籍人氏的最新精神，他必须与彰明县的教育局长对调。没有多久，彰明的局长就到安县接任来了。他呢，当然不能到彰明去。当时的政治形势已很严峻，而彰明又人地生疏。

在这期间，他还做了许多发展新党员的准备工作。他利用工作之便，广

泛接触了城乡的一些进步青年，对他们进行考察和帮助。在高凌离开安县前夕，经过交换意见，确定了一批发展对象，由他进行重点培养。他的这项活动，也已载入安县党的史册。据《中共安县地方党史大事年表》记载：

一九二七年九月三十日，省委发出“发展党员扩大组织”的通知，分配安县发展党员八名。其中：农科三人，文科二人，其他三人，杨朝熙同高凌在知识分子中确定了王行之、马之祥、陈枝栋、袁玉章、曾学渊为发展对象，并分别谈了话。

沙汀在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培养以后，于1927年2月到成都，准备向党组织作一次汇报，以便做吸收新党员的工作。谁知这次去，正碰上了成都的“二·一六”惨案。

十五落潮中的彷徨和罗曼插曲

1927年2月16日下午，沙汀从安县到达成都。他在鼓楼街附近的百脚店郑慕周常设的寓所住下后，就去梵音寺街找刘尔钰，想通过刘尔钰与周尚明接头。不料刘尔钰不在家，他只得仍回住地。这天是成都常见的阴天。铅灰色的云层又低又厚，阵阵冷风带来一股股寒意。天色黑得特别早，6点多钟就有一些铺面闪烁着灯光。正在这时候，刘尔钰找上门来了。他说他回家一听家人说沙汀找过他，就赶紧过来了。他的脸色从没有那么难看。他告诉沙汀，就在这天下午，袁诗尧、周尚明等同志被反动当局杀害了。他哽咽着说：“周尚明本来是按照组织上的通知，在头一天就离开了省一师的，可是第二天，他为了取走那些秘密文件，又冒险去了，恰恰碰上了敌人的搜捕。”他停了停又说：“头一天他还请了几个同学，到他家里吃他栽的油菜呢！……”

这就是“二·一六”惨案。这是四川国民党右派头子向育仁蓄谋制造的一次流血事件。自从这个刽子手被蒋介石封为四川省整理党务特派员以来，就不择手段地迫害共产党人。这之前不久，他为了破坏省一中的学生运动，强行委派曾经是他的党部秘书的杨明途为校长，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对。当杨明途在军警的护送下入校抢夺校印时，被愤怒的学生于混乱中打死。向育仁就以共产党必须对“拒杨”事件负责为借口，于2月16日晨出动大批军警，到成都各大专中学搜捕共产党员，在下午3时杀害于下莲池畔。

这个血淋淋的事件给沙汀震动很大。周尚明是他的战友，是他革命的引路人。袁诗尧是他的老师，是他敬佩的党的领导人。还有张博诗、石邦矩，也是省一师的校友，是他熟悉的朋友。而今他们都躺在下莲池边，倒在血泊之中。这天晚上，他整夜陷在无言的悲痛之中。一年前周尚明严肃地告诉他已被批准入团时的神情，不断地浮现在他的面前；一年多以前，周尚明向他叙述市民们将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张赤父、龙尊三披麻戴孝跪在孙中山铜像前悔过时那充满嘲笑的话音，还不断地响在他的耳边，……

到那时为止，我虽然也经历过亲人的死亡，但我从来没有像那天夜里那么震动、难受。

特别因为那位给我带来噩耗的同学一再重复的说：前天他还叫我去学校里去吃他种的油菜呢！

沙汀这次没有在成都久留。接连几天，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的所谓“三军联合办事处”的巡逻队，荷枪实弹，迈着囊囊的脚步，不断地在街上走过。街上一派冷清恐怖的气氛。他去找高凌，没有找到。去找曾与他有过联系、在智育电影院工作的程秉渊，也不知去向。刘尔钰、冯棣也都很少出

门，并说要到郊区农村去住一段时间。他只得离开成都回安县。

他回安县不久，组织上派了周璧成来，说是来检查工作的，在他家住了一天，听他汇报工作，对这里的情况颇不以为然。批评安县既无党的组织，更无武装起义的任何思想、组织准备。提出要从成都派人来做农村工作，发动农民起义。要求把安县工作的重点放在与绵竹县交界的塔水乡，由沙汀和袁玉章去作出安排。周璧成走后，沙汀望眼欲穿，没有看到成都派什么人来。后来袁玉章告诉他，成都是派了两个人到塔水来，可是没住几天就走了。

就在这以后，1928年7月，传来一个消息：绵竹武装起义失败了！这是一天上午，史鸿仪从老家绵竹县赶来报告的。这天黄昏时分，袁玉章从塔水乡派人送来密信，叫沙汀火速去塔水。沙汀到达后，才知道是绵竹起义领导人之一的王干青来了。袁玉章并不认识王干青，沙汀也从没有见过这个人。只听说他是国民党左派，不知道他已入党。王干青却说他知道他们。这也许是组织上告诉他的，或者是曾经在塔水住过的那两个人向他讲的。因为王干青知道这两个人的去向，说他们到绵竹去了。

这是沙汀早年敬佩的又一个共产党员。他身材瘦长，眉清目秀，打扮得像一个医生。可正是他组织和发动了川西北的首次武装起义。他们的行动一直是在川西特委的领导下进行的。临近暴动时，特委还派来了人，传达特委的决定：成功以后即建立川西北苏维埃政权。他们于7月3日半夜行动。王干青带领一支人马，一路所向无敌，从西南方向进逼县城，谁知东北方向的另一支队伍，被混进的地方民团的奸细诱入绝境。这次起义虽然惨遭失败，可是王干青却丝毫没有灰心丧气的神色，而且还大有揩干血迹又继续战斗的气概。沙汀同王干青一起住了两天才回县城。王干青留在塔水约两个多月，曾大病一场，以后转移到了别地。

上级组织派周璧成来过以后，再也没有派人来了。沙汀有些着急了。他该做些什么工作呢？发展组织工作还要不要继续进行呢？1928年冬，他就又到成都我党组织去了。当时白色恐怖已没有前一些时候那么严重了。

他在成都四处奔波，终于找到了高凌。他非常庆幸。谁知出乎意料，当他谈到组织联系时，高凌却哈哈大笑：“现在不谈这个了，我要读书了！”随即一挥挥手，扬长而去。他并不甘心，又一连两次去见高凌。可是一涉及组织关系问题，高凌就立即岔开。高凌在安县期间给他的印象还不坏，怎么忽然变得如此消极，使他迷惑不解。高凌原是成都志成政法专科学校的学生，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辍学，此时已经复学，做他的当律师的美梦去了。

高凌的变化，使沙汀很是失望。他想去找别的同志。一个个熟悉的名字都念遍了：刘愿庵，程秉渊、周璧成，……他们在哪里呢？通过谁可以找到呢？成都有多大？穿城不过三里三，可是就不知道他们在何方。

他徘徊了几天，正准备返回安县。一个偶然的的机会，知道原省一师的同班好友蓝仁辅在成都。蓝仁辅的哥哥在宜宾的武装起义中壮烈牺牲，他只身逃亡到成都，因结核病复发住院，带的钱用光了，医院几次赶他出院，陷入了困境。沙汀立即去看望了他。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是念及同窗友情？是对烈士亲属的关心？还是对几天来失望的安慰和补偿？沙汀热情邀蓝仁辅到安县养病。蓝仁辅自然感激不尽。他随沙汀到了安县。沙汀把他安排在汶江小学住下。

由于失去了组织联系，由于高凌的变化造成的阴影，由于革命低潮的低沉气氛，也由于自身的消极因素，正如沙汀后来在上海第二次申请入党时所

反省的：只怪自己的觉悟低，入党后又未学习过，没过组织生活，所以他消沉起来。当时的安县，夏正寅早已离开，国民党右派把持了政权，除少数人有时忍不住私下发泄一点不满外，大多数人再也不敢谈时局、谈政治。年青的沙汀像一只失群的孤雁，感到从没有的孤单。有时从街上经过，听自己单调的足音，觉得心里一样的空落，有时沿着安昌河散步，看河面雾气氤氲，觉得胸中也塞满了一团团抑郁的浓雾。

他多数时间泡在汶江小学里。那里有许多教师：马之祥、杨淑宜、苏玉成，还有秋天新来的刘尔钰，都是他相好的朋友。性格很像张君培那样耿直、坦诚的蓝仁辅，又能心无芥蒂地交流思想。整个县城，只有“汶小”是他阴霾的心里的一片蓝天。他和老师们一起为学校制定了校训、校歌和校徽。校训、校歌歌词内容也还积极向上，只是语言含混不确。校训是：“我们要养成为社会服务的精神。我们要养成为社会服务的能力。”校歌歌词是：“好哥哥，好弟弟，一块儿，齐努力，趁小小汶江，快些向前去。前途是无量，快些向前去。愿我们向前，愿我们努力。好姐姐，好妹妹，一块儿，齐努力，趁一线光明，快些向前去。前途是无量，快些向前去。愿我们向前，愿我们努力。”校徽的图案是一个正五角星，每个角有一个字，分别是：德、智、体、美、群；中央是圆形篆书“汶小”二字。他有时作为学校董事之一，也管管校务，有时老师因病因事缺课，代上几节国文课。他也随心所欲地找点书看，读读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读读新译载的高尔基的小说。读到《因为单调的缘故》，觉得很有情趣，很有兴味。

就在这些时候，彷徨、寂寞中的青年沙汀，坠入与黄玉颀（黄玉春）的情网之中。

黄玉颀一家从灌县迁来，寄寓在舅父的大院里。当年舅父所部驻防灌县时，玉颀的母亲任灌县女子学校校长，因与舅父的三姨太太有旧交，也就同舅父熟识。母亲名叫黄敬之，原籍江苏，出身书香门第，有相当的旧文学水平，工于国画、刺绣、烹饪。年青时随丈夫入川，不幸丈夫病歿，苦心抚育着三个子女。舅父同情孤儿寡母，敬重敬之之才，待之如同家人。聪慧的黄敬之常常是郑府牌桌上不可缺少的角色。她应舅父之邀率家小来安县定居，在“汶小”任教，兼任舅父之子郑志超的家庭教师，子女在学校继续上学。子女中黄玉颀最小，时年15岁，在培英女校附设的师范班就读。由于父母的遗传和影响，由于在开放的环境和新思潮的沐浴中长大，她性情开朗，能歌善舞，在学生中引人注目。年青的沙汀早在灌县见舅父时，就曾同她认识，留有极好的印象。现在相逢，见她青春焕发，妩媚动人，感到分外亲切。沙汀的性情已趋于外冷内热，特别喜欢同热情、直爽的人亲近。他与李增峨凑合，觉得妻子的娴淑无可挑剔，当家理财的精心细致也无可指责，但是她那种不冷不热，常常使人索然无味。他们之间没有对话，没有思想交流，也没有感情交锋。同玉颀在一起，哪怕她任性、好强，也感到是一种情趣。他把当时的一腔惆怅、苦闷，伴和着恋情向玉颀倾注，情窦初开的玉颀大胆而热烈地迎接上去。

沙汀的家在城外安昌河的碾房边。李增峨已为他生下一个脸圆圆的俊俏的女儿，又由他精心斟酌取名杨刚俊。可是他常常不归家，以参与汶小的管理为借口，住在舅父家里，以便同玉颀朝夕见面、偷偷幽会。坠入情网的青年，把什么应负的责任，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统统没有放在心上。

女人对丈夫的心怀二心，是特别敏感的。李增峨已发觉丈夫另有新欢，

对家里的一切漠不关心。她心里无比痛苦。她默默忍受着。

母亲喜爱李增峨，喜爱蹒跚学步的孙女。她埋怨过儿子，可是她毕竟喜爱这个已显示了才干的老二。她无言地抚慰着李增峨的心。李增峨身上也有妇女在家庭生活上特别能忍耐的旧的传统。

舅父对外甥的行径极为不满。他一再生气地说，这个杨朝熙为什么不出去求学、做事，赖在家里鬼混！

沙汀的好友马之样熟知朋友的一切。他为朋友担心，又不免寄予同情。他知道郑慕周与李增峨娘家的关系很深。郑慕周决不会听任外甥继续这样下去，其结果必然会引起严重的家庭纠纷。可是他又觉得沙汀确实与李增峨捏不到一起，与黄玉颀已难分难解。他想出了一个极好的办法：沙汀远走高飞，既有益于事业和前途，又可以成全自己的恋情。

直爽的蓝仁辅早就批评过沙汀，说那种终日无所事事，看看小说、吹吹牛皮，是耽误前程，浪费青春。他知道沙汀的恋爱以后，也竭力赞同沙汀离家出走。他对沙汀说：若果我有你那样好的国文功底，早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了。

于是，青年沙汀下定了外出的决心。到哪里去好呢？他想到了上海。此时的上海已是革命运动的中心，新文学运动的中心，还有他敬仰的鲁迅先生也在那里，他到上海站住脚，就可以把玉颀接出去。他向舅父表示去上海求学。舅父满口答应，而且叫他去投考“中国公学”。舅父想到的是，沙汀去上海，一则对前途有好处，一则同黄玉颀疏远，那种莫名其妙的恋爱也就会烟消云散。沙汀向母亲谈到自己的打算，母亲也希望儿子以自己的前途为重。

就在这以后不久，1929年年初，安县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促使青年沙汀踏上了新的途程。当时，沙汀去了一趟成都。他刚刚走，红灯教的队伍猛攻县城，打伤了驻军的一个团长。这就是远近闻名的1929年旧历2月11日“教案”。事件平息后，县党部书记魏道三和县长张琳均含沙射影地说：这件事很蹊跷，不早不迟，杨某人（指沙汀）一去成都就发生了。沙汀回安县后，亲属、朋友都告诉他，魏、张二人居心叵测，要他赶紧离开安县。他立即收拾行装，启程去上海。母亲为他准备了相当充足的费用。玉颀偷偷前来送别。自古多情伤离别。玉颀伤伤心心哭了一场，沙汀也免不了来一番海誓山盟。

青年沙汀结束了闲散的生活，迈向新的旅程。他在这段时间里，随着革命的潮涨潮落，经历了人生的波澜起伏。他丰富了自己的情感经历，增加了感情积累。他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扩大了生活领域。他经受了革命的锻炼，强化了独自面对社会生活的自主精神。他在以阶级论为中心的现代意识再次审视故乡以后，加深了对这片乡土的文化环境的认识。只要遇到和创造出适当的机遇，作为乡土作家的这种潜能就会焕发成奇异的光彩。

第三章上海八年（上）：走上献身文学的道路 （1929年夏——1935年冬）

还是青年军官的列夫·托尔斯泰，应《现代人》杂志的一批作家之邀去了彼得堡，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四川盆地长大的青年沙河，“冲出夔门”去上海，对他开始自己的文学事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青年沙汀来到这左翼文学的大本营，来到现代思潮漩涡的中心，受到了感染和熏陶，有幸得到鲁迅先生的指导。并且在创作上刚起步，就像当年列夫·托尔斯泰幸遇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得到茅盾的热情关注。正是由于“左联”领导人的奖掖，文艺界人士注意了这位文学新秀。他们给予了他恰当的评价，将他与臧克家、艾芜、黑婴等并提，称他为“1933年的新人”。“沙汀”也就出世了。

青年沙汀首途初步成功，固然取决于他潜在的素质和内在的条件，取决于他的奋斗和孜孜以求，但提供机遇的历史时代和促成内因转化的客观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此时甚至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丹纳在考察佛罗伦萨和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对拉斐尔艺术事业的影响时说：“佛罗伦萨是意大利艺术与高峰的中心”，“拉斐尔在他们那里用过功，他的天才一半得力于他们”。沙汀的才情来自潜能的喷发和“用过功”，也来自上海文化环境的影响，得力于文学先辈和同辈的教益。

十六闸北破楼里的苦读

1929年春末，青年沙汀离开家乡去上海。与他同行的有两个人，其中又有谢荣华。他是再次去上海报考大学。

他们乘车到重庆，然后换乘轮船顺江东下。船行至万县，因军警扣船运兵，滞留了一段时间。在街上闲逛时，偶然碰见了省一师的同学蒋世询。沙汀知道他正过着灰颓的生活以后，约他一道去上海考大学读书。

他们一行四人到达上海，住了一天旅馆。第二天到法租界艾威斯路找到了安县同乡萧宗英，由他在法租界菜市路天祥里租了一间前楼住下。接连几天，他们一面逛街，一面联系报考学校。三个人各自找到了去路。沙汀到吴淞的“中国公学”找到先前去北京途中见过的四川老乡巫次伦，打听了该校的一些情况。又到一所私立的新闻专科学校，问过课程设置和内容。他都没有报考。他对这些学校的课程都不满意。他不愿意轻易束缚在这些学校里。

这时候，两个先行到上海的四川老乡，帮他拿定了主意。一个是葛乔，一个是任白戈。葛乔是省一师的校友，住在萧宗英家对面，从萧宗英那里知道他到了上海。任白戈早年在重庆中法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重庆“三·三一”事件后，逃亡到成都。成都“二·一六”惨案爆发，辗转流亡到上海，在招商局办的招商公学教书。他在成都时，曾与周尚明一起担任过共青团的领导工作，从而知道沙汀的一些情况。他从葛乔那里听说沙汀已来上海，感到非常高兴。葛乔和任白戈相约来看望沙汀，一见如故，都用亲切的乡音，谈两年来的情况，谈共同认识的同志和朋友。当葛乔、任白戈听沙汀谈起来上海的打算时，都劝沙汀不要进什么学校，而要坚持自学。阅历比较丰富的

高个儿任白戈，还列举了一些自学成才的例子，反复说明自学的好处。这次会见，使沙汀下定了自修的决心。他想到的是，他向往的学校已经关门，据说还较好的学校，经实地了解，大都名不副实。与其进那样的学校混日子，还不如踏踏实实地自修。

在同葛乔、任白戈认识不久，沙汀又经萧宗英介绍，认识了刚从日本回国的萧崇素。当他们搬到闸北东横浜路德恩里 13 号时，沙汀也因天祥里的房租太贵，搬到那里居住。萧崇素住前楼，他住后楼。13 号的二房东夫妻俩都是和善的人。丈夫是做西装的缝纫师，妻子是一个日本人。每当下午或黄昏，就可以看到日本和尚敲着羊皮鼓到房东门口化缘。而日本女人总是给化缘者以充分的满足，以致报以深深的鞠躬。

这期间，在沙汀住房后面的一排房子里，住着周扬和周立波。由于一起办《摩登月刊》，萧崇素与周扬早已熟识。经萧崇素介绍，沙汀认识了周扬和周立波。稍后，也因为萧崇素的介绍，又认识了赵铭彝。不过，当时沙汀与周扬、周立波还没有多少往来。他觉得他们有一种优越感，不愿意同他们接近。

经常同沙汀往来的仍旧是葛乔和任白戈。后来他们又带来一个脸有些麻的王义林。任白戈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来沙汀住处聊天。葛乔、王义林从西艾威斯路搬到东横浜路景云里以后，因为近便，也常到沙汀这里来闲谈。

一到德恩里 13 号住定以后，沙汀就开始了自修的生活。

他周围的环境催促他上进。他身边有名目繁多的报刊，有各种各样的讲座，有丰富多采的演出，有琳琅满目的书店。他一直崇敬的鲁迅先生就住在很近的景云里，从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先生的近作。认识不久的周扬、周立波都是文化层次很高的人，不时有译著问世。很相好的任白戈，一面参加沪东区党组织的活动，一面从事马列主义著作和欧洲哲学著作的翻译。同乡萧崇素也见多识广，已经在报刊上崭露头角。所有这些，都是一种激励，一种鞭策，一种压力。

他托葛乔、王义林联系，到“上海艺大”旁听。先后听了陈望道、郑伯奇、夏衍的讲课。1930 年 3 月 9 日下午，还有幸在那里的左联成立大会会址，听了鲁迅先生关于《美术上的现实主义》的讲演，满足了一识先生的夙愿，获得了现实主义问题的许多新的知识和见解。他除了听课，成天关着门苦读。1930 年夏天，上海天热，仍把自己死死地关在破楼里悉心攻读。

我开始写作于一九三一年，在这以前的一两年间，我完全过的是灰色的堕落生活。我终天把自己关在闸北一间破后楼里，便是热天也不肯轻易出门一步，简直像耗子一样。这甚至养成我现在喜欢赤了脚搁在台子上呆想的习惯。

但自然和我的同辈青年人一样，我也有感愤，也不知高低地关心着我们这民族的悲苦的命数，可是却不知道应当怎样去干。那时候新的拼争正重新激发着我们，但同时也叫我们手足无措了。

青年沙汀正是在可以强烈地感到“新的拼争”的文化环境中。“不知高低地关心着我们这民族的悲苦的命数”，刻苦地也多少有些盲目地学习着和思索着。

他先是喜爱哲学，读了许多哲学著作，产生过编一本辩证法的小册子之

类的想法。随后又醉心于文学，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他读古典小说《儒林外史》，读现代作家鲁迅、沈从文、废名的作品，读法国作家莫泊桑、司汤达、梅里美、巴尔扎克、波兰作家显克微支、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作品，读俄罗斯、苏联作家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的作品，读苏联“同路人”皮涅克、伊凡诺夫、巴伯尔的作品。

有些作品，反反复复地读。鲁迅的《孔乙己》、《故乡》、《离婚》，契诃夫的《万卡》、《苦恼》、《齿痛》等，他不知读了多少遍。这些作品对人物独特命运的艺术把握，世态人情的真实描绘，情节、细节选择的精当，艺术结构的严谨，文笔的简洁洗练，深深地吸引着他。普希金的《甲必丹之女》（赵诚之译，后孙用译为《上尉的女儿》），他读来爱不释手。作品把彼得·格列尼约夫的恋爱故事与普加乔夫的起义事件交织在一起，从侧面表现了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其结合之巧妙，情节之紧凑，对普加乔夫描写之精采，使他赞叹不已。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从“共学社”的译本到高植的译本，他都一再读了。作品写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的几次见面，尤其是在流放的监狱中最后的那次见面，对两人各自隐秘的内心世界和特定的深沉感受，没有作任何解说，而是通过对话和心理的刻画真实地展现出来！对玛丝洛娃的自我牺牲精神，没有进行任何外加的评价，却从客观的描写中生动地揭示给读者。所有这些，都使他深深体会到列夫·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的特色，感悟到什么叫艺术的匠心独运。

这本书（指《甲必丹之女》）我至今总随身携带，尽管我连它当中的主要人物的生活都那么熟悉了，有时我却还要重读一些章节，感到最大的享受！所以我特别选用了“依恋不舍”

一语。我对托尔斯泰的《复活》也是这样。从“共学社”的译本到高植的译本，我都读过。而这后一译本一般我也随身携带，因为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的几次见面是多么吸引人！

特别是他俩在流放监狱中最后那一次会见。

这是 50 多年后，沙汀在和青年作者谈心时说的话。他甚至还有点偏激地说：不懂这两本书，就不会懂得写小说。可见他对这两部作品的推崇。

那些时日，与沙汀紧邻的萧崇素，曾为这位同乡的刻苦读书所感动。每当夜深人静，听见沙汀在屋子里时而鼓掌、时而抽泣，他就非常感慨地对人说：这位同乡又沉醉在契诃夫、托尔斯泰的小说里了。于是他也抖擞精神，认真读书。

与沙汀近邻的周扬，对沙汀刻苦自学的印象也非常之深。他曾不只一次对萧崇素说：你们这位同乡呀，最用功啦！

沙汀的阅读文学作品，显然已由泛读逐渐侧重在俄罗斯、苏联文学和东北欧文学。他的这种阅读选择和取向绝非偶然。第一，19 世纪以来，现实主义在西欧、北美已经在现代派或前现代派的冲击下衰落，其中心已转移到俄国和东北欧，在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身上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挪威的易卜生、波兰的显克微支身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怀着对民族、人民“悲苦的命数”和现实生活热切关注的沙汀，自然要以他们作为自己的借鉴。第二，苏联文学，包括 20 年代中期“同路人”作家的作品、程度不同地表现了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社会生活，其新鲜的、传奇性的生

活画面，相应的新的艺术手法，这对于倾向革命并曾经投身革命活动的沙汀，必然会有巨大的吸引力。第三，从“五四”运动到当时，鲁迅先生一直是进步作家的精神领袖和左翼作家的旗帜。先生的文学趣味不能不影响到所有进步作家和左翼作家，这也无疑会影响到从来就崇敬鲁迅先生的沙汀，不仅对先生的作品百读不厌，对先生译介的显克微支的作品，先生和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也充满兴趣。第四，现实主义在西欧狄更斯等身上，大体上是一种城市文学，而俄罗斯、东北欧许多作家把题材扩大到了农村。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描写了封建宗法制社会的真实生活和人生悲剧。这些作品也容易引起来自川西北农村乡镇的沙汀的兴趣。总之，沙汀的阅读倾向对他的文学的自觉具有积极的意义。他所阅读的作品，直接启发着他的文学智慧，推动着他的审美趣味的发展，陶冶着他的文学的性灵。

沙汀的苦读，当然是一种奋斗。可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开始并不十分明确。成名成家的念头早已萌生，但当作家的愿望并不强烈。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关心着人民、民族的命运，但对苦读与感愤的关系并不清楚。在上海站住脚，把朝思暮想的玉頔接来的打算是有的，至于这样的“奋斗”就能站住脚吗？也有些茫然。他有自主自制，又有矛盾苦闷。他连恢复组织关系的积极性都没有。一个偶然的机，他被同乡萧崇素拉去见了一场精彩的《文舅舅》（朱湘译，后通译《万尼亚舅舅》），被剧情吸引到一片荒漠之中，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改变自己的处境的愿望——要像剧作者契诃夫那样拿起笔来创作！……从这以后，他才真正有目的地生活和自学。这时候，一颗由异质文化冲突激起的创造的灵魂，噹噹噹地跳动起来。

我去上海，也不曾有过搞小说创作的念头。后来在自学的名目下，却成天读起小说来了，主要是俄国古典作家的中译本。在看了“辛酉剧社”演出契诃夫的《文舅舅》以后，深感这样无目的地自学下去，决非长策！我应该工作。

由一场戏猛然激起强烈的创作的欲望，这是多么有趣的现象！
这事看似偶然，并非偶然。

十七 辛垦 辛垦 辛垦

沙汀到上海不久，一方面坚持自修，一方面参与创办辛垦书店。

办书店的事最先是由葛乔、任白戈、王义林提出来的。那是1929年秋末的一天，他们来到德恩里13号，非常热心地向沙汀谈起了这件事。谈得最多的是葛乔。他对上海办书店的情况了解得最多。他介绍了大同书铺、南强书店等小书店的经营情况，提出了办店的设想，讲得来头头是道。沙汀听出来，这事显然是他们三人，还有他们提到的杨伯恺一起先行酝酿过的。当时上海不少有名人物，李达、林伯修等，都在热心经营书店，出版马列主义译著。林伯修翻译的普列汉诺夫著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就曾使沙汀爱不释手。而提出办店的葛乔、任白戈、王义林又都是有组织关系的人，任白戈的理论水平，葛乔的经营才干，也是不用怀疑的。同他们一起办个书店，一来可以传播革命理论，二来自己出书也方便，三来也便于以后独立谋生。所以沙汀当即表示完全赞成。

这以后，他们便相约去招商公学会见杨伯恺。在这几个青年中，杨伯恺

俨然是师长。杨伯恺早在 1919 年就与赵世炎等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参加了革命活动。1925 年回国后，与杨闇公、吴玉章一起在重庆筹办了中法大学，并作为吴玉章的助手，担任了教务长。重庆“三·三一”惨案中，他头部被打伤，侥幸逃脱，由党组织安排在汉口的湖北省第二中学教书。后来到了上海，与任白戈一起在招商公学供职。他对党的活动中的一些极左的做法，如每逢节日进行“飞行集会”之类极为不满，深感加强革命理论宣传的必要，对创办书店十分热心。他听大家谈了自己的想法以后，当即拍板，显出说干就干的样子。他的年资比所有人高，比沙汀年长整整 10 岁，又是任白戈、王义林的老师，很自然地受到尊重，形成他说了就算。他给沙汀的第一印象是严肃认真，但过分庄重，不好接近。

此后，杨伯恺又找大家商量过两次。这年年底，他应成都大学张澜的聘请回四川教书，在离开上海前夕，同大家一起确定了办书店的许多事项。书店的店名，经葛乔提议，大家讨论通过，定为“辛垦书店”。“辛垦”是英语“思想”的音译。按汉语又有辛勤垦殖的意思。办店的宗旨，未拟成条文，但一致的想法是以出版革命理论译著为主。拟议出版的第一批书，有杨伯恺从法语翻译的列宁的《论帝国主义》，拉法格的《财产的起源与进化》（《经济决定论》），任白戈从日语翻译的《依里奇的辩证法》，王义林从日语选译的文艺短论，包括青野季吉、臧原惟人的文章，葛乔从日语翻译的苏联沃尔加的《1928 年世界经济》。沙汀没有提出翻译计划。他的英语蹩足，日语刚刚起步。后来他从刊物上看到周扬翻译的果尔德的一个短篇小说，向周扬约了《果尔德短篇小说集》译稿。办店的经费，按照当时同人书店的做法，得由筹办的人入股和募股。杨伯恺、任白戈各认了股金二三百元，还表示要在招商公学募股。杨伯恺答应回四川后大力募股。葛乔、王义林认了股份，但没有交款，后来用版费抵交。沙汀一次就认了 1000 元，随即交出了一部分现金，满有信心地表示要向舅父郑慕周募股。大家对沙汀的慷慨和热心极表赞赏。由于对郑慕周捐资办学、办图书馆的事迹早有风闻，相信沙汀募股也不成问题。在确定董事长时，就一致推举沙汀。沙汀当然难乎为情。无论年资、译著，还是经营才干，他都不算首领，仅仅因为他出的钱多些。

书店的筹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杨伯恺走后，葛乔担任了事实上的经理。他年青肯干、主意也多。租赁店铺，购置用具，联系印刷，与纸商洽谈，里里外外一把手。大家也密切合作，任劳任怨。书店没有明确职责，每个人既是店主又是店员，既是编审又是编辑。店址选择在同仁书店林立的北四川路北四川里的一幢楼下的前后弄堂。店铺一经租定，几种要出的书分别交付印刷。“辛垦”的鲜花，就在几位同仁的辛勤浇灌下含苞待放。

沙汀对书店抱的希望很大。他从书店的兴办看到了自己的前景。书店办好了，生活有了保障，接黄玉颀到上海也就不成问题了。他一面积极工作，一面加紧自修，还加紧学日语。为便于互相学习和督促，也为了节省用费，他和葛乔、王义林合住在一起。地点仍在东横浜路，一间离景云里很近的临街的二楼前楼。三个年青人各搭了一张床睡觉，共用一个煤油炉煮饭。学习时各自面壁而坐，讨论时抵掌相谈。沙汀觉得心里充实了，苦闷也少了。

然而，正在书店出书的时候，叶青闯进来了。这是 1930 年学校暑假期间，杨伯恺来上海接家眷去成都。他向书店的同仁们问了一些情况以后，告诉大家，青锋（后更名叶青）即将来上海，为书店译书。他接着点明：青锋即任卓宣。一听说是任卓宣，知道其人的任白戈、葛乔、王义林当即表示反对。

沙汀在问明这个叛徒的底细后，也说这怎么行呢！杨伯恺言不由衷地向大家说，这件事已经省委同意了。（1963年，沙汀在上海见到曾在四川作过地下工作的陈同生，问及此事。陈同生说有这件事，这是当时四川省委的一个错误。）这样一来，大家就只得勉强答应。但一致提出，叶青来书店后，不能有政治活动，不能出头露面。

这年初冬，叶青来了。他到沙汀、葛乔、王义林住地同大家见面。任白戈也从招商公学赶来会见。因为都很陌生，又有成见，大家都很少说话，叶青却无所顾忌地侃侃而谈。他并不讳言在长沙被捕的事，但竭力为自己开脱。他说他被捕两次，第一次被判枪决，可是没有打中要害，让群众救治好了，第二次完全是由于党组织有关的人不听劝阻，非要用他的住处做联络工作不可。不过这些事都已过去了，现在他再也不搞政治了，只想埋头搞点翻译、写点东西，为革命做些实事。他的脸色苍白；但说话很有精神，语言也流畅，只是有点迂腐，有点市侩气。大家请他吃了午饭，他一再要付钱，还要一分一厘地计较零头。他还带来一位助手，名叫周绍章，南充人，成都大学学生，为他抄写稿件，料理生活事务。他初来时，倒还老实，埋头译著，从不露面。工作上很认真，生活上闹点笑话，例如为省时间省煤油，常常叫肉与饭一锅煮，使得他的助手叫苦不迭。没有多久，也就露出了本相。他叫别的人把稿件都交他校订，俨然总编辑的样子。对葛乔、任白戈、王义林、沙汀，通通不看在眼里，随意指手画脚。

这些时候，沙汀回了一趟安县。一是为了募股，二是为了接玉颀。路过成都时，杨伯恺约他以书店董事长的身份会见了车耀先、皮仲和、刘伯庄。车耀先早闻其名，当时正在经营“努力餐”餐馆，并与人合伙办书店。皮仲和在成都大学读书，是一个富有的地主子弟。刘伯庄与叶青熟识，也曾赴法勤工俭学。经过董事长做工作，前两人后来都成了书店的股东。杨伯恺还同沙汀一起去见了川军旅长陈离。他对这位将军的开明和进步早有所风闻，见面后，比预想的还慷慨，很有气派地说：“好嘛，要入股吗？给我个计划就行！”当沙汀提到郑慕周时，他还很不以为然地笑着说：“他，能出多少股？”

沙汀高高兴兴地回到安县，迎面而来的却是一瓢瓢冷水。他向舅父募股。舅父很快就知道他的用意是办好书店，将黄玉颀接出去。他对这种抛妻却子、另求新欢的行为大为不满。表示一股不给，半股也不给，并且向谢象仪等打招呼，对沙汀不予理睬。沙汀莫可奈何，只得哀求母亲给了点钱，以凑足他已认的股金，然后悄悄地同玉颀离开家乡。

沙汀和黄玉颀在成都停留了两天。还好，见到了原安县县长夏正寅，募集到两百元股金。当时已临近新年，杨伯恺已向陈离交了书面计划，收拾行装回老家营山县过年。沙汀和玉颀也匆匆踏上去上海的旅途。他们比杨伯恺早一天离开成都，在转赴遂宁候车时住进旅馆。杨伯恺途经此地，两个年青人正如胶似漆，在旅舍滞留。这一对恋人抵达上海时，已是春节过后了。沙汀向书店的同仁述及募股的经过与失败。他们似乎并不在意。此时，他们已从杨伯恺的信中知道陈离将大力支持书店。不多久，果然杨伯恺汇来一大笔钱，说是陈离的股金，而且陈离还将继续投资。

书店的资金雄厚了，出版的第一批书销路也很不错。书店的同仁们为此兴奋不已，打的打包，跑的跑邮局。最辛苦的当然是葛乔。后来才请来名叫廖志明的店员，作他的助手。书店除了交付房租，没有其他行政开支，工作人员也没有薪水，对廖志明也只供给食宿，大家谁也没有计较这些。不幸的

是，在这项有意义的事业方兴未艾的时候，内部的裂痕也在加大。唯我独尊的叶青，经常以杨伯恺在信中怎么怎么嘱咐为由，与其他人闹磨擦，特别是排挤葛乔。1931年暑假，杨伯恺辞去教职，前来主持书店工作以后，他更是利用这位长者的厚道，投机钻营，争权夺利。

一是在用人问题上。不知何时开始，店里忽然有两个人混迹其间。一个是刘伯庄，一个是任曙。大家知道了两人都是声名狼藉的取消派人物，纷纷提出质疑，叶青却与他们纠集在一起。任白戈、沙汀问及叶青，叶青搪塞说，刘伯庄已没有任何政治活动，一直潜心于从法文译介马列主义著作，任曙也是他很了解的人，正埋头做自己的学问。其实这两个人与他私交很深，气味相投。不久，刘伯庄交出一本《物质论》要求出版。同仁们认为这并非译著，而是著作，不符合办店初衷。任白戈、沙汀还担心其中塞进什么“私货”。叶青为其辩解说，刘伯庄的法文已经生疏，不得已改而从事著述，这本哲学著作还有不少独到见解。由于他一再向杨伯恺游说，而杨伯恺鉴于刘伯庄生活困难，也就不顾书店宗旨，同意出版。任曙则经常大耍无赖。他的老婆因不堪虐待，跟中央社的一个头头私奔。他既不敢追究，又不甘忍气吞声，终日借酒浇愁，大发酒疯。时而痛不欲生，时而满口秽语，披露夫妻生活中的隐私和党内个别负责人性生活混乱的秘闻，把一个书店闹得乌烟瘴气。他要求出版的小册子《中国农业问题》，歪曲中国农业现状，认为中国农业比之大革命前已有好转，农民生活也有好的趋势。言下之意，土地革命，苏维埃运动，均没有必要。对这一派谬论，任白戈、沙汀毫不含混加以反对，可是叶青却企图调和。幸好杨伯恺坚持书店暂不出版有关现实问题的政治经济读物，没有同意印行。

二是在建设理论队伍问题上。杨伯恺来上海主持书店工作时，向大家宣布，他有一个大计划：从四川搞一批青年来从事理论翻译和研究，从而造就一支理论队伍。书店可以用预支版费和稿费的名义，按月付给一定的生活费，将来出书后扣除。沙汀、任白戈、葛乔、王义林都认为此事要慎重。书店究竟能拿出多少钱？将来拿不出译著怎么办？究竟找些什么人来？政治上谁负责？善于钻营的叶青却力排众议，支持杨伯恺，大家看出来，杨伯恺本是一番好意，同他们有不同意见也只是工作上的分歧，但叶青显然是骗取信任，便于以后拉自己的人马，杨伯恺果然觉得叶青能理解他的意图，而其他的人都很狭隘。实际上，杨伯恺来上海时，已带来刘元圃、丁遥诗两个人，叫书店每月支付生活费。以后，他又陆续叫来一些人，有谭辅之、王宜昌、张默生等。久而久之，大家也再没有抱什么成见，还鼓励这些青年好好学习和工作。可是叶青却肯下功夫。凡与他意见不合的，就遭到他排斥，凡听从他使唤的都塞进书店。如已经发表文章的、原民力大学的高材生王宜昌，不到一个月就被排挤走了，而原在南充一所中学教书的张慕韩，因与叶青自幼熟识，叶青千方百计将他调来接替葛乔任经理。书店的人员复杂化以后，播弄是非的事也就多了，杨伯恺与任白戈、沙汀的隔阂也逐渐加深。

三是创办《二十世纪》问题。杨伯恺来上海之前，叶青就与他在书信往来中交换过意见，创办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刊物《二十世纪》。杨伯恺来后，正式向大家提出了办刊的计划。几个年青人都担心：这又不免又违背办书店的宗旨，介入现实政治问题，尤其在有叶青这类人物的情况下，牵涉政治问题必然引起许多麻烦。叶青又“舌战群儒”，说可以办成一个“纯理论”的刊物。青年们认为这是一种“神话”。他却说可以创造这样一种“神话”。对

办刊的经费，大家也不免担心。杨伯恺却说，这不成为问题，陈离会大力资助。大家认为这次争论，仍然是工作上不可避免的分歧。但叶青却蓄意制造杨伯恺与青年们的鸿沟。本来按照大家的意见，由沙汀担任刊物的发行人。可是当他还在为稿件、经费问题操心时，叶青早把编辑、出版权揽走了。《二十世纪》接连出版两期都用了杨朝熙的名义，刊登了一些什么样的稿件，沙汀一点也不知道。

辛垦书店没有兴盛多久，五位发起人开始分裂。最先是葛乔退出书店。这个第一发起人早就感到在店里没有地位。他募股没有成效，出书也少，腰杆不硬。叶青擅权后，更觉得许多事作不了主，以致无事可做。他暗中同北京的同学筹划另组书店。被疑心与那里的政治面貌不清的人往来，又被怀疑干扰任白戈和邬一先的恋爱，终致同任白戈大吵大闹，于1932年夏天离开了书店。他走后不久，经常与他形影不离的王义林也退出了书店。沙汀同情葛乔，认为他为开创“辛垦”出力最多，自己仅仅出版了一本译著，没有领半文钱的薪水。接替他的张慕韩坐享其成，一接手就公然给自己发薪加薪。后来沙汀得知他在北京与托派混在一起，才表示鄙弃。至于王义林，在沙汀心目中不过是一个庸俗低能的人。此人后来与叶青的妹妹结婚，走向了堕落。

沙汀从1931年起，就已不大关心书店的事了。这年春节后，因为玉颀上学的问题一时没有得到解决，便相偕到杭州度蜜月。两人住在离岳坟不远的“汪社”。看苏堤春晓，观花港游鱼，度过了30多个甜蜜、愉快的日子。

一个多月后，沙汀和玉颀回到上海，住在德恩里13号老地方。玉颀每天到“艺专”音乐系学习。他则静心读书。读来读去，先前萌生的创作的念头愈益强烈，把枯燥的日语丢到了一边。不久，他同艾芜重逢，把兴趣完全转到了创作上。艾芜曾告诉沙汀，杨伯恺很热心地邀请他加入“辛垦”。沙汀说：不要去了，“辛垦”闹分裂了。

在辛垦书店的同仁中，沙汀一直与任白戈很亲密。他们经常交谈，互相信任，胸无芥蒂。秋天，玉颀人工流产卧床，沙汀为侍候病人弄得筋疲力尽。任白戈放下自己的事，终日帮助照顾病人。他跑街买菜捡药，守着两个煤油炉子煮饭熬药。晚上还同沙汀轮班守护病人，让沙汀适当休息。这样热情地帮助，有两个星期之久。左邻右舍，无不为之称赞。连二房东那个日本老婆，也感动得忍不住落泪。

葛乔退出书店后，任白戈和沙汀已同书店若即若离。一天，他们到书店闲坐。忽然听杨伯恺说，鉴于当局查禁书刊、查封书店，雇用暴徒捣毁书店，为保住“辛垦”，准备叫叶青去南京拉拉关系。还说这是叶青的建议，他与那里的周佛海在北伐时就认识。任白戈、沙汀听了，十分惊愕，连忙说无论如何不能用这种办法，杨伯恺见状，赶紧把话题转到一边去。任白戈、沙汀以为这不过是杨伯恺一时的念头，没有记在心上。谁知没过多久，任白戈就从张慕韩那里得知，当时有名的文化特务朱其华到书店找过叶青，而叶青又到南京找过周佛海。张慕韩得意地说：现在放心了，书店不会出问题了。耿直的任白戈听了，几乎肺都气炸了。他立即找到沙汀：罢了，赶紧脱离“辛垦”！过了两天，他们便去向杨伯恺提出退出“辛垦”。他们没有点穿与南京拉关系的事，只是强调不愿与叶青共事。杨伯恺十分着急，一再劝他们留下，还建议沙汀任书店的经理，并且同叶青当面谈谈。沙汀没有答应任什么经理，但表示可以同叶青见见面。

好心的杨伯恺，陪同沙汀去与叶青会谈。叶青来上海已大捞了一把，住

上了有一个单元的弄堂房子。一楼一底，宽敞舒适。室内床铺桌椅，一应俱全。这哪里是沙汀的斗室蜗居所能相比的。他除雇用周绍章作助手，还把一个兄弟和一个20来岁的妹妹也接来侍候生活起居。沙汀和杨伯恺上得楼房，叶青恭迎接待。当杨伯恺谈到沙汀打算离开书店时，叶青立即表示挽留，显得比杨伯恺还要热情。他把“辛垦”的前途吹嘘了一番。他说：“在上海滩，北新书店要算最大的了，可是‘北新’算什么？我们‘辛垦’将来一定会超过它！……”从来不大沉得住气的沙汀打断他的话：“这些不说了！我想问问你到南京去是怎么一回事？”叶青说：“是去过呀。”沙汀又问：“是怎么一回事？”叶青说：“啊，你是问去做什么？——”他又凭着他那很不错的口才，滔滔不绝地叙述去南京的目的和经过。说是南京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是中央政治大学文史系的高材生，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他们之间已通过几次信，彼此都很想有机会面晤。他这次去就是同情人约会，双方已约定在女方毕业时就“花好月圆”。他说：“我们之间的通信，那真是心灵撞击的美妙的乐章。结婚以后，我们准备将所有的信汇集拢来，像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一样，结婚的费用也解决了，……”沙汀再也没有耐心听下去了。他陡地站起来说：“好了！你这个恋爱最划得来！人也搞到了，钱也搞到了！”他的语气带着明显的轻蔑，这是他习惯的语言方式。叶青顿时语塞。他还没有回过神来，只见沙汀已快步下楼了。杨伯恺连忙上前相劝，但没有任何用处。叶青的弟弟也打招呼：“唉，就要吃饭啦！”也没有留住客人。

沙汀、任白戈退出了“辛垦”。此时，他们已站到“左联”的旗帜下了。

辛垦书店的发起人陆续退出，只有杨伯恺一人勉强撑持。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叶青公开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杨伯恺与他彻底决裂，书店也就关门了。

“辛垦”的那些日子，沙汀一直是怀念的。他为它花过心血。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就是“辛垦”出版的。“辛垦”开办的几年内，一共出版过几十部译著，在当时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中，与其他进步书店一起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沙汀与杨伯恺有过隔阂，但他始终钦佩杨伯恺那种长者之风。每当同仁们发生争执时，杨伯恺总是语重心长地说：“现在问题非常简单，要拿出东西来啊！”当任白戈流露离心倾向时，他也总是说：“认真坐下来读书和研究嘛，不要出一本《伊里奇的辩证法》就满足了！”杨伯恺的这些劝导，始终成为沙汀动情的追忆。杨伯恺自己呢，也确曾踏踏实实做过翻译、研究工作。短短几年时间，他出版了10多部译著。有《财产之起源与进化》、《哲学原理》、《精神论》、《哲学思想集》、《哲学道德集》、《学说与格言》、《思想起源论》、《自然之体系》等。这是他的实绩。

退出“辛垦”很长一段时间，沙汀没有见到叶青。忽然有一天，他在八仙桥碰见刘元圃，不由他分说，被拉到青年会去看叶青的婚礼。出于好奇，他挤进了那热闹的场所。只见叶青身着燕尾服，带着白手套，俨然洋场绅士的样子。只是脸色仍旧苍白，表情有点痴呆。沙汀看了一眼就转身走了。后来据说叶青旧习不改，仍然坚持饭与肉、饭与菜一锅煮，以致新郎、新娘经常为之吵嘴、打架。

十八求教于鲁迅先生

沙汀和艾芜在上海重逢，对他们两人的生活道路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那是 1931 年 4 月的一天下午，沙汀陪黄玉颀去宽仁医院诊病回家，路过北四川路横浜桥，忽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桥头迎面而来。啊！那不是汤道耕吗？他又惊又喜，高声喊道：“汤道耕！”艾芜看清是杨子青，也激动地叫道：“杨子青！”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两人成都一别，已经将近 6 年。今日竟在上海不期而遇，都感到意外，感到分外高兴。

沙汀向艾芜介绍了黄玉颀。然后问他何时来上海，住在何处？艾芜告诉沙汀，他来不久，尚无定居，经漂泊云南时结识的、正在上海劳动大学读书的王秉心介绍，暂时在宝山县泗塘桥农村栖身。不容他多说，沙汀热情邀请他进城来住。不多久，艾芜就搬到德恩里 13 号的亭子间里，与沙汀夫妇邻居。

沙汀和艾芜竟日长谈。沙汀听艾芜讲了南行的生活情形，被他丰富曲折、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迷住了。他热情地鼓励艾芜写出来。他认为艾芜的素养、气质完全适合文学创作。艾芜也听沙汀讲了几年来的生活经历。凭着他对沙汀素质的分析，认为沙汀也应致力于创作，而且一定会成功。

接下来的日日夜夜，两位挚友就一起在德恩里的那狭窄的屋子里纵谈世态人情，倾诉人生感受，畅叙阅读心得，揣摩艺术技巧。两颗心互相撞击，又心心相印。沙汀身体较好，精力弥满，兼之又好激动，常常一拉开话匣子就关不拢去。艾芜因长期流浪，健康稍差，容易疲乏。当他抗不住困倦，沉重的头偏向一边时，沙汀就提高嗓门，并伸手摇动他的膝头，使他振作精神，继续热烈地交谈。

他们互相打气，执笔创作。艾芜早在漂泊期间，写过诗歌、散文、小说，已有初步的创作经验。他重新回顾从昆明街头的人生第一课，到乘英国太古公司太原号轮船赴上海途中的感受，构思着《太原船上》、《洋官与鸡》、《伙伴》、《人生哲学的一课》。沙汀时而思考着他所熟悉的大革命失败后来上海的知识分子的矛盾和苦闷，构思着《俄国煤油》、《莹儿》，时而又忧虑着农村的动荡和破产，构思着《风波》。

他们觉得自己是怀着对时代的助力和贡献的愿望进行这些作品的构思的。所要表现的人物都是有熟悉的模特儿作依据，而不是所谓普罗作家那样凭着某种革命愿望虚构和编造的。可是在创作的题材上，一个主要写时代潮流冲击圈外下层人物求生的欲望与朦胧的反抗，一个是讽刺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弱点，这样的作品有什么时代意义呢？他们不免有些迟疑，他们多么想向文学前辈请教，多么想有导师的指点啊！

他们想到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不就近在咫尺吗？为什么不请他指点迷津呢？然而，他们刚刚动议，又自行否决了。已经蜚声中外的鲁迅先生，在他们是高山仰止。先生会理睬他们这样的无名青年吗？他们犹豫再三，最后才鼓起勇气：给先生写信！于是，两人经过商量，由艾芜执笔，给鲁迅先生写了信。本来他们的住地距先生的家很近，可以将信送上门去。但考虑到先生写作很忙，尽量少去打扰，又考虑到先生的安全，避免引起特务的注意，采取了当时通行的办法，在信封上写周建人先生收，由他代转。

沙汀、艾芜的信于 1931 年 11 月 29 日寄出。鲁迅先生在当天收到。接连 20 多天，鲁迅特别忙。他主编的《十字街头》创刊。接连发表了《好东西歌》、《公民科歌》、《知难行难》、《沉滓的泛起》、《“友邦惊诧”论》。还就赵景深关于翻译的错误主张，写了《几条“顺”的翻译》、《风马牛》等

文章。而且接到来信的第五天，即12月4日，孩子海婴又患了流行性感冒。从当天到12月14日10天内，七次携海婴去医院诊病和取药。21日，他自己也染上了流感。如他在日记中记叙的：“身热疲倦”、“头重眼肿”。然而，先生仍然非常认真地考虑了两个青年提出的问题。据鲁迅日记分析，他可能于12月8日写了一简短的信稿，12月25日正式写成《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12月28日，带着病后的疲乏，亲自徒步从住地的北四川路“北川公寓”（鲁迅已于1930年5月12日从景云里迁居此地三楼四号，其弟周建人仍居景云里原处。沙汀、艾芜误将周建人住处当作鲁迅住地，在回忆文字中一直说鲁迅此时仍住景云里），送到两位无名文学青年家里。遗憾的是沙汀、艾芜均不在家。直到解放以后，他们才从周建人那里知道事情的经过。

鲁迅在回信中，阐明了他的题材观。一、对作品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题材，而是作者。对革命文学来说，则关键在于作者是不是一个“战斗的无产者”。“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意义的”。二、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观照现实生活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并非与无产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有聪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里的没有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的事，无须管得，更说不到损益。例如法国的戈兼（戈蒂叶，1811—1872，法国诗人，小说家）痛恨资产阶级，而他本身还是一个道道地地资产阶级作家。倘写下层人物（我以为他们是不会‘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阶级并无补助。而且后来也很难言。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势力一大，觉得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三、作者的立场和世界观固然指导着作者对题材的处理和运用，但这种指导作用必须通过深切的感受这个环节才能发生积极的影响。因此，当作者尚未到时代潮流中心的时候，可以“就自己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例如沙汀、艾芜信中所举的他们熟悉的两种题材，“如第一种，非同阶级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袭击，撕其面目，当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种，则生活状态，当随时代而变更，后来的作者，也许不及看见，随时记载下来，至少可以作这一时代的记录。所以对于现在以及将来，还是都有意义的”。四、作者的立场观点可以决定处理和运用题材的方向，但也不可忽视题材对象本身的潜在价值及其差别。因此，必须严格选材。“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五、一方面，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是“革命文学”；但另一方面，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以致沉役了自己。既然“两位都是向着前进的青年，又抱着对于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意志，那时也一定能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看见新路的”。鲁迅的这些论述辩证、全面、完整、彻底。不仅对沙汀、艾芜的创作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在当时的文学发展中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极大的针对性。他是继：“左联”成立讲话批评了小资产阶级作家在“左”倾路线影响下过高估计革命形势，而不面对艰苦的现实的盲目乐观情绪和不正确的文学观念之后，进一步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立场与劳苦大众存在着差距，因而造成对生活的感知与把握的差距，强调了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局限的迫切性。他针对20年代末期提出革命文学口号以来的“左”的倾向，

强调了创作主体以及作家生活感受的极端重要，明确指出能写什么就写什么，写自己熟悉的题材，而不要为了趋时，离开自己的生活感受去硬造“革命英雄”。对那些脱离生活感受，仅凭一种革命的主观愿望，用一些抽象的观念去处理“重大题材”，创作出缺乏真切感受的作品还自以为是“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提出了诚恳的告诫。

沙汀、艾芜接到鲁迅先生的复信，真是喜出望外。他们抑止不住兴奋和激动，选出了自己的习作，由沙汀执笔写了一封信附于其后，寄给鲁迅，请求指导。沙汀寄去的是《俄国煤油》，艾芜寄去的是刚刚脱稿的《太原船上》。1932年1月5日下午，鲁迅收到稿件。1月10日晚，写了复信，带上小说稿，由许广平陪同去沙汀、艾芜住所。当晚阴霾欲雨，北风透骨生寒。鲁迅夫妇步行到两位青年住处。此时沙汀外出未归，艾芜上前接待。由于艾芜与鲁迅从未谋面，而他和沙汀给鲁迅的稿件仍然是寄周建人先生收转，以为送回稿件的必然是周建人，就没有多所交谈。到1936年鲁迅逝世时，去瞻仰鲁迅遗容，见到灵前的周建人，才辨别出这天晚上前来的不是周建人而是鲁迅。后来他读《鲁迅日记》，见1932年1月10日所记：“晚复杨汤信，并还小说稿”。再一次印证了这一事实。

鲁迅在退稿信中，认为《太原船上》写得朴实，题材、描写都比较好。这样的作品不是在时代中心之外。对《俄国煤油》则有批评，说“顾影自怜，有废名气”。沙汀和艾芜对先生的热心指导感激不尽。1月14日，又由沙汀执笔，联名复信向鲁迅先生致谢。

《俄国煤油》是沙汀的处女作。它写一个叫罗模的年青的知识分子，从四川破产的封建家庭来到上海，居住在狭窄的小旅店的亭子间，买不起烧饭的煤油，精神也十分“苍白而空虚”，便渐渐“由痛恨上海人的岂有此理，转而深悔离开乡土的自己之失策”，陷入深深的哀愁之中。不多久，他忽然听到一个欢欣鼓舞的消息：只等中俄会谈成功，俄国的煤油就要运到上海。他兴奋地想起那出产廉价煤油的国家，“现在它不是工人的国家么？不是正在努力经济的复兴么？……”他有了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可是，他的情绪又反反复复。时而燃起希望，时而“脑筋昏昏荡荡，心里是搔抓不着的难过”。后来，他终于在一天上午去售货店购油去了。不幸的是他迷了路。他“感到从来没有的虚弱和昏乱”，“一个尖锐而冰冷的意识电流似的透过全身，‘我快昏倒了！’”他在最后清醒过来，迈着虚晃的大步，向着家里的方向，毫无选择地走去”。他回家“醉人似的入睡了”，他进入了梦幻：“‘煤油燃了！’……他想大声叫，然而喉头又有甚么冷而硬的东西哽住，……突然，又飞来震耳的噪音：‘哼！便宜，没有一只手！’……身子沉重地往下面落着，落着，一撒，虚弱的意识掩过来。……”这篇长达1万余字的小说，写罗模穷愁潦倒的生活，表现他自怨自艾的心理活动和情绪变化。

这篇作品的症结在于鲁迅指出的“顾影自怜，有废名气”。废名即20年代中期以《竹林的故事》、《桃园》著名的作家冯文炳。其作品冲淡、朴讷又带有感伤情调，产生过不小的影响。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序》中曾说：“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作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的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耀，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

态了。”《俄国煤油》中罗模的“哀愁”也不过是琐碎生活中一己的“有限的哀愁”，他的感伤也只是狭小天地里个人的小小的悲欢。作品对其中真切之处的描写也吞吞吐吐，寄寓的嘲讽也欲言又忍。于创作者也许自以为有深意，但读者看来却沉溺于自怨自艾之中，一种顾影自怜之态中。

这篇作品反反复复写罗模繁琐的日常生活，却又硬塞进向往社会主义苏联的重大政治题旨，在艺术旨趣上是讽刺罗模式的生活情态，却又企图通过这个人物寄托对光明的向往。这样就使作品的艺术载体与思想主题之间不协调，使讽刺旨趣与理想情调之间不谐和。这类于黯淡琐碎的生活情调中硬加政治油彩的构思方式和表现方式，显然是受了初期“革命文学”创作思想的影响。

本来当时沙汀手中除《俄国煤油》，还有《风波》、《莹儿》等短篇小说初稿。他之所以选送这一篇小说，主要是因为注意到鲁迅的信中有熟悉知识分子可以写知识分子，熟悉劳动人民可以写劳动人民这样的语意，认为他写了熟悉的知识分子，在描写技巧上花了功夫，还运用了意识流等手法细腻地刻画了人物的心理。他的这种认识当然是肤浅的、片面的。他忽略了鲁迅在信中的“不能将没有意义的事，便填成一篇”和“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论断。而且他所认为的“写熟悉的”也并非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写熟悉的。毫无疑问，《俄国煤油》写的寓居亭子间的生活和感受，对往昔故乡生活的怀恋，都是他所熟悉的，甚至还像许多作家的处女作一样，写进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有些非常细腻的笔触也足可称许。可是作品中大量描写的罗模的那些琐碎的烧饭、睡觉、梦呓、起床、踉踉而行等，都是缺乏严格选材的现象罗列。现实主义不同于自然主义。它要求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作家应当写熟悉的生活，但又要严格选材、深入开掘。在更高的意义上创造新的艺术形象。

鲁迅给沙汀、艾芜的两次复信，给了两位文学青年莫大的鼓舞和具体的指导，使他们坚定了毕身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受到了深刻的教益。当然，他们对复信的理解会有一个过程，后来沙汀曾经述及：

当我们收到先生的回信时，深感先生对我们的关怀和鼓励，感情激荡得很厉害，因而只是朴素地觉得信的内容丰富，使我们有了用创作为革命服务的勇气，但对于先生的许多宝贵的指示，并没有很好体会，当然，也不能单凭一些宝贵指示，便可以写出像样的作品，它还需要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譬如，鲁迅先生对我讽刺小资产阶级的习作所加的评语‘顾影自怜，有废名气’，就使我改进了文风，乃至内容。尔后又得到茅盾同志对我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的批评指正，这才逐步加深了对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实质的理解。”

十九崭露头角：《法律外的航线》

得到鲁迅先生的指教以后，沙汀更加勤奋地创作。

1932年“一·二八”战争期间，他所住的德恩里处在日军的控制范围内。日军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就设在附近北四川公寓的对面。战争爆发的当夜，居民们纷纷逃往英、法租界避难。沙汀、艾芜和黄玉颀在战乱中蹲了半夜，几度设法转移，都没有成功。后来任白戈冒着生命危险前来接他们出险境。他领着他们穿过一道道小巷，一连几次被日本兵挡住盘查，有一次，一个日本兵喇地用明晃晃的刺刀指着任白戈的胸口，把黄玉颀吓得一声惊叫，沙汀、艾芜也连忙说退回去，但任白戈仍坚持前行。他们四人，还有辛垦书店的杨

伯恺等，在法租界吕班路租了一间前楼住下。几个逃难的人一起吃了20多天大锅饭，战争停了才各自回去。

沙汀夫妇回到德恩里住了一段时间，于当年初夏再度去了杭州。他们仍住在“汪社”。沙汀此次来的目的是潜心写作。西湖的初夏，风和日丽，柳枝招展，湖波潋滟，但他无心观赏，从早到晚都伏案工作。他修改和新写了6篇小说。6月底，任白戈还同邬一先来住过两天。任白戈是到山东、北京转了一圈以后回到上海，来到杭州的。他气愤地告诉沙汀，葛乔曾破坏他与邬一先的关系，使他们之间产生了隔阂，他希望沙汀做些工作，让他们修复感情。沙汀作过试尝，但没有成功。他们很快就返回上海。不几天，沙汀夫妇也回到上海。他们打算仍住德恩里，见艾芜的两位“左联”的朋友已挤在那里，便改在虹口里虹桥附近租房住下。生活稍稍安定，他又继续写作。

到1932年8月，沙汀已创作713篇小说。拿着这一迭迭书写得整整齐齐的稿件怎么办呢？投寄给刊物？始终没有勇气。与出版商联系？又找不到门路。他反而发起愁来。热心、厚道的任白戈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一天，当着杨伯恺、沙汀在场，他提出是否可以由辛垦书店出版沙汀的小说集。他本来知道杨伯恺一向不重视文学创作，却偏偏要当面提出来。杨伯恺有些勉强地说，这，当然可以嘛！可是，是否可以先发表一部分再出书，销路会好些。沙汀一点也沉不住气，顿时气忿忿地说，用不着谈出小说集的事。杨伯恺再三解释，他也不吱一声。

一连几天，沙汀闷闷不乐。艾芜知道了这事，几次拉他去喝酒解闷。直到杨伯恺派刘元圃来道歉并索稿，他才冷静下来，将稿件交出。其实，杨伯恺并没有拒绝出这本书。他也有他的难处。出版小说集不也是违背“辛垦”的宗旨吗？

小说集付排以后，艾芜比沙汀还要高兴。他约耶林清洁风画社的郑邵虔作了封面木刻。沙汀原用名“沙丁”，意在表明要作一名发掘生活矿藏的“金佚子”。艾芜建议将“丁”改为“汀”。艾芜还要沙汀抄了《码头上》和《野火》两篇，由他转给《北斗》杂志。过了几天，他告诉沙汀，编委会讨论这两篇小说时，丁玲还对其中的一些土语作了解释，因为湖南也有类似的说法。后来由于《北斗》被查封，这两篇稿件转到了左联书记处继《北斗》、《前哨》之后创办的《文学月报》。此时，沙汀又将《汉奸》也寄给了《文学月报》。这三篇小说先后在《文学月报》上发表。

沙汀的第一本小说集，于1932年10月由辛垦书店出版发行。这本书以《法律外的航线》的篇名为书名，收入沙汀1931年4月至1932年8月创作的12篇小说，共印行1500册。出版者热忱地介绍说：“这是由现实生活底体验与观察抽绎出来的十余个短篇小说集。体裁是写实的。是深耕的刻画，是统一了的内容与形式，并不像单纯的纪事与步韵的填词。题材有反帝的，有涉及‘一·二八’的。有崩溃的农村摄影，有没落小布尔乔亚底悲哀，……这是近三年来中国文艺界底寂寞中骤然出现的一株青草，并不让于奇花异卉。书已付印，不日出版。”

这本书一问世，很快引起瞩目。现代书局出版的《中国文艺年鉴（1932年）》，选载了《法律外的航线》。并且在《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中评介说：“这位在1932年以前没有人听到过的作家，却决不是对文学毫无修养而率尔操觚的。我们只消照他的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所包含各篇的发展过程看，便可以看出作者在辛苦地找寻着并且发现着新的表现法和新的术

语的痕迹：他的作品所以是有独特而非模仿的风格，到底也不是偶然的事情。沙汀在描写一个复杂而错综的场面上有他的特殊的能力，虽然他的表现法也许失之晦涩。”《法律外的航线》还由冯余生译成英文，以左联的名义寄给在苏联的萧三，准备介绍给《国际文学》，后来下落不明。

茅盾在小说集出版之前，就看到了个别的篇章。他是从周扬送审阅的稿件中看到的。当时周扬刚刚接任《小说月报》主编。他给茅盾送去几篇短篇小说的原稿，对茅盾说：这些都是年青人的作品，我看过，认为还可以，请你审定一下，能不能采用？你是编委，又是名作家，所以来稿中的小说就请你最后审定。还有其他一些差的稿件，就不送来了。茅盾看的这批原稿，就有沙汀的《码头上》、《野火》，艾芜的《人生哲学的一课》。他看完《码头上》以后，附上了一张字条，说写得还可以，看来作者是有才华的，小说可以发表，不过结尾这种印象式的写法，我不喜欢。过了两个月，即1932年12月，茅盾看到了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由于这之前对沙汀其名和《码头上》、《野火》已有了印象，很认真地读了，很快写了评论文章。茅盾对这部小说集总的评价是：“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好书！”他认为其中多数篇章不同于数年前的“革命文学”，没有公式主义的结构，没有脸谱式的人物，却有作者自己的风格。他特别喜欢《法律外的航线》、《平平常常的故事》、《撤退》、《恐怖》、《莹儿》等。他认为这些作品用写实的手法，很精细地描写出真实的社会生活图画。人物的对话是活生生的四川话，是活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对话。他们嘴里没有有些作家作品中那种生涩的知识分子的长篇大论以及按照逻辑排列得很整齐的有训练的辞句。他对《码头上》提出了批评。认为从这篇作品可以看见这位新作家身上还有公式主义的余毒。这篇小说通篇都是生活的写照，但篇末却硬扎上一个革命的尾巴。也许有些评论家喜欢这个尾巴，但他却认为应该割掉这个尾巴。他在评论文章的最后写道：“《法律外的航线》里的短篇，大部分不是蹈袭了那个旧公式，并且作者的手法也是他自己的。这便是可喜的现象。盼望沙汀努力，再给我们一些！”

《法律外的航线》引起关注，正由于它是在左翼作家清除革命文学倡导时期造成的“左”的影响中应运而生的，是左翼作家走向艺术自觉时所期望的现实主义艺术成果之一。20年代中后期，在革命文学倡导者蒋光慈、李初梨的创作以及他们把持的文学刊物中，存在着严重的“左”的幼稚倾向。在思想内容上表现为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漫蒂克”情调，在艺术方法上表现为公式化概念化，最明显的是结构的公式主义，人物的脸谱主义，正像茅盾所生动地概括的那样，“结构一定是先有被压迫的民众在穷苦愤虑中找不到出路，然后飞将军似的来了一位‘革命者’——一位全知全能的‘理想的’先锋，热刺刺地宣传起来，组织起来，而于是‘羊群中间有了牧人’，于是‘行动’开始，那些民众无例外地全体革命化，人物也一定是属于两个界限分明的对抗的阶级，没有中间层，也没有‘阶级的叛徒’；人物的性格也是一正一反两个‘模子’，划一整齐到就像上帝用黄土造成的‘人’。故事的发展一定就是标语口号的一呼一应，人物对话也就像群众大会里的演说那样

茅盾：《法律外的航线》，载《文学月报》第1卷第5、6合刊。

茅盾：《法律外的航线》，载《文学月报》第1卷，第5、6合刊。

紧张而热烈，条理分明。”这种倾向一出现，就受到鲁迅、茅盾的批评。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它在理论上已受到清算，但在创作上的影响尚待肃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沙汀等一批青年作家推出了一部部富有生活气息的现实主义作品。它们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活力，给文学创作注入了一泓清流。这批作家能取得初步的成绩当然不是偶然的。就沙汀来说，这是由于他有一定的生活根基，由于他受“左”倾的影响较少，因袭的负担较小，也由于有一定的艺术省悟。他和艾芜在致鲁迅先生的信中说，他们“虽然也看见过好些普罗作家的创作，但总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却喜欢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画出来”。这就是对创作中“左”的倾向的怀疑和挑战，是一种艺术意识的重要表现。

《法律外的航线》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侧面。《法律外的航线》这篇小说可以说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无忌和苏区土地革命如火如荼的一个剪影。它取材于沙汀多次川江航行的经历和感受，着墨在一条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即所谓“法律航线”之外的外轮的一次航程，表现外国船主、洋兵以及高等华人的买办对群众的欺压，人民群众的愤怒和骚动，从两岸可以感到、从乘客谈话中可以听到的土地革命引起农村变动的的生活情形。《恐怖》涉及四川的一个大事件：倾向进步的川军旅长陈离率部起义，四川军阀以及成都军警极为恐慌，疯狂地进行“清共”的搜捕和屠杀，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作品巧妙地避开事件本身，着重通过一个青年学生的感受，表现此事件引起的白色恐怖气氛。《撤退》、《汉奸》以“一·二八”战争为背景，表现民众和下层官兵抗日的热情，反动军队的不抵抗主义和对民众的恣意残害。《我“做广告的”表兄的信》、《没有料到的荣誉》勾勒了“九·一八”国难中大后方国民党官“关着门跳他们自己的加官，翻他们自己的粪堆”的丑恶嘴脸，和破落乡绅用无赖的自杀骗取爱国者称号的无耻面目。《莹儿》通过对知识分子心态的探索，折射了那令人窒息和压抑的社会生活。《平平常常的故事》切入从苏区逃亡出来的地主乡绅的生活情态，用意透露苏区土地革命引起的震撼。《风波》、《酵》反映了农村的破产和动荡。这些作品截取的生活层面大多是当时人们关心并感到新鲜的。它们在表现这些生活层面时，一般都采用了侧面的描写。《法律外的航线》以航船为窗口。《平平常常的故事》着眼在逃亡地主的生活和心理状态。《恐怖》通过气氛来看事件。《撤退》、《汉奸》都落墨在一支退却中的连队，等等。这种手法当然与沙汀对苏区、“一·二八”战争的全局和对白色恐怖事件并不熟悉、无力正面描写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艺术的选择，一种艺术上的聪明才智。

这部小说集的一些作品在某些艺术描写上，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真切。这是它们的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也是被茅盾认为初步展示了艺术才能的重要依据。如《法律外的航线》写船上湖北老、包袱客、鱼贩子、老头子等“杂色客人的杂色谈话”，写峭壁、村落、田野、黄色的江岸、湍急的江流等环境气氛，虽不无浮光掠影之嫌，但将各种人物的谈吐、面貌和身份，具体情势下的生活场景，从总体上活生生地描绘了出来。所以茅盾在评论中摘引了写众多人物谈话的好几个段落，称赞说：假如你耐心读一遍，再读一遍，你闭眼默想，你就能够感到那真实的生活的图画，如同你亲身经历过。斯诺也

曾予以高度的评价：“几笔就勾出一幅十分生动的形象”。又如《莹儿》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温室’里娇养的孩子与垃圾堆上穷人的孩子的对照中，描写知识分子对自己苍白贫乏生活的苦闷和自责，虽然失之琐碎，但也比较细腻和真切。《恐怖》写白色恐怖：军警包围学校，就地处决学生，在尸体上贴上白色纸条，场景描写和气氛渲染真实具体，绘声绘色，使人如同身临其境。《风波》整体构思较松散，但写机匠破产后的心境：他踏着浓霜焦干了的枯草回家，把清鼻涕擦抹在布满鸡粪、蛛网的织布机上，见了穿进口花布衬衫的媳妇就心烦，咒骂病中的妻子，接着又想起妻子的好处，关于妻子的价值观是能生孩子，劳动勤快，等等，将特殊境遇中的心理状态，用真实的细节逼真地表现了出来。

这部小说集还有一个在当时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人物语言普遍运用了四川民间活的口语。这些语言生动、简洁，富有生活气息和表现力。例如：“婆娘跑到城里告状，尿都快给泼出来了，——有屁的用！”（《风波》）“嚎丧吗？老子给你娘儿母子把毛都拖落了！”（《风波》）“对啰！雷打人总也查个善恶呀！”（《恐怖》）“要是上头说话，我可不负责啊！——简直拿红炭团给我捏呀！”（《撤退》）“我是干什么的呀！和尚每天吃了饭也要念两句消灾经嘛，——真正，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我“做广告的”表兄的信》）“尽量吃，没看你停过嘴！不怕屁股上牵狗么？”（《汉奸》）“快了么？你看喉咙里都伸出手来了！”（《法律外的航线》）“我说会走出蹊跷来吧！”（《法律外的航线》）“打退了，我愿意在手掌心里煎鱼给他吃！”（《平平常常的故事》）这样的例子很多。当然，作为创作的起步，有些语言还不免粗糙，特别是叙述语言还有不少枯燥、生涩的欧化句子。但在当时许多文学作品知识分子腔调较重，甚至掺杂标语口号式的空话的情况下，这些作品大量运用活的口语，不能不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法律外的航线》毕竟是沙汀的发轫之作。它的艺术质量参差不齐。有《法律外的航线》这样的稍好的作品，也有《酵》这类极差的篇章。从总体上说，也还停留在用一个故事、一段情节以表现一种题旨的浅层次上，人物描写更是停留在印象式、类型化的较低的水平上。1934年4月1日《现代》月刊发表的侍桁的一篇评论认为，沙汀还不是在作艺术的写生，而是使他的笔成了一架照相机，他的作品只有群像，没有个性的人物。侍桁的有些措辞不免言之过甚，但指出人物有群像而缺乏个性却是十分正确的。后来沙汀也同意这个批评：“有一位批评家曾经提到这个，我认为他的话是不错的，算是搔到了痒处”。

这部小说集的有些作品，也还有革命文学倡导时期“左”的影响，有一些概念化的笔墨。《码头上》的例子最为突出，这是茅盾明确指出了的。这篇小说写上海码头上几个十来岁的流浪儿，被饥寒煎熬，同时又被流浪的生活扭曲，沾染上瘪三的流氓气。对这样一群孩子，作品却生硬地写他们在从一个流落码头的士兵那里听到苏区人民的胜利消息后，向往着苏区：“在红红的火光中，六只眼睛放着光，期待着丰富的晚餐和那多大的、红的领带”。这个结尾当然不符合人物的真实状况和生活发展的逻辑，所以茅盾认为这是一个“硬扎上的尾巴”，“因为我们谈到那‘尾巴’的时候，只看见一幅码

斯诺：《活的中国·序言》，载《新文学史料》第1期。

沙汀：《感谢》，载《文哨》月刊第1卷第3期。

头上的小瘡三的漫画，我们嗅不出半点儿‘革命味’；而突然‘尾巴’来了，革命意识！这样，怎么怨得人起了硬扎上去的印象？”此外，《平平常常的故事》写到从苏区逃亡出来的地主少爷的心境时，也插入了概念化的议论。

《莹儿》表现知识分子在孩子养育问题上的自审意识，本来引人入胜，可是画蛇添脚，末尾竟加上一段说教。《酵》则可以说整体构思是概念化的。它写农民大圆因母病连年累岁，地租又层层加码，“早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就是那条能够换钱的牛，也在去年随着他们的血汗，浸灌到江大爷的田里去了”。他盼望到了春天也许就会好些，可是母亲死了，他为殓葬四处奔走，最后又不得不“走进江大爷的大厅，向那比以前更刻毒的佃约上画上十字”。他正在重重苦难中，一位村小教师启发了他的革命觉悟：“他们不会变好，我们又愿等死么？”他认为村小教师的话不错，是“得推翻一切？”教师问他：“你也想造反啦？”他说：“兔子逼慌了也咬人呢！”教师说：“将来后悔，该不会怪我吧？”他说：“你他妈条鸟啊！”这篇小说就这样循着由受苦到受启发到反抗的观念演绎成篇，给人以枯燥乏味之感。

同许多作家的起步之作一样，这部小说集的有些作品也有受沙汀读过的作品影响的痕迹。这种影响有些属于艺术借鉴。例如对不熟悉的生活采用侧面描写，显然得益于《甲必丹之女》等作品的领悟。有些属于艺术构思的启示，如《风波》、《法律外的航线》受到鲁迅的《风波》、伊凡诺夫《铁甲列车》的触发。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形，这就是近于因袭的不适当的模仿。如场面、人物的描写着眼于印象，叙述语言的矫揉造作等，就带有因袭苏联“同路人”毕涅克、巴伯尔作品的印迹。以语言为例，毕涅克、巴伯尔作品叙述语言别扭、雕琢，“即兴式的陈述、暗示、寓言式的措辞、象征性的比喻”的特点，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中也有所表现：“一个可怕的念头，袭击地冲进她模糊的意识。于是，陈古的顽固以少有的强度燃烧起来。她沉重地不住抽气；不是出于纯然的被动，而是有意识地强制，拼搏，——生与死的拼搏。”（《酵》）“他们摄伏在老和尚逃不脱的命运之下，想着明天碰着的或生或死，想着那另一个世界进行着的历史，他们都希望那钝重地落在人心上的，是最末一次柝声。”（《恐怖》）“一种苦涩的严肃，好像已经从这破屋子爬出，伸入每茎霜蘸的草，每垄铅似的雪屋里去了。”（《风波》）这些生涩、别扭的语言，是生硬地模仿和造作所为，是沙汀创作尚处于幼稚阶段的表现。

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存在的不足，是一个作家起步时在所难免的。这里有各种各样难以避免的客观上的影响，就作家主观方面来说，主要是离开熟悉的生活，凭着一时的政治热情勉为其难所致。《法律外的航线》、《莹儿》反映的生活，沙汀是有实感的，《恐怖》涉及的起义，他是有真情的，这些作品写得得心应手，写得比较真切动人。几篇从侧面反映苏区土地革命和“一·二八”战争的作品，大多是带着先入为主的意念，从报刊、听闻中得来一点素材，匆匆赶出来的。这类“印象式”的创作，很难写出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和独特的生活场面，也很难摆脱概念化的影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沙汀在与鲁迅通信后，对鲁迅的许多重要的论述并未真正理解。他是带着反映“时代冲击圈内”生活的主观意愿去读鲁迅关于题材的通信的，看重了要

茅盾：《法律外的航线》，载《文学月报》第1卷第5、6期合刊。

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第60页。

去写的这一方面，却忽略了要写熟悉的生活，不必趋时、能写什么就写什么这一重要的一面。他在接到《俄国煤油》的退稿信后，也更多地是凭表面的直感，认为应少写知识分子的生活，多写“时代冲击圈内”的题材。这样，他就为追求“重大题材”勉强去驾驭那些并不熟悉的生活而以意为之。

二十站在“左联”的旗帜下

沙汀因出版《法律外的航线》而崭露头角，于1932年冬加入了“左联”。

艾芜早在这年春天，即已加入“左联”。他来沙汀家时，曾多次谈起他在“左联”参加活动的情形。他先同茅盾、阿英一个组，以后又同丁玲一个组。他被派在杨浦区涟文学校作义务教师，在工人子弟中发展通讯员。他对耶林的印象相当好，等等。

有一天，艾芜来玩了很久。说了许多话，似乎还意犹未尽。沙汀送他出门，走出弄堂，他才以征求意见的口气对沙汀说，他们向他提出了加入党组织的问题。沙汀听了，为艾芜的进步而振奋。艾芜也因沙汀的鼓励而激动。他们沿着大街，走了一程又一程。开始的相聚，变成了严肃的交谈。“他们”究竟指谁？沙汀没有深问。他推测是很了解艾芜的人，不是耶林，便是丁玲。

艾芜还多次约沙汀去北四川路上海大戏院对面的周扬家里。一年前，沙汀、艾芜与周扬同住德恩里时，是沙汀介绍艾芜认识周扬的。而今，由于艾芜先于沙汀参加了“左联”，与周扬见面多，同周扬更为熟识。沙汀在周扬家里，先后认识了“左联”的不少人。他印象最深的是穆木天。这个名噪一时的诗人，正狂热地追求性格爽朗、泼辣的彭慧。艾芜当面说了穆木天的许多笑话。穆木天很直爽地说，他喜欢艾芜的作品，而不喜欢沙汀的作品。沙汀觉得，在周扬那里，在“左联”的作家中间，彼此十分融洽。过去认为周扬不好接近，不过是一种误解。

没有多久，1933年3月，周扬急急忙忙来沙汀家里，告诉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艾芜被捕了。艾芜在3月3日下午，去曹家渡丝绸厂约见工人通讯员，引起了便衣巡捕的注意。巡捕向他是干什么的。他自称是名叫唐人的华侨，到此地来商讨入股办厂的事。巡捕不由分说，强行将他逮捕。周扬说，大家都在为此事着急。他要沙汀也参加营救工作。

次日，沙汀得知任白戈已为营救艾芜的事找过律师史良，就去史良那里打听消息。周扬一连三次来找沙汀、任白戈谈情况，并且送来鲁迅捐助的50元钱，作为营救的经费。正在艾芜被转押去苏州第三监狱的时候，积极参加营救的任白戈也被捕了。

幸而任白戈的被捕是一种误会。当天，反动当局的侦探到任白戈隔壁人家搜查，记错了门牌号数，误入了任的房间：见他的书桌、书架上满是日语、汉语的马列主义哲学著作，便将他逮捕，关押在南市警察局。沙汀得知详情后，又为营救任白戈奔走。为了筹措经费，他重又到辛垦书店向杨伯恺借钱。杨伯恺从来不赞成借用公款，但此次却破例应允借了400元。沙汀拿着钱，请史良同一位翻译和一位公安分局的负责人取得联系。他们一道去拘留处见到了任白戈，佯装亲属故旧，嗔呼道：“你一天、两天不落屋，把姑妈都急死啦！还瞪着眼干什么，赶快跟着回去！”任白戈连声叫喏，走出了拘留所。

接着，沙汀便和任白戈一起继续去营救艾芜。此时，沙汀收到了艾芜的来信，说他和先后被捕的5名工人，都因无任何人证物证，又得到史良律师

的辩护，有可能无罪释放，但现在急需铺保，如无铺保，则还会再关一个星期，那时便很难避免发生意外。任白戈从史良那里，也得到相同的情况。他们赶紧商量聘请铺保。恰好任白戈有个同乡李继皋在苏州做事。他喜不胜喜：这真是天作之合！就同史良商量妥当、一道去苏州。9月29日，苏州的江苏法院开庭审判，法官判决艾芜无罪，接着问有无保人？立即有一个50多岁商人模样的人站起来说：“我愿意担保！”这人就是李继皋。于是，法庭当即宣布释放艾芜。任白戈迎上前去，紧紧地握着艾芜的手。

任白戈陪同艾芜返回上海。当时沙汀住法租界新天祥里的一间前楼，任白戈住后楼。艾芜就同任白戈住在一起。沙汀、任白戈置酒为艾芜压惊。三位挚友，经过离乱，重又相聚，百感交集。艾芜一再谈起狱中的情形，沙汀、任白戈都鼓励他写出来。后来艾芜创作了《乡下人》、《一家人》、《强与弱》、《张福保》等短篇小说。

艾芜一回到上海就不断地生病、生疮。但他最苦恼的还不是这些，而是爱情问题。他在杨浦区培养工人通讯员时，认识了一个湖南籍的女工。她也是知识分子，是因为做革命工作去当工人的。艾芜对她印象极好。对方也喜欢他。她与艾芜先后被捕。艾芜出狱不久，她也出狱了。但她离开苏州后，没有回上海，到她在南京中央政治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哥哥家里去了。艾芜一再写信要她来上海。她却再三坚持要艾芜去南京。两人就这样“打拉锯战”，谁也不让谁。艾芜为此事睡不安枕，食不甘味。沙汀多次劝慰也无济于事。他见这事久拖不决，对艾芜是一种痛苦，便自告奋勇前去与对方“谈判”。

他说干就干，开始了“南京说亲”之行。他于一天傍晚乘火车到南京，直趋图书馆对方家里。见那湖南姑娘，眉目俊秀，身材适中，觉得确实不错。直截了当向兄妹俩说明来意，反复强调艾芜不能离开上海，热忱希望女方适当迁就。兄长说这是妹妹的事，由妹妹自行作主。妹妹则说她早已在给艾芜的信中表明，她不愿去上海，不愿离开哥哥。“谈判”到深夜，对方始终不为所动。次晨，沙汀又约女方单独谈话，把一切诚恳的用语都用尽了，对方仍不动摇。她的主要理由是，她是哥哥保释出狱的，如果她离开南京，哥哥就得担负责任。沙汀见她口气坚决，只得长叹一声，返回上海。他不明白此女何以如此固执。像艾芜这样的才子，可以说百里挑一，你上哪里去找？

沙汀到艾芜、任白戈住处，向艾芜谈了南京之行的经过，劝艾芜断了这份相思。谁知艾芜失声痛哭起来。他埋怨沙汀、任白戈平时不关心他的婚姻恋爱，把他当作不思饮食男女的“圣人”。沙汀、任白戈都呆了。沙汀自以为并非不关心这位知己的个人生活问题。记得与艾芜重逢不久，他见艾芜同当年省一师一位同学的妹妹何蔼兰时有往来，曾动念为之撮合。细心而敏感的黄玉颀也认为何蔼兰人品不错，而艾芜也似乎对女方有好感，应该促成这桩良缘。但他们见艾芜于男女之事颇为淡漠，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后来何蔼兰去了华北，良好的心愿也就成了遗憾。所以沙汀面对艾芜的埋怨，不免感到委屈。不过他转而又想，艾芜的心情也可以理解。他能当面说这番话，也正表明对朋友的信赖。这以后，沙汀和任白戈就更加认真地为艾芜的婚姻恋爱问题操心。当时任白戈在“左联”做组织工作，活动范围大，认识的人多。不多久，他就和杜谈促成了艾芜与“左联”新诗歌会的蕾嘉（王显葵）相好。沙汀认识蕾嘉稍晚。当艾芜偕蕾嘉到他家时，他们已快要同居了。沙汀为艾芜美满的婚姻祝福。

沙汀加入“左联”不久，1933年夏天，还做过一段时间常委会的秘书工

作。那也是周扬通知他去做的。那时他已搬到北四川路底司高塔路路口的弄堂里住家。周扬常来他家。他也常到周扬那里去。经周扬介绍，他认识了关露、蒲风、张耀华等许多人。周扬还约他去一家广东茶室，与关露，司徒乔一起吃茶。他向《现代》投稿，也是周扬介绍的。5月间，应修人与特务搏斗坠楼牺牲，潘梓年、丁玲被捕，周扬接任“左联”党团书记。他就向沙汀提出，由沙汀担任常委会秘书。沙汀领会，一则是“左联”领导人很看重文学新人，很信任他，一则是他家人口单纯，距鲁迅、茅盾的家较近，便于在他家里开会。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左联”的活动已处于地下状态，鲁迅、茅盾的行踪必须保密。开会地点的选择，当然是非常慎重的事。沙汀当即表示接受“左联”的安排。接着周扬就给他送去一筐文件，叫他妥为保管。所谓文件，其实大部分是“左联”刊物备用的稿件，其中就有丁玲的一部作品：《不是情书》。

常委会在沙汀家里开过一次会。到会的人有鲁迅、茅盾、周扬，还有组织部的彭慧。茅盾到得最早。他与沙汀虽然第一次见面，但由于写过关于《法律外的航线》的评论，与沙汀神交已久，所以一见如故。他当时30多岁，因出版了《子夜》，发表了一系列农村题材的作品而声名大震。他用那种风趣而又机智的语调，同沙汀侃侃而谈。他谈了一些大革命时期在武汉的见闻，谈了许多创作上的问题。当他问了沙汀的经历以后，热情鼓励沙汀写一部中篇小说，并对这部中篇的艺术结构，某些具体的艺术处理，提出了建议。沙汀说他对此没有多大把握。于是茅盾又出了一个主意：写一组人物相同、故事互相衔接的几个短篇较为省力。他还以外国类似的中篇小说为例，加以详细说明。他之健谈，给沙汀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鲁迅来得稍晚一些。他穿一件青布长衫，一双黑色球鞋，短短的黑发，浓密的上髭。他的面孔威严，但谈话极为随便。沙汀与鲁迅有文字之缘，还听过他的讲演，但坐在一起还是第一次。他始终以激动、拘谨的眼神看着鲁迅与茅盾、周扬的交谈。他特别注意的是鲁迅抽着在当时只能算中档的“品海”牌香烟。常委会的这次会议，主要议程一是讨论欢迎巴比塞国际反战调查团问题，二是讨论“左联”编辑内部刊物问题。会后，几位常委先后离开沙汀的家。沙汀深感遗憾的是，未来得及当面向鲁迅先生请教，他以为以后这样的见面的机会还多呢！

这次会后，7月间，当上海文化界积极筹备欢迎巴比塞调查团时，反动当局再次进行了大逮捕。一天下午，周扬前来告诉沙汀，一位参加筹备欢迎会的社联的人，和与沙汀住一个里弄的张耀华被摘了，要他立即转移。周扬走后，沙汀就同黄玉颀收拾“左联”的文件、《前哨》的稿件和行李。他刚刚把许多文稿扎在黄玉颀贴身的衣服内，周扬又上门来了。他告诉沙汀，情况十分紧急，弄堂里里外外巡捕、便衣很多，必须赶紧动身。沙汀和玉颀都有些紧张，催促周扬赶快离开。他们先后出门，在靠近北站的老靶子路北段找了一家小旅馆权且栖身。次日，到法租界姚神父路新天祥里租定了房间，等到天黑下来，叫了两辆人力车，将全部家当搬到了新居。当时的搬家也真容易，没有那么多坛坛罐罐。

这以后，鉴于在沙汀家里开会已很不方便，周扬就叫他不再作常委会秘书，改作小说散文组组长。周扬介绍了杨刚、时紫与他联系。杨刚系燕京大学毕业生，一个文化素养很高的女青年。叶紫也才20多岁，与陈企霞一起创办了《无名文艺》，所著《丰收》引起鲁迅的关注。他们一起在沙汀家里开过三次小组会。三个年青人碰在一起，气氛相当活跃。有一次讨论《现代》

杂志上署名刘字的一篇小说《西乃山》，就曾争吵不休，相持不下。

此后不久，沙汀参加了欢迎巴比塞调查团的茶会。巴比塞并未来，是由伐扬·古久列和英国的马莱爵士带队。这是当时上海文化界人士少有的盛会，沙汀认识的许多人都参加了。宽大的大西洋餐厅里，楼、堂都坐无虚席。茶会原订由田汉主持。他刚一露面，便引起混入会议的暗探的注意。大家只得劝他离开，临时改由胡风致辞。由于伐扬·古久列在周扬陪同下参观和调查未归，由马莱爵士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茶会在热烈而紧张的气氛中匆匆结束。

这以后，杨刚没有同沙汀联系了。小说数文组只有他和叶紫。不久，欧阳山参加进来，又才有了三个人。欧阳山也比沙汀小，但已创作了好几部长、短篇小说。他们在叶紫家里一起探讨创作。有时是谈报刊上的作品，有时是谈自己的构思和创作。叶紫胸无城府，常常详细地谈他的种种艺术构想。有一次，他刚刚讲了一篇作品的设想，沙汀就哇啦哇啦说了一通，认为可以这样剪裁，可以那样取舍。欧阳山笑道：啊哟，分明是一件长衫，这一剪下来，岂不变成汗衫了！”沙汀说：“依我之见，还得去掉两只袖子，改成背心！”他们争论十分热烈，气氛却很和谐。叶紫的生活清贫。他，妻子，孩子，母亲，一家三代人挤在一个破烂的亭子间里。除了床铺，没有任何家具。衣箱当书桌，打捆的书籍当凳子。在这样的环境里谈创作，还如此谈笑风生，真不容易。他们谈得兴高采烈，还要买上一点高粱酒助兴。没有下酒菜，叶紫那令人尊敬的母亲悄声无息地端上一碟泡菜。呷一口酒，尝一点微酸的泡菜，依然乐不可支。后来，应叶紫的恳求，周扬还邀请鲁迅在北四川路一家饭馆同他们见过面。当叶紫把他与湖南农民运动有密切关系的身世经历向鲁迅讲了以后，鲁迅十分激动，叫叶紫好好写出来。此后，鲁迅常常接济叶紫。有时是请叶紫上饭馆吃饭，既是谈创作，又是让叶紫补充补充营养。鲁迅对叶紫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沙汀十分感动。那些对日，沙汀又有机会同鲁迅见面，可是他已变得相当拘谨了。

1934年春天，沙汀搬到迈尔西路恒平里住家，叶紫就没有参加小组活动了。这时，陆续补充了草明、杨骚、杨潮。草明20来岁，与欧阳山一道从广州逃亡到上海。她早在广州时就已发表作品。来上海后，在《文艺》上发表了《倾跌》等小说。杨骚年龄稍大些，是一位热情、直率的诗人，中国诗歌会的发起人之一。杨潮系杨刚之兄，新闻记者，也写评论文章，搞翻译。几个人定期聚会，大多是在欧阳山家里。由于杨潮在外国通讯社工作，收入可观，经常买点酒，有时还买点四川名酒泸州老窖大曲。大家酒逢知己，畅谈文学，热热闹闹，无拘无束。那种团结和谐的气氛，使沙汀无限怀恋。

除了几位组员，沙汀还按照周扬的要求，同魏金枝、欧阳凡海、沈起予取得了联系，同徐懋庸、杜谈、白薇、林淡秋、冯余生、魏猛克、卢森堡等有过接触。他同魏金枝的往来较多。魏金枝在麦伦中学教书。诚恳、朴实、谦逊，给人印象极好。他同白薇大姐很快就熟识了。她热情、直率，无话不谈。

也是由周扬介绍，沙汀认识了胡风。周扬告诉他，胡风从日本回国不久，在理论批评方面造诣很深，用谷非的笔名在《现代》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胡风爱串门，每次前来谈文坛现状，谈文学创作，滔滔不绝。但没多久，沙汀就发现胡风、周扬之间产生了隔阂。胡风很神秘地约沙汀会见了冯雪峰，沙汀无意间向周扬谈起了这件事，周扬显出惊奇的神色：不是说雪峰已经离开上海了吗？为什么胡风绝口不谈他还上海呢？又过了不久，周扬当着沙

汀，哀声叹气他说同胡风很不好处，他是负责宣传工作的，胡风是负责理论批评的；但由于胡风的闲言碎语，使得他不好做自己的工作。沙汀说：既然如此，就让胡风负责宣传工作嘛！他是这样想的，如果不协调，就最好换一下位置，而且据他了解，由于周扬对一些作家的创作持一种不公正的态度，已经引起不满，例如周文就很有意见，再加上一般人总认为鲁迅信任胡风，周扬也确乎不便工作。到了这年冬天，胡风与周扬的裂痕越来越深，沙汀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他同情、支持周扬，但对周扬与鲁迅疏远，尽写些空空洞洞的文章，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很有意见。他认为胡风有能力，但又觉得这人刻薄话多，常常使人难以接受。他们都与沙汀往来，都表示对对方的不满，而沙汀又无法调解和折衷，弄得十分苦恼。后来，胡风大肆挖苦艾芜，把沙汀气恼了。

艾芜贫病交加，又急于想把狱中获得的素材写成作品，对“左联”的工作较少过问。偏偏胡风不能体恤，还是给他摊派任务。外表谦和、内里倔强的艾芜当然不买胡风的帐。胡风当面嘲讽艾芜：“你是否是吓怕了！”艾芜顿时火冒三丈，拍桌叫道：“是又怎样？你以后不要来找我！”艾芜正是在同胡风闹翻以后，感到难以安心进行创作，应正在山东济南教书的原省一师校友萧英的邀请去了济南，后来去了青岛。沙汀对此事的经过完全知道，对胡风的意见很大。

艾芜到青岛后，接二连三写信劝沙汀也到那里去。沙汀感到上海处境困难，又一心想多写点东西，也决定举家迁往青岛。他将全部家具支付托运，打算到青岛长住。周扬和周立波闻知此事，赶紧前来劝阻。周扬是考虑到沙汀联系了一大批青年作家，走后会使这项工作受到影响。立波认为沙汀离开上海，无论对工作、对个人的事业都没有好处。可是沙汀去意甚坚，还是偕同玉颀，带着襁褓中的孩子杨礼去了车站。此时是1935年4月，玉颀所生长子才满月不久。因从外祖母黄周礼（黄敬之）之名，取名杨礼。

然而，沙汀在青岛住了两个多月，就再也住不下去了。当时的青岛，比起上海来，实在太寂寞了。每天往来的除了艾芜还是艾芜。而艾芜夫妇又苦于生计，终日愁眉苦脸，看了使人难受。沙汀终日心烦意乱，而且又得到不幸的消息：母亲去世了。母亲一辞世，断绝了经济的一个重要来源，生活也没有保障。他只写了一篇小说，就没有心思创作了。中秋节前夕，他变卖了家具，挈妇将雏，搭上了回上海的海轮。

沙汀一家仍住恒平里老地方。不过已不是前楼，而是开间狭小、租价较低的亭子间。那是他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四川老家没有接济。由于许多刊物没有稿费或“谨致薄酬”，靠卖文为生也没有可能。孩子杨礼常常生病发烧。他自己身体也不好。同他往来的作家，对他生活的俭朴印象颇深：斗室之居，一间床，一张书桌，散乱地堆着些书刊，此外别无长物。人也不修边幅，老是一身西装或一件长衫。他离开青岛时，艾芜前来送行，曾说：“这个啥子生活啊！弄得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计算着过日子。”这句话不时响在他的耳边。他又何尝不是如此！周扬、周立波托社联的一个成员为他在正风中学谋了一个教职，吃饭才不至成为问题。

二十一在突破的临界点上

沙汀加入“左联”以后，继续进行创作。

这个期间，尽管要参加“左联”的活动，生活也有过动荡，孩子出生后还有许多家务，可是他并没有懈怠。他的创作才刚刚起步。首航的成功，鼓舞着他的信心。“左联”的文化气氛，催促他继续前进。作家们的互相切磋，推动他不断探索。

从加入“左联”到回家安葬母亲这三年间，他创作了17篇小说、3篇小品、1首诗。他曾将其中的9篇小说，加上前一段时间创作的1篇小说编为一个短篇小说集《土饼》，交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在这个期间，他已写出了像《老人》、《丁跛公》（《乡约》）、《祖父的故事》这样的、他认为标志他“转向”的作品。他在回忆他的探索时说，在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出版不到一年，他已在周围的喝采声中逐渐清醒：

我忽然得到一个反省：茅盾先生说他不喜欢我的印象式的写法，为什么一般人反说它正是我的特点，知何的新，如何的新，如何的了不得呢？接着，我更考虑到创作上若干基本问题，于是我丧气了，觉得自己该重新来过。而《老人》、《丁跛公》这几篇作品，正是我改换作风新的起点。

他所说的“改换作风”，主要是指改变那种“但凭一些零碎印象，以及从报纸通信中掇拾的素材拼制作品的简便途径，转而将跟光投向四川”。

《老人》写于1933年春天。其实这篇小说仍然是他在看了上海党报《上海报》和公开发行的《社会新闻》、《文艺新闻》有关报道，受到触动而构思创作的，只不过他尽量融入了自己的一些感受。他从这些报道中得到一个总的印象：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使苏区的农民受尽了苦难，而有的老年农民却又不理解儿子参加的土地革命运动。他联想到他也有过不被母亲和舅父所理解的情形。于是他便从过去熟悉的生活中概括出一个破产农民的形象，通过他的遭遇和思想变化的过程来反映农民的觉醒。这个老农从土地革命中得到好处，但信赖的仍是土地，对儿子参加革命活动深为不满。后来斗争形势发生反复，农民纷纷逃亡，他却死守着成熟的庄稼。他成天焦躁不安，总是没头没脑地向老婆子发脾气，但他还没有完全绝望。直到“老总们”带领夫役、谷米商将庄稼全部“帮忙”收割，露出掠夺的本相，他才明白过来：“噫唉，兴这样帮忙么？这就是你们为老百姓呀，……”而且也才在侥幸死里逃生之后，“第一次亲切地想起他儿子和他儿子干的事体”。这篇不到600字的小说，刻画了老人在各种境况下的感情状态和心理变化，留给人以一定的印象。由于人物活动的场景也拉到了作家所熟悉的川西北农村，给人以真切的感觉。作品发表后，引起了评论界的重视，认为沙汀已写的小说人物没有个性，《老人》则是例外。1934年，鲁迅与茅盾应美国记者伊罗生之约编选中国现代作家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后因故未出版），选入了《老人》。1936年，胡风受鲁迅之托向日本介绍左翼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也曾将这篇小说译成日文，刊载于东京《改造》1937年1月号，并为此写了《沙汀小传》。《丁跛公》写于1935年初。它有一个副标题：“一个道地的四川故事”。这篇小说初名《乡约》。它成功地刻画了一个有特色的乡约的形象。乡约是民国初年四川农村最基层的官吏，相当于后来的甲长。川西北农村有所谓乡长吃肉，保长啃骨头，甲长当撵山狗之说，乡约就是撵山狗这类货色。沙汀早在《风波》中写了乡约张善人肩着褡裢走家串户催收预征粮款，勾画了乡约的身影。

沙汀《感谢》，载《文哨》第1卷第3期。

沙汀：《沉痛的悼念》，载1981年4月3日《光明日报》第3版。

在《丁跛公》中进一步塑造了乡约丁跛公的形象。丁跛公位居层层官吏之下，沟里六七十家农户之上。他花钱买了个哥老会会员以提高身价，但只能吓唬农民，在地主、乡绅、赌棍面前仍低一等。他在上流的“者者轩”茶馆没有座位，只是在无牌号的半边茶铺出入。他在家可以颐指气使，在社会上却低三下四。即使被人粗鲁地捉弄，最多也只是瞪着眼：“我要毛脸了哇”，接着还得扮出笑脸。他买了王屠夫洗劫逃兵的枪枝，一旦团总周三扯皮风闻此事，赶紧陪着笑脸将枪送去。周三扯皮还要找他的麻烦，他只得连连赔小心：“你老人家怎么咯！”以致人们把这句话当作打趣他的笑料。他奉命“勒派奖券”，以为可以大捞一把，谁知“螳螂捕蝉，有黄雀在后”，这油水也被周三扯皮全部捞光。他“狗肉没吃到，反而惹上一身骚”，招惹土匪抢劫，被砸碎了踝骨，成了货真价实的丁跛公，……作品用了许多主动的细节和富有机趣的叙述语调，将这个作为乡约的丁跛公的独特性格勾画了出来。这是出自当时四川农村的一个“土特产”，是列入沙汀人物画廊的第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这篇小说因现实性强，为正在推行保甲制度的国民党当局所不容，未获上海书报检查部门通过，转寄沈从文主持的《大公报》副刊刊登。《祖父的故事》写在《丁跛公》之前，于1934年在青岛时脱稿。它写“祖父”为避免驻军征用住房而苦心改换门庭，终因被识破而枉费心机。其中人物和生活环境也都取材于沙汀早年熟悉的生活。沙汀家确曾出租厢房以抵制驻军的征用，房客中确有一个叫苟老爷的土粮户。茶馆老板、“中间人”唐摸王对借贷者的善于对付，蒋木匠对雇主催工的沉着冷静等，也确有那么回事。当然，沙汀在创作时都根据整体的艺术构思作了加工、虚构。不过它的不足也正在于有些拘泥于生活，“进入”而未能“跳出”，以致作品显得松散和琐碎。沙汀一直重视这篇小说。后来还以这篇小说的篇名作为一本小说集的书名。他把它当作创作“转向”的一个试尝和顶兆。

在这期间，沙汀仍有好几篇小说是凭“零碎印象”或从报刊通讯中掇拾材料的“拼制”之作。不过他在处理题材或某些描写上尽量融进了熟悉的生活和感受。这些作品总的说来艺术性较差，但比起第一部小说集的作品又有进步。《老太婆》便是出于一种观念凭借印象写的。它写早年居孀的老太婆对外出求学的儿子的企盼，后来因儿子被捕而希望成空。其中写企盼有沙汀基于自己的经历所作的推测，显得较为真实。但人物仍然是“类型”而不是具有个性的典型。《人物小记》是根据对故乡的那一类“狠人”的总体印象写的。着重写了一个靠“放印子钱”过活的、被称为“么鸡”的老头子的吝啬和狠心。此人可以让土匪将自己的独生子“撕票”，也不肯多出一点钱将其赎回。即使一年不见油腥，而且在一场诉讼中胜诉，也只摸出一点钱割了四两肉，将一个小钱那么一点点胡椒嚼碎后吐进汤锅里。这些富有表现力的细节，都采自沙汀早年的见闻，给人留下一定的印象。但这篇小说只可以说是一篇人物素描，缺乏深层的意蕴。《赶路》写“我”在川西北旅途的感受。那乘车之难，那么店子寂寞而令人恐惧的雨夜，那土匪的出没，部写得较为真切。其中融合了沙汀的亲身经历。但整个作品较散，人物也不给人以特别的印象。《一个绅士的快乐》写乡绅欺凌农民、霸占农家妇女的悲惨故事。其情节的戏剧性与主题的严肃性很不一致。有的情节取材于沙汀早年的见闻，如安县许多人知道的年青、风骚的女人对愚痴、讨口的男人不满而放浪形骸的故事，写来有几分真实感。可是企图以此表现阶级压迫的主题就未免牵强、生硬。《战后》写战乱后，离乡背井的农民带着焦虑、惶恐的心情返

回苦难深重的故乡。《夫卒》写被拉差参加围剿苏区的农民，在行将启程时的逃亡。《上等兵》写军队内士兵对反革命战争的不满。《有才叔》写战乱中乡镇居民宁作太平犬、不作离乱人的心境。这几篇小说涉及到乡镇，涉及到农民和农民出身的士兵的一些描写，较为真实自然。但总体上仍然有根据听闻和通讯报道以意为之地“拼制”的痕迹，显得一般化和概念化。比这几篇小说稍晚创作的《凶手》也是根据听闻写的。写残暴的军官强迫士兵用惩罚性的枪杀来惩治逃兵，以致哥哥被迫枪毙弟弟。情节紧凑，涉及农村的场景描写有生活根据。但为追求情节的戏剧性而忽略了对人物的刻画。这种缺乏节制的写法与沙汀追求含蓄美、深沉美的审美倾向不符。《土饼》是根据当时《大公报》、《申报》有关河南农村灾荒的报道创作的，仍停留在写事件的表层上，人物也有群相而无个性。可是对濒于绝境的农村气氛的渲染，某些个别场景的描写比较真实动人。如写饥馑中走投无路的女人无可奈何地用土饼诓骗嗷嗷待哺的孩子，可以说扣人心弦。作品在这里按照一种逆向思维，将母亲的诓骗与轻易相信的孩子的天真互相映衬，造成特殊的艺术效果。它写在孩子的盼望中，母亲回来了：

“你们不要这样盯着我吧！”她求乞似地嚷道，“我去给你们弄吃的好啦。”

于是，她从怀里摸出两个在归途上做好的黄泥饼子，在孩子们眼前一掠，转到侧面的灶屋里去了。

几颗小小的心一齐愉快地跳动起来。

但是因为害怕母亲见怪，就又赶快一声不响，屏住呼吸。

在无边的静寂里，风啸着，柴火劈啪作响。

那个男孩子终于忍不住幸福之感的挑弄了。他胆怯地凑近姐姐的耳朵，悄声说道：

“我该猜到了吧？”

“你能干嘛。”

她爬起身，坐上板凳，摇着箩筐，柔声哼唱起来。

“月老爷，

月光光，

妈在河里洗衣裳。

……

这是饥饿中的天真，是受诓骗后的天真。越是绘声绘色地写这种天真，就越是震动人心。人们不仅会在画面前、在哼唱中感到辛酸，还会在画面外，在弦外音中冥想：这以后，母亲又怎样出现在这些天真、饥饿中的孩子面前？

沙汀在这期间仍有两篇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一篇是《爱》，写爱情与金钱的矛盾。一篇是《孕》，反映事业心与家庭生活的冲突。《爱》中写白芹雨里的等待，《孕》中写宗子洁“觉得自己渐渐是一个被缚了手足的落水者”的郁闷，细腻自然。《孕》中含有沙汀自己的某些生活体验。如因家庭的争执引起的烦恼，因妻子有孕引起的对事业的担心和加重经济负担的担忧，沙汀与玉顾问也确曾有。但这两篇小说在当时许多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显不出什么特点。

沙汀这个期间的作品，他的小说集《土饼》比起第一部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有了一定的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已有了全面的突破。作品的质量仍参差不齐。有《丁跛公》这样的较好的作品，但也有《夫卒》、《上等兵》这样几篇作品，仍属意念之作，不同程度地存在概念化的毛病。

然而，沙汀这些时候的创作已出现了可喜的苗头，这就是开始把题材、

审美取向转到熟悉的故乡生活领域并取得了尝试的成功。这是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摸索，经历了成功的欢乐与失败的苦恼，经历了奖掖的喜悦与批评的焦灼，联系创作的甘苦领悟鲁迅、茅盾的教诲和指导取得的重要进展。他不能不深省：为什么故乡熟悉的生活总是有那么强大的诱惑力？为什么一进入那个生活领域就感到无比的自由，写出的作品也更引人瞩目？创作，再也不能离开自己的生活感受和文化根基，仅凭良好的愿望以意为之，再也不能仅只依据零碎的印象或从报刊上掇取的材料浅尝辄止、浮光掠影。

沙汀是处在创作突破的临界点上了。他已有了充分的尝试和思想的准备。1935年冬的故乡之行，促成他把创作的根基完全转到熟悉的故乡的生活领域，取得创作的全面突破。

第四章 上海八年（下）：有才华的左翼青年作家 （1936年春—1937年秋）

沙汀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以后，把创作的题材取向转到了他熟悉的故乡生活领域。1935年冬末的故乡之行，促成了他的这种转变。他开始像故乡的金侠子一样，在那与他气质、艺术契合的生活领地里披沙拣金，拓展出一片新的艺术境界，写出了一批优秀的短篇小说。

沙汀的这种转向是他聪明的文化选择。只有在这一片属于他的生活的沃土里，他才得以充分显示对世态人情独特的感受，发挥出开掘人的内心世界独具的才情，表现出对乡风民俗特别的敏感，体现出吸取群众语言特殊的智慧。也只有在这片得天独厚的乡土里，他的批判的历史意识才与具体的独有的生活体验达到内在的统一，真正按照美的规律，深入发掘他早年积累的丰富的“知识和印象的库藏”，创作出既有时代气息又有乡土文化特色的优秀作品，从根本上避免前一阶段创作中那种“印象式写法”的弊病。

促成沙汀的转向，是由于时空迁移引起的不同地域文化的反差感和创作心态的变化，也由于他具有了发现生活和发现自己的成熟的眼光。这种眼光包含了所具备的现代意识，所汲取的左翼文化思潮，从鲁迅等作家的作品中领悟到的乡土文化意识，不同地域文化的比较意识，创作实践中得到的艺术经验和艺术见解。正因为具有了这种眼光，他才有可能在这次回归故里中发现他过去几次回乡所没有发现的东西。

沙汀到上海以后，经过一年多准备、四年多探索，到1936年、1937年，在创作上走向了成熟。

此时沙汀正30出头。30而立。一个有才华的左翼青年作家沙汀站立起来。

二十二 转向那一片熟悉的乡土

1935年冬末，沙汀收到哥哥杨朝绶的来信和一笔汇款。信中说母亲已去世将近半年，早该入土，希望他回家协助安葬。他痛念母亲养育之恩，对杨朝绶拖延丧事大为不满，同时也想重温故乡的生活，便辞别玉颀和孩子，匆匆踏上回乡的途程。

从上次回乡到现在，不过5年光景，老家的情况却已大变。由于母亲去世，一切陷入衰败。宽大的杨家大院格局依旧，可是内囊已经空虚。门榻、墙垣破损，家具、用具大都被变卖，庭院里的几株枯树在寒风中抖抖索索。

败家子杨朝绶好酒贪杯，烧烟赌博。续弦不久的老婆因闹闲话又怄气吊死了，尸休刚刚入殓。孤单的鳏夫仍不悔悟，穿一件空心的、领口肮脏的狐皮袍子东游西荡。舅父对这种状况赌气不管。前妻李增峨无可奈何，已带着孤苦伶仃的刚俊、刚锐去娘家寄居。

母亲的遗体停放在正堂上。她紧闭着一双失望的眼睛，摊开一双疲惫的手，令人心痛如割。母亲躺的棺材倒非常之好。它是特质的阴沉木制作的。是从前别人送给郑慕周的。一共两副，他给了母亲一副。红军长征路过川北时，国民党军队沿途追剿，有一股军队驻扎安县，企图占用这副棺材。母亲

死活不肯，躺到了里面，丘八们无可奈何，只得作罢。而今母亲算是享用上了。

沙汀出于对母亲的深情，也顾及体面，尽量把丧事办得隆重一些。他借贷了一笔钱，发丧受吊，成服举哀，择吉出殡，将灵柩抬到河请乡，安葬在杨家老坟国内。事后变卖了一部分田产，偿还了债务。

在办完丧事之后，沙汀沿着过去的足迹，重温了故旧，拜访了亲友。县城里人事的变迁，茶馆的盛衰，门庭的更换，唤起他的回忆与悬想。朋辈们叙及社会的动荡，岁月的艰辛，人情的冷暖，辛酸或捧腹的传闻，引起他的关切和兴趣。

给他印象最深的要算汶江小学教师马之祥的一席谈话。这位当年的知心朋友告诉他，红军过境时，国民党反动派怎样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地主、乡绅和一些上层人士怎样惊惶不安，追剿的国民党军队怎样烧杀奸淫，为虎作伥的袍哥大爷怎样浑水摸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使他难忘的是灾区北川县之行。当时正值重灾之后，“省赈会”派人前往北川查灾放赈。被派的官员中有一人与郑慕周认识，便邀请他和刘俊逸、尹策三协助工作。沙汀自告奋勇，代舅父出差。他随“省赈会”派的官员出北城，过索桥，进入紧邻的北川县山区。在山坡沟壑中艰苦跋涉，看到了天灾人祸中山民们的惨景，放赈过程中的形形色色。到达北川县城以后，目睹了这深谷中小县的破败和荒凉，乌鸦啄食路毙的惨状，小吏们各种各样的脸面。不过5天时间，给了他思想感情一次又一次猛烈的撞击。

沙汀是在有了更丰富的人生阅历之后回到故乡的，是在吸取现代思潮和左翼文化思潮之后，来反观这闭塞故里的带着浓厚宗法制和乡土色彩的社会生活的，是在具有不同地域文化的比较意识之后，来体察这特殊的文化环境的，是带着一双有经验有见地的艺术眼光，来审视这一片熟悉的生活领地的。他的思想认识的触角更丰富了。感情的冲击更强烈了，艺术的灵感更活跃了。许多过去疏忽了的、视而不见的东西在他面前重现了光彩，许多新鲜的、耐人寻味的东西向他敞开了胸怀。他于1936年春返回上海。身居十里洋场，心却仍在川西北故乡，眼前总是浮动着一片熟悉的土地上的憧憧面影。

他构思和创作了《兽道》。他从马之祥那里听说红军过境时，国民党军队诬蔑红军共产共妻，其实他们所到之处，人民才惨遭抢劫奸淫之苦，就产生了写一篇小说来表现这个主题的想法。不久，他听人说县城西门边小巷里有个产妇惨遭国民党军官强奸，她的母亲气得死去活来以致神经失常。他被这事深深震动，认为很能反映国民党军队“剿匪”的本质。他推测这个老太婆会是什么样的人？他想到他老家的女佣，房份上遭遇不幸的四婶，……一个个人物、一件件事纷至沓来，揉合补充，构成了魏老婆子这个人物和她的一段悲惨的故事。经过反复酝酿，写成了一篇小说，寓反讽之意取名为《人道》。他把这篇作品送交正在主持筹办《光明》的夏衍审阅。夏衍读后，大为震动：“什么人道？简直是兽道！”将篇名改为《兽道》。这篇小说突出刊登在1936年6月10日创刊的《光明》半月刊第1卷第1号上。

他构思和创作了《在祠堂里》。这也是由县城里国民党驻军的种种残忍的暴行刺激起创作欲望进行创作的。对驻军连长这类人物他十分熟悉。他少年时代院子里就驻过连长。他们平时似乎还很和气，有时满有兴致地与小孩逗趣，将小孩高高举起又猛然放下。可是一转脸就可以提起板凳将冒犯了他的卖柴农民脚杆打断。他从人物和情绪的酝酿出发，虚构了一段发生在祠

堂里的事件。祠堂的描写以他熟悉的萧家大祠堂为生活依据。那里的幽深，正堂上肃穆的历代祖宗牌位，庭前淤积的泥水等等，经过精心的艺术描写有助于造成特定的氛围。他用了几天时间就写了《在祠堂里》。这篇小说发表在1936年6月5日创刊的《文学界》第1卷第1号上。

他构思和创作了《代理县长》。这完全是从一个人物的触动开始的。他和“省赈会”的官员走在荒凉的北川县城里，忽然见一个人贸然而来。这人头发蓬松，穿一件褪色的长袍，趿一双布鞋，手提一副肥猪膘，向居民借炊。在遍地饥民的街头，竟有人有如此奇特之举，立即引起他的注意。经打听，原来此人还是堂堂皇皇的县府官员。他根据自己的生活阅历分析这个人的身世：这个家伙可能是兵痞出身，不学无术，欺骗拐诈，无所不为。他以这个人物为主，用生活中遇到的其他人物，尤其是曾经接触过的官吏来补充、丰富、综合，构成了要写的主角。并从这个人物出发，设计了在灾荒年月的一段生活故事。这就是小说《代理县长》。这篇作品脱稿于1936年年底，因上海的期刊送检未被通过，寄给了天津的沈从文，刊登在《国闻周报》第14卷第1期上。

他构思和创作了《龚老法团》。这篇小说也是由人物的触动引发艺术创造的。他漫步在城南的街道上，总想起从小熟悉的钟子吉先生。此人年过半百，还靠了阿谀逢迎和社会势力捞了个农会会长的美差。这个“寄生虫”的许多生活习性使人既厌恶又忍俊不禁。后来他看见县乡政府的腐败情形，便联想到这个老朽正可以说是腐木上的菌类。他以此人为原型创造了龚春官这个典型人物。这篇作品题名为《龚老法团》，发表在《光明》第2卷第11号

沙汀在陆续推出这一篇篇有分量的作品的同时，还写了其他一些作品。他创作了《苦难》，通过一个邮政局长的眼睛捕捉了灾区街市的荒凉破败和乡村的满目疮痍，穿插写了乌鸦啄食饿殍死尸的惨景，透出这场灾难是“时代的大的苦难”的意蕴。写了《逃难》、《轮下》。前者是应巴金之约，为开明书店成立10周年纪念出版的小说集《十年》赶写的。它以讽喻的笔调写红军经过川西北时一个“略带土气的肥绅士”王胖先生“逃难”前后的心境。后者写穆平先生逃亡成都后的种种窘态。穆平这个人物是以他当年熟识的向履丰为依据进行艺术创造的。红军路过安县边境时，向履丰确曾带着妻室儿子和那个与他私通的漂亮的嫂子逃到了成都，有过一段悲惨而又可笑的经历。这些作品选择的角度较新，人物也有一定的特色。

沙汀还根据查灾放赈时的生活积累，写了《灾区一宿》、《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这是两个连续性的短篇，写了查灾放赈组在山区的两次活动。第一次是去贺么夹夹家。原来这个地主、鸦片烟贩子、哥老会头目、团正的破产，是由于红军过境时农民起来反对地主的压迫、剥削造成的。他眼前的缺粮，也只是因为好逸恶劳，而且在灾荒年间也没有改变寄生生活的习性。第二次是去“瞎精怪”陈邦福家。这也是一个因受冲击而暂时处于困境的地主、粮户。这个贪婪的家伙一再撒谎以骗取赈款、赈粮。为了侵吞佃户孤老婆子的两升玉米，竟残忍地将老婆子杀害。对于这样的特殊的“灾民”，会保养的“省赈会”特派员抱以“哲学家似的叹急”，新近才脱掉“黑籍”的科长最多也只是好奇，性格诙谐的向导王老顺是带暴露性的嘲弄，“我”则“感到很深的憎恶”、“感到愤激”。沙汀在写这篇小说时，是带着鲜明的阶级分析意识，将听来的为口粮杀人的重要情节加在了地主、粮户身上。这

是一篇带政论色彩的作品，它形象地表明北川的灾情，绝非如谣言所说是红军过境加剧的，其真实状况就是如此。这篇小说初名《查灾》，发表后曾引起较大的反响。后来收入小说集《苦难》时改名为《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

沙汀还继续写了自传体中篇小说。他一直念念不忘茅盾的鼓励，经过断断续续的酝酿，应良友图书公司之约写了这部系列中篇的第一篇《某镇纪事》。在此期间又接着写了第二篇《干渣——老C的自传片断》，第三篇《一个人的出身》。这三篇都可以看作独立的短篇。它们都是以沙汀熟悉的川西北乡镇小地主家庭生活为题材创作的。名为自传体，实际上并非沙汀的自传性的作品。其中有沙汀少小时生活的影子，但人物和人物关系都系艺术虚构，不少场景描写倒有生活依据，沙汀熟悉的城镇街景、茶馆、风俗民情，都有生动的再现。不过，这三个短篇都重在纪事，不重在人物，较为松散和表浅，不给人以深味。

此外，沙汀还写了《毒针》，渲染传教士“毒针”的传说引起的恐怖心理。写得比较意念化。

从1936年春办完丧事返回上海，到1937年秋离上海，沙汀创作了13篇小说。1937年，他将这些作品和前一阶段的一些作品编为《苦难》、《祖父的故事》两个短篇小说集。前一部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之一，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37年7月出版。后一部列入郑振铎主编的《创作丛刊》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因纸型毁于战火，未能付印。

沙汀这个阶段的作品，大多是他故乡之行的可喜收获。他在与他气质和艺术完全契合的故乡的土地上，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和潜能，熟练地操纵现实主义的犁耙，扎扎实实地耕耘，取得了沉甸甸的成果。他创作的质量比前一阶段《法律外的航线》、《土饼》中的作品，整体上有了显著的提高。尤其是有了《兽道》、《在祠堂里》、《代理县长》、《龚老法团》这样的一批短篇佳作。这些作品以含蓄、冷峻、凝重的格调，真实地描绘了闭塞、阴郁、黑暗的封建宗法制的川西北乡镇社会的世态风俗。它们标志着沙汀创作发展到了新的里程，并以独具的特色丰富了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

沙汀非常重视他创作道路上的这一段经历。他曾经在后来写的《〈兽道〉题记》中回顾过这时候创作的转向。1982年，他为了给新时期的青年作家提供自己的经验，还特地翻出旧稿，作了修改，交《青年作家》杂志重新发表。他写道：

……大体说来，《航线》、《土饼》两本集子出版以后所写的作品，较为合乎我的理想，写的时候也痛快省力。因为它们都是我所熟知的题材的缘故。而《航线》、《土饼》这两本集子当中的大部作品，则多是凭一些粗浅印象，以及若干报纸通信中的素材拼制成的。正唯其如此，写起来吃力不必说了，最主要的，是颇难于写出一个压秤的人物。

因此，便在这一本材料有限的集子当中，读者也不难看出，编主最末的各篇，所有的故事、人物、背景，都已经取材于四川了，而且，一部分作品着重在写人物。这个改变，在我是颇为有意义的。而促成这个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1935年回过一次故乡，重新接触到了我一向熟悉的生活。

由此可见生活知识之于我辈的重要。

我常常这样想，技巧诚然是了不得，它可能帮助你准确、适当地处置你的材料；在向生活摄取素材的时候，它能给你的方便也会不少。可是，如果和生活脱了节，你就只有架空，至少你会觉得事倍功半。但自然，先进思想更为重要，不过思想也必须以现实生活作养料，它才不致枯萎，变成僵硬的教条；你也不致发生误解，走上编造离奇故事，搞公式化、概念化的斜

路上去。

沙汀实现创作转向以后，创作发生了飞跃。他跻身于左翼优秀作家之林，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赞许。埃德加·斯诺访问鲁迅时，问：“你认为最好的左翼作家是谁？”鲁迅说：“茅盾、叶紫、艾芜、沙汀、周文、柔石、郭沫若。田军和张天翼有左翼倾向，但他们不是左翼作家。”1936年，尼姆·威尔士（斯诺前妻海伦·福斯特的笔名）在《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活的中国——现代中国小说选》附录）一文中，根据鲁迅与斯诺谈话的精神，也称沙汀是当时“新出现的极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之一。

二十三走向成熟：《兽道》、《在祠堂里》、 《代理县长》、《龚老法团》，……

沙汀在1936年和1937年，连续推出了《兽道》、《在祠堂里》、《代理县长》、《龚老法团》等优秀的短篇小说，标志着他在创作上走向了成熟。

（一）创造了一个个独特的人物形象。

沙汀从前一阶段的摸索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反省，这就是没有写出“压榨的人物”。他在这些作品的创作中，特别注意了在熟悉的故乡生活的基础上创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他曾欣然自招和自况，他的转向乡土并重在写人物，是他“颇为有意义”的改变。

沙汀的这些作品，改变了过去那种“单用一些情节，一个故事来表现一种观念，一种题旨的方法”，注重从表现人物性格出发来谋篇布局，塑造具有独特个性的典型人物形象。《在祠堂里》选择了擅长的侧写的角度描写人物，巧妙布局。《代理县长》、《兽道》、《龚老法团》以人物性格的刻画为中心精心谋篇布局。《在祠堂里》中的连长以一种自负助长起来的骄横，残忍地施行惨绝人寰的暴行是很独特的。此人平常似乎也有点人性。“对人极和气，他很喜欢同孩子们玩，时常一只手把他们举得高高的，还给他们糖吃”。但在遇到一个仅仅萌生了一点人权欲望的女人稍许的反抗时，这个所谓“裹腿帮”出身的军官便兽性大发，施加迫害，甚至将其活活钉进棺材。他的逻辑是：那女人是他用钱买的，是不能心怀二心的，而他这样有身份的人，是不容许任何人冒犯的，“我十五岁就在外跑滩！”……他正是按照这种逻辑为所欲为。作品也正是联系到这种特殊的心态，从表与里的紧密结合上揭示了这个人物的特点。沙汀在塑造这个军官时，之所以注意到那似乎有一点人性的一面，避免了单一化，之所以抓住了人物特殊的心理，防止了类型化，其主要原因是立足于自己熟悉的生活，从早年熟悉的这类人物出发进行艺术概括，而不是从印象和观念出发去涂抹脸谱、勾勒类型。《代理县长》中贺熙贪婪、刻毒而又市侩、窝囊，也是这个特殊的“贫寒老爷”在一种特别的环境中所特有的。作品把握了这个人物质的规定性和作为个别的特殊性的统一。作为县太爷，他始终不会改变剥削、压榨人民的本性。即使在哀鸿遍地、饿殍盈野的荒月，他也会挖空心思地想出征收过路费、诱骗买

沙汀：《〈兽道〉题记》，载《青年作家》1982年第4期。

沙汀：《〈兽道〉题记》，载《青年作家》1982年第4期。

沙汀：《〈兽道〉题记》，载《青年作家》1982年第4期。

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人》，载《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

票候赈等一个又一个“瘦狗还要炼它三斤油”的诡计。作为一个鄙俗不堪的“贫寒老爷”，他又有独自的特点。他出身兵痞，当过所谓“跑滩匠”，好不容易升任县衙秘书，在如此贫困的小县而又值此饥馑的年月代理县长职务，所以他有一副流氓气十足的、寒酸可笑的嘴脸。他每天提着白米、腌肉“飘飘荡荡地从街面上经过”，到居民家借锅就炊。他强打起精神，做出满有信心的样子给前来请示的下属联保主任打气：康县长到省城请赈准会马到成功，“省赈会和总部里，老康都有熟人，只要他吹一盘，就行了。”联保主任一出门，他就打着哈哈对同僚说：“你让他个舅子去蠢想呀！”他劝慰他的同僚，此县虽地瘠民贫，可是“这种生活就出十万元也买不到呢！睡在床上都可以看山，还有雪景！又一点不受拘束，又可以随便把老百姓拖起来打屁股。高兴的时候……”如此等等。把县令中的“这一个”活生生地勾画出来。《龚老法团》中的龚春官，作为县级政权的一种附庸和政客的一个配盘，也是特定土壤、气候条件下的产物。此人昏庸老朽却走红运，已是年过半百的老监生，当上了虽只有空名但不干实事又有实惠的农会会长。这家伙懒、馋、占、贪却得以遂其意。作为法团的首脑，县城里有宴必请，有请必到，吃饱饜足，还要兜着走；县行政会议每次必到，列席不发言，表决时一概举手；各种公文送到手里，不看内容，不问情由，掏出泰山石私章就盖，“毫不打闪”。此公虽已年迈，还把一个使女收上房做小老婆，自鸣得意其身体健旺。《兽道》中的魏老婆子，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两个都是个性鲜明的女佣形象。魏老婆子的性格不及祥林嫂丰满，但更为强烈。作品涉及的魏老婆子的媳妇被丘八强奸和她的投诉的重要事件令人震惊。可是它却把这些作为过程交待，着重描写魏老婆子遭到重重打击引起的精神的改变。作品顺畅地写魏老婆子精神的变化，但同时又一再写了这变中唯一的不变，即魏老婆子几次重复她目击丘八强奸媳妇时说过的撕裂人心的话：“嗨！给你们说她身上不干净，——我给你们来呀！”这样，作品始终集中笔墨写了魏老婆子，并把这个善良的女佣精神的痛苦和失常反复强烈地凸现出来。从这些作品的描写人物中，可以看到沙汀已是怎样的领悟和贯彻了鲁迅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至理名言。《代理县长》紧紧把握着人民挣扎于死亡边缘与县吏依靠掠夺过着悠闲生活的反差，深掘了代理县长贺熙市佻而又狠毒的精神面貌。《在祠堂里》集中在骄横的军官与微不足道的女人之间发生的冲突，深刻地揭示连长悻悻而又残暴的心理特征。《兽道》把握着人物性格稳定与发展的辩证的统一，表现了魏老婆子精神面貌的逐步变化。开始是在她的媳妇被强奸，她投诉无门，料理了后事之后，她没有忘记被侮辱与被损害，但并没有垮下去：“虽然她的腰背好像比从前弯曲了，她的眼光显得慌耗，看人时好像直对着强烈的阳光一样，但是她的嘴巴还是很啰嗦的，而且和以前一样硬朗。她一有空闲就要咒骂一通，从军队一直骂到县大老爷。”接下来是亲家母向她讨还女儿，双方到茶馆里“吃讲茶”，“自从这一天起，我们很少听见她那种泼辣的咒骂了，仅仅有时红着眼圈子咕哝几句：“倒活出怪来了呢！我的男人都没有打过我，……”第三步是她那多少能够使她感到安慰的孙儿死了，这“立即把她打昏了，她呆呆地从灶门口站起来，颤声道：‘这拿来怎么做呵……’她说这话时脸上毫无表情，好像在说梦话一样。但她随即哭出声来，而且仿佛发了狂那样，满头柴灰的跑去看那孙子去了。”第四步是在一切绝望以后，连长太太还纵容小孩侮辱她，并且当众打她耳光，“这天以后，老婆子变得畏缩而沉默了。她经常做

错事情，而姑母才一责骂，她便又立刻赌哑气，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哭泣。姑父几次吵着要开销她，直到她的儿子跑来把她接了回去。”最后是她出门在外的儿子魏大回来了，将她从主人家里接走，这唯一的亲人虽没有责怪她，可是说怕主人家里有忌讳，要哭回自己家里去哭等等，又给了她精神压力。两天以后，这个不幸的女人神经失常了：“她穿着一件大镶大滚的衣服，下身是赤裸了的，披散着头发”，“摇摇摆摆地游荡过来，一只手拿着她的裤子，一只手舞着一根破竹篙。她走不上十步，便又忽然地停下来，闪着梦幻一般的奇异眼光四下张望。而末了，她拿竹篙敲击着街道上的铺石，一面拖长了声调叫道：‘嗨！给你们说她身上不干净！——我跟你们来呀！’这个勤劳俭朴、硬朗干练的女佣，就这样从精神上一步步被摧毁了。作品正是一层层地开掘了这个精神摧毁的过程。

茅盾曾嘉许《法律外的航线》描写“很精细”，其意也许在于鼓励。如果把这个评语用在这个阶段这些作品的人物描写上，则可以说当之无愧。这些作品按照现实主义的要求，运用真实、生动的细节描写，表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代理县长》写贺熙即使在人民濒于饥馑的年月，每晨洗脸仍保持着那特别的兴致和派头：“要滚烫的水洗，洗的时候把脸全部浸进水里，拿毛巾按着原是发炎的鼻子揉搓，息里呼呶，好像在水里搓洗衣服一样。随后还要打扫烟筒似的，用毛巾的一角，尽量塞进鼻孔里去，不住转动。‘别的都不要紧’，他时常这样愉快地说，‘这帕脸非洗舒服不可！’”《龚老法团》写龚春官晚年捞到一个闲职，颇有闲情逸致，娶小纳妾，“每当有人笑他怎么会像中年人一样健康的时候，他便十分酣畅地笑一笑，眨眨眼睛，捋捋胡子的尖端，掀起下巴正正经经答道：‘你不记得书上讲过吗？“小”，补之哉呀！，他的笑容又立刻在脸上布满了。”写他昏庸无能，尸位素餐，却恬不知耻：“当经过十字口时，一位熟人请他鉴赏一下学生们新贴的标语。这是用康南海的派头写的，笔划恰像鳝鱼一样。他首先看见的写道：‘打倒昏庸老朽的龚春官！’但是老法团淡淡一笑，又对众人瞬瞬眼睛，就从轰笑中走开了。”这些作品不仅写这类主要人物，细节选用精当，刻画人物维妙维肖，写一些非主要人物，看似信笔所之，实则精细入微，有妙笔生花之效。《代理县长》中写县衙的“一个真正在守卫着的公民”：这是一个十四五岁的青年，衣衫褴褛，黑布头帕上扣着一顶灰布军帽，已经睡着了。他蹲在门白边的谷草上，头脸紧埋在膝头上，只有那根夹在手腕子里，饰着红缨络的矛杆子还是挺立着的，看来倒像插在垃圾堆上的一样。代理县长忍不住笑了，他望那裹着烂棕的腿杆踢了一脚，嚷叫道：吓，这才好看哩！……壮丁给立即吵醒了。他怔了一下，随便右手在耳朵边一搁，扶着矛杆子撑起身来。‘敬礼！’壮丁颤声说，又把手向耳朵边搁了一下。”这个守卫县衙的壮丁的衣服，装束，神情，恐怕是当时当地特有的。如果不作深入的观察和精心的推敲，凭着亭子间里向壁虚构和推测，是达不到这样高度的真实和精确的。沙汀的重视个性化的细节描写，重视精采的细节的积累，已成为他的一种自觉的艺术意识。后来他曾多次说：“为了避免人物刻画的一般化，细节描写也要注意。”“编故事容易，找零件难。”这是他推进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

沙汀：《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载《四川文学》1961年第11期。

沙汀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论短篇小说创作》第22页。

的一个重要经验。

(二) 开始形成独具的审美取向和审美形态。

沙汀的这些作品给人一种艺术直感：悲剧或喜剧意味普遍增浓。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作品的审美蕴藉大大加深。前一阶段的作品，例如《恐怖》、《土饼》、《我‘做广告的’表兄弟的信》，在题材选择和艺术表现上也有悲剧或喜剧色彩，但还不能列入美学意义上的悲剧或喜剧范畴。这个阶段的这些作品，无论题材选择，还是人物塑造、氛围描写，内蕴开掘都具有独特的悲剧或喜剧精神和意蕴。

“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祠堂里》写了兽性对人性的践踏、造成美好人性的毁灭。在那封建宗法制的黑暗王国，豪强霸道者可以为所欲为地放纵兽性，被侮辱被损害者起码的人的权利都得不到。那洗衣婆女儿为争取婚姻自主，为维护做人的权利进行的不屈的斗争何等可敬。她的人格比起那些各种各样的“看客”又何等高尚。可是这美好的、庄严的人性终于被作贱了、吞噬了，这是何等震撼人心的悲剧。《兽道》写兽道对人道的摧残，终致善良的灵魂被毁损。丘八们的兽行给魏老婆子以残酷的精神打击。家破人亡，亲友逼迫，世人冷眼，连长太太的羞辱给这个不幸的女人以精神的损害和摧残。一个性情开朗、待人和善，甚至“还带点孩子气”的劳动妇女，曾几何时，变成了腰背弯曲、麻木呆滞、精神失常的乞丐。这是何等悲惨的人生。这两篇小说在表现悲剧情调上都有带着诗情的抒情色彩。《兽道》通过叙述人“我”的真诚介入与参与，发抒了对黑暗现实的愤慨，寄予了对主人公悲惨遭遇的同情。“我”最初对魏老婆子的印象是良好的。当这个女佣遭到不幸、遭到打击，精神面貌发生很大变化，最后离别时：“雨还在浙浙沥沥地挥洒着，天空异常低暗”，“那个可怜的女仆好一会才出来，腋下挟着一个臃肿不堪的包袱，她也不告辞，连头都不回转一下，便勾着脑袋走出去了。魏大紧紧跟在她背后。我想问她需不需要雨具，但是我没有说出来，好像喉头有什么东西哽住。我们大家都望着细密的雨脚叹息了。……”雨中离别，欲言又忍，欲助又罢，只有望着雨脚叹息，这是多么深厚、悲戚的感情。《在祠堂里》采用第三人称写法，感情寄寓于景物的描写、气氛的渲染之中，形成内在的情感蕴藉和外射。它切入祠堂的环境：“天色慢慢黑了下来。在院坝里，鸭群寂寞而懒散地鸣叫着，伸长颈项，踱过秋霖的积水。供着历代祖宗的大祠堂里，已经点上了神灯了。但此时院落里却显得清冷，没有一点活气。”接着，结合情节的发展，两次写城墙上的号音：“号兵们每天照例的‘翻音’又开始了。其中一个人毫无止境似地吹出一种单音，摇曳而悠长，直到快要接不上气了，才由别人继续下去；就这样反复着，使人想到那种被人扼杀的情景。”这些描写绘声绘色，将一个草菅人命的事件发生的环境渲染到了极致。这些笔墨绝非所谓客观主义，字里行间透出主观抒情色彩。其中“没有一点活气”，“使人想到那种被人扼杀的情景”，更带有明显的主观感觉和感情。它的结尾，写洗衣婆女儿被连长活活钉进棺材以后：

夜很深，四近没有一点声音。锤子在棺材盖上的声音，恰如敲在木桶上的一样。而在远处，突然响起一阵巫师清脆的“司刀”声，接着便是一阵悠长而又凄厉的呼唤。

“三魂七魄回来没有呵！……”

狗噪叫着。……

这是将灰色的社会氛围、人物悲惨的结局和凄冷的自然景色交融在一起的绝妙之笔。它造成一种深沉、凝重的悲剧感，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周立波评价说，这些描写“把夜间的各种幽凄的声响，注入一个四川女性的悲剧里，在字里行间造成一种凄厉的氛围气，这是中国文学的一种新的成就。”

《代理县长》、《龚老法团》属于另一种审美形态：讽刺喜剧小说。它们通过真实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讽刺对象假象与本质、手段与目的、名义与实际内在的矛盾，凸现其令人可笑的喜剧性格。也就是美学理论家通常说的，真实地深刻地表现“能引人发笑的重大的不协调”，构成喜剧艺术对象。

《代理县长》主要嘲弄“代理县长”贺熙貌似达观实则刻毒地奉行“瘦狗炼油”的掠夺政策的嘴脸。他注定会有一系列的“不协调”的言行。他下令布岗设卡，强行向背井离乡的灾民征收过路费，却非要让联保主任懂得“筹款”的目的：“想为地方上保存点元气”。他责成联保主任禁止“烂绅”私办服务，要将这类事务全揽在手里以榨取灾民血汗，却硬要做出一副热心为灾民服务的样子，非常认真地对联保主任说：“桑梓地方，受灾又这么重，你将来可以多出点力。”他向同僚们一句话道破了天机：“管他妈的，弄一个算一个呀！”当联保主任执行他征收路费的指示遭到反抗，被打得满脸血痕，来到他面前时：“代理县长呆了一下，接着站起来惊问道：‘你这是怎么搞的？！’但他随又忍住噗嗤一声笑出来了。‘怎么搞的！’联保主任喘着气说，‘我才挡了一下，这些狗东西！……他们要强着过，我才挡了一下，他们就蛮干起来！……他们晓得几杆枪都是些烂行头！’”读至此，人们也会噗嗤一笑。《龚老法团》的中心线索是擅长以不变应付一切的龚老法团终于在糊里糊涂地参加县党部的党义考试后一命呜呼。这个总体构思就具有讽刺喜剧色彩。至于龚老法团的所作所为也无不充满自相矛盾。这位老先生在“春秋祭孔”时，“他的赞礼是全县闻名的”，可是他的兴趣却在分得祭祀的“腊肉”和“牛鞭”。所以作品通过叙述人以冷峻的语调写道：“像这样的人是该活一百岁的，但在十年前却不幸去世了，这无疑是一大损失！”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他在评价《儒林外史》时说，作者“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使人物“现身纸上，声态并作”，刻画、揶揄习俗“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沙汀这两篇讽刺小说也大体上具有鲁迅所说的这种特点。它们真实而冷峻地揭示了讽刺对象内在的矛盾，将其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伴着严峻、苦涩的笑而深识其“情伪”。

沙汀这个阶段的创作，在悲剧和喜剧两种审美形态上都有成功之作。悲剧型的小说具有实实在在的人生感和沉甸甸的悲剧意识。喜剧型的小说具有含蓄、冷峻、苦涩、凝重的讽刺情调。其中正孕育成型的讽刺艺术更是引人注目。他的多方面的艺术创造和成就，是他在把创作立足点转到风雨如磐、人兽间杂的四川西北乡镇社会以后，在现实生活与独具的易感、热烈、尖刻、

周立波：《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的回顾》，载1936年12月《光明》第2卷第2号。

参看《电影艺术译丛》1962年第2辑。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漫谈“漫画”》。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睿智的气质和个性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创造才能的结果。

（三）形成了有明确指向性的地域文化特色。

沙汀前阶段的作品，涉猎到城市、乡村、军旅、战乱、日常生活等生活领域，题材广泛，但大多开掘不深，而且缺乏指向明确的地域文化特色，不仅艺术感染力差，也很难说有什么独特的风格。艺术取向转到川西北乡镇社会生活以后，时空迁移、文化借鉴、“土著”心理等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地域文化意识，使他在创作中自觉地进行乡土文化的艺术追求。他这阶段的作品有了浓郁的川西北乡土特色。

相对封闭的川西北乡镇社会，有着密度较大的历史沉积、传统风俗、民间土产、土著意识。所有这些在沙汀这阶段的作品中都有充分的描写。袍哥社会、法团组织、贫寒老爷、“吃讲茶”、抽鸦片、坐滑竿等，都带有乡土印记。老法团、朝天椒、肉电报、狗狐子、二棒槌、贺么夹夹、二杆子、史耗子等名号，也有乡风土味。

地域文化特色的艺术追求，不仅要描绘地域的地理、风俗等文化外象，还要深刻地揭示人的文化心理特征。从《在祠堂里》、《兽道》、《代理县长》、《龚老法团》等较成熟的作品来看，沙汀已有了这方面的文学自觉。

《在祠堂里》不仅写了连长的兽性兽行，还写了特有的“婆娘家，洗脚水，洗了一盆又一盆”的婚姻观，写了反动本性加上自负心理为所欲为地残害不顺从的女人。不仅写了只有在这封闭的宗法制社会才有可能发生的悲剧，还特别写了一群男女的“看客心理”。经理员大叔、七公公、肉电报、布客大嫂、显庭姑姑等，目睹了这神圣的祠堂里发生的惨绝人寰的悲剧，有的麻木不仁地惊奇，有的以传统的道德观念为依据认为女人罪有应得，有的抱卑琐的小市民态度幸灾乐祸。“你看她那副神气哩，简直是她妈个生成的贱皮子，过不来好日子的。”这就是七公公的认识。“拿到福享不来呵！”“要吃有吃，要穿有穿，换个别的人么，恐怕屁股也是喜欢的哩！”这就是肉电报的心理。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的社会心理。《兽道》不仅写了魏老婆子目击媳妇遇难道害，陷入悲痛欲绝的境地，还更多地写了亲家母的不容，世人的冷眼，兵太太的恶意等社会心理形成的窒息人、毁灭人的精神罗网。使人们感到精神的戕害比肉体的摧残更为可怕。沙汀的这些作品表明，他在地域文化特色的追求中达到了较高的层次。他已注意了写出地域文化支配下人们特殊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当年曾有人对当时创作界的看重乡土文化特色抱不实事求是的态度，认为它在把文艺往风志的地位上拉。沙汀明确地指出，这是一种“过激”的认识。可见他在这方面是有自觉的艺术意识的。

沙汀在创作上的地域文化特色的艺术追求，这之前有鲁迅导乎先路，后来的沈从文、废名的作品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比起早期的乡土作家，他却有他自己的特色，有一种后起之秀的气势。他的一些佳作有那个时代强烈的时代气息，有鲜明的阶级论为中心的历史意识，有沉实的社会内容和人生感，有更为开阔的艺术思维空间。他不愧为别具一格的乡土作家。

（四）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小说的地域文化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带有文化色彩的地方民间语言的熟练运用。沙汀在前阶段的创作中显露了语言艺术的才华。许多作品的人物语言富有生活气息和个性特色。但是总的说来还未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特别是叙述语言还比较粗糙。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

探索，这个阶段作品的人物语言的口语化、地方化更加成熟，叙述语言也初步形成了简洁、洗炼、明快的个性特色。从总体上看，具有了独特的“川味”。

由于地区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由于地域文化环境的差异，川西北民间有着自己的方言土语系统。它不仅在汉语覆盖的地区、地域中独具特色，就是与成都城区比也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沙汀把创作立足点转到这一片乡土以后，凭着早年深受的地方文化熏陶和艺术气质、艺术敏感，广泛采撷、精心提炼和熟练运用乡风蜀味很浓的语言来刻画人物，描绘乡土环境。从《代理县长》、《龚老法团》等成熟之作来看，无论叙述还是描写，均驱遣自由，准确，鲜明、生动。

如《龚老法团》开头叙述“龚老法团”其人：“这是一个十分健康的人，蓄着雪白的牛角胡子，脸孔饱满，黄里带黑，眼角布满了细密的皱纹，看来好像焙制过的黄连一样。不管两三个自命为懂得幽默的青年人，每一望见他走进茶馆，就免不了要抿嘴笑一笑，其实在县城里，老头儿还算是声望极好的人。他当了十一二年公事，但是在功名上，不过是个监生；一清查起瓜葛来，却也并非什么重要角色的‘老表的老表’，‘勇子的勇子’。单凭这一点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轻视他是多么不公平了。”这描述简约、幽默、生动、明快。它纯熟地运用写实的手腕，不作漫画似的夸张，更无任何油腔滑调。于朴素中透出幽默情趣，委婉中带者嘲弄语调。用“好像焙制过的黄连”譬喻眼角细密的皱纹，是以川西北俗常的事物设喻，形象生动。说“清查起瓜葛来”，而不说“清查起社会关系”或“清查起亲属关系”，并且用“老表的老表”、“舅子的舅子”来形容、譬喻这种“瓜葛”，所有这些都是川西北民间习常的表述方式，生动明确。“其实在县城里，老头儿还算是声望极好的人”，“单凭这一点看，我们也就可以知道，轻视他是多么不公平了”，这都是反语，富有机趣和幽默情调，联系上下文，从整个语境中即可谙其韵味。

如《代理县长》中写代理县长和他的同僚老科长的对话：“‘好，说正经话！’代理县长马上就同意了，接着道：‘我敢向你们担保，这些告示一两天就会生效。到了时候，索桥边给我派两个人守住，看那些灾民还长得有翅膀么！一天平均拿十五个人计算吧！一个人五角，五得五，五五二块五，……’老科长叹息道：‘杯水车薪呵！’‘你难道一锄头就想挖一个金娃娃么？哈哈……不要慌：久坐必有一禅！……’”“‘我决定走！’老科长继续说，声调里带着不少决心，‘难道我还要把几根老骨头送葬在这里吗？……我明天就写信向家里要盘川，我自己垫钱好了。……我不信会在这里拖得出个名堂来的。死了会连箴折子都找不到一张哩！……’老科长的声调忽然哽咽起来，于是代理县长开始进行劝解。”仅只这两段对话，就把代理县长掠夺的本性和狡猾、凶狠的嘴脸，老科长的雇佣态度和工作缺乏信心的心理状态，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索桥边给我派两个人守住”，“一个人五角，五得五，五五二块五”，“把几根老骨头送葬在这里”，“不信会在这里拖出个名堂”，这些都是口语的表达方式。“挖一个金娃娃”，“久坐必有一禅”，“死了连箴折子都找不到一张”，这些比喻、形容的用语，都是当地群众常用的，闪烁着群众智慧，颇有生活气息，又富有表现力。

又如《在祠堂里》写“看客”之一的七公公的面目和心理。开始他不停地埋怨洗衣婆母女：“老实说，原早就不该让他两母子搬来住！常言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当别人认为他不应该说这些话时，他说：“说

这些话！我亲自听见她叫我七疯子哩！她不疯，养出他妈这样一个现世宝来。……”当洗衣婆女儿遭到连长毒打时，他反而冷笑女人：“你看她那副神气哩，简直是她妈个生成的贱皮子，过不来好日子的。”事态进一步发展，女人继续遭到残酷打骂，他却仍不忘照例喝几杯，呷了一口酒：“……拿到一个年轻婆娘，一天有事没事都打扮得花花俏俏的！常言道，母狗不摇尾巴，公狗不敢上背。”到深夜，当听说女人已被残杀，他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未免太‘莽’了，唉！……”七公公的口语的结构方式、比喻方式和表达方式，都是从川西北民间活的口语中提炼出来的。仅仅从人物的语言可以感到此公的身份、年龄、态度、心理。勿需介绍其人，即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知晓其精神面貌。

二十四坦诚的小个子川籍作家

沙汀在1936年年初返回上海时，带回了变卖田产积余的一笔钱，暂时不再为生计发愁，辞去了中学的教职，一方面进行创作，一方面继续参加上海文艺界的工作和活动。

他先是在《文学界》任编委。这个刊物是根据部分左联盟员的要求和党组织的意见，通过邱韵铎取得光华书店的支持创办的。

主编署名周渊，不少人以为就是周扬，其实是个假名。刊物的一切编辑工作实际上由左联党团成员、分管组织工作的戴平万负责。办公地点设在邱韵铎家里。沙汀参加过两次编委会，讨论刊物的稿件安排。他在《文学界》工作不久，由于与戴平万经常接触，彼此十分了解。这位当年的“太阳社”成员、坦率幽默的“老广”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到了入党问题。他详谈了1927年入党前后的情况。戴平万认为那时的事难以查证，不如重新入党。于是经戴平万介绍，沙汀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事后戴平万告诉他，党团书记周扬说：这个人早应该介绍入党了。

在《文学界》工作不久，沙汀又被安排担任《光明》的编委，原来的工作由陈荒煤接替。《光明》由洪深、沈起予任主编，生活书店发行。洪老夫子是挂名。他与国民党上层有往来，便于对付当局的干扰。沈起予的政治色彩也不浓。他和他的妻子李兰负责日常编务工作。夏衍参与了领导工作。每次编排，他都提出许多好主张。他的作风也很深入，曾多次同沙汀一起跑印刷厂，亲自调整版面，撰写补白文章。他对编辑业务之熟悉，才思之敏捷，审看校样之精细，给沙汀的印象很深。沙汀为办好《光明》，组稿，改稿，跑厂，很忙乎了些时日。周扬转来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刊登后，引起强烈的反响。他便与舒群取得密切联系，约到几篇好稿，并且通过舒群，约到了罗烽、白朗的稿件，出了一期“东北作家近作集”。

沙汀返回上海时，“左联”已经解散，成立文艺家协会的事已经确定。他从周扬那里得知，这是根据萧三给“左联”的一封长信作出的决定。萧三是“左联”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代表。他通过内部交通线将这封信送到上海史沫特莱手里，然后经鲁迅转给周扬。他在肯定“左联”取得成绩的同时，严厉批评了“左联”长期存在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提出解散“左联”，成立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文艺团体。他的提议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王明的指示。因此，沙汀认为既然是党的指示就应当服从。而且他也确实感到“左联”多少有些像党组织，不大像文

艺团体，以致影响了文艺界更广泛的团结。可是没有多久，他忽然听说鲁迅对此持有异议。1936年4月初的一天，周扬来找他，要他邀请茅盾来他家里见面，商议怎样去做鲁迅的工作，茅盾如约到来。周扬对茅盾说，解散“左联”后，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的工作进展顺利，但现在由于鲁迅有意见遇到了困难。鲁迅是文艺界的旗帜，理所当然应由他来挂帅。他不肯参与领导，使一大批作家对这个新的组织表示冷淡。周扬还说，现在社会上和有些小报说鲁迅破坏抗日统一战线，这纯系流言蜚语。他对鲁迅一向十分尊敬，过去有人化名骂鲁迅，他不知情。有人故意歪曲事实，挑拨离间，他感到痛心。总之，周扬说了许多使他左右为难的话，希望茅盾能从中调解。茅盾对周扬说，不是他不愿调解，而是无能为力。事实上他已多次同鲁迅交换过意见。开初鲁迅对萧三的意见持看一看的态度，认为没有必要急于解散“左联”。“左联”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确乎严重，但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是有人在那里“做”，绝不会因为取消了“左联”，他们就不“做”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应该有个核心，这个核心最好是“左联”。解散了“左联”，统一战线就没有了核心。我们一心想把人家统过来，弄不好恐怕会被别人统了过去。“左联”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旗帜一倒，岂不是向敌人宣布自己失败了。后来，鲁迅在徐懋庸等一再劝说下，同意解散“左联”，但提出必须发表一个宣言，申明“左联”之所以解散是为了在新形势下把文艺运动推向新的阶段，而不是溃散。他的这个意见，周扬他们曾表示接受，可是以后却为何变了卦。鲁迅对此十分生气，认为他们言而无信。在这种情况下，茅盾怎么进行调解呢？他们这次谈话，没有多少成效。成立文艺家协会的事拖了又拖，直到6月初才大体就绪。6月7日，文艺家协会在驷马路大西洋菜社的大厅里举行成立大会。到会的有七八十人。大会公推夏丏尊为主席，由傅东华作筹备经过的报告，通过了简章和宣言，选举茅盾、夏丏尊、傅东华、洪深、叶圣陶、郑振铎、徐懋庸、王统照、沈起予9人为理事，沙汀等5人为候补理事。大会热烈鼓掌通过了给病中的鲁迅的慰问信。沙汀参加了大会。他曾约艾芜、欧阳山、草明参加。他们没有去。

也是在回到上海时，沙汀就听说上海党组织根据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在《救国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和共产国际出版的《国际时事通讯》上一篇文章的精神，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他也认为作为党组织提出的口号，当然应该赞成。当1936年6月胡风在《文学丛报》上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提出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来代替“国防文学”的口号时，他同许多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人一样，认为胡风此举是分散抗日的力量。两个口号的论争激烈展开以后，沙汀完全站在“国防文学”口号一边。不久，茅盾曾出面做双方的调解工作。他在主张“国防文学”口号的“左联”成员的一次座谈会上，苦心劝说大家放弃口号之争。可是与会者都按周扬、夏衍的调子，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提得早，已经得到普遍的拥护。沙汀在会上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座谈会结束时，他还试图去说眼茅盾，要茅盾为《文学界》写一篇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他煞有介事地说这个口号是党组织提出来的。几乎谈得来唾沫迸溅。茅盾只是摇头，用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看着他。茅盾的调解没有成功，两个口号之争愈演愈烈。《夜莺》、《现实文学》、《文学丛报》、接连刊登许多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夜莺》第1卷第4期还出了特辑。《文学界》、《光明》、日本东京的《质文》发表了大量的赞成“国防文学”口

号的文章。《文学界》也出了特辑。沙汀在《文学界》第1卷第3期上发表了《一点意见》，表示拥护“国防文学”的口号，只是说“因为经验的限制，我只能接受而不能履行”。到1936年8月中旬，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发表以后，两个口号的论争才逐渐缓和下来。鲁迅表明了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驳斥了徐懋庸的错误观点，批评了周扬在理论上、行动上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错误，并对两个口号作了分析。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国防文学’这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有缺陷，它仍应存在，因为存在对抗日运动有利”。许多作家都表示赞成鲁迅的观点。尽管大家在口号上有过争论，但在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根本问题上却是一致的，一经鲁迅分析两个口号的关系，强调了两者并行不悖，很快就消除了隔阂。

此后，两个口号论争的双方都已偃旗息鼓。谁知徐懋庸并没有服气，又别生枝节。他在给鲁迅去信后，回浙江老家去了，一读到鲁迅的公开覆信，立即返回上海。他到沙汀家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他读了鲁迅的信，已痛哭了几场。他给沙汀的印象是，虽然做了糊涂事，但仍然是尊重鲁迅的。但过不多久，他却找上门来，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还拿出一封名为《答鲁迅先生》的“公开信”，要求在《光明》上刊登。沙汀竭力劝阻，也不看他的信。他一再说他非常痛苦，这封“公开信”非披露不可。沙汀向周扬谈及这一次和徐会见的情况，周扬很吃惊：怎么这个徐懋庸竟不听鲁迅的批评，不吸取教训！沙汀便约周扬与徐懋庸在自己家里作了一次长谈。周扬热心而又真诚，可是也没有能使徐懋庸回心转意。这个执拗的人带着“公开信”扬长而去。沙汀曾同徐懋庸一起任过《文学界》的编委。对这人的印象一直很好。他有才气，又极勤奋，写的有些杂文得到过鲁迅的赞赏，其《打杂集》还由鲁迅作序，没想到竟如此之自负。后来，徐懋庸一意孤行，将他的“公开信”交给一个从日本回国、八方拉稿办刊物的人，发表在《今代文艺》的创刊号上，引起文艺界普遍的不满。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逝世了。噩耗传来，上海文艺界进步人士无不万分悲痛，纷纷去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周扬、夏衍因不便在那种场合公开露面，便请沙汀、艾芜代表他们志哀。20日，沙汀一到殡仪馆，迎面看到了胡风。胡风拉着沙汀的手失声痛哭。沙汀也泪如雨下。随后沙汀肃立守灵，默对先生清癯的容颜，忆起往昔的音容，念及过去的教诲，心中有如刀绞。22日下午出殡，沙汀一早就赶到现场。事前拟定的扶柩拾棺的名单中没有沙汀，因临时缺人，巴金、靳以便招呼他参加。他跻身十多个青年作家的行列，在肃穆中前进。送殡的队伍缓缓蠕动，首尾长达数里。白色的挽联一幅接着一幅，《哀悼歌》一声接着一声。“鲁迅先生精神不死”的口号声震长空，街道上人山人海。出殡事毕，沙汀回到家里，就与洪深商量编排《光明》的纪念专稿。他们将已编好的当期刊物改版，增加了“哀悼鲁迅先生特辑”，推迟在10月25日出版。沙汀写了《哀悼之辞》。其中说：“鲁迅先生的伟大处是在直面而坚持地对一切黑暗突击，从古久先生的帐簿一直到泊夹品的卅字徽章。在五四运动后的十数年中，每逢一次新的巨大的激变，都能够勇敢地站在前线作战的，只有先生一人，而能够使一切丑恶畏懼的，也

仅仅只有先生一人。”

在两个口号的争论开始不久，不少左翼作家就对上海文艺界进步作家的内部矛盾深感不安，希望开展一些活动以增进了解。

鲁迅答徐懋庸的信发表以后，他们又建议加强联系，消除宗派情绪。鲁迅逝世后，大家都很悲痛，更进一步提出要在大目标下团结起来。于是，当欧阳山向沙汀提出在他们已经组织过的“小说座谈会”的基础上扩大范围，吸收两个口号论争中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再次举行座谈以增强团结时，他欣然表示同意。10月30日，座谈会在四川路的一家粤茶馆内召开。欧阳山、张天翼、艾芜、陈荒煤、沙汀等都高高兴兴地赴会。大家见面握手言欢，讲团结讲友谊。沙汀也在友好的气氛中慷慨陈辞：要“尽快增强团结”，“创作家们要先联合起来，打定一个基础”。“现在看到《小说家》根本没有一点宗派意味，所以我才毅然决然地加入”。1936年12月1日出版的《小说家》第1卷第2号对这次座谈会作了突出报道，集中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

这以后不久，茅盾又发起了定期的聚餐会。他先行给沙汀通了情况，说他已同冯雪峰等商量过，可以用过去他和文艺界、出版界一些老朋友用过的星期聚餐会的方式，加强青年作家的联系，自由地交谈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沙汀自然非常赞成。他希望茅盾领头，他愿意多邀请一些青年作家参加。他们经过联络，商订每一、二个星期的星期一聚会一次，名为“月曜会”。由茅盾固定作东，其他人用撒兰的方法多少交几角钱。所谓的撒兰，即按聚餐人数画一丛兰草，根部注明钱数。聚餐的人各抽一叶，按数交钱。这种方法类似四川的划鸡爪。他们用这种办法，一次可凑到六七元钱。在当时上海的中小餐馆，六七元一席，蒸、炒、烧、拌，样样都有一点。这种“月曜会”举行过多次。一般没有预定题目，从政治形势、文坛动态、文艺思潮、个人见闻、创作打算直到在座作家的某篇近作，无所不谈。经常参加的有张天翼、艾芜、陈白尘、巴人、蒋牧良、端木蕻良、沙汀等。有的刊物的主编也来参加和组稿。《文学》的主编王统照就常常在座。他除了组稿，还请茅盾点名发言，探讨青年作家来稿中的一些共通性的毛病，使话题更加集中，讨论更加活跃。“月曜会”从1937年春天开始，一直坚持到“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前夕。沙汀觉得从这项活动中获益匪浅。

这些时候的沙汀，已是有名气的左翼作家。可是他不只是同名作家交往，还常常和不知名的青年作者往来。他喜欢同青年们无拘无束地交谈。青年作者也喜欢这个小个子川籍作家的坦诚。他那辣斐德路桃源邨的斗室之后，经常有不速之客。不过，他往往是同来访者谈不上20分钟，就会约请一同到马路上散步。一面走一面畅谈。据曾经几次受过这种“马路上的热情招待”的青年作者回忆，这个外表冷静的作家实则心热似火。他陪客人一上马路就絮絮叨叨，一连几个小时也没个完。当远远望见屹立的普希金铜像时，他还会激动地朗诵起普希金的诗，看见悠闲踱步的白俄罗斯人时，会很诙谐地说宛如置身在古老的莫斯科黄昏的街道上，看见流浪的老白俄时，会沉思着说想起了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那顽固而悲惨的老年人，看见携着小狗的淑女或者握着手杖的绅士时，会一口咬定，“这些都是果戈理小说中的人物啊！”谈话未了，总是诚恳地叮嘱：“你们要熟读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尤其是《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这一部书，还有《罪与罚》，还有法捷耶夫的《毁灭》，还有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还有契诃夫等人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读上百次也不算多，……”

第五章 辗转于后方、延安、前线： 拓展生活和题材领域 (1937年秋 1939年冬)

沙汀已过了容易激动的年龄，但他在本质上是“易感的和浮动的”，“对于一种新的念头又非常执拗”。他曾为抗日的热情所燃烧。他曾活跃在大后方的文化人中间。他满怀热情奔赴延安，又为贺龙那光彩夺目的性格所“迷惑”，去了晋西北和冀中。

沙汀的这段生活，不仅使他拓展了题材领域，表明他完全可以用适合他的方式表现“灰姑娘”和“大力士”，而且使他开阔了政治视野，在后来的创作中有可能站在较高的角度上冷眼看恶，从容地以“革命辩证法”进行他的“诗意的裁判”。

二十五被热情燃烧着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炮声响了。抗战救国成了全国人民的神圣职责。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存亡成了每一个进步作家关注的中心。在国家、民族危亡之秋，沙汀也把那许多小说的构思抛到一边去了。

《大公报》记者陆诒从前线返沪，夏衍立即邀请他向一部分作家作平津战事的报告。报告会后，夏衍邀请了几位原“左联”的成员在艾思奇家聚会，商议根据报告内容和其他有关通讯报道，集体创作一部反映芦沟桥事实的长篇演义小说《芦沟桥演义》。沙汀为通知听报告的人到处奔走。接着又为组织讨论创作提纲做了许多工作。经商定这部小说分别由沙汀、艾芜、张天翼、舒群、夏征农各写一章。沙汀负责写第一章《前夜》。主要写芦沟桥事变前夕天津的局势。他于11年前去北京时到过天津，对城市环境多少有些印象。在上海“一·二八”事变时曾行街巷，对商人慰劳军队的爱国行动记忆犹新。小说切入商人袁晓初一家的生活，表现其由衷的爱国热忱，并穿插写了海河中的浮尸，日军诡秘的动向，预示侵略战争的战火即将燃烧起来。人物、故事均为虚构，构思和文字都较粗糙，可是那一片热忱却十分可贵。这篇小说由夏衍交给了《救亡日报》（广州版），于第二年2月8日至14日连载，总题目改为《华北烽火》。

1937年“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战火燃烧到了身边。当晚沙汀站在窗前，目睹了反击日机侵袭的空战。次日路过大世界，亲眼看到炸弹落下，遇难的同胞肢体横飞。他胸中燃烧起一阵阵怒火，参加抗战服务工作的愿望愈加强烈。战火稍停，他就和舒群、罗烽等找到刚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要求介绍到张发奎部队服务。等不到正式答复，他们又向驻军交涉，到军中采访和慰问。遭到拒绝以后，他们没有灰心，相约到街头宣传，到医院慰问伤员。没料到医院的限制也很严，只得到金神父路的一所收容所，看望受伤的同胞。后来沙汀好不容易通过私人关系，取得可靠的担保，去一家医院面谈可否参加服务工作。他兴致勃勃地赶去，结果仍垂头丧气而归。医务处了解

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载《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

恩格斯：《致劳拉·拉发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77页。

他的身份后，当场婉言谢绝。正像他在随记《P 医院碰壁记》中记述的，对方问过他的姓氏，连连说久仰久仰，对他前来服务，哪怕说明不计报酬，愿义务为伤员写写信、读读报，“结果仍是礼貌周到地挡驾”。当时他不免感到困惑不解，后来才知道原来医院对新闻界揭露他们的服务质量差深为不满，对一切摇笔杆的人都拒之门外。那些时日，沙汀只遇到一个偶然的机，到萨坡赛路的一家私人医院访问过一个四川潼南籍的战士，写过一点记叙文字，多数时间空怀激烈，喟然长叹，如他后来所描写的那样：

抗战引起我一种冒险的打算，我以为我应该暂时放下我的专业，不再斤斤计较一定的文学形式，而及时地反映种种震撼人心的战争。我认为这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责任，而在情绪方面更是一桩不能自己的事。所以“八·一三”后，在离开上海那一段时间中，我总四处奔走着，渴望着到前线去。

然而，如同其他许多抱着相同希望的朋友一样，我失败了。我们似乎只有被热情燃烧着，住在租界里倾听遥远的枪声的权利。

9月转眼过去，到10月，沙汀见在前线工作已没有可能，而且在战争环境下，报刊发行困难，出版社纷纷内迁，靠稿费为生也成了问题。他在和欧阳山、张天翼等交换意见时，都认为只有到后方去开展文化救亡工作。他去征得周扬的同意，便收拾行装，准备回川。当他去找周扬转组织关系时，周扬却叫他去找夏衍。但到夏衍家里，又见到周扬。他早已有一个印象，自从冯雪峰主持文艺界的工作以后，周扬就逐渐消沉，好像被停止了工作。

但是周扬和夏衍都很动情他说了许多惜别的话。夏衍还叮嘱到成都后去见李一氓，找他接上组织关系。

10月中旬的一个阴沉沉的日子，沙汀一家人和舒群、罗烽、白朗、丽尼等，携带着行李，匆匆离别上海。

已是上海沦陷的前夕，闸北硝烟弥漫，市民关门闭户，逃难的人扶老携幼，人来人往。

吴淞口已被日本军舰封锁，只得赶到沪西梵王渡车站候车。车站也一片混乱。等车的人呼儿叫女，挤挤撞撞。沙汀一行约莫等候了3个小时，才挤上了去嘉兴的车。周扬赶到了车站，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

车到嘉兴，他们在那里住了两天，乘汽车到了南京。到南京后，就各自分别。

沙汀带着家小辗转南京街头，找到了先于他们到此地的任白戈夫妇。任白戈和李柯带他们到丹凤街的田汉家借住。热情的田老大把自己的双人床让出来待客。任白戈和李柯又介绍沙汀认识了四川同乡阳翰笙。阳翰笙也非常热情。他替沙汀买好了去重庆的船票，并且给他在四川的高县同乡吕超写了一封信，托吕超嘱咐成都协进中学的董事长吴景伯，为沙汀谋一个教职。大约停留了3天，沙汀陪夫人带孩子匆匆去了一趟玄武湖、秦淮河，便乘船溯江而上，经三峡回川。

二十六在堪察加的文化人中间

1937年10月底，沙汀携家眷乘船抵达重庆。他们为筹措路费，在萧崇素家暂住。萧崇素早已从上海回川，在《新蜀报》工作。他家住在观音岩山

梁上，虽是几间木屋，却还比较雅致。稍前几天从上海回来的刘披云也住在这里。沙汀一家人来后，萧崇素让出前楼，自己和刘披云搬到后楼。

在萧崇素家里，沙汀同重庆地下党负责人、《新蜀报》主笔漆鲁鱼见了面，了解了抗战以来大后方的一些情况。漆鲁鱼和萧崇素也利用机会组织了一个报告会，请沙汀作形势报告。

报告会的地点在大梁子的基督教青年会。听报告的人大多是重庆爱国组织的青年和学校的学生。他们排着队列，打着抗战“学习会”、“宣传队”、“歌咏队”一类的旗帜，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和大刀进行曲进入会场。大家热烈鼓掌欢迎从上海回来的作家讲抗战的形势。报告完了，还有不少青年学生涌到前台请沙汀签名留念。

沙汀一家在重庆住了几天，于11月初乘车到成都。他们在旅馆住了3天，黄玉顺便带着杨礼回故乡，到秀水乡小学教书的哥哥黄章甫家暂住，沙汀则留下联系工作，待落实以后再接妻儿来成都。

沙汀住在同乡杨冠斌家里。他先后会见了车耀先和张秀熟，向他们打听李一氓的住处。他们也不大清楚。张秀熟说，或者可以找一找张老。这张老是谁？沙汀未及深问，直到解放后才知道指的是张曙时，所以他暂时没有接上组织关系。这些时候，从上海回来的周文，也有些着急地告诉他，他也没有同党组织取得联系。周文在“左联”解散前夕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组织部长，在此期间的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与沙汀有分歧，彼此很少往来。现在在大后方相逢，都似乎自觉地捐弃前嫌，言归于好。沙汀向周文，并且通过周文向刘盛亚了解了成都文化界人士的许多情况。

当时成都的报刊，较有生气、影响也较大的是车耀先在这年年初创办的综合性期刊《大声》。稍次一点的《国难》三日刊，主要转载外省报刊宣传抗日的文章。此外就只是一些发行量很小的小型报刊。沙汀和周文都感到空气有些沉闷，与如火如荼的抗战形势很不适应，同上海活跃的气氛也相差很远。他们向张秀熟提出创办一个刊物，或者接收一家报纸的副刊来编。经过几次商量，决定创办《战旗》旬刊。

《战旗》旬刊由刘披云、周文、葛乔、沙汀担任编辑。日常编务由葛乔负责。葛乔脱离辛垦书店后辗转回到四川，在《国难》工作。他同张秀熟也早就熟识。《战旗》也是综合性期刊，文艺占的篇幅较少。沙汀为它赶写了一个两千字的短篇小说《出征》，系根据在上海采访四川潼南籍战士获得的素材创作的小故事。可是《战旗》在报批时得到的结果是“暂缓发行”，只印了一期“试刊”就停刊。葛乔到重庆去了，刘披云到协进中学教书去了。

学校的寒假渐渐临近，成都军政当局以加强战备为名，准备利用假期在四川大学组织一次规模较大的军训。车耀先、张秀熟向沙汀、周文提及此事，希望他们去讲讲政治课，进行抗日宣传。两人都满口答应。但由于军训迟迟不曾举行，沙汀不愿意再等，就回安县去了。周文参加了军训工作，还担任过队长。

沙汀是在旧历年年底回安县的。他在城里住了几天。小小的城镇，是他百读不厌的书篇。他觅旧迹于街巷，访亲友于庭院，又有多少旧事萦回于心间，有多少新鲜的传闻引起他激动不安。最令他感慨的是眼下的生活与昨天的生活反差是那么大。3个多月前的上海满眼血肉横飞，满耳“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歌声，转瞬间的故乡却一切依旧，一切暗淡。这偏僻的角落也并非没有扰攘，那些官吏们不就正顶着新的头衔大肆掠夺，进行着淘金的角

逐么？不过，他没有来得及深化自己的感受。除夕已经到了，他得赶到秀水乡同家人团聚。过了春节，他就携带家眷去成都。在成都停留期间，他已办好了教书的手续。他得按聘约准时到职。

他和李嘉仲两家人合租了一个幽静的小院。地点就在距协进中学很近的仁厚街，过街进小巷就到了。协进中学的门面较小。进校门是一个小小的庭院，后面却有一排排教室，宽敞的操场，枝叶扶疏的女贞、泡桐、杨槐。学校的校长谷醒华，50来岁，四川荣县人，成都高等师范学堂毕业后，在原籍从事中学教育工作多年，以热心服务桑梓誉满乡里。后来与倾向进步的张志和结交，在张志和所部的24军一师驻防江津时，任过师部秘书和江津县县长。陈离、吴景伯、张志和在成都创办协进中学，谷醒华即受聘任校长。学校的教务长杨伯恺，是上海“辛垦”时期的老相识。教职员洪仿予、黄觉民、李筱亭等都是党员和进步人士。学校有高、初中20多个班，1000多学生。学生们出壁报，组织歌咏队、话剧队，宣传抗日，相当活跃。沙汀担任了两个班的国文课。在上课前后，他常常到李筱亭家小坐。这位老先生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有相当声望。他的家就在校园内。

同上海的动荡、喧嚣相比，这大后方按部就班的教书生活当然是比较安定、闲适的。可是沙汀不可能安于这种日子。易感而好激动的沙汀，对每一种新的触动总爱念兹在兹地回味。他回四川特别是回故乡所见的形形色色一直往复于心。那借抗日之名的各种各样新的扰攘应不应该写出来呢？他的回答是肯定的。

既然如此，那么将一切我看到的新的和旧的痼疾，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指明出来，以期唤醒大家的注意，来一个清洁运动，在整个抗战文艺运动中，乃是一桩必要的事了。隐瞒和粉饰固然也是一种办法，可以让热情家顺顺当高兴一通，但在结果上，却会引来更坏的收场。

正是基于这种深切感受，沙汀创作了《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从这里再一次可以看到这位作家在对生活的审美思索中具有怎样的历史意识。

这篇小说是他在刚刚开始教书生活时写的，但小说的构思在安县就已初步形成。他在县城里听到一个笑话：有个受过防空训练的人居然害怕一枚废弃了的炸弹。他很快就将这个笑话同一个人联系起来。此人在抗战开始后投机钻营，搞起防空协会，捞了个主任的头衔，可是除了搞钱，什么事也不干。他就按照这个人的特点进行推测，这个没有防空知识的防空“专家”必然会出尽洋相，必然在看到当年国民党军队追剿红军遗留的炸弹时害怕得躲起来。他的这种行为也必然成为人们的笑料，甚至会被常进“者者轩”茶铺的上层人物所耻笑。这种人可能会被撤掉，但在这个县城里接替他的人也不会比他更好。到成都后他继续酝酿，经过更多的虚构，融合更多的嘲笑，人物更加丰满，喜剧性也更强。恰好茅盾从广州来信，要他为《文艺阵地》撰稿，他就赶写了这篇小说。这篇作品脱稿于1938年3月，发表在同年6月16日出版的《文艺阵地》第1卷第5期。茅盾还在“编后记”中写道：“沙汀的这篇小说是他慎重生产下的惊人的收获，带点‘幽默’味，但是愈咀嚼其味愈苦。我们觉得如果在这时代也还不废‘幽默’味的话，那一定须是这样真正寄沉痛于幽默的作品。”这篇小说的特色正在于幽默与讽刺同构并带苦趣。继这篇小说之后，沙汀还准备在“堪察加小景”的总题目下，连续写几个短篇。已拟定的题目有《气包大爷的救亡运动》、《到西北去》、《联

保主任的消遣》、《从军记》。后来《联保主任的消遣》完成于晋西北的军旅中，其他几篇都没有兑现。主要原因是他在认识上发生了动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怀疑我是在泄气，而泄气却是不应该的。”不过这也不必太感到遗憾。他把其中一些好的构思都用到长篇小说《淘金记》中去了。至于何以称为“堪察加小景”，这是受当时报纸宣传的影响。抗战开始时后方的大报小报，为把偏僻的后方与前方加以区别，均戏称为“堪察加”。

沙汀在任教期间，经常在课余踱步到附近祠堂街车耀先那里去。他在书刊经营处读到了延安出版的一些书刊，读到了《论持久战》，读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多次见到周文、刘披云，参加了文化界的一些活动。

他同车耀先一起，参加过《大声》周刊社社员组织的慰问抗战军人家属活动。那是一个星期天，10多个人到五福街、西御河沿街慰问六户抗属。军属见到他们自然十分兴奋。谈不上几句话就倾诉苦情。战士余湘藩的妻子在丈夫牺牲后，只领到很少一点抚恤金，由于已有了遗腹子，不能就业谋生，家里已快要断炊。战士赵文全的妻子，带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靠洗衣服挣钱度日。两娘母没有住房，借住在纺织机房内。白天工友们进机房劳动，他们就得出外流浪。慰问队的人怀着同情和义愤，叫保长来质问。睡眼惺忪的保长支吾一阵，搬出优抚条例例行地解释一番，弄得一个个书生不住地唉声叹气。还有一个星期天，《大声》社社员送一个瘫痪的军同老太太到平安桥医院就医。这个老太太姓穆，儿子穆合林是个人力车工人，踊跃参军上了前线。穆老太太家里连一张床都没有，每天蹒跚在潮湿的泥地上过夜。久而久之因受风湿引起了瘫痪。他们用人力车推着生病的军属老太太，像游行示威一样排成队列跟随其后。队列前举着用篾折衬底的横标：“送抗战军人壮丁母亲穆老太太进医院”。队伍行进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所到之处，沿街市民仁立观看。有些妇女、儿童还加入队列。当然也有人一旁讪笑。路过民生路时，就有个算命先生讥笑：“车蹉蹉儿（指车耀先）又要做啥了！”沙汀根据这两次慰问活动写了两篇通讯：《慰问抗战军人家属小记》、《送穆老太太进医院》。分别发表在《大声》周刊复刊的第39、40期。

沙汀更主要的活动是结交文艺界的朋友。他在春节后到成都不久，通过车耀先的联系，见到了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接上了组织关系。党组织给他的任务就是在文艺界广交朋友。他在这方面的活动大多是同周文一起进行的。周文刚刚结婚，没有孩子拖累，也没有固定职业，时间较多。而且周文在文艺界的工作已有一定的基础，还在参加寒假军训期间认识了一些文学青年。例如四川大学学生羊角就是相当活跃的一个。羊角、车辐等一批文学青年办了一个文艺刊物，在青年中有一定的影响。沙汀通过周文同文艺界人士和青年作者建立了友情：

他同马宗融也有较多的往来。马宗融也是在“八·一三”战事爆发后从上海到四川的。沙汀同他在上海虽不曾谋面，却互知其名。他们都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过书，都同巴金熟识，听巴金谈到过。马宗融之妻罗淑系成都附近的简阳县人，写过《生人妻》等很有特色的小说，为沙汀所熟知。沙汀从安县到成都几天，即3月17日，这位很有才气的女作家不幸因产褥热去世。沙汀前往吊唁，并与马宗融一见如故。当时马宗融在四川大学执教，沙汀常

常到他那里去。马宗融也常常到仁厚街来拜访沙汀。

他还认识了陈翔鹤。陈翔鹤是原沉钟社的成员。沙汀作为《沉钟》的热心读者，早就知道陈翔鹤其名。1933年读了《关于“沈钟社”的过去现在及将来》，更有了良好的印象。陈翔鹤也是在抗战爆发后从北方回到重庆，以后举家迁来成都的。他家人口多，又没有找到工作，生活相当困难，住的地方也很狭窄。可是他却有闲心种花，常常忘情于花丛之中，很有点旧文人那种穷开心的味道。陈翔鹤对人诚恳、直率，与沙汀很快就有了交情。而且由于他在北京多年，同迁居成都的“京派”作家熟识，沙汀通过他与那些人也有了接触。

沙汀对邓均吾也是早闻其名。他在省一师时，就从创造社的刊物上读过邓均吾的作品，邓均吾到辛垦书店工作期间，虽然见面很少，但印象较好，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文化修养的人。沙汀同他也有了交往。

沙汀同李劫人、朱光潜常在文艺界的会上见面，但他仍上门去拜访了他们。李劫人因连续出版了《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在文艺界颇有声望。他性情随和，很容易接近。他还保持着在法国养成的生活方式，如每日四餐，中午只吃点心，下午3时才是正餐。朱光潜也是很有名气的美学家，教授的派头十足。沙汀曾几次前去作客。

沙汀同何其芳、卞之琳有过接触，次数却不多。何其芳在石室中学教书，卞之琳在四川大学任教，两人在北京上大学时已有深交。他们同四川大学的朱光潜、罗念生、方敬、谢文炳等自费办了一个半月刊《工作》，刊登一些散文、通讯、小小说、随笔、杂文。虽然只有8个页码，用土黄纸印刷，但很有生气，给沙汀的印象很好。何其芳的诗《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发表以后，尤其引起他的瞩目。

成都文艺界人士经过联络，由周文等出面发起成立了“成都文艺界青年抗敌工作团”。约50多名代表在学道街省济难第一小学举行了筹备会，推选马宗融、沙汀、周文、任钧、蔡天心、羊角等11人为筹备委员，发表了《成都文艺青年抗敌工作团发起意见书》，申明“要使文艺部门在救亡的洪流，能够发挥它最大的战斗力量，是需要一切文艺青年的共同努力的，所以我们需要产生一个组织，以集体的力量，和我们青年的积极战斗性推动整个文艺的救亡运动工作”。不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各地相继成立分会，又由周文、李劫人等出面联系，广泛联合了老、中、青文艺家，成立了成都分会。“文协”成都分会推选了李劫人、马宗融、沙汀、周文、陈翔鹤、罗念生等任理事。为了增进友谊，发抒抗日的爱国之志，文艺界人士举行过几次联谊性的茶话会、聚餐会。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枕江楼聚会。周文、沙汀联系和交往的许多人都参加了。大家在秀丽的锦江岸边、翠竹掩映的阁楼下品茗谈心，然后进餐，尽兴方归。还在“文协”成都分会成立前，沙汀、周文就曾打算为《新民报》办一个文艺副刊。他们与报馆洽谈，报馆只表示欢迎他们撰稿，却无意“多此一举”。分会成立后，他们以分会的名义办起了《笔阵》。这个刊物一直正常出版，成为成都进步文艺界的一个重要阵地。

这年初夏，陈白尘、沈浮、白杨、赵丹等组织的上海影人剧团来成都举行抗日演出。由于沙汀和周文在上海多年，对他们比较了解，义不容辞地担任了接待工作。他们为剧团举行了演前招待会，邀请“文协”的一些成员出席。剧团上演的第一出戏是陈白尘根据席勒的《威廉·退尔》改编的，在成

都引起很大的反响。但演出不久的一天晚上，刚刚开场，一批地痞流氓就起哄、捣乱。在场的警备区司令部的人不仅不加制止，反而下令停演。事后警司的头头严啸虎还根据谣言，把这次事端的原因归咎于白杨。分会的许多文艺工作者非常愤慨，在“努力餐”开会研究对策。大家一致决定揭露事实真相，并由车耀先、熊之骏等代表各界人士向当局提出抗议。在各种舆论的压力下，警司不得不撤销禁令，剧团得以继续演出。在这个过程中，沙汀与陈白尘有过多次接触。陈白尘是当时影人剧团的编剧，在上海时还用墨沙的笔名写过小说，出版过《曼陀罗集》等小说集。沙汀同他谈戏剧、谈小说都非常投机。沙汀曾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揭露上海宝山县汉奸政权罪恶和丑闻的通讯，打算据以创作一个多幕剧，已写好了分幕分场的提纲。当他知道陈白尘苦于缺乏创作题材时，将这个提纲交给了陈白尘。后来陈白尘参考这个提纲，创作了话剧《魔窟》。时间很快到了1938年夏天。这时成都到延安去的青年逐渐多起来。青年们向往中国革命的圣地，许多家长、老师也鼓励子女和学生奔赴延安。曾任安县县长的夏正寅从住家苏码头来沙汀家闲谈时，就提到女儿夏森已去延安，并且希望沙汀帮助三个中学生去陕北公学。张秀熟也来找过沙汀，要他支持一个熟识的年青和尚去延安。沙汀尽可能给了他们帮助，请党组织开了去西安办事处的介绍信。

沙汀也动了去延安的念头。教书生活虽然安定，成都的人缘也还不错，但是他认为都不值得留恋。他朝思暮想的仍旧是写作生活。随着抗战的发展，他再次产生了到抗战前线生活和创作的打算。

正在这个时候，沙汀读到了周立波以战地记者身份写的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记》。这篇作品生动地反映了边区八路军英勇抗战的生活。他读来激动得坐卧不宁。不只是因为作品的内容，还由于是老朋友取得的成功。他眼前不断地浮现着周立波热情、质朴甚至有点天真的面影。这个当年上海辣斐德路同一里巷的朋友，而今战斗在烽火连天的前线，这怎能不给尚偏安于西南一隅的沙汀以激励和鼓舞。

沙汀征得黄玉颀的同意，开始作去延安的准备。他们请车耀先给仁寿县文公场小学当校长的好友写信，让黄敬之迁到那里教书，将杨礼托附给她。并且与协进中学校长商定，由陈翔鹤接替沙汀的教学工作。

陈翔鹤无意间将沙汀的秘密透露给了何其芳。何其芳正想去延安。他告诉了好友卞之琳，卞之琳也欣然愿往。两人便相约来到沙汀家里，提出同行的要求。这两个戴眼镜的书生，过去给沙汀的印象，言谈举止文质彬彬。这次却迥然不同，显得无比激动和热情。他们说他们已经在跑步、骑车，锻炼脚劲，以适应长途跋涉。沙汀当即表示愿意结伴而行。

沙汀请地下党负责组织工作的周凤平开好了介绍信。又请郑慕周利用旧关系，托吴克仇找李家钰将军所部47军在成都的留守司令部办理了护照，以由四川去晋南前线李家钰部队工作为掩护，对付沿途可能遇到的检查。

在上路前夕，沙汀还办了两件事。一是萧军夫妇从兰州到了成都，由他们为他们租佃了住房。原来在上海时，沙汀同萧军因两个口号之争有过隔阂，但沙汀仍热情地为他们在桂花巷46号租了两间厢房。萧军夫妇自是感激不尽，然而他们却始终不曾提到去过延安。一是介绍林海坡入党。沙汀开始只是把林海坡作为统战对象来联系，后来觉得他虽然上过旧军校，作过地方部队的旅长，但与一般旧式军官不同。他为人正直，追求进步，应该满足他的入党要求，他向程子健、邓均吾谈了此事，两人也极表赞同。于是便由邓均

吾和沙汀介绍林海坡入党。入党宣誓在沙汀家里举行，由周凤平主持宣誓仪式，并同新党员谈话。

二十七金秋在延安

1938年8月14日，成都的一个凉爽的早晨，沙汀、黄玉颀告别还未离开成都的阿礼和岳母，悄悄地穿过寂寞的街巷，到城北汽车站与早已等在那里的何其芳、卞之琳会合，搭上了川陕公路的汽车。

汽车颠簸在公路上。穿过平原，进入丘陵，于傍晚到达歇脚的第一站梓潼。此地原是沙汀少年时代向往的梓潼会的发源地，可是如今亲眼所见，如此之偏僻、荒凉。入夜，通城只有很少几盏煤气灯，照着犬、猫出没的狭窄的街巷。客栈、店堂如豆的油灯下，过瘾的烟客像鬼影一样晃晃动动。烟客与妓女讨价还价的声音不时传出，一方面是邪恶、淫荡，一方面是哀告、悲戚。几个正直的书生次日登程，都有发抒不完的感慨。21日晚到达川陕边境的宁强。这里虽属山区小镇，却岗哨密布。他们正要安寝，巡逻队咚咚敲门查房：你们是否是去延安“抗大”？面对突然的盘查，何其芳表现了少有的镇静。他用一种玩世不恭的口气回答：都长胡子了，还上什么“大”，读什么书？接着沙汀出示了护照，好不容易闯过了险关。24日，翻过巍巍秦岭，到达陕南重镇宝鸡。此地因系入川咽喉，陇海路又通到这里，呈现一派暴发的繁荣。破旧的石板路两旁耸立起一座座簇新的商场、饭店。他们滞留了一天，于25日搭上了去西安的火车。西安不愧是十二朝帝王古都。街道平坦宽阔，屋宇整齐雅致。他们在一家旅舍下榻，由沙汀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27日晚，一行人住进了办事处。次日下午，乘上一辆去延安的专车。

同车去延安的有30多人。大多是去进“抗大”的。有前线下来的军人，也有江苏、河南、陕西等地来的进步青年。司机旁边坐着一位抱孩子的妇女，一身军装，十分庄重。原来是著名的徐海东将军的夫人。读过《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的沙汀，很快联想到其中描绘的徐海东将军的形象，对将军夫人肃然起敬。同车的人都以同志相称。越唤越热乎，越唤越亲切。沙汀一行都感到格外兴奋。同志们谈笑，他们也谈笑。同志们唱歌，他们也跟着敞开歌喉。当然，嗓音最好的要推黄玉颀。她和同车的几个女同志一亮嗓子，就压倒了五花八门的合唱。

全国动刀兵，一齐去出征。

你看那大旗飘扬多威风——

这批人马哪里来？

西北陕甘宁。

……

从成都算起，经过18个日日夜夜，3000余里风雨兼程，8月31日到达延安。

暮霭开始降临，巍巍的宝塔山映衬在淡青的夜色里，幽幽的延河吟唱在路旁，城内外闪烁着点点灯火。空中回荡着悠扬的歌声。延安是那么静谧、庄严！

沙汀他们下榻在城里的西北旅舍。这是边区政府的招待所。一座有10多间客房的小院，一律整齐的土炕，小巧的方格窗棂。出院门就是街道，路面坑坑洼洼，店铺窄小简陋。

不两天，周扬、苏灵扬前来看望沙汀夫妇，同时认识了何其芳、卞之琳。周扬夫妇在沙汀、玉颀离上海不久就到了延安。周扬任边区教育厅长兼：“鲁艺”副院长。他谈笑风生，气色极好，一年前的那种忧郁的神色已无踪无影。这之后，边区“文协”负责人柯仲平也来了。他代表边区文艺界欢迎几位作家到延安。这位当年的狂飚诗人像他正在提倡的大众化诗风一样平易近人。接着，延安文艺界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迎式，热烈欢迎沙汀一行。

延安的干部大多穿灰色制服，虽然简朴，但很神气。沙汀他们的长衫、西装太不入时。在他们提出换装后，接待人员很快满足了要求。换上新装，都觉得十分体面。沙汀夫妇还不免互相赞赏一番。脱下的旧装放到哪里去？四个人灵机一动，拿到旧货市场便价处理，所得收入买了些枣糕、卤羊肉、蜜汁葫芦等风味食品，乐呵呵地品尝。

到延安几天后，经过周扬的联系，毛主席会见了他们。

毛主席住在城西的凤凰山下。一排三间窑洞。中间的窑洞开门，左右两间有青石镶垒的窗门。他们进门后，毛主席请他们到左边的屋里就坐。毛主席身穿蓝布制服，坐在窗前的书案边。书案由一张长方木板搭成，上面铺着一张桌布，放着砚台、毛笔、稿笺。案头有一具约半尺高的高尔基塑像。毛主席问过他们的情况后，用幽默、爽朗的语调同他们随意交谈。

他们向毛主席提出想写延安。毛主席笑着说：延安有什么可写的呢？延安有三座山。随即扳着指头：有西山，清凉山，宝塔山，……也有一点点可写的。他们接着向毛主席表示，想到前方去搜集材料写报告文学。毛主席说：文艺工作者应该到前方去。又鼓励他们说，上前方去，走路会成为一个困难，但是很快就会习惯。毛主席还说，他去武汉的时候，也是每天出门就坐车，后来上井冈山了，没有车子坐，只好两只脚走路了，很快就学会了走路，……毛主席的一番富有风趣的谈话，给了他们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以后不久，他们分配了工作。卞之琳如愿以偿，只在“文协”工作过一段短时间，便去了晋东南前线。黄玉颀被派到“抗大”女生队。沙汀和何其芳到“鲁艺”任教。周扬希望沙汀接任他兼任的文学系主任。沙汀觉得学识有限，无力承担，又担心从此难于有机会上前线，只答应代理一段时间。两人去敌后根据地的愿望暂时没有得到满足，但都服从了工作的需要。质朴、开朗的何其芳还相当愉快。他的情绪感染了沙汀。

“鲁艺”刚刚成立半年，当时叫鲁迅艺术学院，以后才改名鲁迅艺术学院。校址在延安城北门外西侧的一个山洼的半坡上。校舍较为分散，有两排20来孔旧窑洞和新挖的一些土窑，也有一些平房。山坡下有一片由旧文庙废墟平整出来的活动场地。学院的领导机构是由沙可夫、周扬、艾思奇、朱光、李伯钊、徐以新、吕骥、张庚组成的院务委员会，日常工作由沙可夫、吕骥、李华主持。学院成立了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刚刚增设了文学系。文学系的学制比其他系略长，入学后读书3个月，赴前线实习3个月，返回再学习3个月。文学系第一期的学员有50多人。沙汀、何其芳到学院那天，学员、教师正在一个席棚下的饭堂里吃晚饭。负责接待的教务处干部叫了一声：这两位大后方来的作家没有碗筷，请吃完饭的同志支援支援碗筷。随后就有人送来搪瓷碗和柳枝作的筷子。两位作家没有半点犹豫，高高兴兴地舀满小米饭蹲着吃了起来。当晚，他们在坡下的平房里住下，从此开始了“鲁艺”的生活。

沙汀、何其芳到文学系任教之前，消息就已传开，他们的名声更是早为

许多学员所知晓。学院馆藏的《法律外的航线》、《土饼》等小说集，已在学员中流传。所以文学系的师生对他们到来非常欢迎。大家在窑洞前的土坪举行了欢迎会。沙汀、何其芳先后讲了话。沙汀的讲话给学员们的印象是老练、冷静，何其芳则是热情、爽朗。

沙汀担任了两门课：名著选讲，写作实习。他选讲了爱伦堡的《西班牙通讯》、基希的《秘密的中国》、夏衍的《包身工》、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宋之的的《一九三八年春在太原》等中外报告文学名著。学院的教学方式与中学完全不同。主要是专题讲座，学员结合讨论、自习。到上课时间了，学员们带上折叠小凳在露天坝里坐好，听教员讲课。遇到下雨，就改在一间较宽敞的窑洞里。

金秋十月，陕北的秋收季节。党中央号召延安各级干部帮助群众秋收。沙汀和何其芳向院里的领导人建议组织学员参加生产劳动，同时进行写作实习。这个建议立即得到采纳。学院便以文学系一期的学员为主，整队到延安附近的二十里铺劳动和实习。他们分组分散住在农民家里。白天收割谷子，晚上采访写作。沙汀、何其芳向他们讲观察人物、搜集细节、记录素材的方法。晚上分头到他们的住地了解情况，选择了什么样的采访对象？作过什么样的观察记载？有时还找选择的对象面谈，增加一些直感，然后同学员一起研究应采取的观察角度。下乡劳动一个星期，学员们晒黑了脖子，熟悉了群众，写出了一批习作。这些习作汇集成了一本小册子：《秋收一周间》。这本书没有得到出版，可是几天的下乡实习使学员们受益匪浅。一些学员后来成为作家，每每忆起这段生活，都认为这时形成的观察生活、记录素材的方式几乎受用一生。

由于赴延安同行，沙汀对何其芳有了较多的了解。在“鲁艺”工作一个多月后，他就向吕骥反映应该吸收何其芳入党。吕骥说他们想到一块了。何其芳来“鲁艺”后表现很好，教职员、学员的印象很不错。于是，11月17日，何其芳经沙汀、王宗一介绍入党。

在“鲁艺”的这些日子里，沙汀常去边区教育厅周扬那里，叙旧情，研究怎样办好“鲁艺”文学系和组织创作力量反映边区生活。当然也没忘记一再表示在有机会时，让他到前线去。他也常去“抗大，看黄玉颀，同时看望任政治主任教员的老朋友任白戈。在那里，他认识了女作家陈学昭。陈学昭曾两次赴法留学，获得克莱蒙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她在《浅草》、《语丝》等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文笔优美的散文，翻译的屠格涅夫的作品也十分流畅。这位大姐待人热情、诚恳。沙汀每次告辞出门，她都要不容推辞地塞些零食。沙汀外出，除专门去看玉颀，一般都与何其芳同行。他们几乎形影不离。

沙汀仍念念不忘创作。有一次，他同何其芳到陕北公学去看望成仿吾，留在那里吃饭。席间，他谈起了前线，谈起了创作。成仿吾说，你想写前方将士？就写贺龙嘛！贺龙很值得写。又有一次，他在机关合作社里与李伯钊一起吃饭，遇见了关向应。李伯钊热情地作了介绍，然后对他说，你不是想写政委吗？这就是政委。于是，沙汀就有了到一二师，写贺龙、写关向应的打算。

事有凑巧，这时中共中央六中全会闭幕，贺龙应邀到“鲁艺”作报告。这位传说中的个性鲜明的将军活生生地站在了面前。他向师生们讲一二师在前线的战斗故事，沙汀却入神地注意他的风貌。

这个高矮适中的中年人，穿着一身整洁的普通军装。看来肉很多，但并不见得肥胖，只

是使人感到他非常结实。因为面部宽大，且又从不隐藏自己的愉快心情，他的眼睛似乎相当细小；一笑起来眼角上便布满了饱经风霜的皱纹，他的神态生动，但在开阔的嘴唇上却横着一撇浓黑的胡髭。当它们闭阖着的时候那便显示出一种不可摧毁的信心。

这是不带任何概念化色彩的真实的素描，是对贺龙的第一印象。此后，贺龙在“抗大”女生队也作过一次报告。毛主席还亲临听讲，不停地称赞讲得好。黄玉颀激动地将所见所闻告诉了沙汀。在这以后，沙汀又多次见到了贺龙。

11月，边区“文协”筹办《文艺战线》，特约沙汀为创刊号写点散文。沙汀满口答应，决定写一篇贺龙访问记。11月12日，他同贺龙约定访问时间。11月14日晨，如约和何其芳、陈荒煤一道去贺龙住处。他们按事前的分工，由何其芳、陈荒煤作记录，沙汀提问，并专记神态、动作和有特色的语言。事实上不用多问，贺龙就吧嗒吧嗒地抽着叶子烟，富有风趣地侃侃而谈。他谈他的身世，谈长征，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谈抗战的前途。这次访问用了两个小时，接着沙汀只用了一天一夜就写好约5000字的访问记。陈荒煤看后，连声称赞：可以得85分、90分。这就是《贺龙将军印象记》。

这些时候，按照“鲁艺”的教学计划，应该带学员上前线实习了。恰好贺龙也提出，欢迎文化人到前线工作。于是，经学院领导人安排，由沙汀、何其芳带领文学系第一期、音乐系、戏剧系、美术系第二期的部分学员，随贺龙去晋西北。文学系的学员9名：非垢、康濯、孔阙、浪淘、岳瑟、艾堤、黄海、王文秋、尤琪。其他系的学员12名。其中的莫耶后来成为有成就的女作家，成荫成为著名的电影艺术家。

沙汀把文学系的工作移交给了陈荒煤，辞别玉颀，跟随贺龙上前线。此时此刻，他的心情难以平静，他梦寐以求的日子快要到来。

延安的金秋是美好的，生活等各方面都已完全适应，然而这位作家绝不会停止他的追求，他在事业上是执著甚至执拗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对于战争最前线的憧憬。加之，虽然我有时候是拘谨的，顽固和保守的成分也并不少，而且，我的年龄，似乎也不是那种容易激动的年龄了，但在本质上，我却是易感的和激动的，并且对于一种新的念头总又非常执拗，一定要纠缠下去，弄出一个结果才甘心。这是往往很苦恼我的。

随后，由于种种偶然的机缘，我这多少带点浪漫成分的心愿，总算是实现了。

二十八被他的豪迈和热情所吸引

1938年11月19日，阳光照耀着山峦淡淡的积雪，沙汀和何其芳带领“鲁艺”的21名学员，随贺龙从延安乘车出发，奔赴晋西北。

到了米脂，中国古代美人貂蝉的降生地，部队分派了几十匹马，要他们改为骑马。沙汀在少年时代为舅父送情报和枪枝就学会了骑马，所以很快驾驭了战马。身材矮胖、眼睛近视、从未骑过马的何其芳不免出许多洋相。于是马就成了大家共同的话题。在驰骋者中，当然要数贺龙知识广博。他嘲笑市面上各种各样的马，绘声绘色，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夜宿吕家坪，他兴犹

沙汀：《贺龙将军印象记》。

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载《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

未尽，一往情深地讲起过去伴随过他的一匹大青马：“它还很有德义呢！

比如你前面有人这样躺起，它就停下来不走了。翻大雪山的时候；靠它救了多少命啊！至少五六十条。每一次总是好几个人，尾巴上、颈项上都拖得有，我自己还一手提一个，就这样往返了好几回。要不然死的人会更多些。山又高又大又冷，空气很稀薄，身体坏一点的，还没有喘过气，倒下去就死了。”大家在一阵沉默之后问这匹马在哪里呢？他说：“后来给猴子偷走了。”他见大家都惊奇地看着他，解释说：“这在西康是常有的事。天天看见藏族同胞骑马，军队骑马，猴子也懂得骑马了呀。”他的丰富的阅历，他那与四川话接近的语言，使沙汀感到佩服，感到亲切。

他们经过几天的行程，渡过黄河，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于11月23日下午到达了一二师司令部所在地岚县。1937年底，一二师挺进管涔地区，建立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3月，打垮了敌1万多人的进攻，收复了宁武、神池等7座县城。8月，又派出支队，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以后，一二师威镇晋西北广大地区，将指挥中心设在岚县，贺龙到司令部以后，便忙着召开师团干部会议，传达六中全会精神，进行挺进华北敌后的战斗部署。

沙汀、何其芳和学员们被安排在司令部附近的民房里。沙汀、何其芳受到优待，住进了一座地主大院。这是这个县城最富丽堂皇的住宅。檐牙涂了鲜艳的色彩，炕壁有封神榜故事的彩绘，窑顶上耸立着高高的女墙。他们休息了一会，贺龙抽空独自来了。他到窑顶上眺望了一阵，便到学员中间问寒问暖。他提议大家唱歌，学员们逼着他先唱。他略一沉吟，微笑着哼了两句山歌，带领大家满怀兴致地合唱。

在岚县住下以后，学员们分配到部队和地方基层工作。沙汀则忙着搜集创作材料。一有机会，他就去采访贺龙。他随军上前线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写一部贺龙的传记。在延安同贺龙几次接触，如同他后来回忆时所说，像铁未被磁石吸引一样，“被他的豪迈和热情吸引住了，”决心写出这个中国的“恰巴耶夫”。到了岚县，他便尽一切可能去了解贺龙的经历，多侧面地去认识这个光彩夺目的性格。贺龙热情地接谈。谈他的身世，谈他的家乡桑植强悍、好胜的民风，谈他在湘西游击战中英勇牺牲的大姐贺英，谈正在研究的对敌作战，……

可是，贺龙作为司令员，又肩负着率部挺进敌后的艰巨使命，哪有可能集中时间和精力详谈过去的一切，回答那些不厌其烦的提问。渐渐地，沙汀觉得自己的打算不符合实际。他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准备在岚县长时间住下去，先了解晋西北根据地的一般情况，然后深入到一个游击区，在一个连或者一个营生活半年。“与其广阔而浮面，不如狭小而深入”，相信只要在一个小的范围内深一些、久一些，一定能写出一点像样的小说。在半个月时间里，他访问了许多部队干部、地方干部和游击队干部，用“电报式”的笔记记录了数万字的材料。

12月21日，一二师主力部队开赴前线的前一天，沙汀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是随军去华北呢，还是继续留在晋西北？去，担心贺龙没时间谈话，创作计划会落空；留下来，又担心将来会因为没有上前线而遗憾。他向何其

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载《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

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载《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

芳谈了他的心情。志在写诗而又负有带领学员实习任务的何其芳，自然是要去华北的。他分析了沙汀的实际情况，主张沙汀还是留下来深入生活的好。次日上午，在躲过一阵空袭之后，沙汀就去向贺龙陈述他的想法。谁知他刚刚提了个头，就被贺龙一阵爽朗的笑声打断。贺龙说：到铁路那边去吧，那里会有更多的创作材料。又说：需要找我谈也是可以的。到那边住定了，每个星期我们就谈它个两三次吧！他斩钉截铁地说，马都给你准备好了，你还再说什么！犹豫不决的沙汀，遇到了果断、爽快的贺龙将军，其结果可想而知。沙汀只得低下了头。他回到住地，对何其芳说，又得改变自己的计划了。何其芳沉思着说：是倒是啊，生活每每并不按照预定的计划来进行。

12月22日傍晚，岚县漫天大雪。贺龙率一二师七一六团将士踏上了征途。“鲁艺”的学员除留下5人，其他16人在沙汀、何其芳的带领下随军前进。这支劲旅，全副伪装，连牲口都披上麻袋或高粱秸制作的披毡，神奇地行进在茫茫的雪野中。

到第一个宿营地正是中午，雪停了，恍恍惚惚的太阳，照着冰封的汾河。河对岸有一片片白杨树丛，树丛南面山坡上有几堵红墙。更上面有郁郁葱葱的苍松翠柏。看见这景色，使沙汀想起家乡山区的自然风光。沙汀一行人进城后，兴致勃勃地随副官去看住房。不料这阎老西统治区的群众觉悟很低，房主人当面给他们吃了闭门羹。这个自称60多岁、实际不过40多点的麻脸汉子一个劲嚷叫，房子是他出钱租的，他还有个60岁的老婆。然后呼地一声把门关了，神经质他说：“想跟我一炕睡——那你们才好干呀！”这一伙文化人自然快快不乐。其实，据次日晚卫生部长说，他头一天就是在那个所谓60多岁的老头子家里住下的。他并没有什么老婆。

大部队继续前进。12月26日深夜，在游击队的掩护下穿过距敌人据点只有5里的同蒲路。12月29日，到牛郎院，渡过滹沱河，进入河北省地界。这里枣树渐渐多了，还有花椒、核桃树。河两岸是大山。河宽水急，中流不冻，不时有浮冰顺流而下。太阳映照着滚滚的河水，令人心胸开阔。沙汀自得自到陕北以后，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色。

这里已属晋察冀边区，有自卫队、儿童团。沙汀很有兴趣地找了几个儿童团的孩子谈话。孩子们踊跃参加军训。他们都懂得自己的职责：查汉奸，防日寇。这几天，沙汀有机会两次与萧克将军交谈。萧克时年30岁。眉眼粗黑，嘴唇轮廓显得很倔强。他谈话很理智、很细心。谈到重要问题时，照例想一句说一句，有时还停顿很久，自己默念一遍，这才出口。他过去很喜欢喝酒，十六七岁时常常“喝得颠颠倒倒”。后来在一次患疟疾时，医生劝他戒酒。他“说不喝就不喝了”。他谈中国的革命，各阶层成员的变化，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知识之广博使沙汀感到钦佩。

沙汀仍是一有机会就去采访贺龙。开初，贺龙还尽量挤时间同他谈话。他谈边区，谈他所知道的朱德、彭真、聂荣臻的情况。后来忙于指挥行军、作战，就常常把沙汀的事忘了。他身边别的领导人也席不暇暖，没有更多的时间顾及沙汀、何其芳的创作。他们终日只是杂乱无章地行军、睡觉。不了解战局，又没有具体的工作，沙汀忍不住幽默地对何其芳说：“我们好像一二师喂的两匹牲口。”两人实在闲着无事，何其芳就一一抄录旧作，沙汀便拿他的诗来吟咏，或者去啃高尔基、司汤达的大部头著作。新年前夕，两人谈彼此的思想、性格、家境直至深夜。过完元旦节，沙汀在日记中写的是：“感到怅惘：又一年过去”。后来，按照贺龙的意见，何其芳带学员到政治

部工作，沙汀到司令部，这才不再被当做“客人”，沙汀同贺龙的交谈才又多起来。不过，他已调整了写作计划，决定先写一部贺龙在前线的报告文学。不只是了解贺龙的经历，还注意贺龙的日常生活，贺龙的言行。

几天以后，大部队进入平山，到了灵寿。一路所见典型的华北平原风光：聚居的村庄，谷秸的小棚，茂盛的白杨林。1月12日宿营七祖院村，沙汀和何其芳很有兴致地到村外的白杨林中走了很久。丛林旁有大明川，河面很宽，水很浅。落日的余晖炫人眼目，不远的峰峦呈浅紫色。何其芳诗兴大发，他说他很爱北京的夏天，那淡淡的槐花，那不停的蝉声，那金环一般的上弦月，那飘忽的萤火虫。沙汀却说，他怀念的仍旧是四川故乡的社会情态，没有多少诗意。过了一天，到了行唐地界，重又进入山区，觉得像压在锅底似的。次日晚，通过敌人重兵把守的平汉线。当敌人的探照灯猛然射来，沙汀、何其芳于仓惶中掉了队。着急了好一阵，两人才发现了部队。原来将士们仍伏在路旁的一带高坎下面，贺龙也蹲在那里。部队重又集合行进时，沙汀一再丢失了行李，何其芳掉了马鞍。到了宿营地，一个个疲惫不堪。接着几天的行军，不断躲避敌机的骚扰和袭击。这些时日，沙汀的心情正如1月18日在深泽的一个小村柳树下记的日记所说：“战斗的恐怖把自己简单化了，对于生命和死亡特别敏感。所以尽管心情显得复杂，其实也不过在安全问题上绕着圈子罢了。同战士们对照起来，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行军的间隙，沙汀也不免思念起延安的妻子和四川的孩子。有时念之甚切，心中升起淡淡的惆怅。掏出玉颀和礼儿的照片，对着那张聪慧、娇气的脸和那张俊秀、稚气的脸阵阵出神。旧历年的前夕，从延安传来了“抗大”女生队已经解散的消息。女生队解散以后，玉颀到哪里去了呢？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猜测。过了几天，贺炳炎从延安来到司令部，谈起了延安的空袭，谈起了女生队的解散。这个独臂将军富有风趣他说，敌人的炸弹像长了眼睛，专门炸女生，炸女生又专门炸结过婚的。这当然是一种玩笑，是有意取笑沙汀。敏感的沙汀却又不免引起一番忧虑。他犹豫再三，还是写了几句电文，请贺龙交电务员拍发到延安。当天夜里，他几乎通宵不眠。第二天，有学员接到“鲁艺”同学从延安的来信，其中捎上了几句问候沙汀的话，提到“想来黄同志已经告诉你了”。沙汀据此肯定玉颀一定安然无恙，悬起的心才落了地。这天晚上，他一口气补记了贺龙的一次约3000字的谈话。1月26日，贺龙的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行程，终于到了冀中军区司令部附近的惠伯口。次日，在不远的李村，两个部队的首脑机关举行了联欢大会。沙汀去时，贺龙向他介绍了军区的几位负责人。他见到了赫赫有名的吕正操将军，一个身材瘦长的军人。这以后，一二师的七一六团便与冀中军区、八路军三纵汇合，战斗在与日寇重兵盘踞的平、津接近的冀中前线，并且很快传来一次次捷报。2月初，一二师七一五团也奉命冲过平汉路到了冀中，与冀南的一二九师会师，将一把把尖刀插进敌人的心脏。

还在行军途中，“鲁艺”的有些学员思想情绪就有些波动。到达冀中后，这些学员更是经常发牢骚。他们抱怨随军生活没有条件创作。一旦要求下连队没得到满足，就赌气不去接近部队干部，不去访问地方干部和群众。直率的贺龙批评他们，为什么一再叫没有材料，应该搜集材料却又并不热心？他还以高尔基为例，强调要解决好态度问题。沙汀和何其芳也多次同学员们谈心，向他们做思想工作。可是他们却一心指望早日返回延安，还说院领导派他们跟着部队行军是不负责任。学员之间也常常闹不团结发生口角。到卫庄

后，沙汀找他们分别谈话。有一个学员不仅不听意见，反而怨言百出。沙汀不免急躁，严厉批评他：你不要口太敞，不要太任性，不要忘记现在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这个学员不服，和沙汀争吵了一阵。这件事使师的领导人深为不安。甘泗琪了解了情况以后，委婉地批评了沙汀，要他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沙汀克服了急躁情绪，主动去学员住处，当面表示歉意，详询了生活和创作的苦衷，帮助修订了创作计划。沙汀曾反躬自省：自己的心情不也有矛盾吗，不也曾托人捎信给黄玉颀，说要争取早日回延安吗？

1939年4月，沙汀、何其芳和“鲁艺”学员随军实习行将结束。离别前的几天里，师部领导机关的同志都来看望他们。关向应同沙汀作了长谈。夜已深了，贺龙在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以后，也到沙汀的住房里畅叙别情。他把滑石片战斗中缴获的一支钢笔送给沙汀，作为珍贵的纪念。他希望沙汀回延安把家里的事安排好再来冀中。他爽朗他说：“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搞它个几年了。一个三十五、六岁的人，年龄并不大，要干的事情还多啊！你看，我这个人除了打仗，就什么事都不管，……”他走到门口，又回转身来，深情他说：“你一定再来，老沙！我们将来还要通到关外去呢！”第二天黄昏时分，沙汀一行即将动身，他赶到司令部去同贺龙辞行。贺龙正手持红蓝铅笔，面对一幅军事地图，向参谋们指指点点他说着。他看见了沙汀，立即走到门边，热情地伸出那粗大有力的手。一面紧握着沙汀的手，一面朗声说：“再见吧，我不送你了！”接着又叮嘱：“路上当心些呀，老沙！”

沙汀和何其芳带领学员们踏上了归途。他们与冀中军区政治部的一批去延安受训的人员同行。这支队伍一共50余人，由三纵队的一位知识分子干部李部长和一位骁勇善战的军事干部曹大队长率领的武装人员专门护送。

他们的这次西归历时两个多月。沿途的形势与去冀中时已经不同，到处是严密的封锁，到处是残酷的扫荡，不得不避开敌人的锋芒，与敌人兜着圈子周旋。仅仅过平汉路就用了一个多星期时间，几次避免与敌人的正面冲突。所以后来沙汀以这次行程为主要生活依据写成中篇小说时，题名为《闯关》，又名《奇异的旅程》。

一道道险关终于闯过来了，沙汀回到了延安，回到了妻子黄玉颀身边。玉颀也不免激动地记下了自己的心声：要到来的幸福终于到来了。其时，黄玉颀早已在任白戈的关照下，由“抗大”女生队转到了“鲁艺”音乐系。她在“鲁艺”得到了在院里做行政工作的苏灵扬很好的照顾。

沙汀仍在“鲁艺”工作。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的队伍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延安已被炸得满目坑洼。边区军民正紧急动员，准备迎击敌人的进犯。“鲁艺”和延安许多单位一样，进入战备状态。7月中旬，“鲁艺”的一部分师生还奉命由沙可夫率领，与“抗大”、“陕公”等单位部分人员组成八路军第五纵队开赴前线。吕骥、崔嵬、秦兆阳等许多同志随队出征。出发的当天，留校的师生列队到清凉山前的延河边欢送。整齐的队伍唱起高昂的校歌：“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踏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其情景非常壮观。8月初，“鲁艺”从北门外迁到了东郊十余里地的桥儿沟新址。这里位于宝塔山和清凉山之间、延河之滨。过去是天主教的教区，有一座延安最辉煌的哥特式风格的天主教堂，有一排排整齐的窑洞。沙汀和黄玉颀随校搬进了东山坡的教员居住区。他们与洗星海近邻，经常可以听到这位杰出的音乐家指挥排练的《黄河大合唱》的歌声。

沙汀集中精力在创作上。他在随军生活中，勤奋地记下了自己的观察和

感受，一共记了三本日记、一本贺龙言行录和一本杂记，共 20 多万字。有些日记、笔记也就是散文特写。他根据丰富的材料写成了长篇报告文学《随军散记》。作品的素材都来自他与贺龙一起生活，对贺龙访问、观察所作的记录，按报告文学的要求作了必要的艺术加工。

这部作品选择了独特的视角。它并不正面表现贺龙的丰功伟绩和他指挥的有声有色的战役，而是写他在日常生活和战争环境中的思想、作风和品格。写他那身披羊皮大氅驰骋的英姿，他遇到敌情时的镇定自若，他谈社会、人生、婚姻、牲口具有的真知灼见、博闻多识和幽默情趣，他在将领相处中的真诚、坦率和富有风趣，他与老乡们在一起的亲密无间，他同纯朴的孩子们接触时浓厚的人情味，他一有闲暇就不忘记打篮球的个人爱好，等等。作品正是寓崇高于平凡，以亲切的散记的笔调描绘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八路军高级将领的形象，一个真实、崇高而又富有美感意义的英雄性格。像这样来塑造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革命英雄的，在当时可以说是少有的、别开生面的。

这部作品采用了作家主观参与的叙述方式。它以“我”为总的叙述人，通过我的观感来记叙贺龙。尽管作家在创作时曾“极力避免自己及别人置身其间”，但仍抑止不住热情外溢，使作品

带有主观感情色彩。这不仅在有“我”介入时是如此，无“我”参与时也往往是这样。例如这样一段不带任何议论的描写：

他把帽子戴得略高一点，大衣的前襟飘扬着，而他骑在马路上的宽大结实的身躯，就像岩石一样坚定。他的脸色比平日更红润，胡髭更黑，脸上的轮廓也比平日更显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似乎更加认识了他那性格的阔大不羁。他嚷叫着，带着一种感情洋溢的嘻笑，他的身影逐渐在北方的尘雾中隐没了。

这里的刻画带着倾向，叙述饱含着感情，并且还通过“我”直抒胸臆。采用这样的叙述方式，在沙汀过去的创作中是少有的。一些有眼力的评论家把这种特色标举为一种有代表性的风格。如以群就曾在一篇评述性的文章中说“以作者所接触的事象为范围，由作者以自己底面貌出现，描写那些事象，同时宣告自己对那些事象的感情和意见——爱或憎，喜或恨，冷淡或热烈，同情或反对。这种风格底特点在于由作者底行动贯穿所有的素材，组织成一篇完整的作品，而作者本身明白地在作品中露面，直接地表现着他对于所接触的事象（作品底主体）的感情和意见。”

这部作品还体现了作家作为小说家的特长，在深入开掘人物内心世界上具有特色。它无论写贺龙与领袖、将领的深情厚谊，还是写他与战士、老乡的鱼水情深，都没有停留在表层的叙述，而是深掘了他内在的美。如它写贺龙与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不是写他如何在毛泽东同志指引下转战，而是写他对毛泽东同志的深情，从而揭示他诚挚、质朴的内心世界。有一次，他谈到毛泽东同志有一匹好马，不幸在行军中死了，毛泽东同志还亲自去看过，叫人挖一个坑埋了，他说：“他俩个像满有感情呢！”这里不仅展现了他眼里的毛泽东，而且从他的感慨中展示他的精神和情趣。又如它写贺龙对受伤战士的手足之情，不只是表现他对战士的爱心，而且深入发掘了他深厚的人情味。其中有一段极为精彩的描写：那两天，这个爽朗的人忽然一反常态，沉默懒散，食欲不振。他不忍听伤员们在锯腿抉择中的哭叫，不忍见锯手截腿

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载《抗战文艺》第 7 卷第 1 期。

以群，《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载 1941 年 7 月 25 日《中苏文化》第 9 卷第

那种惨烈的场面。可是他却在听了和看了之后忍不住叫沙汀、何其芳也去看看。

他盘了一条腿坐在炕上，一只手斜撑着身子，右手大拇指的指甲在芦苇上随意划着，嘴里低声哼着一种模糊不明的曲调，十分明显，他很不快活，正在尽量控制自己的感情。

但他终于慢慢昂起头来，苦笑着叹息道：

“昨晚上一整夜没有合眼睛啊。”

我们却沉默着不做声。

“翻来覆去总睡不好！”他接着说，口气听来手叫人有些难受，“早上一早，我就到卫生处去了。脚呀，手呀，一大堆！”

同志！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肉，共产党人的血呀。”

这里侧重写贺龙的情感状态和思想境界。所揭示的将军原来是一个对同志情感细腻、人情味很重的军人。而这也正是他与战士情同手足的内在原因。值得一提的是，何其芳在《记贺龙将军》中也写过贺龙的这段生活。作为诗人，何其芳在记叙了贺龙与关向应的关于伤员和牺牲战士的谈话后，便热情地抒发自己的感情，感到“又惭愧又负担着一种责任”，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脆弱性”深深抱愧。同样一段生活却各有不同的审美情趣。一个重在精神内震，一个重在感情释放。沙汀笔下的贺龙是一个内心世界丰富的将军。

与30年代以来不少报告文学“欧化”的表现方式不同，这部作品更多地借鉴了传统的白描。它记叙亲切自然，绝无浮夸、卖弄之笔；探索人物的精神风貌情真意切，力避粉饰和矫情；使用语言质朴简洁，不事铺陈，不求雕琢，往往用极省俭的笔墨，便将人物的性格生动地描绘出来。如写贺龙所部的一次宿营，一个副官处的人报告，房子大都已经找好，只有一家地主死也不肯让出空屋子来驻扎师部，贺龙说了一句气话，——

这自然是气愤话，因为板着脸沉默一会，他又用显然含着极大忍耐的口气这样说了：

“搅他妈的鬼啊，——还站着做什么？”

把铺打开，大家挤着睡呀！”

“这个炕太小了，”警卫员担心道，“看睡得上五个人么。”

“炕小就挤紧些，总不能搁两个在外面露起呀？！”

他接着又吩咐警卫员，叫把他自己的铺位开在接近墙壁的地方，说是人多了睡觉，躺在中间最不舒服。

“可是老甘无论如何也不要挨着我哇，他身上有虱子”。

“造谣！我会有虱子吗？你看：清洁、整齐、严肃！”

贺龙同志忍俊不禁地笑了，一面进行着反驳：

“一定有！你不要骗我！”

这段描写富有生活情趣，文笔简洁生动，从细微之处表现了贺龙诚挚、乐观、风趣、阔大不羁的性格和将领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

《随军散记》是现代文学史上成功地表现我军高级将领的长篇报告文学。它不仅在抗战初期方兴未艾的报告文学中异峰突起，而且在这以前的整个报告文学发展史上，也占有显著地位。《随军散记》出色地赞颂了新世界，真实地刻画了一个光彩夺目的英雄性格，拓展了报告文学的新领域。

《随军散记》完成于10月下旬。它的部分章节曾在《文艺战线》、《星岛日报》连载。全书后来由知识出版社出版，书名为《随军散记——我所见之一个民族战士的素描——他在前线的生活，他的经历和他的故事》。1958

年修改再版，改名为《记贺龙》。在这部作品创作之前，沙汀还写了短篇报告《一个游击队员的故事》，应《文艺战线》之约，写了短篇小说《联保主任的消遣》。这篇小说写于晋西北军旅中，所反映的却是沙汀故乡的生活。这是他早已构思成熟，于此时形之于书的。它以川西北乡镇为背景，通过联保主任彭痰在玩乐的消遣生活中处理公事的几个片断，刻画和嘲讽了这类抗战中的蠹虫的丑恶面目。

在《随军散记》完卷的那些时日，黄玉颀一再向沙汀提出了回四川的要求。她到陕北以后就因不服水土，常常生病。此时因妊娠反应，更感到身体不适。加之思念蜀中的幼儿和老母，经常心绪不宁。沙汀曾同她达成协议，待趁热打铁将书写完就申请回川。现在书稿已经完成，就很难找到理由来支吾。王震将军率三五九旅参加陕甘宁保卫战返回延安。应邀到“鲁艺”作报告，听沙汀说玉颀生病，还去家中亲切慰问。这以后，玉颀仍没有回心转意。

没有多久，沙汀也动了回川工作的念头。这一方面是体贴娇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将来的创作。从冀中回延安，他写贺龙的报告文学倒是一鼓作气，极为顺利。他对贺龙感情深、理解深。贺龙的湖南话与四川话比较接近，对他表现这位领袖有利。他翻阅那一册册日记、笔记，觉得还可以再写若干篇散文和短篇报告。可是要根据这些素材构思小说，却感到困难。他对所在的北方各阶层人的心理素质、风土人情、语言方式都不十分熟悉。凭着访问所得也可以写一点小说，但要写出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优秀小说却很不容易。从创作的长远打算出发，还是回四川的好。

正在这些时候，沙汀从已在“鲁艺”主持工作并兼任《文艺战线》主编周扬那里获悉，组织上正准备派人到重庆的南方局做文化界人士的工作，把《文艺战线》也转到那里去出版。沙汀觉得他恰好适合做这项工作。他在“左联”认识的许多朋友都于抗战爆发后到了重庆，他可以利用旧关系开展工作。他在《文艺战线》创刊时就被确定为编委，为办好这个刊物已做了一些工作。他向周扬提出，让他到重庆去。

周扬自然知道，沙汀要求去重庆，多半是体贴黄玉颀。他主张派人将沙汀的孩子和岳母从四川接到边区。张闻天从周扬那里知道沙汀的情况后，也找沙汀谈话，建议把孩子和岳母托付《新华日报》社到延安的人带来。沙汀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尝试去做玉颀的工作。但他左说右说，均无成效。他除了创作，家里的许多事都是迁就老婆的。周扬见再也挽留不住，同时也觉得沙汀去重庆工作也是最适当的人选，批准了他的要求。

11月，组织上正式决定沙汀去重庆。沙汀夫妇已在收拾行装，可是他仍然觉得不应该离开延安。然而他始终没有勇气去说服玉颀。

第六章在山城：积蓄着 壮丽喷发的力量 (1939年冬——1940年冬)

沙汀从延安到四川重庆，担任文化界人士的联络工作。由于前一段生活开阔了政治视野，由于大后方环境的特殊感受，由于文化人之间的思想交流，也由于1938年以来“暴露与讽刺”问题讨论的推动，他在熟悉的人文背景下深入总结了抗战三年来的创作经验，深化了对现实主义的认识。他认为现实主义应当成为立足于中国现实情况的一种适当的方针，在中国社会很不平衡的条件下，现实主义应在总趋向一致的基础上得到多方面的发展，创作方法也应因描写的对象而异，因不同的作家有所不同，它是否恰当应看具体的作品和具体的民族需要，而不应固执一种一定的尺度。他克服了《防空》发表以后对暴露黑暗、讽刺丑恶曾产生的“怀疑”和“动摇”，决心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乡土讽刺艺术。

沙汀说：“一个作者倘使没有一种对于现实和创作的一定的理解，而且对这些理解发生自信，他是无法写下去的”。沙汀对现实的认识是清醒的。他联系自己的创作实践总结出的现实主义理论认识也是切实的正确的。他不仅把现实主义看作一种创作方法，而且看作一种创作精神、一种自觉的文学思潮，并作了深刻的理解。他对发展自己的现实主义满怀着自信。

沙汀心底里的岩浆在涌动，即将开始壮丽的喷发。

二十九到曾家岩50号报到

1939年立冬过后，延安下过初雪，延河开始结冰。沙汀穿一件厚厚的羊皮军大衣，带着被卷和行李，偕同黄玉颀到十里铺上了去西安的一辆军用卡车。一同乘车的有10多人，也都是去外地工作的干部。大家把被卷当做座椅，用毛巾把头颈遮得严严实实。

汽车缓缓开动了。延安，告别了！宝塔山，告别了！车上的人无不回首延安，回首宝塔山，投去依恋的一瞥。

汽车驰上大道，人们开始交谈。有一位同志传出一个消息：国际友人白求恩大夫，在给伤员作手术时受了感染，不幸牺牲。猛然闻听这一噩耗，沙汀顿时觉得两眼一片模糊。去年同白求恩大夫见面的情景，浮现在他的眼前。那八路军装束的瘦瘦的身材，那扬起锅铲、自称是医生又是厨师时的音容笑貌，闪动在他的脑海里，……

汽车在高原上奔驰，扬起一阵阵黄尘。迎面间或可见三三两两男女青年挎包带伞，艰难地跋涉。有时也碰见一辆辆汽车，有的悄声无息地疾驰而过，有的一车欢笑一车歌，飞扬起“战斗在太行山上”激越的旋律。歌声也激发了沙汀一车人的热情，特别是几位去八路军总部工作的年青人，他们也引吭高唱起来。沙汀也激动地随声附和着。他在冀中还登台参加过大合唱呢！

汽车在洛川停了一夜，随后又在三原郊外八路军兵站停了一夜。在三原的这天晚上，沙汀认识了南汉宸。南汉宸和夫人一直坐在驾驶室内。沙汀早闻他曾任杨虎城将军的秘书长，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起过重要作用。南

汉宸告诉沙汀，他是到西安为延安的一些文化单位募捐。他还说，大前天酝酿成立新宪政促进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时，还有人提议沙汀为理事，后来有人说此人即将去重庆工作，才只得作罢。

经过两天多行程，到达了西安。沙汀和玉颀随南汉宸夫妇去八路军办事处。他将介绍信交办事处的李华。李华于三个多月前从“鲁艺”调来办事处工作。他立即带领沙汀去见林伯渠。林老身材高大，气宇轩昂，但是鬓发已经花白，显出种种老态。他向沙汀问好，嘱咐李华多多照顾。

沙汀和黄玉颀在办事处住下。当晚他们应南汉宸夫妇之邀，上街去一家浴池舒舒服服地洗了澡。

第二天，沙汀遇见了“鲁艺”的王震之。他是“鲁艺”戏剧系实验剧团的团长。既懂话剧又懂平戏，能编能演，会拉胡琴会打小鼓。创作的《八百壮士》、《人命贩子》上演后曾受到好评。他率领剧团随一个炮团赴晋东南前线演出，辗转到了西安。他热情地邀请沙汀进饭馆，叫了一份酱肉，一碟皮蛋，二两白酒。在延安的干部每月只有几元钱津贴的年代，可以说是盛情招待。

在西安的三天时间里，沙汀托办事处办了一张假护照，证明是去李家钰部队探亲后返川，将笔记本、资料交给办事处，由军车捎去重庆；把军用大衣改制成普通皮袍；领了一笔足够的路费；在闲暇时，还在办事处院内看了实验剧团的一次演出。

第三天夜里，西安街头静静悄悄，路灯暗淡朦胧。沙汀和黄玉颀随办事处的车副官，来到七贤庄附近的一个僻静处，登上了早已为他们备好的两辆人力车。两夫妇一前一后，悄然奔向火车站。

火车于深夜到达宝鸡。这里正壅塞着调往陕北的马步芳、胡宗南的队伍，也还有南来北往的客商。昏暗的灯光里，到处是搭起的席棚。沙汀和玉颀找到一家席棚店过夜，于次晨按车副官早已作好的安排，持介绍信到“工合”办事处取得联系，搭上了入川的一辆货车。

车过秦岭，进入川北，由高山渐次到丘陵、平原。经过罗江时，沙汀和玉颀在那里停留了一夜。他们按照离开延安前夕何其芳的付托会见了李广田，并看望了旧友陈翔鹤。李广田是当年年初随山东内迁的国立第六中学到罗江的。陈翔鹤在成都协进中学任教半年，就应聘来这里。两位早年新文学社团的成员在小县的师生中声望很高。沙汀同他们几乎谈了一个通宵，向他们介绍了延安的情况。他希望家室拖累不大的李广田去“鲁艺”教书。至于陈翔鹤，他的那位与他的脸一样圆、一样戴眼镜的妻子，已经抱着一个胖胖的孩子了。

沙汀夫妇顺利地到达成都。当晚他们在一家旅店住下。沙汀去祠堂街看望了车耀先，托他与《新华日报》成都办事处联系去重庆的货车。翌晨，两夫妇搭乘了去仁寿县的班车。他们到了文公场文华中学，见到了朝夕思念的杨礼和黄敬之。其时，孩子和外祖母的身体均好。一直愁眉不展的玉颀，也就眉开眼笑了。玉颀留在了学校，沙汀停留了两天，只身返回成都。

沙汀在“努力餐”对面的一家旅店住下，等候便车去重庆。他应车耀先的邀请，参加了为他举行的一次座谈会。地点就在“努力餐”餐馆内。参加的有车耀先、张秀熟、马哲民、熊子骏、李嘉仲、黄宪章几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已经知道马步芳、胡宗南的部队进犯边区，夺取了三个城池，十分担心延安的安危。沙汀恰好听到王震将军作的形势报告，就把其中的一

些内容和自己了解的情况，向大家作了介绍。他用大量事实说明延安军民斗志昂扬，充满必胜的信心。容易激动的沙汀，讲得来慷慨激昂。座谈会后接着聚餐。由于车耀先的吩咐，接连上了“素烧什锦”等几道“努力餐”的拿手好菜。一年多没有吃四川的菜肴，加之一帆风顺，心情极好，沙汀胃口大开，吃了不少。

座谈会后，张秀熟还单独约沙汀到半节巷家里叙谈。这位师长是个精明、细致的人，他向沙汀详询了边区的许多情况，我们的力量，敌人的部署，究竟投入了多少兵力，等等。沙汀就所见所闻，又一一详述一番。他特别讲了些三五九旅的战斗事迹，洗天河战斗，滑口片战斗，满足了张秀熟的要求。

沙汀特地去看望了萧军。从住地到萧军所住的桂花巷，经过长顺下街拐弯就到了。他同萧军谈了一阵，又一起到一家小酒店喝了一台成都特有的“碗碗酒”。

沙汀还看望了别的一些党内的同志，看望了“文协”分会的一些朋友。从早到晚，几乎没有歇息。车耀先通知他，已有车去重庆了，才离开成都。

他搭乘的是新华日报社的运纸车。车上满载着乐山嘉乐纸厂出品的土黄色的“嘉乐纸”。同车的只有几个人，其中有罗髻渔一家大小。罗髻渔在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工作，对重庆文化界的情况较为熟悉。他向沙汀谈到郭沫若、阳翰笙、杨骚、欧阳山、罗烽、宋之的等人的近况，告诉了“文协”总会的详细地址。他们一路闲聊，不知不觉天色向晚，到了内江，当晚在内江歇店。内江因盛产蔗糖而被誉为甜城，可是却给人一种“苦味”。街头流落着许多乞丐，向行人伸出一支支拨火棍一般的手。旅店的茶房不时前来诡秘地问：要不要一个陪客？10多天前才离开延安的沙汀，觉得似乎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到达重庆，沙汀就去临江门横街33号“文协”总会。进门见到的第一个熟人就是宋之的。沙汀在上海任《光明》编委时，曾编发过他的作品，看过他的多幕剧《武则天》，一起在驷马路长兴绍兴酒店喝过两次花雕。宋之的比沙汀年轻10来岁，身材魁梧，性情豪爽。同沙汀见面后，热情地拉沙汀到南岸铜元局华裕农场住下。华裕农场是胡子昂先生创办的，房舍宽敞，风景幽美，有种植的四鲜瓜果，养殖的家禽牲畜。宋之的到重庆后，一直同夫人王莘住在这里。罗烽、白朗夫妇等也在此住家。沙汀见到他们，旧友重逢，绘声绘色地讲了一番延安和冀中。他们都笑了起来：“啊呀，你一来就向我们做宣传工作。”

次日一早，沙汀就去看望郭沫若。郭沫若于一年前从桂林到重庆，主持国民政府军委第三厅的工作。他家就住在张家花园巷道尽头的一个独院里。闻听有人进来，忙起身探看是谁。一见是沙汀，立即相邀入室。沙汀向他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和他关心的一些熟人的情况，谈了此次到重庆的任务。接着就向他打听重庆的政治形势。郭沫若扼要讲了当时的局势，告诉沙汀说，这个所谓“陪都”，表面上市井繁华，歌舞升平，只有红球升起，警笛长鸣，才有些战时的气氛，但实际上白色恐怖相当严重，街头上特务横行，告密、绑架、凶杀时有发生。他说：“连我的信，他们都要偷着检查啊！”他一再嘱咐沙汀要小心谨慎。他们也互相问了一些生活上的情形。沙汀早听说郭沫若已与于立群结婚，却没想到汉英已将满周岁，不免惊叹道：“你都有这么大的孩子了！”郭沫若很有风趣地贴着沙汀的耳朵说：“啊唷，上个月还扯过一回地皮风啊！”在谈话间，于立群已把早饭摆上桌。沙汀就留下吃了两

碗稀饭。他从郭沫若家出来，又顺路去看望阳翰笙。阳翰笙住在观音岩上梯坎不远的一座楼房的底楼，转眼功夫就到了。但由于他是和另两人挤在一个房间里，不便谈话，只得在寒暄一阵之后，告辞出门。

接着，沙汀去看望了章汉夫。他同章汉夫在上海见过面，但并不熟。是因为周扬与章汉夫有密切联系，嘱咐他到重庆以后去看看他。当时章汉夫是《新华日报》的负责人，他家住在报社所在的化龙桥附近。这是山沟里的一座宽敞的院落，院坝的一角有几株引人注目的芭蕉。章汉夫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言谈举止十分谨慎。加以他正犯哮喘，呼吸、说话有些困难，更多的是听沙汀谈话，自己很少开口。沙汀问到重庆的政治形势，他喘着气说：“我也又聋又瞎，知道得不多啊！”但他反复提醒沙汀，到南方局接组织关系时要多加小心，警惕特务盯梢，显得十分诚恳。他还陪同沙汀到化龙桥街上吃了午饭。

随后，沙汀就去报到和转组织关系。他先去红岩村 13 号八路军办事处。这是重庆举城瞩目的去处，坐落在嘉陵江边红岩嘴的农场内。这个农场是董必武的学生饶国模于 1935 年创办的。一年前八路军办事处从武汉迁来重庆时得到她的赞助，将大本营设在此地。沙汀经过化龙桥，爬上红岩嘴，机警地从一处宪兵营房前走过，漫步在崎岖的山道上。这一路景色极佳。有丛丛翠竹，密密藤萝，数不清的李、桃、杏、柠檬、苹果等果树。虽然已是隆冬，但仍透出绿意。他走不多久，就看见路口的那株黄桷树。它裸露枝柯，在寒风中亭亭挺立。据说那是个指路标。循着它的右边往上径直到办事处，沿着它的左边往下就会走进国民参政会会所，就有可能落入敌特之手。他向右边走去，不远数十步，看见了一幢砖瓦结构的楼房，那是农场主饶国模的住宅。他听说过，前不久著名演员陈波儿去办事处时，刚上坡就被特务盯上。她急中生智，一闪身走进了饶国模的楼房。特务不便入内，却又不肯轻易放过，就在楼房外死守。后来饶国模的家人去办事处报信，才派人将她接走。沙汀掉头路口，未见有人尾随，但为了谨慎起见，也照样进楼房呆了一会儿，才放心地走向办事处。办事处的楼房矗立在更高一层的山坡上。楼前右侧有传达室和岗哨。沙汀经传达室通报后，步上土坎，走进狭窄的拱门，经过过道，到了工作人员的一间办公室。上前来接待他的，中等身材，深度近视，不是别人，而是博古。沙汀与博古在延安的一次文艺界的座谈会上见过一面。当时从前线回延安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汇报了自己的收获。例如吕班大讲了运用“卖梨膏糖”的曲调编写唱词受到老乡欢迎的情况，讲得生动具体。沙汀和何其芳却说了许多自责的话。沙汀说他有愧于一二 师，同志们在敌后经常打胜仗，他却打了“败仗”。汇报完了，博古讲了话。这个貌不惊人的领导同志并不就具体得失发表意见，而是从总体上强调伟大的抗日战争需要伟大的文学作品，希望大家拿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之作。他讲话的逻辑严密，措辞恰当，给沙汀的印象很深。他见了沙汀，依然是很严肃很认真的样子。他问沙汀什么时候从延安动身的？在延安见到周立波没有？路上有些什么停留？沙汀一一据实回答。他点了点头，叫秘书取来早已运到办事处的笔记本和资料，叫沙汀去曾家岩 50 号徐冰那里报到，并由他先去个电话。

随后，沙汀就去曾家岩 50 号。这里即著名的周公馆。1938 年底周恩来来到重庆时，在机房街八路军驻渝联络处和曾家岩渔村住过一段时间。翌年南方局成立，工作人员增多，由邓颖超从陈长蘅处转租了这幢楼的大部分房间，将南方局文委和文化组、妇委和妇女组、外事处、军事组等迁至此处。

周恩来、邓颖超和这些部门的负责人也住在这里。这是上清寺街尽头的一幢三层楼的建筑。它的右侧是戴笠的公馆，左侧有警察局的一个派出所，巷道里的茶馆、烟摊、擦鞋摊均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坐探。沙汀事前对这里的环境已作了了解，所以他非常谨慎地踏着石板路走进小巷，来到挂有曾家岩 50 号小横牌和水利委员会大吊牌的圆拱形门前，故意不看小牌而专注地看看大吊牌，然后快步进去。他穿过天井，向传达室通报了姓名和事由，随即经过过厅，来到右侧的文委、文化组办公室。文委秘书兼文化组组长徐冰上前热情迎接。徐冰与博古迥然不同。他性情开朗，言语爽快，交谈不上几分钟，就使人感到无拘无束。他要求沙汀担任文化界人士的联络，尤其要利用他与原“左联”盟员的旧关系，经常了解在重庆的这些人的思想情况，向文委、文化组汇报。沙汀不明白徐冰的职位，按习惯也绝口不向对方打听，但他感到徐冰是文化工作方面的负责人。后来徐冰就一直是他的顶头上司。他和她相处得很好。这位领导人同他一样喜欢喝酒。他在听取汇报时，常常会忽然打断对方的话：“不忙！停停！”随即叫警卫人员上街去买点醃卤排骨、猪头之类，从写字台内的角落里取出一瓶泸州老窖特曲，一同边饮边谈。当然，这大多是在周恩来不在 50 号的时候。

三十文化界的联络员

沙汀报到以后，就开始在重庆文化界做联络工作。他从宋之的和住在“文协”总会的以群那里了解了文化界人士居住的情况，分别去看望他们。

他去了南温泉。从海棠溪过江乘车，约莫一个小时就到了南温泉。这里的青山绿水间新盖起一排排茅屋。从上海疏散来的许多“左联”的旧友，杨骚、白薇、欧阳山、草明等等，大都住在此地。沙汀一一拜访了他们。彼此已相别两年多，他们的颠沛流离，沙汀的延安去来，都有说不完的话题。在这里，沙汀还见到了王平陵。这人曾因提倡“民族主义文学”受到左翼作家的批判，但他似乎并不计较往事。他在“文协”任职，向沙汀、欧阳山、草明约稿。他说：“叫你们写稿，你们不写。好吧，我就预支一笔稿费，总会写了！”欧阳山笑着说：“你最好先请我们吃一台吧！”他果然信以为真，请大家吃了一台。当时的重庆虽然不时有防空警报，但还未遭到轰炸，没有大量的人涌向郊区的现象。南温泉还比较幽静，旅馆也很清静。沙汀住了两天才离开。

沙汀正准备去一趟北碚。那里也有一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正待出发，听说章泯进城来了，住在“文协”总会葛一虹那里，就立即去拜访章泯。章泯曾经是“左联”剧协的负责人，同沙汀有过交往。由于徐冰在向沙汀谈到动员文艺工作者去延安时，特别嘱咐要动员几位戏剧家去，而且点到了章泯。所以沙汀同他见面后，开门见山，说组织上希望他去延安。他满口答应，还说可以从育才学校戏剧系动员几位教师去。他向沙汀讲了他的一件很苦恼的事：他离开上海时，本来去见过夏衍，可是就忽略了要组织介绍信，此间认为他是失掉了组织关系。沙汀说一定为他设法。他向徐冰作了汇报，由组织上去电桂林同夏衍取得了联系，顺利地解决了章泯的组织问题。沙汀从章泯那里大体上了解了北碚一些知名人士的情况。

在市区的文化界人士居住比较分散，沙汀分别去拜访了他们。他看望《新蜀报》主笔漆鲁鱼以后，去见了副刊《蜀道》的主编姚蓬子。这是他第一次

同姚蓬子见面。此人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是说话像打机关枪一样，劈里啪啦，唾沫飞溅。不过他还知趣，能在叫嚷一阵以后，用手遮掩“枪口”。他也很关心地问起延安的近况。当沙汀说“马回子”算不了啥，延安安如磐石时，他仍然做出很担心的样子：“你再说马回子的部队不行，可是这样包围下去，得不到外边的接济，也难办呀！”

一个星期以后，沙汀就按事先的通知到曾家岩 50 号汇报。这次是周恩来直接听取汇报。沙汀在文委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就随徐冰到后院去。后院有一个天井，左边有一块洗衣用的长条石，中间有一个防空洞，下通屋后的嘉陵江滩。它既可以用来躲避空袭，又可作为进出 50 号的秘密通道。天井的右厢房是一幢一楼一底的建筑。底楼就是周恩来、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卧室。这间长方形的屋子约 20 平方米，面向天井和江滩各有一道窗口。周恩来的办公桌面向天井，邓颖超的办公桌背靠江滩，面向周恩来。周恩来的办公桌后面有一张双人床。左边有一个书架，一张藤椅。沙汀和徐冰在周恩来的招呼下入座。徐冰把带去的几帧条幅一一展开请周恩来欣赏。这是田汉托人从桂林捎来，赠给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系田汉的几首有关国际、国内形势的五言、七言诗。其中一联写道：“英伦一老雪满头，误尽苍生伞未收”。讽刺时年 70 的英国首相面对德国法西斯侵略所采取的“不干涉政策”。周恩来评论一阵以后，开始听取汇报。沙汀事前作过认真的准备，汇报时也以为会听他一一道来。没想到周恩来不习惯“听取式”而喜欢“交谈式”的汇报方式。他听不上几句就不断插话。除了提问，还对一些说得不充分的问题加以补充，对涉及到“左联”一些人的不够准确的说法加以纠正。沙汀进屋时有些拘谨，汇报开始时尽量放松，经过几番插话后又有些紧张。直到周恩来听到一些趣闻，朗声大笑，这才不感到拘束，话语也才连贯。他谈到白薇时联系到她在上海的一些情况。她同杨骚重逢，时而狂热，时而吵翻，社会上流言四起，无聊小报造谣中伤。她在痛苦与损害中顽强地生活，勤奋地写作。她患了盲肠炎，咬牙硬挺着。后来红十字会医院的医生打开下腹，发现盲肠已自行萎缩。周恩来听到这里，大笑不止。随后非常关切地问起她近来的生活和健康状况，反复嘱咐要同她多多往来，对她多加关心。

这是沙汀第一次到曾家岩 50 号汇报。这以后，一般都是每星期汇报一次。汇报会大多是徐冰召集，周恩来主持的时候较少。有时他也来问问情况，谈些意见。参加汇报会的有胡绳、蒋南翔、冯乃超以及几位长住周公馆的同志。胡绳每会必到。蒋南翔不久就离开了重庆。冯乃超一直在文委工作，但并不经常到会。汇报时间大多是在晚上，经常持续到深夜。遇到这种情况，沙汀就在“文协”，总会以群的房间里搭铺歇宿，或者留在会议室隔壁的屋里过夜，第二天早晨出门，在上清寺的甜食店里喝一碗豆浆，吃两根油条，然后返回华裕农场。

沙汀也经常参加重庆文艺界的活动。12 月下旬，“文协”总会招待战地访问归来的作家，接着，访问团的作家讨论反映前线生活的作品的出版事宜，他都参加了。他还热心为他们出版丛书想办法。当时有两家书店争着要书稿。其中一家声誉不好，作家们不同意交给他们。另一家生活书店素有声望，但版费较低。他认为以交生活书店出版为好，版费问题可以交涉。他专为此事去 50 号汇报，进门碰见了凯丰，就将此事和他的意见一一讲了。凯丰也主张交生活书店出版，但涉及到版费时有些迟疑地说：这可不好办，尽管我们同“生活”的关系很好。后来这一套丛书被国民党方面把持的一家书店以较高

的版费抢去出版了。周恩来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他们，认为他们办事不力。周恩来说，就是拿钱来补贴，也应该由生活书店出版嘛！周恩来的胸怀和眼光，使沙汀深深佩服。

这些时候，沙汀一直在宋之的家里吃饭。宋之的时年二十五六，精力充沛，才思敏捷，正将西北访问的见闻写成作品在《新蜀报》、《抗战文艺》、《七月》等报刊上发表，所著的多幕剧《鞭》、《雾重庆》也正在上演，稿费收入甚丰，生活较为宽裕。他与沙汀一样喜欢杜康。他的夫人王苹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员，还是一位出色的厨师。这位回族烹调家最“叫座”的菜是黄豆烧牛尾。

烧得来黄亮亮、油酥酥的。他们生活在一起非常融洽。有时心有余闲，还在微醺之后，搓几圈麻将。邀请的牌友，一个是罗烽的母亲，东北妇女，身材高大，性格开朗；一个是王苹的堂姊，铜元局子弟校教师，身体壮实，性情幽默。子弟校教师爱唱京戏，她在牌桌上，爱用鼻音哼上几句。牌局紧张、生死决战的时候，哼唱得特别起劲，很有点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气概。

由于生活安定，心情愉快，沙汀创作的兴致极好。他应《新华日报》、罗苏、罗烽主编的《文学月报》、胡风主编的《七月》等报刊之约，写了《一段日记》、《老乡们》、《毁路与修路》、《小鬼》、《过去》等散文和短篇报告文学。几乎是三、五天就写一篇。宋之的见了，十分惊讶：“过去在上海，听说你是难产作家，殊不知你写得这样快！”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都是他在冀中的见闻，早已烂熟于心，写来自然得心应手。这几篇作品，加上以前和之后写的《一个游击队员的故事》、《游击战》、《同志间》、《在史家庄》、《游击县长》、《民主政治》、《通过封锁线》、《知识分子》等几篇，均属同一类型的作品。沙汀将它们结集为《敌后琐记》。它们多侧面地反映了根据地群众的精神面貌，八路军的优良作风，游击战争的状况以及政府、干部、军队和人民之间的新型关系。它的基调是歌颂新的社会制度、新的人和新的人际关系。它不仅具有沙汀创作一贯的精细、简洁的艺术笔调，而且还因为特定的题材和对题材的理解，带有抒情性强的新的艺术特点。当然，一般说来这些作品的思想蕴涵不深，读来觉得热情可贵，深味不足。

在这期间，沙汀还做了《文艺战线》的一些编务工作。他同生活书店交涉，将在延安编好的一期《文艺战线》交付出版发行。这是《文艺战线》的第6期。其中有沙汀的《随军散记》的前三章。还有一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文章：“艺术创作者论民族形式专辑”。包括何其芳的《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沙汀的《民族形式问题》。《文艺战线》于1940年2月出至第6期终刊。

三十一 这里也弥漫着乡情

1940年3月上旬，沙汀接到黄玉颀来信，称不幸小产，切盼速归。沙汀向徐冰请假到仁寿去。恰好刘披云要回成都，两人便相约同行。

启程的一切均已准备好，忽然刘披云前来告诉沙汀，成都刚刚发生了“抢米事件”，反动当局制造事端、栽赃陷害，已将罗世文、车耀先逮捕，暂时不能去成都。沙汀听到这个消息，对反动派不择手段加害于共产党人非常愤慨。至于他走不走呢？他认为他与刘披云的情况不同，他从没有像刘披云那

样在成都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而且他只是路过成都，仍决定按时出发。

汽车于次日下午黄昏时分抵达成都牛市口车站。沙汀步出车站，立即招呼一辆人力车去仁寿。车夫不免有些迟疑。沙汀一再解释要去探望一个危重病人，愿出高价，车夫这才点头，并且说可以赶到苏码头过夜。沙汀当即一迭连声地说：行！行！

沙汀叫车夫绕道从东门外水津街去西门。车过九眼桥头时，忽然瞥见一个面孔很熟的中年人迎面而来。那人用惊异的神色看着沙汀，嘴正欲启动，沙汀赶紧把脸掉向一边，佯作路人。他仿佛记得这人在陈离手下工作，与车耀先有过往来，但他顾不得那么多礼节。在这铅灰色暮云深重的成都，很难说会发生什么意外。

他之所以同意在苏码头夜宿，是由于那里有他的老朋友夏正寅。约莫 30 里路程，天色擦黑，就到了此地。他进得这河边的小镇，探问到夏家这座比较阔绰的府第，不料出门迎接的不是夏正寅，而是他的夫人。她告诉沙汀，夏正寅前几天就已离家，连去向都没有告诉家人。沙汀立即警觉到此地的环境也一定非常险恶。尽管夏夫人一再挽留他住宿，他仍推口说只是顺路来看看老朋友，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并且又好说歹说，说服了车夫，继续向前赶路。

这辆孤单的人力车，在夜色中艰难地前行。爬过一座座山坡，绕过一道道山弯。车轮扎着粗糙的路面，发出吱吱喳喳的响声。约莫走了 10 多里路，到了一个小乡场。天色已经漆黑，车夫也已精疲力竭，就只得在客店住下。

这个乡场名叫煎茶溪。只有一条一眼到底的街道。场上的客栈仅此一家，别无分号，而且房间很少。与沙汀同房间的是一个约莫 20 来岁的青年，一身同样的长衫。他自称是从仁寿到成都去探亲的，沙汀也谎称是到仁寿县老家去的。沙汀把话题引到小城镇的税收、役政上去。这个年青人兴致来了，先是慷慨激昂地抨击一番，然后又长吁短叹。他说所谓按户口抽签服兵役，三丁抽一、五丁抽二，谁抽到谁就当壮丁等等，全是骗人的。有钱有势的人家出点壮丁费就可以不服兵役，有的壮丁费也不出，照样不出壮丁。这些情况，同沙汀在华裕农场一位技师那里听到的相同，只是更加具体而已。他分析这个青年可能是中、小地主家庭的知识青年或教书先生，是四川农村通称的“土老肥”家中的“老坎”。这类人不同于乡绅恶霸，也不同于普通农民。他们要受乡绅恶霸的欺负，在服役、纳税方面要听命于人。说不定这个年青人就是为躲壮丁远走他乡的。他的姓名，他的所谓探亲，也许全是假的。隐匿身份、心事重重的沙汀，当然很容易以己之心揣忖别人。不过，他的心情也很快安定下来。他一面谈话一面解衣就寝，头一落枕就呼呼入睡。第二天早晨，精神爽朗，叫上车夫，直奔文公场。

这些时日，黄玉颀早已为沙汀布置好了小家庭。她到文公场后，同母亲和孩子住在学校教职员宿舍的一间屋子里，以后应聘担任音乐教师，也仍然是三世同堂。得到沙汀回家的确切消息时，就向校长聂生明申请代为租佃住房。聂生明同主持学校日常教学工作的常务校董商量，让出冯家祠堂的两间房子，供沙汀一家居住。沙汀到达文公场后，就有了一个舒适的家。此时，玉颀的健康已正在恢复，阿礼也分外活泼可爱。黄敬之仍旧住在学校，但每天都到冯家祠堂来烧饭做菜。她做菜也不亚于绘画、刺绣，精工细作，菜肴的色香味俱佳。

这冯家祠在场口的栅子门外。院子虽然不大，但庭院幽雅，屋宇整洁。

祠堂主人系潘文华家产的代理人，自己也相当富有。不仅有雅致的住宅，还开了一个中药店和一个当铺。此人的思想不像聂生明那样开明。他迷信鬼神，据说有一次请人扶乩，乩手说神灵已经临坛，他入迷地问起已逝的一位县官在阴曹地府的际遇，乩手立即在沙盘上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眼大肚皮小”，下联是：“嘴硬骨头酥”，横批是：“啥都想吃”。他不解其意，但也没半点怀疑。就在沙汀到冯家祠不久，他家的药店发生了一起“花案”：药店的学徒同家里的使女热恋，夜里在药店的一隅云来雨去。此事被他的儿子发现，他们将这对男女赶出家门。当晚他们便请来巫师设坛祈禳，驱除“晦气”。不过，像这样富裕而又迷信的人家，慨然出租祠堂的房间给外姓人住家，倒是出乎意外。

小小文公场，潘文华修建的一座中西合璧的住宅，曾任川西北路司令的董长安为父母兴建的祠堂，成了瞩目的胜境。宽敞的董氏家祠尤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气派，初到此地的人不免都要前去游览。沙汀也没能免俗。这座祠堂坐落在一片漠漠的水田之中，有一条整齐的石板路直达门前的台阶。进大门是高大的殿堂，上有四川著名书法家赵熙题写的匾额：董氏大本堂。据说这座祠堂的落成典礼盛况空前。董长安所部驻防的江油、安县、平武、北川、彰明五县的军政首长、土豪乡绅，田颂尧防区的县、区头头以及他的僚属都曾前来恭贺。成都的一些大小军阀，也有派员来贺喜的。本县、邻县一些想拉关系的、趋炎附势的人，更是大凑热闹。两家川戏班子拉到场上来昼夜演出。一批批曲艺艺人前来献艺。

方圆几十里的庶民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涌向乡场。有一家卖凉水、冰粉的，摆了三四个摊点，三四天时间发了大财。

文公场和四川所有乡场一样，平场天冷冷清清，逢场天人山人海。冯家祠堂外的集市，挤得水泄不通。当地盛产的红皮甘蔗一捆捆、一扎扎，价格低廉到几乎相送的地步。到了晚上，场上也并不寂寞。宽敞的茶馆里，打围鼓的开始了，川戏爱好者引吭清唱。春节那些时候，这里还邀请成都的川戏班子演出，其中有著名的旦角琼莲芳演出的叫座戏《北茆山》。

沙汀在文公场住了两个多月。他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在四川乡场上长时间居住了。他感到了与故乡乡场类似的乡俗民情，尤其感到它与延安、前线强烈的反差。这里的沉滞太需要突破了，人们太需要理想的鼓舞了。

这时候，他写了短篇小说《磁力》。他把早作过构思的表现青年对延安的向往的故事，更多地拉到四川的环境中、立足在熟悉的乡土上来写。不只在青年袁小奇身上寄托他有过的对延安的一往情深，还着重地写这个青年对大后方沉滞腐朽生活的沉闷感窒息感，从中融入对乡场生活的体验。小说的倾向鲜明，情感真挚，描写真切。它最初发表时，以袁小奇出走后又被逮回作结局，后来改为奔向梦寐以求的目的地为结尾。这个修改增强了生活的积极面，却又自然、真实。

沙汀还为《随军散记》交付出版写了前记。短短五六百字，但将前一段工作告一段落。

三十二 友谊中的切磋

1940年5月上旬，沙汀从报纸上看到5月3日、4日重庆连续遭到大轰炸的消息。他像战士把枪声当命令一样，决定立即返回重庆。家人一再劝阻

也没有将他留住。他经仁寿的北斗镇直插资中的球溪河，从那里乘成渝路的车去重庆。到球溪河，只见西去成都的一辆辆车满载逃难的人，东往重庆的车大都放空，他到车站购票，售票员也十分惊讶：你看人家都逃出重庆，你还要去重庆！他解释说有急事，不然谁还到重庆去。汽车当晚在永川附近一个小镇上过夜。次日到青木关停车接受检查站检查，并不断听说重庆又拉了防空警报，只得时走时停。到达重庆，天色已经黑尽。

往日的山城之夜，山坡、江岸到处灯光闪闪，宛如置身星空之中。而今一片漆黑，只有少数的摊贩，点着昏黄的亮油壶、鱼烛，忙着自己的生计。在一些断墙残垣上，依稀可见新贴的标语：“看，是谁炸毁了我们的家园！”“看，是谁炸死了我们的父老兄弟姊妹！”

沙汀没有去华裕农场，直奔“文协”总会。总会只有一个传达人员留守。他告诉沙汀，总会已迁往南温泉，人员已分别疏散，华裕农场的宋之的，罗烽等已转移到了寸滩。沙汀只得转身去曾家岩50号。到了后院，见到了军事组的王梓木，算是向组织上报了到。王梓木说，许多文化人都到南温泉去了，凯丰也在那里的一家私人医院养病，可以到那里去。他住了一夜，就到南温泉去了。

到南温泉后，沙汀先去看望了杨骚、欧阳山等原来就住在那里的熟人，然后到河对岸乡场外“文协”总会的疏散住房见了驻会秘书梅林夫妇，要下一间客房住下。这时已是初夏，这僻静的桃子沟杂花遍开，树木葱茏。如果不是间或从市区响起凄厉的警报声，这青山绿水足可令人陶醉。

沙汀在这里见到了陈学昭。这位大姐仍旧那么热情。她不只受找沙汀畅谈，还一再邀请沙汀进乡场上的饭馆吃饭，说是改善生活。她同过去一样，吃饭前总要拿出一个酒精瓶子，用酒精仔细擦拭碗筷，才准使用。

张恨水也在这里。他家就在沙汀住地的对岸。一排三间草房，门前有宽敞的院坝，家人的活动一一在目。当警报拉响时，全家人都急急慌慌地躲进防空洞，唯独这位老先生很悠闲地提着陶瓷茶壶，往山沟里走。过去沙汀对张恨水有偏见，认为不过是一个鸯鸳蝴蝶派作家。前不久读了《新民报》连载的《八十一梦》，印象有了改变。《八十一梦》用“寓言十九，托之于梦”的手法揭露和嘲弄了国统区政治腐败的形形色色。其中《我是孙悟空》、《天堂之游》等章节，一看便知是讽刺孔祥熙的寓言故事。沙汀同张恨水有了交往。沙汀、杨骚、欧阳山、草明等几个人凑份子钱聚餐，邀请凯丰参加，同时也邀请了张恨水。

沙汀经常交往的是杨骚、白薇、欧阳山、草明。只要没有防空警报，他们就要相聚在一起。常常是有一二人在河坎上吆喝，其他的人就应声出门，一起进茶馆吃茶聊天。谁要是收到了稿费，还要买点酒菜请客。几个人无话不谈，抗战以来的创作情况，各自在创作上的思考，是经常的话题。沙汀同他们往来，带有自己的任务，但更多的是思想文化的自然联系。所以彼此间有感情的交流，创作的切磋。沙汀还试图促成杨骚与白薇结合。他对这两人同住一排房子、生活上互相体贴，但就是不谈婚姻的事感到不解。有一天，白薇到总会来，一阵闲聊之后，他就提出这事，谁知这病恹恹的女同志忽然变得像一头愤怒的狮子。她不仅大声斥责，而且步步进逼，差一点要打他的耳光。沙汀赶紧表示歉意，从此再也不提此事。

在同这几位朋友相处中，沙汀感到他们对党组织部很有感情，就想到应该吸收他们入党。他去看望凯丰时谈了他的想法。建议先吸收欧阳山和草明，

下一步吸收杨骚和白薇。凯丰说可以同欧阳山、草明谈谈。此后他就注意寻找谈话的机会。当然不能在茶馆里谈。到他们家里，又避不开那个带孩子的保姆。费了许多心思，终于有一天保姆出门去了，他就抓紧时间同他们谈话。正如他所预料，两夫妇都很激动。他们说，他们早就盼望着入党了。沙汀把谈话的情况向凯丰作了汇报，通知欧阳山、草明分别去见凯丰。凯丰同他们谈话后印象也很好。不过凯丰说，这事还需要向周恩来汇报。凯丰回曾家岩50号以后，沙汀去汇报工作，问到了欧阳山、草明的入党问题。恰好周恩来到了会议室。他们向他谈了这件事。周恩来对欧阳山、草明早就很了解。1938年，他曾派他们和周立波、廖沫沙去湘西做过开辟工作。1939年两夫妇到重庆后，他又很注意了解他们的情况。他说：两个一起吸收吧！不久，欧阳山、草明经沙汀和吴奚如介绍，由八路军办事处党组织吸收入党。

这些时候，重庆也间或开展一些文艺活动。民族形式座谈会就是一项重要的活动。这是《新华日报》副刊“文艺之页”出面，于6月9日在一心花园举行的。文艺界不少的人都参加了。沙汀也应邀到会。

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最早是抗战初期武汉《新华日报》批评“盲目地利用旧形式”反而被叫日形式所利用”引起的。向林冰、茅盾等发表文章，表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当时的论争较多地停留在“旧瓶装新酒”的问题上。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学习”一节中，明确提出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以后，在延安掀起了讨论的热潮。文艺界举行了座谈会。周扬、艾思奇、萧三、何其芳、柯仲平、洗星海、罗思等都发表了文章，广泛涉及到文学、诗歌、戏剧、音乐、美术各方面的民族形式问题。这次讨论扩展到了重庆。1940年3月，向林冰在《大公报》副刊《战线》上发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不仅坚持他过去的观点，还进一步主张以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葛一虹在《文学月报》上发表《民族遗产与人类遗产》，表示不同的意见。接着有不少人发表文章，对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表示自己的看法，引起广泛的论争。这些文章在谈到民族遗产的继承问题时，或者盲目崇拜，或者不加区别地一概否定。在对待“五四”新文学问题上，不是一笔抹煞，就是百分之百赞扬，忽视它本身存在的弱点。而且它们大多纠缠在民间形式是否“中心源泉”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民族形式本身的深入探讨。《新华日报》副刊的这次座谈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以群在会上的发言，基本上反映了会议的意图：“自从民族形式提出，到现在为止，一直停留在民间形式是不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问题上，现在应该把这一问题向前推进一步，更深入更广泛地展开讨论”。

沙汀从冀中回到延安的那段时间；就参加过民族形式问题的座谈会。在“鲁艺”文学系的一次讨论会上，他和何其芳还同萧三、张庚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萧三、张庚突出强调中国文化遗产的精华和民间创作的重要，他和何其芳很不以为然，认为不适当地强调，弄不好会“降低艺术水准”。他们被指责为“将艺术脱离抗战，脱离政治”，“新的艺术至上主义”。后来，沙汀将他的几次发言整理成《民族形式问题》一文，在《文艺战线》上发表。他认为民族形式问题，“在一方面它是指作家应该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民族的立场，用民间活的语言来描写他们的实际生活，他们的音乐和希望，这

见1940年7月4日《新华日报》第4版。

是第一，其次，在另一方面，它是指对于长久地、广泛地存在于民间的，曾反映了民族生活的某一方面的旧作品形式的利用”。他着重阐述了对第二个问题的主张，明确提出不应把旧形式利用在文艺上的价值抬得过高。他联系到鲁迅，认为“他的成功主要的来自一个现实主义者所必不可少的写实手腕；然而这大半是从世界文学来的，鲁迅先生自己就曾经感谢地提到果戈理和显克微支等人”。他结合文学的现状，认为“目前民众的现实生活已经和旧形式当中所表现的有相当的距离”。他同时也提到，这也并不是说新文艺就毫无缺点，例如“在一小部分创作上，我们所描写的人物还不大中国化，即使好一点的也没有表现出民族的一般特点”。不过对这方面的问题应持乐观的态度，“因为抗战已经把作家重新输入民间，而在抗战的这激巨的变动下，民族的特点也容易显现，因之也就容易把握”。至于表现形式，他认为“应该力求写实技巧的把握，而以人物环境在客观上之真实性作我们的目标。并且为了把读者扩张到广大的群众中去，为了避免空等老百姓文化水准的提高，一切随着生长病和由于生活空虚而来的字句上的花饰都该在我们摒弃之列：使得作品尽量简洁明快”。在《新华日报》副刊举行的这次座谈会上沙汀发了言。他的观点基本上与文章的观点相同，只是根据会议的主题作了新的阐述，对创造理想的民族形式问题作了新的概括：

我们理想的民族形式的目标，总要作到为一般大众所接受所享受。这理想是与民主政治有整个关系，要使一般大众能有机会受教育才能理解文艺作品，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我有两点意见：一、在内容上只要是站在大众利益上，能有艺术的或

份，虽然不为大众所理解，也不能否认它的价值，在不损害艺术价值外，努力使之成为大众所接受；二、发动大多数喜好文艺者及知识分子从事通俗化运动，将这两条道路的汇合是可能的。

沙汀在民族形式问题上的发言及其主张，都是从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其中还反映了他自己的审美走向，即借鉴现代艺术形式来表现具有民族和地域文化特点的川西北乡镇社会生活。因而它们是切实可行的，具有实践性的特点。此其一。第二，它们始终坚持了一种认识：民族形式问题不单纯是表现形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待民族现实生活的态度问题。发展民族形式应同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方法结合。因而它们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具有根本性的特点。第三，明确指出不可把旧形式的利用看得过重。事实证明许多旧形式已经与民众的现实生活有相当距离。鲁迅和新文学发展的道路已充分说明必须大胆借鉴外来的艺术形式。从这方面看，它们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

三十三创作活动的思考

沙汀在南温泉住了大约3个月。到了8月底9月初，重庆的雾季到来，城市的防空力量有所加强，敌机再也不像前段时间那样猖狂，疏散的人陆续返城，“文协”总会迁到了张家花园65号，沙汀也离开了南温泉。

他同以群一起住在总会楼房后的一间小屋里。楼房住有史东山、陈鲤庭、舒绣文、郑君里、葛一虹等许多熟人。宋之和王莘从寸滩回来，也没有再去华裕农场，住在二楼上。总会又热闹起来。

沙汀进城后，接连几次去看望郭沫若。郭沫若在张家花园的寓所遭到轰炸以后，于6月底迁至赖家桥三塘院子，10月初又搬到天官府街。郭沫若住在四号三楼，一共三间房子。墙壁因被炸弹震裂，石灰剥落，箴片裸露，他称之为“蜗庐”。每当他蜗居写作时，于立群就把守在门口，避免无关紧要的来访者打扰。但沙汀每次上门都受到欢迎。有时是他找上门去，有时则是郭沫若约他前去，向他了解文艺界和文学创作的情况。有一次，沙汀还拉欧阳山一道去。欧阳山正在研究抗战三年来的小说创作，谈起来头头是道。郭沫若身居高位，苏联对外文协，塔斯社，还有一些进步的外国记者经常登门访问，他得找些人做他的耳目。他从不强不知为已知，总是虚心了解情况，而且性喜幽默，极有风趣，使来者从不感到拘束。

9月下旬，沙汀为周恩来参加知识界的一次座谈会作安排，去了一趟北碚。周恩来是应邀到北碚作形势报告。当时的时局比较紧张。德军把30多万英法联军逼在敦刻尔克海边。英军撤回英国本土，法军惨遭失败，演出了历史上有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悲剧。德军乘胜同意大利夹攻法国，法国投降。与此同时，英国切断了滇缅公路，增加了我国国际交通的困难，日本侵略军又同德。意相互呼应，发动了一次次大“扫荡”，而国民党反动派也沿着投降、反共、独裁的方向倒退。因此，知识界的不少人对抗战的前途感到忧虑。北碚的一些进步文化人希望周恩来去讲讲形势，提高认识，增强信心。

沙汀约了以群一道去。当时以群的组织问题虽然尚未解决，但他忠实可靠，工作积极，情况熟悉，许多具体工作，沙汀都同他一起去做。他们一同乘车沿嘉陵江而上，约两小时到达北碚。此地系重庆北部的一个小镇，坐落在嘉陵江边，上游是北温泉，下游是观音峡，对岸是夏坝。它的街道不多，但店铺不少。饭馆、旅舍、茶铺、酒店、戏院、浴室、金店、银行，一应俱全。林语堂曾在这里买了一幢小洋房，去美国以后，暂交“文协”总会管理，“文协”把它作为疏散房子和招待所。沙汀和以群就在这里住下。他们见到了艾青。他于这年春天到重庆，在育才学校任文学系主任。育才学校在草街子古圣寺，他是临时到这里来玩的。沙汀和以群告诉他，周恩来即将来北碚，并希望他去延安。艾青非常高兴，他很想见到周恩来，很想去延安。辞别艾青，他们过江去夏坝，在复旦大学和通俗读物编刊社附近的黄桷树边，找到了胡风的家，向胡讲了座谈会的目的，请他作主持人，并邀请靳以和复旦大学一些教授参加。次日，他们又去陶行知家里，讲了座谈会的内容，请他同胡风一起主持会议，并约请一些熟人到会。

周恩来于第二天晚上到北碚。随行的有徐冰和另外两人。他们原定下午到达，后来有事推迟。因为走得匆忙，晚饭也没有顾得上吃。到北碚时，较好的饭馆都已关门。沙汀、以群便陪他们到一家小饭铺吃饭。沙汀、以群汇报了准备工作的情况。周恩来当即决定去看望陶行知，当时天色漆黑，陶行知又住在山沟里，但他执意要去，周恩来夤夜造访，当然使陶行知感动不已。陶行知说一定要把这次会开好，大家早就盼着聚一聚了。他们没停留多久，就乘车到北温泉去了。沙汀和以群仍回原地住宿。

第二天一早，沙汀和以群就去约艾青一道去北温泉。艾青大发诗人脾气：周恩来来了，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们陪周恩来吃饭，为什么不叫我？周恩来到陶行知家里去，为什么也不让我知道？沙汀一再解释，周恩来到得很晚，吃饭和见陶行知，都是临时提出来的。说了好一阵，诗人才转嗔为喜，

一同赶到了北温泉。他们到数帆楼周恩来下榻处，他正从浓荫覆盖的石阶上健步下来。沙汀介绍了艾青，然后和以群退出来到徐冰那里商量座谈、聚餐的具体事项。他们预计了座谈会的人数和费用，同管理人员接洽。办完这些事，艾青从周恩来的房间里出来了。这位诗人显然因为兴奋，脸红喷喷的。他不停地向沙汀、以群谈刚才的印象：周副主席真了不起！他那么关心人，那么豁达！……像朗诵诗一样。

前来参加座谈的学者、名流不少。最引人注目的是梁漱溟、郭任远。沙汀早在省一师读书时，读过梁漱溟论述东方文化的书和哲学著作，但眼前的梁先生却出乎意料的又黑又瘦、又矮又小。沙汀初到上海时，读过郭任远的一本从心理学角度论证马克思主义缺乏科学性的著作，对这位留美的心理学家颇不以为然。但是尽管信仰不同，出于对民族命运的关心，老先生也参加座谈会来了。他比梁漱溟年轻，衣着、神情迥然不同，一身西装，热情开朗。

座谈会按时举行。主持人陶行知、胡风讲明意图，请大家无拘无束地发言。接连有好几个人讲了对形势的看法。梁漱溟、郭任远也谈了自己的认识。他们都认为国际形势正在恶化，中国的抗战困难重重。他们希望周恩来讲讲，我们怎样对待还可能发生的挫折。最后，陶行知请周恩来讲，全场一阵热烈的掌声。周恩来没有讲稿，即席演说。他讲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抗日战争产生的影响，又讲经过三年抗战，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已发展成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国范围的人民战争。他的讲话亲切有力，与会的人都深深地吸引。

座谈会之后是聚餐。十人一桌的四张圆桌，座无虚席。聚餐以后，参加座谈会的人陆续散去。陶行知稍晚一点离开。他直接去育才学校，为周恩来参观作准备。沙汀、以群陪周恩来、徐冰住了一夜，次日上午先行赶到育才学校。周恩来一行到学校时，师生们早已衣着、佩戴整齐，排成欢迎的队列。师生们热烈欢迎周恩来，唱起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周恩来向师生们问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此时，章泯把徐冰和沙汀拉到他家里去了。章泯是租的农民的院子。两间瓦房，一间茅屋，宽敞舒适。他的夫人端出热腾腾的过浆粉子汤圆，热情招待客人。徐冰吃着没有反应。沙汀对通常春节才品尝的个头大的川味汤圆赞不绝口。他们吃过以后，分别找章泯的教学助手沙蒙、舒强谈了话，鼓励他们到延安“鲁艺”去。

周恩来、徐冰一行当天下午回重庆。沙汀和以群留在育才学校住了几天。沙汀动员贺绿汀到“鲁艺”教书。这是吕骥曾交待的任务。但是贺绿汀同冼星海有隔阂，不愿去“鲁艺”，后来去了新四军。沙汀还应艾青之邀，同育才学校文学系的同学座谈了小说创作。他觉得这些从孤儿院、难民收容所出来的青少年相当不错。他问他们：作品中的“故事”是什么意思？有一个同学立即回答：故事就是人物的行动。沙汀不由得点点头。尽管这个回答还不够全面，但把握住了重点，语言简洁明快。

那些时日，沙汀、以群、育才学校的老师们常聚在一起聊天。他们谈前线和后方的见闻，谈文学，谈政治，无拘无束。有时也开开玩笑。开玩笑的主要对象是以群。以群质朴，脾气极好，不管说什么，从不生气。爱幽默、爱反讽的首推沙汀。他笑话别人，自己也大笑。当有人谈到在法国所见的一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时，沙汀立即拉到以群头上幽默几句。任于还十分生动地描述以群的写作习惯。每到夜深，以群就像开动的机器一样开始写作。

写上一两个小时，上床睡一两个小时，然后又写上一两个小时，像机器一样操作，充分做到劳逸结合。把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在一个新雨初霁的日子里，沙汀、以群、艾青、韦茛还相约去了“普希金林”。那是学校附近的一片长着苍松、翠柏、青桐、灌木的丛林。学校的老师冠以普希金的美名。据说贺绿汀就常到那里去寻找灵感。他们兴致勃勃漫步于林中。正是大雨大曝之后，林子里那些树桩、泥土中的菌丝吸足了水分和养料，长出一朵朵蘑菇。大的如茶杯，小的如蚕豆，有的像撑开的伞盖，有的像遮阳的凉帽，有的像小小的钢盔。他们细心地寻觅着，兴奋地采摘着，兴高采烈地欣赏着，尽兴方归。

沙汀、以群是和艾青、韦茛一道返回重庆的。他们乘汽船到北碚，接着就赶上了去重庆的汽轮。可是沙汀忘了如约顺路去看望胡风。他回重庆不久就从葛一虹那里看到胡风的一封信。胡风叫葛一虹转告沙汀，责备他言而无信。好在胡风并没有说别的挖苦话。沙汀初到重庆时，胡风就约沙汀给《七月》写稿。但他并不直接提出，而是写信给宋之的，托之的转致沙汀：“老沙来了，你帮我约一篇稿件。我们登了他的稿件，也许将来在革命法庭判刑时，会判得轻一些。”胡风就喜欢这样的表达方式。不过他的约稿确也生效，沙汀赶紧给《七月》寄去一篇散文。后来，“鲁艺”文学系毕业的孔厥、天兰等给《七月》投稿，胡风委托沙汀代审，他也都一一照办了。

沙汀回到城里不几天，10月8日，《新蜀报》副刊举行座谈会，他应邀参加了。他以《从三年来的文学作品看抗战胜利的前途》为题作了发言。概括地谈了他对抗战以来文学创作发展的看法，充分肯定了“暴露和讽刺对于抗战不但无害、反而有利”。这次座谈会并不很引人注目，但对他却有着重要意义。它进一步推动了他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对抗战三年来创作活动的反思。从《随军散记》脱稿以来，在大后方文化人的交往与切磋中，在文公场闲居和写作《磁力》的时候，在这次北碚的报告会上，以至在育才学校聊天的那些时日，他都已在作这方面的思考。这次座谈会成了促进他深入思索的诱因。座谈会后，他再一次系统地思考了发言中谈到了的问题。《抗战文艺》主编向他约稿，他就将他长时间的思索和新近的探索写成了较长的文章：《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他回顾了抗战以来创作的经历，肯定了“聊以自慰”的《随军散记》、《敌后琐记》两本书，畅谈了它们的创作经过和体会，紧接着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深刻的自审，对现实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是立足乡土的问题。他根据晋西北、冀中的生活积累，写了一部《随军散记》、12篇《敌后琐记》，这是应当肯定的。可是他却始终没法根据这些生活材料写出一篇小说。“这原因，第一，行军作战的时候是太多了，流动性过于大；其次，我所醉心的题材是农民，但我经常接触着的却是部队；第三，我一直保持着客人身份，和上层接触的机会多于士兵”。再进一步深究，“重要的原因却还在这里，虽然我看见了一些战后的新的情况，接触了一些已经有着新的观念和新的感情的人民，并且得到了一般的概念，然而他们原来怎样？其间经历过如何的过程？这一切都不很清楚，因而，我总觉我对他们是相当陌生的，不能更深地去了解他们”。而此时的他又已经过了长

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载《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

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载《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

时间的探索，早已不再满足于单用一些情节、一个故事来表现一种观念、一种题旨的浅层次的创作，所以他绝不会轻易在创作上降低水准、降格以求。联系到创作的历程，他恰恰是在通过摸索，将创作的立足点转到乡土生活以后，才有重大的突破和新的飞跃的。因此，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的经验都充分证明，他仍然应该坚持立足在熟悉的乡土生活领域。

二是暴露和讽刺问题。他在从上海回到四川不久，带着对“堪察加”一隅“新的和旧的痼疾”的“不能抑制的显然的愤怒”写了小说《防空》。但这以后很快就对自己写这类作品产生了“动摇”和“怀疑”。他说：“我问我自己：这样下去，在抗战中，真是一桩必要的工作么？我怀疑我是在泄气，而泄气却是不应该的。”这时候，又恰好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遭到指责、引起争论的时候，于是他只好将他已有的创作计划抛在一边。延安、冀中去来，他的生活和政治视野大大开阔。他从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两个不同的时代的对比中，更加清楚地看到抗战的前途、民族的希望、人民的未来，看到国民党统治的反动、腐朽，看到他们的一切倒行逆施的反动本质及其失败的必然性。他认为他完全有必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条件出发，为抗战的胜利，为实现民族的希望和人民的理想，无情地彻底地暴露和讽刺阻碍抗战、阻挡民族和人民前进的反动势力的丑恶面目。他说：“我很安心我这样做，不复有从前那种不安和动摇了，以为这是泄气。因为抗战的信心已经普遍于全民，而自身的改造更是一致所渴求的，所以我们正用不着害怕，用不着自己向自己的嘴上贴上封条”。这时候，关于暴露与讽刺问题的讨论也以肯定的意见占主流而告一段落。他联系到这场争论，更加认识到坚持暴露和讽刺是基于他的实际情况坚持现实主义的表现。现实主义应当是立足于中国现实情况的创作方针。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要求现实主义在趋向一致的总目标下得到多方面的发展。而对于每一个作家来说，创作方法是因描写的对象和人的相异有所不同的。“它们是否正当，我们应当从具体的作品，和具体的民族需要入手，而不该固执一种一定的尺度”。

经过认真的总结和深入的思考，沙汀形成了明确的认识：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乡土讽刺艺术。这是沙汀继1935年确定创作“转向”的反思之后又一次深刻的创作自审。前一次反思促进了创作的飞跃，这一次自审推动创作走向了新的高峰。一次又一次“自我认识”、“自我完善”，一步一步推进现实主义的深化。

三十四艺术高峰：《在其香居茶馆里》

1940年11月，茅盾应周恩来的邀请来到重庆，沙汀立即约以群去看望了他。他住在嘉陵江边枣子岚垭下的学田湾。沈钧儒、邹韬奋等都住在那里。沙汀、以群敲开那座小楼的门，见到了茅盾和孔德沚。三年多不见，茅盾依然没有变。他热情、健谈。话到兴头上，爽朗地大笑，左眼皮不住眨动。他讲他对延安的印象，充满了深情。以群性格沉静，只是质朴地笑，很少开口。沙汀一遇知己，就像温水瓶倒出的水一样热烈。他谈了对延安的依恋之情。

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载《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

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载《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

沙汀：《这三年我的创作活动》，载《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

他说他之所以离开延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觉得对陕北的生活不如对四川熟悉。在那里写点散文、报告还可以，写小说就比较困难。人物的心理素质不熟，风俗习惯不熟，语言方式不熟。在四川，就是有人打个喷嚏，都能猜到它的含意。他说到这里，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茅盾也朗声笑起来。他们的话题又转到当时四川的一些社会现象上。沙汀谈到一财主囤积居奇的故事。此人看到物价不断上涨，用手中的钱买了一箱洋钉。洋钉涨价，就把它拿到银行去抵押，贷了一笔款，买了四箱。如此倒来倒去，大发了“国难财”。茅盾听了，哈哈大笑。从桌上拿过一个笔记本，迅速地记了下来。沙汀讲这事只当是闲聊，茅盾却处处是有心人。茅盾的敏感，又触动了沙汀。它成为一种启迪，引起他的回味，激发起他的联想，强化了他对故乡淘金的形形色色的感触。作家们的交往与谈心，对于彼此间灵感的激发和创作的促进，这也可以算是一个例子。

就在此后不久，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在重庆复刊。茅盾约沙汀写一篇小说。沙汀赶写了《老烟的故事》。小说中老烟的原型是沙汀在省一师时低班次的同学傅字琛。此人在30年代初翻译过日本的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抗战初期在成都作过报纸编辑，以后在重庆长江轮渡上工作。从前线来到《新华日报》工作的记者陆诒曾多次见过这人，对他那种害怕特务迫害的神经质印象很深。陆诒向沙汀谈起此人的情况，引起了沙汀的兴趣。沙汀便据以进行艺术虚构，创作了这篇小说。他将这篇稿件送给茅盾看时，茅盾却说这类题材的作品恐怕在检查官老爷那里很难通过。茅盾说：“现在还是打苍蝇吧，不要摸老虎屁股。”又说：“这些题材，包括正面反映解放区生活的题材，不是不可以写，还可以放手大胆地写，写的时候根本不要想在国统区发表，可以搁在那里，等到大局变了再说。”经过研究，沙汀将作品的背景改在云南，篇末注明写于昆明，也不署作者姓名。后来此稿竟侥幸通过检查，“蒙混过关”，沙汀又适当改了过来。

这篇小说通过老烟的神经过敏，以致在惊惶惶中死去，折射了国民党特务政治的罪恶。像老烟这样一个背叛过地主家庭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变得如此消沉，如此忧心忡忡以致郁闷而死，这是谁造成的呢？是特务政治形成的环境和气氛。作品的独到和深刻之处，正在于它没有在中心格局上正面展示特务的跟踪、凶杀、拘捕、拷打，而是充分描写特务政治造成的精神的、心理的压力与恐怖。它无论写人物的精神和心理的变化，还是渲染气氛和描写环境，都十分真实生动。作品中有些叙述语言稍嫌直露。例如写到老烟已死，画蛇既毕，又添一脚：

后来我又多方打听，终于弄不清老烟致死的真正原因。但是，当我一人独处，偶尔想念到他的时候，我总每每于蒙胧中看见绞架、陷阱，以及种种或软或硬的迫害，而好多软弱一点的人，就这样萎缩了，死亡了！但我又想，这是应该的么？现在是什么时候？……

沙汀一直主张作品的倾向应由作品的人物、故事自行流露，而不应由作者啰啰唆唆地讲明。可是当他有时用第一人称，以“我”为叙述人来叙写时，也有情不自禁地违背自己主张的情形。

11月中旬以后，重庆文艺界举行过好几次文艺活动。第一次活动，是11月17日由“文协”总会主办、沙汀主持的小说晚会。这次活动是沙汀和胡风动议的。11月8日下午，沙汀应邀参加苏联使馆举行的茶会。他走上批把山时遇见了胡凤。他们在大队宾客的行列里边走边谈。开始是谈小说创作。都认为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应当合情合理。至于怎样合情合理却有些分歧。胡凤

强调个人的情与理多些。沙汀讲人民大众的情与理重些。不过他们都还心平气和。后来他们就谈到正是山城雾季，应该多开展一些文艺活动，组织一些创作讨论会。此后几天，胡风没有回北碚，暂时住在城里。他们经过再次酝酿，向负责“文协”总会常务工作的老舍提出建议。老舍欣然同意，还主张开一系列的小说、诗歌、戏剧创作座谈会，而且首先开一次小说创作座谈会，由沙汀主持。当时沙汀刚刚担任了小说创作委员会的负责工作。

11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举行小说晚会的预告消息。当晚，座谈会在中苏友协会议室召开。参加晚会的人比预料的多，约70多人。其中多数是进步的文学青年。社会名流陈铭枢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九如也到场了。沙汀宣布会议开始，情欧阳山作关于抗战以来小说创作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的报告。欧阳山正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专为这次晚会写了讲话稿。他将1937年到1940年小说创作情况作了概评。按照作品的主要人物分为“战斗的人”、“昏睡的人”等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虽然是长篇大论，但讲述生功，分析精辟，听众津津有味。报告完后，老舍、胡风讲话。然后由老舍朗诵《骆驼祥子》的章节。老舍富有幽默感，言谈很有风趣，到重庆以后还说过相声。他满口漂亮的京腔，语调抑扬顿挫，加之又有表演才能，伴以适当的表情和动作，把作品的神韵完美地传达出来，博得与会者的喝彩。

一些文学青年给主持人递上一张张纸条。有热情鼓励，也有批评建议。他们要求作家热切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如物价的飞涨，奸商的囤积居奇，群众的民不聊生。有一张纸条说：现在乡下拉壮丁闹得鸡犬不宁，为什么作家漠不关心？这张纸条像猛然的一捶，沉重地敲在沙汀的心上。

晚会圆满结束。次日《新华日报》在第二版显著地位刊登了一条报道。标题是：“文艺界小说晚会，有欧阳山报告，老舍朗诵，听众要求作家多反映物价高涨与奸商囤积等问题”。

这次晚会后，沙汀一直心绪不宁。会上的那张要求反映役政问题的纸条总是浮现在他面前。“为什么作家漠不关心？”总是响在他的耳边。那些时候的拉壮丁，岂止乡下鸡犬不宁，一些城镇也闹得人心惶惶。丘八们像逮捕犯人一样强拉壮丁，以招考学生为名诱骗青年入彀，五花八门，无所不用其极。可是作家为什么很少写呢？已写的作品又为什么没有引起注意呢？

他联想起华裕农场陈技师告诉的一些情况。在一次躲避空袭的闲聊中，陈技师谈到他家乡的一个侄儿被拉壮丁拉走了，后来又经过疏通关节放回来了。沙汀问：“怎么会那么容易放出来？”陈技师说：“那还不容易！先买通了队长，在排队报数时，那娃按照事前的授意错报数字。队长当即破口大骂：你他妈的这么瓜，还配打国仗？把衣服给我刮下，拖过去捶二十军棍，滚蛋！——这不就放了。”

他又联想到煎茶溪邂逅的那个青年人的谈话，并由那次谈话想起安县城镇里那些社会地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下等乡绅，他们在拉壮丁问题上既受气又不服气的状况。例如他的一个亲戚杨茂轩的儿子，那个外号么胡子或杨猫胡子的，他有一定的势力和靠山，但他又受官僚、恶霸的欺负。他对各种欺侮莫可奈何，但又绝不服气。他说话不忌生冷，做事不顾后果。“老子这张嘴，说是要说的，吃是要吃的，说够了回去两杯酒一喝，倒下去就睡！”……

于是，他开始了艺术构思。在兵役方面被欺负但又绝不服气的邢么吵吵，阴险狡诈的联保主任方治国，当过十年团总、十年哥老会头目、年前退休的

陈新老爷，跑长途贩运的蒋米贩子，作为视学的好好先生俞视学，等等。一个个人物活了起来。他们在拉壮丁的问题上各自作了充分的表演。他们活跃在那熟悉的茶馆里。那幺吵吵为自己的儿子被联保主任方治国密报拉了壮丁，同方治国吵得难解难分。正在这时，蒋米贩子传来消息：儿子已经弄出来了。怎么弄出来的呢？“昨天夜里点名，他报数报错了，队长说他没资格打国仗，就开革了，打了一百军棍”。怎么打一百军棍呢？“不是大老爷面子大，就你再几个一百也出来不了呢。”

起初都讲新县长厉害，其实很好说话，前天大老爷请客，一个人老早就跑去了；戴他妈副黑眼镜子……”

他用了几天时间，将这篇小说写了出来。这就是《在其香居茶馆里》。

这篇小说一出，使当时许多暴露和讽刺黑暗的小说黯然失色。它没有停留在描写拉壮丁的悲惨场面和为拉壮丁的尔虞我诈的层次上，而是通过独特的人物和人物关系的生动描写，深刻地揭示了国民党政权在兵役方面的弊政。不是别人，恰恰是那位扬言要整顿“役政”的新县长接受了宴请和贿赂，放出了那幺吵吵的儿子。而新局长的言行，又不仅仅是他个人所为。他的扬言整顿役政不正出自国民党从首脑到各级政府的头头之口吗，出自他们的一项政策吗？这篇小说暴露和讽刺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在这里，不只是因为熟悉的生活有助于作家的深入构思，更重要的是作家对题材的深入开掘，达到了题材的深层，获得了最佳的艺术视角。

小说把艺术框架建立在独特的人物和人物关系之上：联保主任方治国是在新县长扬言整饬役政，为掩盖自己在这方面的劣迹，不得不密报县兵役科，将缓四次的那幺吵吵的二儿子拉去当壮丁的。那幺吵吵这个有一定的势力和靠山却没有当权、很讲面子、吵架不忌生冷的乡绅，是在初次疏通关节未见成效的情况下不得不利用茶馆里的遭遇，挑起同方治国吵闹以至大打出手的。于是独特的人物独特的遭遇，特殊遭遇中的独特的人物，构成了人物和环境的独特性。方治国，这个有“弄得顽强的对手哭笑不得”的“软硬人”本领的小吏，那幺吵吵，这个有实力的、一切行为不顾后果的“火炮性子”的乡绅，两人为着切身的利害争吵不休，当场出彩。前者的狡诈阴险的嘴脸暴露无遗，后者的横行无忌也揭示得淋漓尽致。

小说在整体布局上，着重表现那幺吵吵与方治国争吵不休，俞视学、陈新老爷的相劝和调解，到后来却听说被拉的壮丁已经放回。情节发展波澜起伏，结尾出乎意外又入人意中。试想，那幺吵吵与方治国干仗得火热，双方家属也卷入了冲突，摆开了阵势。可是受那幺太太之托打听儿子下落的米贩子蒋门神却显得见怪他说：“人已经出来了。”在场的许多人难免惊叫：“当真的呀！”情节发展至此，难道不使人感到这是出乎意料的转折。可是这出乎意外的事又并非意料不到的。从蒋门神口里交待：这放人的原因和理由都很简单，新县长其实“很好说话”，请他吃饭，“老早就跑去了。”原来新县长照样热心宴请和受贿，只不过“‘戴他妈副黑眼镜子’而已。遇到这样的县长，又有那幺吵吵的大哥、舅子的暗中勾结，释放那二公子这有什么值得奇怪。小说写到这里似乎可以轧板了。谁知它妙笔生花，写道：“米贩子叙说着，而他忽然一眼注意了那幺吵吵和联保主任。‘你们是怎么搞的？你牙齿痛吗？你的眼睛怎么肿啦？……’”轻松的幽默，达到深刻的讽刺，余味无穷。

小说写那幺吵吵为把密报的事挑明而寻衅吵闹，方治国狡诈而尴尬的苦

笑与退让，俞视学、陈新老爷无济干事的劝解、戴墨镜的新县长虚张声势却照样循私舞弊，等等，都从人物性格的真实和生活本身的逻辑中发掘出喜剧因素，使之具有讽刺喜剧的色彩。其中构成喜剧性的核心，是真实而深刻地揭示出人物假象与本质的矛盾。新县长的整顿役政只不过是一种假象，而邢么吵吵与方治国煞有介事为此吵闹打架，揭穿假象，原来竟如是之滑稽可笑。这种从人物和生活本身的喜剧性矛盾中展示喜剧冲突，比之那些从叙述角度插入噱头、外加一些喜剧色彩的作品高明很多。

小说写茶馆“吃讲茶”的习俗富有生活气息，表现人物性格的语言也富有个性特色。如邢么吵吵进茶馆时，向方治国挑衅：“嗨，对！看阳沟里还把船翻了么！”当俞视学招呼他上面就坐，他含沙射影他说：“你知道么，我坐上席会头昏的——没有那个资格！……”当他向“软硬人”方治国发起攻击时，他显得做作地打了一串哈哈：“好得很！老子今天就要看他是什么东西做出来的：人吗？狗吗？你们见过狗起草么，嗨，那才有趣！……”针对俞视学企图息事宁人，他满脸怒气地嚷嚷：“没有生过娃娃当然会说生娃娃很舒服！今天怎么会把你个好好先生遇到了呵：冬瓜做不做得甑子？做得。蒸垮了呢？那是要垮呀，——你个老哥子真是！”这些富有生活气息、表现力强的语言，将人物的嘴脸和心理都生动、深刻地揭示出来，使人闻其声又活见其人。

这篇小说在揭示主题的深刻性和暴露、讽刺丑恶的彻底性上，在对川西北乡镇乡绅的生活方式、心理特征的准确把握和对乡上环境、气氛的真切描绘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它是沙汀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乡土讽刺艺术的佳作。是他经过认真的艺术总结和思考之后攀上的一个新的艺术峰巅。

在写完《在其香居茶馆里》以后，沙汀紧接着创作长篇小说《淘金记》，继续攀登新的艺术高峰。他考虑到家小的团圆和心情、生活上的安定，以便更好地写作，经请示组织上同意将妻子、孩子迁至重庆，在化龙桥对面的鹅项颈租借国际新闻社的两间房子安了家。从此，他每周星期六至星期一做联络工作，其他时间在家写作。他的创作正在壮丽地井喷，《淘金记》写到第四章，皖南事变爆发了。

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当天，八路军办事处电台就收到新四军总部被围的电讯。周恩来当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交涉。5日以后电讯联系减少，最后完全中断。1月17日蒋介石命令刚刚发布，周恩来就在曾家岩50号过厅内，用手摇电话机打电话痛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天深夜，周恩来得知《新华日报》关于事变的报道和反对蒋介石反动命令的评论被检查机关扣压，报纸开了天窗，怒不可遏，奋笔疾书：“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交身边的工作人员走小路送化龙桥报社填补空白。18日，周恩来还亲自上街散发这张报纸。

那些时日，曾家岩50号所有工作人员都昼夜辛劳。沙汀也经常在那里进进出出。他的任务是听有关人员介绍事变的情况，向文艺界的朋友作宣传解释。

50号连续召开会议，而且一开会往往要到深夜才结束。杨礼又患了中耳炎，需要每隔一天到临江门吕钟灵医院那里去换药。沙汀每天或隔一天就得

往城里跑。有时是头一天带杨礼去治病，第二天去开会。有时是把杨礼送回家，接着又去开会。有一次看完病，天色已晚，只得带着杨礼去开会。走进会议室，他把杨礼安顿在身后靠墙的长椅上，然后专注地听周恩来讲，听与会者发言。当周恩来吩咐警卫员取来一床毛毯搭在杨礼身上，他才发觉孩子已经睡着了。当晚参加会议的人很多。散会以后，沙汀见很难在50号留宿，正有些犯难，周恩来叫派车送冯乃超时，就叫他父子俩同车去文委宿舍寄宿。

50号部署了疏散工作。由于当时时局恶化，南方局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有计划地疏散革命、进步的知识分子。有的组织到延安和别的解放区，有的去香港、南洋，有的去昆明、桂林。艾青、韦菱、舒强、沙蒙、欧阳山、草明、白朗等早已批准去延安，很快分期分批成行。杨骚是福建人，在南洋的同乡、熟人很多，而南洋侨胞在抗战中又有特殊的作用，沙汀在请示以后，动员他去新加坡。他只身漂泊南洋，到建国后才返回祖国。

1月底，疏散工作一一落实，徐冰问到沙汀的打算。沙汀说他正在写长篇小说《淘金记》，舍不得丢下来，而他这人又有些土气，离开四川就写不出小说，黄玉颀也不愿意离川，因此他希望回故乡安县。徐冰问安县的环境怎样，沙汀讲了舅父郑慕周的情况，可以利用郑慕周的关系隐蔽。徐冰点点头说，那你就赶快走呀，这几天周副主席睡不好觉，就为你们这些文化人担心。沙汀问组织关系怎么办。徐冰说就留在南方局。沙汀说：那我就走，我很快就动身！徐冰说：你不同周副主席见见面？沙汀说：当然很想见呀！徐冰走进内院，不多一会，陪同周副主席出来。看见周副主席满颊胡茬，满面倦容，沙汀心里一阵难过。他连忙上前，将疏散的打算简要地讲了。周恩来说：行嘛，就回家乡去嘛！沙汀说：自从我把家小接来重庆后，很少进城工作，我的工作做得少，也没有做好。周恩来说：你在乡下写东西嘛，写东西，当然就少进城嘛！这样一说，沙汀更加难过起来。周恩来对于部就是这样宽厚。这临别的见面，给沙汀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

同50号惜别以后，沙汀就准备启程。他和玉颀连夜收拾行装。以走哪条路为好呢？乘成渝公路的车当然是通常的走法，可是那条路盘查很严。他到两路口车站探看时，发现增加了不少军警，还有一些鬼鬼祟祟的人物。他同玉颀反复商量，最后决定出人意料地绕道走水路。他把这叫做：出奇制胜！主意一拿定，他就拜托舒强买好船票，由舒强将玉颀、杨礼和行李先行送上船。他做出很悠闲的样子，在坡坡坎坎的街上闲逛。他到“文协”总会找以群。以群不在，见到梅林。梅林拿过一张张治中邀请文化界人士吃午饭的请柬，并且说：最好我们都去！沙汀应声说：好呀，我们都去。他们还谈了一些去年一次宴会上的趣闻。他辞别出来，登上观音岩长长的石阶，顺路到白象街看望老舍。他很想将自己的行踪告诉老舍，但是老舍房间在座的还有靳以、姚蓬子。对靳以他当然信任，但对姚蓬子就不便吐露真情。他们一起闲谈，话题转到沙汀的近作《老烟的故事》、《在其香居茶馆里》。靳以说两篇都写得不错，他都很喜欢读。姚蓬子却说后一篇还可以，前一篇不好。他劝诫沙汀：你不要写那些题材吧！他说话照旧粗喉大嗓，唾沫迸溅。老舍看了很不过意，赶紧把注意力转移开。他指着桌上的一只烟灰缸说：你们看这个大家伙，这是专为蓬子准备的。于是大家都笑起来，都去夸张姚蓬子的烟瘾。沙汀悄悄看看表，向大家告辞出门，径直走向朝天门码头。他刚下石梯，忽然瞥见黄洛峰拾级而上。黄洛峰好生惊讶：老沙，这时候了，你还到哪里

去呀？他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随便到河边走走。黄洛峰微微一笑，沙汀也笑了。他匆匆走上了船，在下舱的一个昏暗的角落里找到王颀和杨礼。此时，母子俩斜倚行李，巴望多时。这是一艘汽轮，卖票不限人数，乘船不分铺位。舱内人声嘈杂，烟雾迷漫。启航之前，警察照例进舱检查一番。检查到沙汀的一堆行李时，一个警察忽然说：喝，你们还带了武器！把沙汀吓了一跳。他顺着警察的眼睛看时，原来指的是杨礼的玩具手枪。

正是隆冬时节，汽船迎着凛冽的寒风沿长江而上。航行约4天，到达庐州。沙汀和家小在江边的一家小旅馆住了一夜，次日搭上货船，顺利到了宜宾。当晚他们上饭馆吃了点鲜笋炒肉之类的炒菜，算是过了旧历年，接着又乘船去乐山。宜宾到乐山水浅滩多，木船时走时停，由乘客下船帮助拉纤过滩。每见此情此景，沙汀顿生诗情画意，联想起俄国画家列宾笔下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他们到乐山也只住了一夜。嘉州山水颇负盛名，而当地著名的水产“江团”，也闻之令人馋涎欲滴，可是他们无心观赏和品尝。花了点小费，托旅店的茶房买好汽车票，马不停蹄赶到了成都。在成都一家小旅店住了一夜，于次日叫了两辆人力车，向安县进发。

第七章睢水十年（上）：创作的黄金时代 （1941年春—1945年秋）

皖南事变爆发以后，沙汀经批准疏散回乡。他避居偏僻的一隅潜心创作。他这时的创作是他长时间蕴蓄之后持续的井喷。他后来欣慰他说：“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九年这段时间，是我学习写作以来生产力较为旺盛的年代。”

“我还说过两句笑话，只有抗战期间，我有过类似‘文思泉涌’的情况。这是指我在故乡山区难水关生活那七、八年而言。”从这两段文字可以读出一种笑声。

然而，那时的生活是寂寞而艰苦的。他是在寂寞和凄苦中建造着艺术丰碑，是在那乡场上的一个闹鬼的后房，在山野黄麋哀怨的鸣叫里，在农民们山锄的鉴鉴声中，在一家锅厂后院囚室一般的昏暗的小屋内完成了一部部杰作。在他的这些作品后面闪耀着一个执著、坚韧、诚实的灵魂。

三十五疏散回故乡

1941年2月中旬，沙汀全家回到故乡安县。

他们在杨家大院住了一个星期，搬到了西街郑慕周院内。他们不愿意同杨朝缓一家人住在一起，而且黄王颀受聘担任了位江小学的音乐教师，住在“郑公馆”内，与学校一墙之隔，到学校也比较方便。

“郑公馆”是两进的四合大院。后院的住房宽敞舒适，庭院幽静。郑慕周住正堂。沙汀一家住右厢房。客寓在这里的何迺仁一家住左厢房。

沙汀很快就同何迺仁熟识。何迺仁与巴金有旧交。早年留学法国，信仰安那其主义。抗战初期在粮食部门供职，因揭露其内部弊端，与上司发生顶撞，愤而辞去公职，潜心从事中国农业问题的研究和著述。他很有些愤世嫉俗的傲气，连衣着也与众不同，戴一顶平顶瓜皮帽，穿一件二马据短衫，一双圆头便鞋，拄着很洋气的手杖。他知道沙汀的政治身份，说话无所顾忌，指评时政，讽评世风，谤议当局，甚至大讲蒋介石和宋美龄私生活方面的种种隐秘和笑话。

沙汀常常到江小学去。他对这所学校的感情很深，同许多教师有交情，同马之祥等还有深交。他有事没事都要到那里去坐坐。当时学校进步的空气相当浓，课堂上、壁报上都敢于讲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为欢送青年上前线，师生们还由黄玉颀负责排练了《生产大合唱》，在东门外公园里演出。县党部书记长魏道三也居然前来观看，同群众一起鼓掌。

沙汀同知识界进步人士也有往来。他常同老一辈的李芟荷、同辈的萧崇素、赵槐轩等一起聊天。萧崇素从重庆回乡后，在县立中学任教。他和妻子王映川住在西街妹夫彭丰根的院子里。他常来找沙汀闲谈，有时还相约到十字街口的茶馆里吃茶。萧崇素热情、健谈，尤其喜欢纵论时局，而且旁若无人。

沙汀同县长严树勋也有接触。此人系本县桑枣乡人。北伐前张群在成都任警察厅长时，曾在张群手下当过帮办文书。他之所以热衷来当县长，是混

沙汀：《〈踏青归来〉序言》，载《读书》1981年第10期。

沙汀：《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载《收获》1979年第1期。

资历、图名声。他终日无所事事，外号叫严老婆婆。同乡的袍哥头头挖苦他：“唱小旦也是人干的嘛，为啥子偏要当这个人众讨厌的差事！”他只是淡淡的一笑。他同郑慕周的下属刘俊逸共过事，与郑慕周的关系密切。他来“郑公馆”时，经郑慕周介绍，与沙汀见了面。在一阵客套之后，表示欢迎沙汀到他府上作客。这本来只是一句应酬话，可是后来郑慕周、马之祥、何迺仁、刘俊逸谈起此事，都认为沙汀应该去一趟。因为他们早就注意到，沙汀刚刚回安县，县党部的魏道三和特务头子苟朝荣就制造过舆论，说沙汀可能是奉八路军派遣回乡进行非法活动。沙汀到严树勋那里去做些工作，可以抵制这种谣言。于是沙汀就约刘俊逸、尹策三到严树勋家中造访。他们同严老婆婆闲谈一阵，借机对县党部的造谣发了一通牢骚，说这些谣言毫无根据，其用心昭然若揭。严老婆婆胆小怕事，竭力回避矛盾。他一再打断他们的话，问沙汀在上海住了多久，对上海的印象怎样？他们的这次谈话，对争取严树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周树乾遇到的麻烦，沙汀也帮了忙。周树乾系秀水乡人。曾去过延安，但早已抱病回乡。县党部阴谋按照取缔异党活动法拿他开刀。他们通知他进城谈话。他自恃出身望族，家族又为他壮胆，就糊里糊涂地来了。他住在尚友社的旅店里，做出一副听候处置的样子。党部要他写个书面材料，承认自己是异党，参加过异党活动，说只要这样做，就可以了结。他说他不是异党，也无任何活动，但又不敢说不写材料，更不敢擅自离开县城。一天夜里，他到郑公馆来找沙汀，向沙汀哭诉了一番。沙汀不知他已脱党，对他表示同情。沙汀说你这也太书生气了，你为什么要理他们那一套，大大胆胆回秀水不就算了。沙汀把这个情况告诉郑慕周。郑慕周与周氏族人素有交往，又富于正义感。便在次日上午，在常去闲坐的十字口附近尹策三的杂货铺前，故意大声武气地说：那些家伙黑了心肝！清啥子异党，查啥子活动，人家周树乾得了痨病，天天吐血，硬把人家搞到城里来，真要把人拖死才心甘吗？郑慕周素有声望，号召力强。左邻右舍的人，过往的人，都来帮腔，街头一片喧哗。周树乾确实正在咯血。他见有人为他撑腰，增加了几分胆量。结算了房钱，雇了一乘滑竿，回秀水去了。这出戏演得很好。正像居民们所说，那些党棍连一个喷嚏都打不出来。不过这以后，沙汀很快就看出城里的特务活动加强了。4月间，党部门口新挂了一副吊牌：中央军校毕业生通讯联络处。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个特务机构。打那个招牌的，正是苟朝荣等人。苟朝荣其人满脸横肉，心狠手毒。只不过县长还并不听他摆布，暂时没有实权。

但在“军统”的牌子挂出不久，成都行辕委派的洋特务杨穗，堂而皇之地到县城来了。此人行伍出身，身佩中正佩刀，操着党棍常用的语言。他是来正式筹建特委会的。到后的第二天，按例行的拜码头的规矩，拜望了郑慕周。言谈之中，他故意扯上了沙汀。说他一直关心着沙汀。在沙汀从重庆启程的时候，他就派人和沙汀同车，护送到绵阳。这当然是一派杜撰的话。可是郑慕周却因此心情不安。他要沙汀“避避煞”，以防不测。沙汀认为国民党反共高潮已被打退，他们暂时不敢胡作非为。郑慕周根本不听他的书生之见，安排他到何家沟谢象仪家避居。

何家沟在城东七八里地。是一带岗峦起伏的浅丘。山丘林木葱茏，山沟阡陌纵横。谢家的住宅在一片竹树掩映的山坡间。这是一排西式的瓦房。格局雅致，门面宽敞。谢象仪为沙汀腾出一间客房，隔窗可见茂林修竹、汨汨小溪和漠漠水田。室内挂着名家书画，书橱内有一部完整的二十四史。这样

幽雅的环境是很适合养怕性情、潜心写作的。可是沙汀才住四五天就感到焦躁。从繁华的大城市陡然来到偏僻的县城心里的落差就相当大了，现在落入这寂静的山林，看白鹭孤飞，听溪水低吟，一阵寂寞之感油然而生，心情就有些烦躁了。

幸好结识了一个小伙伴。这是谢象仪的老四，初中毕业，养病在家，性极机灵，嘴也很甜。他见沙汀闲着无事，就亲热地叫杨二哥一起丢钓鱼、沙汀极喜吃鱼。故乡的沙沟鱼、黄腊丁、经晒干油酥了的麻鱼子，是他心目中的美食。他少年时代也喜欢捉鱼。曾在碾房上的拦河捻，将涮笔、溜筒插在卵石笼烫里捕捉黄腊丁、火烧鞭之类。谢老四的相邀，唤起他对少年时代生活的眷恋。于是欣然跟着初中生越过山丘，穿过大路，来到石棺材下面的安昌河边垂钓。初中生钓鱼的方法与他过去的方法不同，是将三尺长的钓竿插在笼篾缝里，让钓钩沉入水中引鱼上钩。他把这叫做“竿竿钓”。他分派沙汀照看三根钓竿，使得他目不暇接，再也没空想心事了。

沙汀在何家沟过着闲散的日子。每十天半月也偷偷进城住一两天。谢象仪每日必进城坐茶馆。有时益园茶社摆围鼓，到深更半夜才回家。他每次回家都要到沙汀这里坐坐。这个已属长辈的人视沙汀为上宾，什么心里话都向沙汀说。他说他平常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但那次红军路过川西北时，他轻信谣言逃往成都，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场。这人的思想已有很大转变。他知道沙汀的身份，很乐意让沙汀在此隐蔽。后来沙汀避居脏水，他的一个同母兄弟，浑名谢聋子的，受特务收买，准备以亲戚的身份去探听沙汀的下落，以便诱捕沙汀。他知道了，痛骂了一顿：聋子，你胆敢去碰杨二哥一下，老子就会像捏饿虱子一样整死你！聋子只得悻悻地告饶了事。1949年底解放大军进县城时，谢象仪不仅没有“逃难”，当他发现大儿子勾结叛匪密谋袭击军代表，还大义灭亲，作了检举揭发。

在何家沟住了一段时间，杨穗奉调回成都，沙汀也就回到县城。这些时候，尽管镇长杨献之被杀后，在谁继任镇长的问题上斗争激烈，但局势趋于平静，完全可以重新提笔写作，可是沙汀仍静不下心。临近学校放暑假，他还向马之祥、刘逊如建议办个暑假补习班，他也来任点语文课。不过此时又出现了新的情况，使他的生活发生了转折。

一天上午，刘俊逸前来向郑慕周密报：县政府刚刚接到成都行辕密令，逮捕沙汀、萧崇素、周光复、周树乾、王映川归案。

郑慕周一听到这个消息，心情十分紧张。他叫来沙汀，不容有半点犹豫，要沙汀去睢水隐蔽。时间已是晌午，午饭已经摆上了桌，也不容迟缓。此刻何迺仁也来了，劝沙汀走为上策。他说疯狗咬人是无所顾忌的。他分析这个逮捕令与杨穗有关，此人离开安县前就曾扬言沙汀、萧崇素等并非什么“本份人”。焦急中的郑慕周还不免责怪沙汀不该离开延安，不该回安县。沙汀无话可说，赶紧去向黄玉颀辞行，然后在马之祥的陪同下走出校门，坐上一辆人力车，疾疾登程。当路过国民党党部的大门时，正义感很强的马之祥还啐了一口：去你妈的！

沙汀乘车出城门，便由郑慕周指派的当差苏朝贵专程护送，前往睢水。

三十六著名“三记”之一：《淘金记》

睢水在县城西南75里。地处安县、绵竹、茂汶三县交界处。这个角落原

是郑慕周手下当过营长的唐盛安的天下。后来唐盛安一手栽培的伙快出身的孙昌明力量强大，同主人反目为仇。在同唐盛安的三兄弟、浑名唐五驼子的纠纷中将其全家和唐盛安杀害，霸占了眼水。郑慕周动员了桑枣、秀水和附近绵竹县一些乡场的武装力量四面围剿，才将孙昌明的势力铲除。当地现任的乡长、唐五驼子的妻兄袁寿山就是在这以后才出头的。据郑慕周说，袁寿山是绝对听他的招呼的。一个多月前此人进城参加县参议会时曾向郑慕周一再表示，如有必要，沙汀可以到睢水隐蔽。

睢水给沙汀的第一印象很不错。它地当通往茂汶的隘口。西北是高山峡谷，东南是浅丘平川。场上只有两百多户人家，平场天冷冷清清。公鸡懒散地拍着翅膀，猪仔悠闲地转游，从山间飞来的岩鹰在空中盘旋。

袁寿山的住宅在进场口不远的地方。是一座两进的大院，后院有一幢三层的楼房。沙汀由苏朝贵引路到后院见过袁寿山。苏朝贵把郑慕周的嘱咐转告了袁寿山。其措辞不免过分生硬：郑旅长说，就把这个人交给你了，绝不能有任何意外，不然就要用你的肚皮来点天灯。袁寿山的神色当然有些紧张。这个向郑慕周夸下海口的睢水一霸，事到临头也有点怯火。他把沙汀安排在楼房的三楼上，一再叮嘱不要上街露面。

这顶楼的房间宽敞明亮。站在窗前眺望，从西山峡谷奔腾而下的睢水蜿蜒而过，河对岸是开阔的河滩，点缀着几座零散的石灰窑，河滩过去是碧绿的田野，苍翠的山岗，地平线上黛色的山影。

美中不足的是这木结构的楼房上面没有加盖顶棚，被太阳烘烤得如同蒸笼一般。沙汀初住下还觉得不错，不上几天就心烦意乱，食欲大减，身上长起疮来。袁寿山差人从绵竹县拱星乡请来医生，悉心调治，才逐渐减轻病痛。那位乡村医生给沙汀的印象很好。他每隔一天就来换一次药，往返 30 余里，翻山越岭，不辞劳苦。后来沙汀每每生病就想到了他。《医生》就是以他为原型写的。

住在这偏僻的山乡，生活毕竟安定得多。而安定就会带来平静，平静也就容易引起各种回忆。沙汀回忆起回故乡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城镇居民的保守落后，反动派清查异党引起的动荡不安，杨穗的作威作福，苟朝荣的心狠手毒，于是情不自禁进行着艺术构思。他写了短篇小说《艺术干事》。描写艺术干事和他的妓女出身的情人开放的性格及其在小城引起的种种非议，讽刺了市民的保守落后。所写的这对情人，采用了汶江小学教体育的吴老师夫妇的某些素材。两夫妇确曾因手挽手逛街和下河游泳引起种种议论。他还写了《小城风波》，通过几位小学教师对清党不满的心理和情绪的生动描写，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活动的背离人心。其中被称为幽默家的刘老师，被尊为学校元老，机智、稳重的牛老师，颇有威信、沉默、耿直的孙校长，正患肺病、好强、小气的小顾等都是以他熟悉的汶江小学教师为原型创造的。教师们议论到的党部部长魏洋人，洋特务“套裤”，将敢于顶撞的小顾逮捕的毒辣的土特务苟琳，则显然是影射魏道三、杨穗、苟朝荣的。两篇小说都写得真切。《艺术干事》写山城的环境气氛富有特色。《小城风波》写人物用笔省俭，勾画准确。不过前者是凭着对县城的总体印象写的。着意在向旧习俗挑战，人物描写不够充分。后者的影射之笔，稍嫌直露。这篇作品寄卞之琳交付《天下文章》发表时，听从卞之琳的意见，删去了最后几句，去掉了不必要的尾巴。

写作确乎是治理情绪的良药，沙汀的心情大有好转，创作的热情再次高

涨。那些对日，与他作伴的袁琳也帮了他不少忙。这个小青年是袁寿山的长子，绵阳中学毕业，在家补习功课，准备去成都投考大学。他对父亲鱼肉乡里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一心想远走高飞。对沙汀则非常崇拜，伺候十分殷勤。他住在二楼，见三楼热得难受，就腾出房间供沙汀写作之用。沙汀也抽时间给他补习国文。

这期间，袁寿山为沽名钓誉，大兴土木，修建了睢水中心小学。他见沙汀到睢水后并没有引起大的麻烦，又了解到沙汀的亲属大多是有经验、有水平的小学教师，就挽留沙汀长期居住，并把亲属迁到这里的中心校任教。沙汀同意了这个意见，于是袁寿山便八方奔走，将沙汀的妻兄黄章甫从秀水调来任睢水中心校校长，将黄敬之从仁寿县文公场调来教国文、图画，把黄王颀接来任音乐教师。沙汀的新居完全由袁寿山、袁琳监工修缮。那原是唐五驼子的旧居。地址在场口外，与其他街房背水向街相反，背街向水。门前俨然像一座寺观，有一带高高的砖墙，一副宽大的双扇漆门。门口有数级台阶，两旁有一对石磴。门前的睢水岸上有两株高大的核桃树和皂荚树。门厅经修建为一排五间整齐的住房，后院的两幢西式楼房，已于孙、唐两家的火并中焚毁，除净瓦砾，开垦成一片菜园。后院有一条狭长的巷道通向街道。

把家安好后，沙汀正准备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创作，此时发生了一场虚惊。这天郑慕周派人前来告警：城里的常备队正全副武装向西南方向开来，务必火速下乡隐蔽。沙汀赶紧率全家转移到乡下。可是后来却没有任何动静。原来常备队是到秀水办案，并未前来睢水。

这以后，沙汀觉得不能在家里平静地摆下书桌。经与袁寿山多次商量，采取了一个稳妥的办法，即只身躲到场西刘煦之酱园铺的后房写作。那是随山坡修建的一间屋子。去那里要像上楼一样转弯抹角拾级而上。据传那黯淡的房间常常闹鬼。每每夜深人静，会听见鬼吃饭时盘碟碗盏磕碰的声响，所以长期无人居住。沙汀觉得那地方很不错。寻觅进屋极其不易，屋后又是长满杂树、灌木、茅草的山坡，如有情况，可立即从后门上山，西入峡谷，遁入深山。他就在这里与鬼作伴写作。

沙汀在此完成了他创作道路上最重要的艺术丰碑《淘金记》。

《淘金记》的写作在重庆时已经着手。此作有一个长时间的构思过程。

早在1937年沙汀从上海回故乡时，他就有了创作的念头。当时前线烽火连天，爱国志士流血牺牲，大后方的安县，地主豪绅却如蝇逐臭地竞相淘金，闹得乌烟瘴气。“人们对于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倒也并非完全无动于衷，一般富有者的反应特别强烈：他们显然已经十分敏感地从抗战预见到了发家致富的简便途径。”

沙河认识一个曾在上海行医的医生。这人曾留学日本，医术高明，作一个大手术的收入可以吃上半年。他因多次掩护和医治到上海治病养伤的我军将士而受到尊敬。抗战爆发后，他同祖籍安县的妻子回到四川，原准备在成都开业，尽其所长为民众服务。由于轻信妻子的怂恿，贸然放弃了原来的打算和专业，参加了小县淘金的竞争。后来夫妻俩弄得两手空空，闲居陋巷，被市井群众笑称为“流浪人”、“流浪汉”。这件事给沙汀的触动很大。他说过：

从上海回川不久我就想到了这个主题，我看见一批士绅，他们的确被抗战弄兴奋了。但

是他们落下来的地方不是抗战，不是为祖国效劳，而在如何牟利，因为金价陡涨，他们终于买了一架吸水机来，跑进山沟淘金去了，竟连一两个有着正当职业的青年，也都立刻收旗卷伞地参加进去。于是

我想，抗战在大后方，把人们的私欲，更扇旺了。

1938年至1940年，经过延安、华北去来，沙汀的视野更加开阔。他对国民党上上下下发国难财的现象认识更加深刻。抗战开始以后，利用战乱发国难财已成为从四大家族到城乡头面人物普遍的行为。由战前靠打内战起家的四大家族，在“强化国家资本”的幌子下，假借“发展战时经济”、“开发资源、抗战建国”等名义，迅速扩张官僚资本。他们大肆进行财政金融的掠夺和工商业的垄断，通过膨胀通货及各种投机活动，把战争中的一切负担强压在人民身上。他们的财政金融掠夺中的一项重要投机活动，就是采用“出售”与“存贮”黄金的方式实行所谓“黄金政策”。这种政策实质上是以黄金投机去代替战前在港沪一带的外汇投机。实行这种政策后，不仅通货继续膨胀，物价也因金价带头上涨而上涨得更快，这就给他们造成了大发横财的时机。在这种背景下来看安县的淘金热，就可以看到绝非一时一地的现象，看到它与四大家族的活动的内在联系，看到它的社会和历史原因。

由于认识的提高，沙汀创作的积极性更高，构思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时候，我一九三七年在故乡逗留中对于豪绅们竞相淘金这件事的看法，也愈益明确了。

因为在四大家族的带动下，在国统区的城乡大小头面人物中间，所谓“发国难财”已经成为一时风尚；其途径也不止于淘金，益发感觉有揭发的必要。

当我回转大后方时，我的信念变得坚决了。我所看到的并不是一时一地的偶然现象，它们已经广阔起来，深刻起来。

于是，沙汀调动着他生活的积蓄。他的“全部经历、记忆活跃起来”。他对淘金的生活是非常熟悉的。他开始记事的时候，常去看东山上的淘金，自不必说。抗战以后，久已沉寂的山坡又热闹起来，印象更加深刻。一方面是金价上涨，每两由50元大洋上涨到90元至150大洋；一方面是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加上连年灾荒，许多农民背井离乡，淘金所雇用的劳动力价格低廉。一帮土豪劣绅、地主恶霸、伪乡保长见淘金有利可图，各霸一方，倚势逞强，办厂淘金。东山有的大的金厂雇有金伙子20余人。一天可淘金二三两，价值二三百元，相当于黄谷五六十担。一时间，淘金成了这个县城上层人物发国难财的主要途径。他对县、乡基层社会组织的形形色色以及许多头面人物也是十分熟悉的。安县城乡由基层政权、土豪劣绅、封建袍哥互相勾结，构成国民党统治的基础。其中袍哥组织密如蛛网。一个10多万人口的小县竟有袍哥3万多人。许多乡绅、袍哥的头面人物，他从小就认识，以后回乡又多次接触。他对他们的经历、性格、生活习性、语言习惯都非常了解。长期留在记忆里的四叔杨治修、表叔陈吉仁、桑枣龙佐卿、何寡母及其子大烟鬼何干青，秀水曹朴斋等等，几乎呼之欲出。他们为他创造典型人物形象提供了基础，成为艺术概括的原型。正是由于生活积累丰富，构思十分成熟，他写来相当顺利。他有时可以写六七千字，几乎没有停滞的现象。

沙汀在谈到这部作品的创作时说，为了情节的紧凑、单纯和，他“只集中在这一点写：为了满足陡涨的私欲，在一批恶棍中展开着怎样的一种斗

沙汀致以群的信，载《文坛》第5期。

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载《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

争”。这部作品正是以竞相淘金为中心线索，描写了三种恶势力之间“狗咬狗”的斗争。其中白酱丹、彭胖、龙哥的这股恶势力，由于有保甲组织，土豪劣绅、封建袍哥三位一体的代表龙哥的参与，依靠政权的力量取得了胜利。他们为霸占笏箕背金矿的开采权，采取了种种步骤。第一步是趁何寡母外出收租未归之机，诱骗任性而无能的何人种上当，以造成开矿的既成事实，迫使何寡母承认。第二步，即第一步未完，立即与另一股势力——林么长子为首的一帮流氓、赌棍达成默契，背着何寡母强行开矿。事情被发现以后，由当权派、联保主任龙哥出面“调停”，逼迫何寡母赔偿开采花去的费用，使得何寡母“赔了夫人又折兵”。第三步，白酱丹拉拢何寡母的侄儿邱娃子，利用何府后裔的名义取得笏箕背的主权。第四步，终于依靠县政府和县的上层人物的支持，通过“立案”的形式霸占了笏箕背的矿产。这四个步骤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步和第四步。而这两个步骤都是在政权的支持下实现巧取豪夺的。作品着重写了白酱丹为最后取得开采权而出入于县城头面人物之间的情景。白酱丹“在县城的第四天上，公事就到了县政府”。其中“最重要的，那个满口承认帮忙的县政府的秘书毕竟叫他恭候到了”。这个深知“党国”内情的政府官员对何寡母的上诉“浮着机敏、深沉的微笑”，加以驳斥说：“全国都通行的，就是找委员长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就是他代表政府在白酱丹明目张胆地掠夺何寡母私产的“公事”上的意见。不过，这个“行政上的重要脚色”，很快就公开了他参与白酱丹、彭胖、龙哥一伙发国难财的面目。作品正是通过这许多生动的描写，通过情节发展的趋向，把一场淘金之争与基层政权性质和作用的揭示密切联系起来，增强了深层意蕴和历史感。

这部作品写了40多个人物。其中着重描写、给人印象深刻的有七八个。他们有着剥削阶级为聚敛财富而贪得无厌的共性，又有着鲜明的个性。例如白酱丹的阴险狠毒、诡计多端；林么长子的狡猾欺诈、油滑无赖；龙哥的横行无忌、粗野鄙俗；何寡母的刻薄吝啬、矜持自负；彭胖的面带猪相却满腔狼心狗肺。作品在表现这些人物时，注重把握他们在特定环境中思想、情绪的丰富性。

白酱丹是最具有个性特征的典型形象。作品先对人物的出场作了简洁而有特点的介绍：这个人“和蔼可亲”，但使人不敢亲近；早已是没落绅士，但“普遍对他感到畏惧”；他的“家产早已玩光”，但却“很是神气”。他靠了什么？一是靠既是绅粮又是大爷和他那“无穷无尽的诡计”，二是“靠着北斗镇上掌权的人物”。接着，作品就围绕这个政治恶棍的善施阴谋诡计、善于利用当权派的权势的特点，从人物的行动上展开揭写。他可以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到笏箕背走一遭就掌握金矿的全部情况。他抓住何人种的愚而好自用的特点，一阵胡吹瞎捧，使之顺从和就范。他一手导演了开挖笏箕背的闹剧，当何寡母出来撒泼时，他一面“和善的说服”，一面强硬地警告这是“堂堂的党治国家”，真是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他在强行开挖笏箕背的事泄露后，立即抓住龙哥贪得无厌而又横蛮逞强的特点，利用龙哥在镇上握有权柄的“优势”，怂恿其出面处置，不仅变被动为主动，而且大获全胜。他可以略施小计，用“玩麒麟灯”来代替玩龙灯、狮子，既掩人耳目，又满足了龙哥的欢心，如此等等。

何寡母也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她的地位正在衰落，但又竭力保持自矜自持的大家风度。她的处境十分被动，但又从不甘于寂寞。她在角逐中明显地失败，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认输。她对佃户极为刻薄凶恶，但在有权势的人面前却无可奈何。

她很讲排场体面，但面临失去祖坟的主权时，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她为了了解白酱丹与邱娃子往来的情况，一反凶恶的常态，对邱娃子百般爱抚，但在一旦知道真相以后，立即“带点狂气”地叫邱娃子“滚，滚，我何家没有你这种东西”。作品生动地描写了何寡母矛盾的境遇，矛盾的心理状态，把一个处于颓势的女地主的特征真实地勾画出来。

作品在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时，当然也包括了人物质的规定性前提下的特殊性。何寡母吝啬、刻薄、顽固，但她在何府内对何人种也有母亲的娇纵和宽容，对何人种与女人的“调笑”也表现出“慈爱和严肃表情”。林么长子凶狠歹毒，但在心情愉快时也会“发善心”，甚至劝阻一个恶棍不要去欺负穷苦的金伙子：“就要上吊，也找大树子吧！”即使白酱丹这样的阴险毒辣的政治流氓，在家庭生活中也有“宽大为怀”的一面。尽管对那丑陋多病的女人，他一直看不上眼，但当女人向他要口粮时，他也“忽然感到难过起来”。对他那怯生生的女儿，他也很不喜欢，可是也要说些“看将来怎么样升学”一类关心的话。作品为表现人物个性特征，特别注意精心选用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有些是勾勒人物嘴脸的细节，如写龙哥的领扣常常敞开，只在进城见县长时才勉强扣好；写龙哥吃滚烫的羊肉粉时，高兴地叫一声汗水都胀出来了。有些是刻画人物心理活动的细节，如写白酱丹为拉拢邱娃子而廉价地关怀和许诺，后来觉得不需要这个“工具”时，哪怕邱娃子跟上门来甜密地喊他舅舅，他也可以“乓地一声把门关了，而且从此不再记得他还有个外甥”。有些是描绘特定境况的细节，如写叶二爸祭神时人、鬼混淆的颇含讽意的场面。所有这些从生活中积累的细节，对于表现人物的个性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部作品的讽刺艺术也臻于成熟。它较少揶揄的讽刺，较多含蓄深沉的讽刺。这种讽刺不是第三者从旁的讥评，不是字里行间的俏皮，更不是漫画式的夸张，而是通过讽刺对象内在矛盾真实而精确的描写，达到鲁迅所说“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艺术效果，它是对俄国果戈理、契诃夫和我国的《儒林外史》现实主义讽刺艺术传统的借鉴和继承，又有自己的创造和发展。果戈理“不讽刺大官”；契诃夫的“抗议是调和性的”，对敌人有时“露出哀伤的微笑”；《儒林外史》也未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的社会制度，而是向往儒家的礼治。作为清醒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者，沙汀洞察了国民党反动派上上下下发国难财的实质，看见了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因而他的讽刺超越了对丑行的一般的道德谴责和爱憎感情，深入了事物的本质，揭露了讽刺对象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通过不露声色的剖析，通过人物和人物关系真实的描写，让人们同作家一起看到形成讽刺对象的社会制度必然走向毁灭的命运。在手法上非常含蓄、冷峻，在讽刺的意蕴上十分深刻、深沉。这部作品的整个艺术框架就是构建在暴露和讽刺的基石之上的。一伙政治流氓、基层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参见鲁迅：《致萧军》（1935年10月29日）。

卢那卡斯基：《它·巴·契诃夫在我们今天》，见《卢那卡斯基论文学》。

官吏、封建袍哥竟然堂而皇之地用国民党反动派“发展战时经济”的口号以发国难财，这就是绝妙的讽刺。这伙人为霸占矿产，可以把“利国公司”的破旗举得高高的，但一旦另有所图时，又可以立刻把它抛得远远的，这就是绝妙的讽刺。国民党政府颁布“禁政”了，于是挂起“鼓吹休明”的匾额，拼凑了戒烟分所，弄上一个烟鬼担任所长助理，一面勒索上门戒烟的瘾民，一面走私贩烟，戒烟所成了贩烟所，这就是绝妙的讽刺。当权派龙哥到处夸耀他对北斗镇的“功绩”和“贡献”，与此同时却像土匪一样进行勒索和掠夺，表面上做出一副“毫无打算、毫无恶意”的样子，实际上“毫无愧色地攫取任何自己高兴的事物”；白酱丹把抗战建国一类的官调讲得叮 响，骨子里却盘算着自己的“发迹”，明明侵犯了他人的祖坟，却冠冕堂皇他讲什么“法律保障”，公然到戒烟分所办公事，又明目张胆地走私贩烟；无用、任性的何人种自吹自擂什么都不怕，实际上成为白酱丹手中的玩物，本来他已上钩，却偏偏说自己“就是粪桶也有两个耳朵嘛”；林么长子白翎很有头脑，自以为见多识广，却在众目睽睽之中瞎说什么日本是靠德国飞机打起仗来的，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绝妙的讽刺。马克思说，喜剧的特征是“用另外一个本质的假象来把自己的本质掩盖起来”，揭示这种矛盾就会形成讽刺。

这部作品也是浓郁的社会风俗画。它把握住了川西北城镇社会心理、风尚习俗和自然景色的特点，准确、生动地描绘出来。白酱丹这个富有特征的外号，他的花缎背心、银质牙签的响水烟袋；地主婆何寡母操持门面自负，她头上的黄金挖耳，手上的描金茶壶；捐班出身的大爷彭胖斤两必较的吝啬，他的收猪牙巴骨加萝卜炖汤的嗜好，喜好刮脸来消遣，乡镇上茶馆的喧嚣，林么长子等人的饮茶习惯，年节中玩灯的场面，狂赌的乌烟瘴气；那代表“大后方繁荣”的游娼，那各具特色的烧大烟的设备，等等，都具有乡土气息。这些真实的社会风俗描写，不仅有助于人物的刻画，人物环境的描写，还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淘金记》完成于1941年9月。书稿寄重庆，以群将部分章节用《筲箕背》、《北斗镇》等篇名在《文艺阵地》、《文学创作》等刊物上刊载。1943年作为巴金主编的“现代小说丛书”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这部作品出版后，老舍曾在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给予高度的评价。四川、贵州等地的《文哨》、《时与潮文艺》、《华西晚报》、《华西日报》、《大星报》等报刊先后载文评论。卞之琳在《读沙汀的 淘金记 》一文中说，这部作品“是抗战以来所出版的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我不管纸张恶劣，印刷模糊，而一口气从头读到了最后一页”。他将这部作品同当时一些作品对比，肯定了它的现实主义艺术成就。他说：“只填公式，只描定型，正是我们许多新小说的通病。我们大家抱住了写实主义的教条或者标榜着新写实主义理论，不尝试也不容许独特而多样的创作活动，囿于一般性而忽略特殊性，耽于抽象的空架子而不接触到实地，结果产生出来的大多倒其实是坏意义上讲的浪漫主义作品。《淘金记》至少是给了我们以一片真切的人生。多少场面都非常活栩。”他还说，这部作品“主要人物如林么长子，白酱丹，何寡妇，何人种，彭胖，龙哥等无不真所谓脱纸而出。”李长之也在一篇文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

载《文哨》第1卷第2期。

章中，赞扬这部作品内容“深沉”，“人物全然精彩”，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叫人不满意”，可以称为“乡土文学中之最上乘的收获”。

《淘金记》在得到肯定评价的同时，也受到过一些批评。例如冰凌和吕荧认为，这部作品是“典型的客观主义作品”，是“师承了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对这种观点，已有不少评论家进行了分析和批评。一、《淘金记》不同于客观主义、自然主义的照相式地记录生活、罗列现象和展览丑恶，它通过对丑恶本身矛盾的暴露来否定丑恶，从而表现了对生活本质的深刻的艺术把握；二、《淘金记》没有回避社会的、道德的、美学的评价，它对所描写的形形色色都从真实的画面中体现出倾向性，而且同当时的社会政治联系起来，加以深刻地暴露和讽刺；三、《淘金记》十分注重艺术概括和典型化方法，它在生活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概括，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又概括了一定社会生活本质的人物形象；四、《淘金记》对生活不是冷漠和麻木，它是通过对黑暗的否定，从反面来表达追求光明的社会理想。它不是引人悲观丧气，而是使人嘲笑所暴露和讽刺的群丑。

在建国以后的评论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淘金记》“对生活中的正面力量缺少表现”，“正面人物缺少”。其实沙汀在构思这部作品时，有意识地避开了金馥子生活的描写，这恰恰是一种高明和机智，这样就避免了勉强去写他所不熟悉的生活，也避免了在没有生活依据的情况下去勉强编造那些“反剥削反压迫的反抗斗争”之类。而且沙汀是为了作品的集中紧凑，才设置了这样的艺术框架，深刻地体现了它讽刺的深层意蕴，也正是卞之琳所说：“比别的任何小说都能摒绝旁骛，而集中主题，以致针线缜密。一笔不苟，洵属形式与钩心斗角、花样百出的内容，恰相一致的一出完整的戏剧”至于能否认为没有描写正面人物的讽刺文学作品就没有正面力量呢，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谈到果戈理的作品时说：“谁也不想从《钦差大臣》中寻找理想人物，但是谁也不会否认这个喜剧中存在着理想。”沙汀也认为：“现实主义的所谓跨过现实一步，并且给予新的成份，这不仅限于肯定的一面，在否定的一面，也可作如是观的。”《淘金记》的正面力量。正表现在作家对所描写的人物和故事鲜明的倾向性上。从一定意义上讲，作家本人就是作品中虽不形之于纸而实际活跃于字里行间的正面形象。首先，这种正面力量和正面形象贯穿在对人物的讽刺中，体现在对人物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的暴露性描写之中。其次，这种正面力量和正面形象也表现在对人物没落感的形象把握中。作品中人物各不相同，但没有一个不处于颓势，即使像白酱丹这样凶恶逞强的人；靠淘金发迹也只是一场梦。再次，作品还通过北斗镇上群众的眼睛，表现了对各种丑行的评论，显示了正面力量。例如作品叙述道：“在镇上一般市民当中，关于秘密开发筲箕背的事，起初总是充满了嫉恨来谈论的。既然认为白酱丹、幺长子的作为过于五毒，像何寡母那样的人的确也值得收拾一顿。至于认为值得收拾一顿的理由，因为她家的生活太写意了。而且在这镇上，又是没势力、没地位的；而且，好高，怪吝，常常是一毛不拔！”这类群众心理的描写，随着情节的发展自然地出现，也符合当时一般

李长之：《淘金记、奇异的旅程》，载《时与潮文艺》第4卷第2期。

卞之琳：《读沙汀的淘金记》，载《文哨》第1第二期。

参见斯捷潘诺夫：《果戈理的戏剧创作》。

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载《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

人的认识水平。它体现了北斗镇市民的眼光，反映了客观现实。现实主义认为，文艺作品在真实地描写现实关系时，同时也在说明这种现实关系，在对它所再现的现实关系加以思想的判断。《淘金记》对现实关系的说明和判断，完全包含在它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深刻的描写之中，包含在它的叙述语调之中。而这正是作品中的正面力量和正面形象。

三十七侧身“壕沟”心弛华北

沙汀写完《淘金记》以后，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他多次步出场西，溯睢水而上，到约3里许的大拱桥游览。这座桥是通往茂汶的必经之地。是一座圆弧形的单孔石桥，长20多米，高约8米，桥面有石梯78级。桥的两旁石栏杆上刻有图案花纹，桥柱上刊有楹联：“鱼洞山前悬半月。虎头崖下卧长虹”。据说这座桥是嘉庆四年由乡人林贤相倡议修建的，迄今已100多年，仍然像睢弓一样搭在河上。他也常常在晚饭之后，出门向东，沿睢水而下，到邓家碾一带游玩。在那里听湍急的流水冲动木轮、带动碾磨哗哗轰轰地交响，与碾米、磨面的农民交谈。有时月明星稀，他还带起家小，走过袁家纸厂专用的木板桥，到河对面的一带草场、田野散步。玩到高兴的时候，吼几句京戏，听声音在静夜中回响。渐渐地，他的胆量越来越大。晚上还上街坐茶馆，与茶客们聊天，了解当地的社会状况和风俗民情。遇到川戏班子到场上演出，还和街邻和乡里人一样，兴致勃勃地去看夜戏。

在平静的日子里，最容易引起往事的回忆。每当沙汀独自一人踏着溶溶的月色信步睢水之滨，就总是想起延安。想起华北敌后的生活，想起那广阔的平原，那纵横的驰骋，那通过封锁线紧张、激动的夜晚。他心里一会儿荡起一阵激越之情，一会儿升起淡淡的惆怅。他孕育着小说《闯关》。

不过，这种安定的生活并没多久，反动当局又加紧了对他的侦缉。1941年10月，成都行辕就曾电令侦捕沙汀，严树勋搁置未办。1942年3月，“黄靖蜀”省审密寅支电严饬缉拿沙汀解省，继任县长任翱亦未遽办。5月5日，“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支电再行严令迅捕奸伪重要分子，除杨只青（沙汀）外，又加捕周述前（乾）、文尚甫（即尚青）、萧崇素、王兰英（映川）、周光复等，共为六名”。5月10日，任翱遂一面叫第二区指导员唐开运调查沙汀等的行踪，一面给省政府张群去了一私函，说“杨只青早离汶江小学校他往，密捕未获。萧崇素及其妻王兰英与周光复平素并无不法行为，且系殷实富庶之家，考厥原因，实由地方派系争执，互相倾陷”。16日，任翱得到唐开运的查报：“1.杨只青常来往睢水乡正绅袁寿山家，与当地中心小学教职员时相往来，反动事迹，确未发现，现已赴蓉月余矣。2.周述前住家秀水乡，每日出街甚少，出即赴该乡中心学校与各教职员周旋，反动事迹，毫未发现。3.文尚青又名尚青，住家沸水乡，去年由陕回家，十余日即赴蓉，今尚未归。”27日，任翱呈复成都行辕，说“此案发生，实由地方派系争执，互相倾陷，该杨只青等六名，查无奸伪证据耳。安县民性慍悍，若遽逮捕，势必引起地方重大纠纷，请免予捕解”。与此同时，即5月中旬，迅捕杨只青等六人解辕的密电泄露，萧崇素、王兰英联名和周光复先后向县府提出了抗议，要求保障人生安全。成都行辕对此项泄密事件十分恼火，部署民政厅出面主持调查。民政厅视察室视察员宁琦乃于7月下旬到安县调查，写了一个报告。宁琦对泄露的情况也没有搞清楚，只是说并非任翱所为，但他负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提到杨只青时说：“杨只青、萧崇素、周光复等三人过去确曾染奸党，色彩尤以杨只青为著”。“杨只青曾作《法律外的航线》一书，署名沙汀，具体表现思想之错误。又尝在陕北抗日大学教书，其为奸党分子，已无疑团。后因生活窘迫，遂挈眷返安。常住睢水乡士绅袁寿山（舵把子）家，与当地中心校教职员及各故旧时相往来，萧崇素、周光复亦不时与之过从。原有家在县城西门外，但其房舍早已租典与人，家业亦多为其兄售散。闻娶有两妻；异地面居，生活颇有飘零之感。至于反动事迹，则各方均尚未侦获讯据。早在其舅父、前旅长郑慕周所创汶江小学任教，亦未被查得不轨实据。安县县党部书记长魏开贵曾促劝自新，终不肯认。闻三、四月前已离安外出；一说仍匿名袁寿山家。”宁琦的报告于7月23日上报，7月28日省主席张群等批阅。8月初，在成都行辕的再次严令下，萧崇素、周光复先后被捕。沙汀由于得到郑慕周派人传来紧急消息，迅即下乡隐蔽，幸免于难。

后来查证，经过情形是这样的：这天上午，县党部的行动组组长亲自率部去睢水逮捕沙汀。其部下害怕地方势力阻挠，难于对付，向郑慕周手下的当差安荣富借枪。安荣富一字不识，却十分机警。他探问到对方出动的方向以后，以回家取枪为名，立即向郑慕周报告。郑慕周略一沉吟，一扬手道：“把枪借去。”待安荣富前脚出门，他随即转身叫一心腹火速抄近路去睢水传告沙汀下乡隐蔽。当行动组的人马到达睢水时，沙汀早已无踪无影。此事一去39年，当沙汀知道安荣富尚在的时候，曾去一信表示谢忱：“荣富君大鉴：四十年代，多承暗中相助，使我能于即时转移，未遭歹人毒手，此事我尚能记忆。现经一位曾去故乡访问的青年朋友谈起，特函致谢。1981年7月26日。”当年，任翹因侦缉令泄露和办事不力，还受过记过处分。据四川省府对任翹的一份考绩表记载：“省政府民政厅评语：三十一年度航空会员费如数扫解嘉奖。缉捕松茂肇事首脑份子不避艰苦，率将设卡缉捕获记功一次。奉行辑捕奸伪份子不守秘密记过一次。未报卅年度积谷数量，申试征实不及二成，记过二次。省府主席批示：记过二次。”

沙汀这次下乡隐蔽，是在叫苦竹庵的地方。此地在睢水场东南七八里，与绵竹县拱星乡接壤，是一带地势错综复杂的丘陵。过去有一尼庵名紫竹庵，供奉着慈航普渡的观音菩萨。后来尼庵毁于山洪，地名也不知从何时起由紫竹庵改为苦竹庵。

主人萧业贵的住房坐落在竹树掩映的半坡间。背后是叫做牯牛背的山岭，有一片松、柏、青桐树间杂的林莽。坡下是人字形的山湾。有一片片高低错落的稻田。住房是一座独家的四合院。院门对着的厅房五间，左手厢房三间，右手偏房一间，接着是一带院墙。院门口有一株百年柿树。庭院里有泡桐、柑桔、李子树各一两株。萧业贵热情地将沙汀安顿在堂屋旁的耳房住下。

萧业贵是当地的保长，新任乡长萧文虎的堂兄，而萧文虎又是袁寿山的外甥，袁寿山在睢水的继承人。他家三弟兄。长兄早已另立门户，三弟尚未娶妻，与母亲一起过活。他与妻子罗惠如已有一个8岁的孩子。他约有50亩田地。大部分租佃给一个姓夏和一个姓乔的农民耕种，自己种了很少一部分，雇了一个名叫邱驼子的长工，大石坝人，因为把庄稼做砸了，被迫当了雇工。沙汀觉得此地环境幽静，心情很快安定下来，开始了《闯关》的写作。由于前些时候就已构思成熟，现在只是形之于纸。尽管耳房陈设较差，但创

作情绪一高，一切都不讲究。他利用屋角里的一张拌桶，搭上一块木板当书桌，就着窗格泄进的微弱的光线，在一本小学生用的作业本上密密麻麻地写下一行行蝇头小楷。写得疲倦了，就在阶沿上或庭院里来回踱步。有时还怀着极好的兴致教 8 岁的萧鸿发诵读算术乘法九九表。朗朗的诵读声，给寂静的院落增添了生气。

《闯关》是沙汀唯一用小说形式反映冀中战斗生活的作品，作家凭着丰富的创作经验，没有勉为其难地去正面描写战斗场面，而是在经历的生活范围内，选取了一个特殊的艺术角度。作品写几个知识分子和 40 多个部队干部家属在几名八路军干部、战士的护送下穿过重重封锁的平汉线，到路西老根据地去的战斗历程。他们的路程本来只有两百多里，正常行军两天即可到达，但由于要绕过敌人的据点，避开敌人的出击和应付各种意外事件，征途因而风云变幻、迂回曲折。作品也因此得以让这支人马在特定的环境里展现自己的种种情态，情节也就有了起伏和交错。这部作品着重写了知识分子左嘉和工农干部余明两个人物。它摆脱了同时期的一些作品那种写知识分子一味贬损其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写工农干部则一味褒扬其无产阶级革命性的公式化倾向，真实地表现了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它写了左嘉的自负矜持、患得患失、迂阔怯懦，也写了他的思想敏锐、凡事认真、善于团结、能够克制；写了余明的坚定、勇敢、率直、不怕牺牲，也写了他的粗暴、武断、狭隘、看不起知识分子。当然，作品在写左嘉与余明的矛盾时着重在表现左嘉的弱点，特别是过铁路的紧急关头，他的苍白无力与余明的英勇果敢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作品也充分描写了左嘉对余明身上的缺点特殊的敏感。左嘉作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名知识分子，深深感到余明的那种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政治上去是“政治上的偏狭”，因为客观事物并不那么简单，“一个数理问题的解决，可以引起一番智慧的喜悦，一句有光有热的文句的产生，也会激起全部感情的鸣奏，而这些显然都不是政治问题”。作品循着左嘉性格的发展进行了许多心理的探索，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沙汀曾经说过：左嘉的性格是他和何其芳的复制品。左嘉的优点更多地吸取了何其芳的优点，左嘉的弱点更多地体现了对自己的解剖。正因为借用了作家自己，表现了某种自审意识，左嘉这个人物写得较为真切。

这部作品的不足是在有限的艺术空间内缺乏灵活的时空调度和拓展，影响了人物描写的大幅度展开和深入开掘。与人物相应的环境描写也显得气势不足。从总体上说写得不够深细，近乎作过一定渲染的报告文学作品。

沙汀在这部作品的题记中说：“作者谨将此书献呈白求恩医生（Dr，Norman Bethune）之灵，为了他那伟大的怀抱，和他的工作热忱所曾赏给我的永远难忘的感动。”沙汀对白求恩大夫的敬慕和怀念是创作这部作品的重要动力，作品对白求恩着墨不多，却通过左嘉的观感体现了作家的感情。

这部小说最初题名《闯关》寄给在重庆的以群。沙汀满以为可以换来一笔稿费以供春节之用。以群收到不久也回信说已送审通过，将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原》创刊号刊登，但过了一段时间，以群回信说：稿件已经发排，国民党中央党部又调去复审，将其扣下，批语是：为异党张目。沙汀读信后愤慨不已。好在以群热心帮忙，又是请客又是送礼，将稿件取出，以《疑虑》和《通过封锁线前后》为题，分两部分在《青年文艺》和《文阵新辑之三：纵横前后方》上发表。后来这部作品改名为《奇异的旅程》于 1944 年 5 月由重庆当今出版社列入“当今文艺丛书”出版，以后又定名为《闯关》，于 1945

年6月由建国书店出版。

三十八著名“三记”之二：《困兽记》

沙汀完成《闯关》以后，又回到睢水场。此时时局又趋于平静，而他家里也添人进口了。次女杨刚颀出生了。妻兄黄章甫和曾恕军私奔后，其妻张慧兰将两个孩子和保姆交给了黄玉颀。黄章甫一表人才，又富有表演才能。其拿手戏《捉放曹》、《夜光杯》誉满西南区各乡。曾恕军是“风流员外”吕仲乐从成都带回的妓女，译名曾二总统。黄章甫与曾恕军同台扮演夫妻，弄假成真。为避免亲属谴责，双双外逃。遭遗弃的张慧兰曾与黄玉颀同学，相信黄玉颀会照管两个孩子。孩子一名黄国权，一名黄国秀，都十分调皮。带孩子的保姆倒是个勤劳、善良的老太婆，都称她作王大娘，河清乡人，儿子王大生被抓了壮丁，只有孤身一人。她一天做到黑，又一直不要工钱，谁也不忍心开销她。她和原来的保姆陈嫂，把一个家收拾得井井有条。她们还养猪腌肉，开垦废园种菜，减少开支。沙汀在家里也帮助做些家务。闲暇时就在中间过厅的马夹上静坐。为应付紧急情况，迅速逃身，他还将右侧卧室的墙洞拓宽，虚掩上一张孙中山先生像。

可是好景不常，就在这以后不久，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露骨地宣扬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污蔑解放区是新式军阀割据，叫嚣要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同年5月，共产国际自动宣布解散，国民党反动派又借机指使特务、走狗假冒“民众团体”名义，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这一浪接一浪的反共逆流都波及到了安县。安县特务会又嚣张起来。特务们一再扬言杨只青必在睢水一带活动无疑。鉴于这种情况，郑慕周接连带信给袁寿山，让沙汀转移下乡。此次袁寿山别出心裁，不让沙汀去苦竹庵，而是叫他去刘家沟的“贴心斗伴”刘营山那里隐蔽。当时沙汀刚刚患过疟疾，健康尚未完全恢复，仍不得不听从安排。

一天清晨，三星在昴，刘营山前来接沙汀去刘家沟。这是个30来岁，个子矮小，机灵中有些狡猾的人。他给沙汀提着行李，一道西出栅门，走上通松茂的大道，迤迳上山。

东方露出曙色，眼界渐次分明。原来所谓大道，不过是迂回于山间的小径。山沟两边高山雄峙，时有鹰出山巅。沟壑中睢水喧逐，震应山谷。山径就在丛林间时隐时现。据说这里常有土匪剪径，烟帮横行，过往客商常遭袭击。刘营山一路说些强梁凶杀的故事，领着沙汀经过罐子滩、黄毛山、牯井背，涉水过沟，沿着一条洪水沟上山，来到半山上的一座茅草院里。

此地叫做柿子院，有一排四间茅屋，四周筑有风火墙，屋前有一片院坝，院坝边植有10多株柿子树，院墙外长着高高低低的春芽、麻柳、泡桐、酸枣、棕榈、柏树、漆树。

刘营山一家5口人。双亲健在，但已分家。妻子邱庭珍，22岁，身材瘦小，勤劳温顺。地里播种收割，家里洗衣煮饭，里里外外一把手。孩子刚满周岁，乳名永成娃，成天捆在母亲背上，随着下地和转锅台。丈夫很有些气派，在沟里是保队副，在家里是太上皇。从不下地劳动，也不料理家务。每天吃了早饭就去睢水场坐茶馆，或给袁寿山当听差，到下午才回家。遇到场期，间或上山砍一担柴，叫同沟的人捎到场上代卖。

这段山沟已是刘家沟的末段，与茂汶县边界相连。约莫四五户农家，分散在山峡的腹部。山脚下有一片片耕地，山坡间有零

星的荒地。山民们刀耕火种，以玉米、山芋为主粮。由于山地贫瘠，耕作粗放，收成很低，虽然平均每户有十六八亩地，仍不能敷口，春天得到林间打笋，冬天须到深山里砍柴烧炭，卖竹笋、木炭，购口粮度荒。山民们最苦恼的是婚姻问题。大家信守同姓不通婚的规矩，青年男女都各自托媒人到外地找对象。姑娘稍好些，不管好歹，嫁出门的女，泼出门的水。小伙子就难了，谁家姑娘愿意到山里来吃苦？即便找个山区的妹子，彼此不嫌穷苦，那一笔聘金、财礼谁出得起。男人三四十岁不娶，甚至五六十岁打光棍的有的是。后来沙汀认识一个叫刘荣成的汉子，熬到了30多岁，对成家的事已完全失望。忽然有一天赶场回来，路见一讨口的女子，衣衫褴褛，但人还年轻。他与之搭话，居然很快“情投意合”。他带她到清冽的睢水边梳洗一番，就领回家成了亲。

沙汀在稍稍熟悉环境以后，就静下心来写作。他的住屋是堂屋旁的一间偏房。这屋子三面是篾壁，在山风呼啸时便扎扎作响。屋里放了些破烂家具，散发着腐烂气息。屋角有一个缺盐的泡菜坛子，不时冒出一股股酸气。当然不会有写字台，沙汀就权且在靠壁的一只三两尺高宽的米柜上摆下书案。为了采光，他还用剪刀将篾席剪了一个两尺长、一尺多宽的窗口。他就在这样的条件下，驰骋那径寸之翰。

刘营山照例白天不见人影。邱庭珍常常是吃过早饭，背起孩子，带上两三块玉米粑上山种地、砍草，暮霭降临时回家。午饭得由沙汀自行操作。他往往是写到饥肠辘辘，才动手做饭。一面往灶膛里添柴，一面呷几口酒。曲酒昂贵，大多喝二锅头白酒。吃罢午饭，又到米柜边去。实在有些疲倦了，就到屋外院坝里做做操，沿山径爬爬山。山间有一山泉，其水清冽甘醇，上山时便打一罐泉水。

女主人待他极好。每晨为他煮一碗荷包蛋，晚上给他烧水掌灯。尽量为他做些米饭，弄些下饭的蔬菜、豆豉，还给他洗衣补被。丈夫向她交待过：这是个老师，是为“躲事”到这里来的。她确实感到这个一身蓝布长衫、举止文静的客人，是个知书识礼的人。他成天总是悄声无息地在纸上涂涂写写的。有时写一阵，还叹一口气，揉成一团丢了，又着急地再写。到吃饭或空闲时，他的话就多了。同永成娃逗乐呀，向刘营山问这问那呀，……

然而，潜居深山，毕竟是寂寞的。有时独立柿树下，远眺凝然的山峰，悠悠的絮云；有时孤坐庭院，听村鸡啼落日，山间传来铲草皮的鉴鉴声，有时下雨，天色黄昏，山巅这里那里响起黄麂凄厉的日日的叫声，那寂寞之感便啮蚀着他的心。

到了年底，他的心情才好些，一是写作还算顺利；二是与山里人逐渐熟识。生活也充实些，在火塘的夜话里，在农家的拜访中，他度过了一个个夜晚和黄昏。他逐渐熟悉了这里的人，这里的民情风习。他过去接触较多的是城镇的上层人物，现在扩大到普通农民群众。他感到收获的欣喜，感到生活的丰富。春节到来，有的农家邀他共酌春酒。厚道、壮实的刘荣成因给烟帮当脚快，跑了一趟松潘、茂汶，挣了一笔钱，女人又快十月临盆，为庆幸自己人财两旺，特地请沙汀写一春联。他没有找到适当的毛笔，就从身穿的那件延安带回的皮袄上扯了一撮羊毛，用细绳扎在一根筷子上，饱蘸浓墨，悬笔挥写。围观的人无不啧啧称好。

沙汀毅然离开刘家沟纯属偶然。在农历二月的一个清晨，他照例迎着朝霞上山散步。因为晨雾稀薄，晨光熹微，他的兴致极好，越过山垭，多走了一程。正当他放眼山野，猛然见山那面种植着一大片鸦片烟苗。他顿时怔住了。这是刘营山的胆大妄为吗？他想起这个鬼鬼祟祟的家伙常与袁寿山诡秘地交头接耳的情景，断定这是按照袁寿山的旨意所为。假如这事被官府发现，他们倒不讲脸皮，可是他就有口难辩了。这不仅于他不利，还会给县里的党棍们以借口，败坏革命作家的声誉。他在这一望绿苗茵的罌粟苗前伫立良久，一挥手说：此地不能久留！当天他就借口要探望病中的刚颀，收拾行李，叫刘营山送他回睢水。

沙汀从1943年冬天进山，一直住到1944年初春。这期间，他写了《困兽记》的大部分，同时扩大了生活范围，为后来创作《还乡记》打下了基础。山居4个多月，使他永生难忘。他后来说：我在这山沟里，一面写东西，一面也增长了见识。我过去接触农村生活有局限，这一次算是比较深入地认识了一些地道的淳朴的农民。我和刘家沟的住户相处得很好。

沙汀的长篇小说《困兽记》于1943年11月底动笔，1944年5月初完卷。

这部作品也充分调动了他丰富的生活积蓄。早在协助郑慕周创办汶江小学和任县教育局长时，他就熟悉了小学教师的生活。抗战爆发后回到秀水镇中心校短时居住，对乡村教师又有了新的了解。皖南事变后疏散回县城初期，与汶江小学的新知旧友早夕相处，更增加了对教师生活的感受。加以他的妻子、妻兄、岳母等都在小学执教，使他与教师有着特殊的感情联系。他写了《小城风波》、《三斗小麦》，反映了小学教师的生存状态。就在创作这些短篇小说期间，他已开始构思一部长篇小说，以教师们组织抗日宣传演出遭到挫折为中心线索，表现他们在困境中的挣扎和奋进。并且还将初步的构思写成了题为《没有演出的戏》的短篇小说。

黄章甫与曾恕军私奔引起他极大的关注，对他这部长篇小说的构思起到了催化作用。他决定把描写的重点由原来设想的学校出面组织宣传演出改为教师的家庭生活，改为教师倡议演出，一方面写好三位教师的爱情纠葛及其与地主少爷的矛盾，一方面写好一群教师组织演出活动与当局的冲突，这样形成网状结构，扩大生活层面，加深思想蕴含，增强生活气息。同时他还决定把环境也由县城改为乡镇，以秀水镇作为艺术概括的生活根据，加强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当然，他没有受制于生活，而是按照他的认识和理解来处理人物和人物关系。他构思中田畴的婚外恋并非黄章甫那样的见异思迁，而是精神苦闷的一种反映。吴楣也不是从成都带回的妓女，而是生活坎坷的女教师。她之倾情于田畴，不是个人品质的低下，而是在屈辱和苦闷中寻找一条出路。地主少爷也不是实际生活中的纨绔子弟吕仲乐，而是不断扩充田产，仗恃富有和权势欺凌女性的少东家。至于其他人物牛祚、章桐、米子运、王大娘、总爷、奶膀等也有生活的原型，更有艺术的创造，环境描写既有生活依托，更有艺术虚构。

《困兽记》比起当时同类题材的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写国统区小学教师这样的下层知识分子，没有着重在他们物质生活的艰难困苦，而是把重点放在他们精神上的压抑与挣扎。教师们也有失业的危机，有物价上涨的威胁，但精神上的苦闷，爱国热情的被扼杀，组织演出活动的被阻止，企图摆脱沉闷的生活而不能，这才是最大的折磨与痛苦。田畴也面临严峻的生活课题。“多子，穷困，口角，便是这些灰色卡通的主题”。他甚至窘困到借王

大娘的优待谷度日。可是他于困苦中向往着新的生活。他劝说妻子孟瑜把刚出生的第四个孩子过继给吴楣抚养，夫妻俩从孩子的拖累中解放出来，一起参加演出活动，然后设法到前线去。他又鼓励吴楣从困境中伸起腰来，“难道一定要在这个屋子里才活得下去吗？笑话！这个世界大得很呢？”然而，他的一切奋争都是徒劳的，演出活动被县党政当局用软的办法扼杀了，由于李守谦的制止，送养孩子的计划落空了。李守谦还以抽佃相威胁，性格脆弱的吴楣也因挫折而一蹶不振，“战争，苦闷，四面都是铜墙铁壁！”这就是他面临的一切。吴楣在李守谦家里的物质生活也是优裕的。李守谦另寻新欢以后给她带来的屈辱，只要她忍气吞声，也可以苟且偷生。可是她也有生活的热情。她把参加演出活动当作自己的救命圈，不甘心沉溺和沦丧于不幸的遭际里。她唯一的希望破灭了，她在精神上被打垮了。沙汀在这部作品的题记中说：“在全书中关于物质生活的困顿情节，我有意写得很少。这是跟我对于题材的理解来的。因为从我看来，小学教师的待遇，自然是该提高，但主要的却还在别方面。战争激起了他们更多的力量，单调枯燥、成效缓慢的教书生活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然而，他们又别无可为，于是一切烦恼也就随之而滋生了。而生计问题，以及种种反抗战的社会现象更加加重了他们的苦闷。”作家正是从现实生活出发，从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出发来确定艺术地把握生活的重点的。也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精神，使他获得了创作的独特性。

这部作品贯穿的中心是教师们精神上的“困兽犹斗”和“斗犹被困”。但它不是演绎这种命运的“循环”，而是通过人物的奋争暗示了突破困境的出路。田畴陷入了这种轮回，但他爱情上的失败有可能坏事变成好事，使他挣脱命运的怪圈。牛祚更是一个明显的启示。他出身贫苦，父亲为打抱不平被恶霸害死，兄弟在广州起义后失踪，母亲、哥哥因之活活气死。他读到大学一年级就不得不迫于穷困辍学，从而抛弃工业救国的幻想。他的出身和经历使他懂得同黑暗势力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懂得必须韧性地战斗。他支持宣传演出活动，但反对浮躁和急于求成。演出的筹备工作遇到挫折，他又反对泄气，反对消极悲观。他好作警句，把许多实质性问题一语道破。性喜幽默，在烦恼中闪现出智慧。他主张对生活要有“老牛筋”的那种“绵劲”。这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是他对付黑暗势力的武器。章桐也是“困兽”中的一种力量。他从前线归来后，一直没有泯灭重返前线的热忱。他被特等豪绅，即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传讯”时以机智和勇敢制胜。当宣传演出计划报批，县党政当局用“一俟聘定专家，当即迅与审查，以利抗战”的鬼话进行欺骗时，他主张置之不理，等到宣传演出结束，也拿抗战的名义写封信说是一时疏忽未等批示或者仅属试演。他成了教师们抗日宣传活动的重要组织者。

这部作品着重写的田畴、孟瑜、吴楣的爱情纠葛也有特色。它不像当时的一些作品那样离开社会生活去编织戏剧性的三角恋爱，或者生硬地编造抗战加爱情的故事，而是将爱情纠葛与社会矛盾、思想冲突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田畴与孟瑜本来是自由结合，但后来却没有随着生活的发展推进彼此间的情感。孟瑜失却了进取的热情，因抗战激起与日俱增生活热情的田畴感到感情的缺损。与此同时，本来在抗战初期的演剧活动中就与田畴有了感情的吴楣，在受到李守谦莫大的侮辱之后，渴望参加田畴主持的宣传演出以摆脱困境，而田畴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救助她于危难之中。这样他们的纠葛就发生和发展起来。田畴与吴楣的偷情被孟瑜发现了，他的精神沮丧了。同时被李守谦知道了，这个视女性为玩物却又要求自己的女人必须坚守贞操的公爷抽回佃

给他的田地，使他在生活上遭到打击，逼得他走投无路。这就是田畴的结局。田畴、孟瑜、吴楣在这场纠葛中的所作所为，是社会矛盾引起的思想冲突、精神矛盾的反映。他们的精神悲剧体现着社会悲剧。

这部作品明显的缺陷是情节发展起落的幅度不大，牛祚、章桐这样的人物写得既不充分又与主线结合不紧，吴楣心理状态描写的层次感也较差，加以艺术手法缺少变化，因而读来有些沉闷。这也许同作家拘泥于生活有关。作家在开掘主题和设计田畴、孟瑜方面站得较高，在情节的总体安排上却似乎过分迁就已有的生活，与生活靠得太近。

《困兽记》最后 10 来章，是沙汀在回到睢水场以后赶写的。当时家里九口人吃饭，玉颀和刚颀又不时生病，生活十分窘困。恰好又接到何其芳自重庆的来信，要他去参加整风学习，需要筹措一笔路费。于是他不得不快马加鞭，匆促完卷，分批寄以群处理。因此，作品后部分有些章节不免粗糙。在交付出书时，他一再作了修改。例如章桐的再次出走由原来写得含混到修改得比较明确。又如最后一个场面写田畴把自己的一群人比作“永见不到阳光”的“土泼鼠、章桐、牛祚则另有一种认识等等，所有这些关于斗争艰苦性和光明前途的空泛议论都作了删节。

《困兽记》最初由以群经手，分成几部分以《窄路》、《两家庭》、《奈何天》、《愁雾》为题在《时与潮文艺》、《青年文艺》、《文艺杂志》、《天下文章》等刊物上发表。1945 年 5 月由重庆新地出版社出版。沙汀为初版写了题记。

三十九生活积极面的感染与开掘

沙汀从刘家沟回到睢水场时，时局又趋于平静。他又不时在场上露面。

他的社会交往逐渐多起来。他或会见地主、老板于袁寿山家中，或拜访小贩于居室之内，或谈笑于食店的厨师、堂倌中间。人们都知道他是郑旅长的亲戚、袁寿山的显客，都称他是“抹豪避相”的。什邡县有个多次来此地的烟帮头子，绵竹县有个常到这里摆红宝摊子的哥老会头子还向他打包票：如遇“水紧”，就到“兄弟”的码头上“避相”。

麦收前是荒月，一些濒于绝境的农村妇女沦为娼妓，间或到睢水场上来“求吃”。一时间，茶馆、旅店纷纷传告“货儿子”到了，地主老财、袍哥头子、地痞流氓都涌去“光顾”。常以正经自诩的袁寿山有时也去“图新鲜”。他美其名曰“换换胃口”、“逢场作戏”。沙汀为扩大生活知识，也曾到旅店去看过“货色”。他被称为：“陪嫖看赌”的。这对他后来的创作果然有用。

从夏天到冬天，何其芳一再来信催他去重庆。他在《困兽记》有了出路，得到一笔稿费以后，将其大半买了米、买了油，安排好家庭生活，用少部分作路费，启程东下。

他在成都停留了两天，会见了李迺人、陈翔鹤和“文协”分会其他一些熟人。陈翔鹤听他说要去重庆，对他途中的安全非常担心。据他所知，尽管当时桂林失守，大敌当前，特务分子仍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去重庆的同志、朋友忽然失踪的事时有发生，他向叶丁易、丁聪谈到了此事。恰好此时丁聪也正为郁风只身去重庆的事发愁。于是他们便商量让沙汀与郁风同行，途中互相照顾，遇有“失踪”等情，也有人通通消息，他们买好车票，

分别陪同沙汀和郁风到车站会面。按事前所约，丁聪向郁风只一般地介绍这是杨只青先生，并不提及沙汀的身份和笔名。沙汀的一番打扮很像个帐房先生或者商号老板。穿一件灰布长衫，戴一顶剪去帽檐的黑呢礼帽，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郁风见面后点点头，没有异样表情。汽车快到重庆时，郁风忽然记起 10 来年前在上海白薇主持的一次妇联会上见过这位“帐房先生”，并为他画过一张速写像。她便悄悄问杨先生究竟叫什么名字。沙汀具实以告，说他确实叫杨只青，笔名是沙汀。女画家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爽朗地笑了。

到了重庆，沙汀把行李丢在“文协”总会，接着就去曾家岩 50 号报到。时间已是傍晚，周恩来邀请部分文艺界人士参加的一个学习会刚刚结束，宾主正人席就餐，沙汀当即被邀入座。聚餐的人虽不多，但气氛很热烈。南方局的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都在座。

沙汀与宋之的、葛一虹同席。他们都惊喜他还活在世上。他们告诉他，早听说他已在隆昌被捕，组织上派人营救也不知下落。豪爽的宋之的要他开怀畅饮，庆幸他还活着。宋之的是海量，沙汀在酒席上也从不示弱。他们一连对饮几杯，不禁都有些言语失控。周恩来从邻席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说：“沙汀啦，少喝两杯啊！”他仍然说没有醉、没有醉。

宴罢客散，何其芳留沙汀在 50 号暂住。他请沙汀喝了一杯浓茶，然后互道延安一别以后各自的情况。何其芳告诉沙汀，他是和刘白羽随林伯渠来重庆的，主要任务是传达延安整风精神，组织整风学习，要沙汀来重庆，也是他要他参加学习。他取出一套文件，要沙汀一一细读，并嘱咐其中凡份只能在 50 号阅读。

沙汀在 50 号住了两天，集中精力阅读整风文件。他同南方局的一些负责人有了较多的接触。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王若飞。他去延安时，曾受赵世炎的亲属之托，给赵世炎的侄儿带一包毛衣一类的生活用品，请王若飞转交，找过王若飞。以后在“鲁艺”工作，在一次节日宴会上又见过一面。此次朝夕相处，很快无话不谈。王若飞思想敏锐，性格开朗。他取笑沙汀说：“沙汀，你怎么一走就不转来了？”这本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却把沙汀刺得满面通红。沙汀当然不敢像在茅盾面前那样侈谈是为了创作，是离不开乡土。

这天，沙汀接到周扬请何其芳代转的一封信，也有类似的责备。周扬说，从南方局负责同志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得知你在重庆文化界中做过不少工作，并且还写了一些好作品，但是我们仍然希望你重返延安，再赴前线。比较之下，继续反映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和斗争意义更为重大。沙汀读完信，思想波动很大。他是仍留在大后方，还是重返前线？思想斗争异常激烈。但他思之再三，还是认为留下为好。他已知道《淘金记》等作品得到了好评，他应该保持创作的良好势头。他给周扬写了回信。说他经过认真考虑，还是认为应留在四川。他对四川的生活毕竟熟悉得多，他可以继续写些讽刺暴露的作品。他愿意退而求其次。

沙汀读完文件，离开 50 号，到“文协”总会以群房间里搭了一张篾绷子床。当天晚上，又不免同以群互诉衷肠。他恨不得在一夜之间将三年来的感受全部倾诉出来。说到激动时，还从床上蹦起来，站在以群床边挥手跺脚。此后，他继续参加整风学习会。他与胡绳、乔冠华一个小组。他们开过一次联系实际的检查会，由在香港工作过的乔冠华检查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但由于形势急转直下。日寇在黔桂一线大举进攻，大批文化人流落西南地区，需要做大量的救济工作，整风学习只得暂告结束。

在此期间，南方局做了大量的救济工作。南方局通过各种途径筹措了一笔资金，派人前去慰问战乱中辗转流离的文化人。《新华日报》在《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缘起》中说：“抗战七年，文艺界同人坚守岗位，为抗战之宣传，勛军民从忠勇，未曾少懈。近三年来，生活倍加艰苦，稿酬日益低微，于是因贫而病，因病而更贫，或呻吟于病榻，或惨死于异乡，卧病则全家断炊，死亡则妻小同弃，……”《新华日报》从7月15日至9月27日连续报道了救援工作情况。沙汀的挚友艾芜正是在救援后到重庆的。艾芜携儿带女从桂林逃奔到柳州，又从柳州流徙到贵阳。贫病交加，生活极端困难。南方局派去负责救援工作的李亚群到了他家里，赠送了3000元救济款。他带着一家大小于10月到了重庆，由“文协”总会安排在会议室暂住，他同沙汀久别重逢，叙及别情，感慨不已。

艾芜到重庆不几天，刘白羽来见过沙汀之后，特地去看望他。沙汀把刘白羽介绍给艾芜，仍回到以群的房间内。他万万没想到，不多一会刘白羽就过来了。他两眼含泪，不住摇头：“沙汀啦，我实在坐不下去了。那种生活怎么过呀！”接着伏在桌上，失声痛哭。当时艾芜、蕾嘉和四个孩子挤在一间屋子里。桌子当床铺，拼几把椅子也当床铺，到处挂着尿布，出入都必须低头、侧身。热情、豪爽的刘白羽怎能不深为感叹。

艾芜虽然贫困，却安之若素，自尊心很强。沙汀动员他到延安去，他表示同意，沙汀向徐冰作了汇报，徐冰也说：欢迎他去。沙汀在离开重庆返安县之前，委托以群去办艾芜启程的事。以群不了解艾芜的性格，对艾芜说：你到延安就好了，生活就不成问题了。艾芜闷声不语。沙汀去向艾芜辞行时，问他何时动身。艾芜说：我不去了，好像我是为了吃饭才到延安去的。沙汀说：谁这样说呀？艾芜说：叶以群就是这个意思。艾芜就是这样的人。

沙汀听说田汉、巴金也到了重庆，立即去看望了他们。他去看望巴金时，约了艾芜一道。三位同龄的四川人抵掌相谈，亲密无间。巴金请他们吃了一台山城著名的“毛肚火锅”。沙汀在重庆住过一年多，岩鲤之类都已品尝过，唯独没有吃过这种火锅。艾芜也是第一次品尝。三人都被这“麻、辣、烫”三味俱佳的名小吃所倾倒。沙汀更是失去节制，吃得大汗淋漓。吃时倒不要紧，过后闭了汗，患了一场感冒，吃了几付解表药。

沙汀还结识了杨晦和吴组缃。杨晦与陈翔鹤是老朋友，曾一起创办“沉钟”周刊，所译《当代英雄》文笔流畅。他在中央大学中文系执教，常在报刊上发表评论文章。吴组缃曾在1941年写过一篇评沙汀、艾芜作品的文章。他认为艾芜的作品多取材于西南社会，故有“西南艾”之称。沙汀的作品多写四川乡镇中的故事，富有四川地方特色。艾芜的风格质朴自然，似乎有点呆板，却颇活泼自然，不止文字如此，结构亦然。沙汀的风格圆熟而多变化，处处闪耀着才智，能以经济的手法写出极深厚的东西。艾芜是用一种老实淳朴的态度正面地看社会。沙汀则往往以锐利冷酷的眼光侧视社会，予以嘲笑抨击。艾芜的作品多用白描。沙汀则多用着色的描绘。吴组缃在师范学院任教。他性格开朗，很有风趣。他到以群房间里闲坐，见沙汀那打了许多补丁的圆顶纹帐，也不管人生地不熟，幽默地说：“哎呀，老兄这床帐子真是洋洋大观。”他见沙汀身体单薄，知道因患神经衰弱常常失眠，热情介绍一种苏联进口的鹿茸精。他非常称赞《在其香居茶馆里》，说他曾推荐给一位从来鄙视白话小说的老教授，这位老教授读后破天荒地说：“像这样用生动口语写的小说，倒还不错。”

赫尔利来华后，周恩来曾陪同前去延安会谈。返回重庆当天，沙汀、以群就从何其芳那里知道了。鉴于当时局势紧张，日寇大有觊觎四川之势，文化界人士普遍人心不安。他们交换意见后，决定举行一次茶话会，请周恩来作形势报告。茶话会由谁来主持呢？当然首推郭沫若。可是郭沫若在政府任职，出面不太方便，于是一致提到茅盾。沙汀自告奋勇去请茅盾。他们确定晚上就要开会，而茅盾又住在约 10 多里外的唐家沱，这当然是一件急切的事。

沙汀到茅盾那里已去过两次。一次是与姚雪垠同行，一次是和何其芳一道。茅盾向他们讲了许多长篇小说的创作问题。他非常推崇托尔斯泰，说他的长篇小说“抓得起，摔得脱”。这些见解给沙汀的印象很深。这次出发已是下午 5 时，沙汀饭都没有吃就赶紧上路。到唐家沱的水路 30 里，但他到江边时，班船已经开走。他立即决定迈开双脚走旱路，大步流星地疾行在石板铺砌的乡村大道上。黄昏时分，他赶到了茅盾家里，说明来意后，两人又立即上路。茅盾时年 49 岁，虽刚刚患过贫血症，但身体尚属健康。沙汀正是不惑之年，走这几许路程不在话下。他们一路有说有笑，不知不觉到了江北码头。此时遥望嘉陵江对岸，已华灯初上，珠玑闪烁。

他们来到茶话会会议室，与会者刚刚入场。会议开始，茅盾简短致辞，接着欢迎周副主席讲话。周恩来分析了日寇进犯四川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强调即使来犯也并不可怕。八路军、新四军会扭住大量敌人，四川人民也会使入侵之敌难于对付。他对着巴金，沙汀说：“巴金先生，还有沙汀，你们都是本省人，四川这个地方还不好打游击呀！”他的讲话给到会的人以很大的鼓舞。

沙汀此次在重庆写了一篇小说。是以群约他为筹办的《青年文艺》杂志写的。他把自己关了 5 天，集中精力赶写。写得饥肠辘辘时，就胡乱拿以群的饼干等零食充饥。小说完卷，以群的积蓄的食品也一扫而光。

这篇小说就是《堪察加小景》，以后收入选集时改名为《一个秋天的晚上》。作品利用了沙汀在睢水场“陪嫖看赌”的见闻。在处理题材和开掘主题时，因感受了重庆这一段生活的积极面，注入了对生活的信赖。它写乡长太太因乡长嫖娼致病迁怒于所有的游娼，将游娼筱桂芬打骂一顿以后拷上脚柙在公所门前的操坝里示众。正在乡公所服役的班长陈耀东企图趁一个风雨交加的秋夜调戏筱桂芬。值班所丁谢开太忠于职守，使陈耀东无隙可乘。当筱桂芬述及自己的身世时，引起了陈耀东思想感情的变化，谢开太也更加寄予同情。

小说以同情的笔调写了游娼筱桂芬。她家被联保主人逼得破了产。父亲死了，哥哥被抓了壮丁，只剩下年老多病的母亲、疾病缠身的嫂嫂和一群幼小的孩子，她轻信纱厂招工的谎言，受骗失足落水。她被示众时一再发出“我又没有抢人偷人”的抗议声。述及自己的年龄、身世时的语气，还带着农村姑娘的纯朴。她的沦为娼妓并非“天生的贱货”，而是生活的逼迫和社会的罪恶。

小说把握陈耀东心理微妙的变化也十分准确。这个 30 来岁的赌棍为逃避拉壮丁到乡公所服役。由于无聊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产生了糟蹋筱桂芬的邪念。但他毕竟不惯于此道，而且又是班长，所以既保持着身份又带着流氓腔调，既怕说话出格又怀着原始的欲望。他将筱桂芬释放到乡公所内火堆旁，给她找饭吃、找水喝。恰好此时未入睡的谢开太来了，见他如此关照这个可

怜的妓女，按照自己的心理和理解，称赞他做了一件好事。陈耀东也就被抬举得退不下来，只得“似笑非笑地摇摇头，感慨万端地在火堆边坐下”，渐渐地，什么欲望都没有了，什么鬼胎也不再烦扰了。当筱桂芬讲起悲惨的遭遇时，他还联想起自己的家庭。

小说写乡长太太因乡长嫖娼致病而把恼怒转到筱桂芬身上，班长陈耀东也嘻皮笑脸地说筱桂芬：谁叫你们拖垮人家的老公。所丁谢开太却不满地说：这只怪自己，又不择嘴，来一个捡一个。所有这些，都用了喜剧的笔调。可是作品写筱桂芬的遭遇和凄风苦雨中的呼声，又带着强烈的悲剧色彩。这就恰当地将喜剧与悲剧结合起来，使其相得益彰，绘声绘色地表现了秋夜中的这一幕悲喜剧。

这篇小说直接切入秋夜中筱桂芬的挣扎，写秋夜的气氛，风雨中的操坝，凄切的呼声，嚶嚶的啜泣，以后写乡公所内的神殿，破败的神像，“胖爷”脚下的油灯，神座下的火塘等等，具有特定的色调和氛围。它不仅对人物的心境有极大的烘托和渲染作用，还加强了作品诗的情韵。

在此期间，沙汀还协助以群看过一些青年作者投寄给《青年文艺》的稿件，写了一篇读稿杂记。他认为这些取材于大后方农村社会生活，旨在揭露土豪劣绅的剥削、表现佃雇农不幸的习作，情节和语言也有一定的生活气息，但主要问题是描写不亲切和人物概念化。其根本原因是对生活观察不深，“由于并没有意识的进入生活，向它毫无止境的掘取创作的泉源，仅仅在一种义愤的鼓舞下，动手写出自己并不深知的东西”，这种创作“叫做即兴式的”，按照这种方式也许会写出一、两篇作品，但绝不能持久。这反映了青年作者修养不足，对名著的研究不够，“感性”较差。沙汀的这些认识融合了自己的经验教训。当年茅盾深刻地批评过他初期作品中存在的“印象式”写法，现在青年作者正在重复他走过的弯路。

四十泡桐花仍自开自落

独山失守后，日寇虎视眈眈地逼近了四川。侵略者的铁蹄踏进四川怎么办？人们纷纷议论、忧心忡忡。“文协”总会二、三楼外省籍的文化人，还向沙汀等本地人提出重庆沦陷以后的退路问题。于是，沙汀也真的替他们着急起来。正在这时候，南方局提出了一个疏散计划，其中的一项就是要他在家乡设置一个疏散点，并且布置一条从重庆到川西北的交通线。徐冰还向他提出，可否在安县开设一两家店铺，以后疏散去的人赖以维持生计。周恩来也叮嘱他途经成都时，向正在那里的影人剧团负责人应云卫打个招呼，要他们拉些社会关系，早作应急的准备。这样，沙汀就只得离开重庆。这时已是1944年年底。

在购买车票期间，沙汀请郭沫若写了几个条幅，以便带回安县赠送亲友。拿到车票后，他又由何其芳陪同去向郭沫若辞行。恰好当时夏衍、冯乃超也在郭沫若家里，便形成了几个人对他的欢送会。他们忽然想起沙汀刚刚在当月满了40岁，一致邀请他到味腴餐厅吃饭，既为他祝寿，又为他饯行。大家都劝郭沫若不要轻易上街，他勉强点头称是，但到点好酒菜，他却披一身灰色的棉布大衣，由沈起予陪同来了。郭沫若性极豪爽，一杯酒下肚，更是豪

情满怀。他拉着沙汀猜拳行令：“四十大庆啦！”“一帆风顺啦！”一连罚沙汀好几杯酒。

沙汀到成都后就忙着办事。当时郑慕周正在成都，租佃了一院房子，为儿子加冠受媳。沙汀同他商量了在安县设疏散点和在合川到遂宁到绵阳设交通线等事项。由沙汀代郑慕周给这几处的熟人写信，请他们负责接待疏散人员。接着，沙汀去找了杨伯恺，商定由杨伯恺利用与雅安刘文辉的交情，在雅安设疏散点。他又去找了王干青，一道到慈善堂拜望了张澜，向这位辛亥保路同志会的领袖扼要谈了战争发展的趋势，请予支持疏散工作。张澜态度鲜明，回答爽快：“这是我们应尽的地主之谊。”沙汀又去《华西日报》约陈白尘到剧院后台见了应云卫，向应云卫传达了南方局领导同志的指示。沙汀觉得几天的工作相当顺利，真正称得上“一帆风顺”。

这以后，沙汀到陕西街看望了叶圣陶。两人相差10来岁，却十分投机。闲谈一阵，还一起经半边桥到少城公园坐茶馆继续抵掌相谈。临别时，叶圣陶再三嘱咐他为《中学生战时月刊》撰稿。接着他又去看望了病中的张天翼。他在重庆时就听说张天翼患肺结核，从桂林路过重庆，连曾家岩50号请吃饭都未来得及，就应陈白尘之邀到成都郊外养病去了。沙汀与陈翔鹤一起，由巴波陪同到了西门外10里郫县上桥张天翼住地。房东鲁绍先是一个文学青年，对张天翼颇为尊敬。每天为他煮荷包蛋不说，还养了一头奶山羊，挤羊奶供他一人吃。张天翼正值病重，身体瘦弱，声音嘶哑，但精神尚好。床上还摆着《资治通鉴》、《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线装书。他们向他问好。沙汀还向他谈了一些延安、冀中、重庆的见闻。他们在鲁绍先家里住了一夜，于次晨向张天翼辞别。由于连日奔波，当晚又没有休息好，沙汀一回到成都就生病发烧。他只得到华西坝林如稷家里养了两天病。

沙汀离开重庆时，何其芳曾转达组织上的意见，要他在四川大学谋一个教职，以便在成都文艺界工作。他在精神稍好后，托陈翔鹤与川大联系。川大在抗战初期由张真如代理校长，聘朱光潜、蒙文通、林如稷等任教，办得还有生气。后来教育部长派亲信程天放把持学校，张真如、朱光潜去内迁的乐山武汉大学任教，就越来越糟，师生的一切进步活动受到阻挠。中文系主任罗念生早知道沙汀的情况，听说他要来教书，连忙说：啊哟，他都来得呀！去川大不成，他只得仍回安县。

离开成都前夕，沙汀再一次去同李劫人辞行。李劫人见他启程时间已定，来不及请他吃饭，感到十分遗憾。他沉吟一阵，转身进卧室，拿出一个红纸包，强迫沙汀收下：“相濡以沫——一点小意！”馈赠的竟是一笔钱。对这一片真情，沙汀当然不好拒绝。

沙汀回到睢水，已是1945年1月中旬。这时的乡场，与重庆的气氛完全不同。许多人家正忙着杀猪宰羊，张贴春联、门神，准备过旧历年。沙汀家王大娘和陈嫂养的一头肥猪也已杀了，檐前灶房吊着一块块腌肉腊肉。日寇进犯四川似乎与这里并不相干。

沙汀过了一段时间闲散的生活。5月、6月，睢水场上的泡桐树花开花落。他的兴致来了，接连写了《两兄弟》、《春朝》、《替身》三个短篇小说。在茅盾50寿辰之际，还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感谢——祝茅盾先生五十寿辰》，寄《华西日报》发表。以后又改名《感谢之辞》和《感谢》，分别在《新华日报》和《文哨》上刊登。

《两兄弟》写一个在省城上高中的学生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经哥哥保

释回乡，仍受到国民党县党部的严密监视。中学生单纯、倔强，对黑暗势力有着大无畏的精神。身为督学的哥哥一方面对付反动当局施加的压力，一方面苦口劝说弟弟避开锋芒。作品于两兄弟的思想冲突中表现他们不同的个性：一个年轻鲁直，一个不乏正义感却饱经世故。作品以这个生活截面反映了反动派对一般知识青年的迫害。可惜作品的主题较为直露，情节也稍嫌单调。《春朝》写曾在前方游击区工作过的一对青年夫妇，在返回四川家乡后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追捕。它直接切入一个风雨的“春朝”，家里人同特务周旋，青年夫妇躲过了一场灾难，两个青年临危不惧的乐观的神情跃然纸上。这篇小说也是反映国民党反动派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也有类似《两兄弟》的缺陷。

《替身》写的是沙汀较为熟悉的兵役方面的题材。它的创作有一个契机。那是开春的一天傍晚，沙汀出门到睢水边打水，瞥见岸边有一个人正在洗刷一担大头菜。看样子这人是一个“跑山货”的小贩。他不免有些惊诧：这一向由于抓壮丁弄得人心惶惶，行商、小贩几乎已经绝迹，此人竟如是之从容。于是惊叹道：“喝，这一向你还敢出门，不怕抓你的壮丁？”小贩气愤愤地说：“咋没抓哇！你看，胡子都给我刮光了！”他细看对方，果然嘴边没有挂须，但多皱的前额和鬓角表明已并非青年。他估计又是被抓去刮了胡子充当壮丁，但没有被验上，不得不放了的。他没有继续询问，可是这“山货客”情绪饱满的回答烛照了他生活的积蓄。那些时日，唯乡长之命是从的保长们，用买条子，拉过路客商，伺机抓捕那些没有权势或失去权势的弱者以凑足壮丁数额的事举不胜举。于是他很快捉摸到一个短篇的轮廓：被任务逼迫的保长，为按期补足壮丁的欠额，出动人马去抓一个土粮户的儿子，因为听到消息，这个土粮户得罪了三老太爷，此时正好下手。谁知正要出门，有人却传出最新消息：这个土粮户已与三老太爷重归于好。怎么办呢？他们就只得去附近的幺店子抓一个过路的盐巴客，不管他多大年纪，强行剃去胡须，权且当作“替身”。这篇小说在保长李天心这个人物身上用了大量的笔墨。保长抓壮丁的手段是

恶毒而荒唐的，但这是乡长和接兵连逼迫出来的，是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不得不采取的办法。于是小说从这里深入开掘主题：这不仅仅是个人的罪孽，更主要的是整个兵役制度和社会的黑暗。小说写拉壮丁的形形色色，保长与女人的对话，保长碍于种种人事关系不敢触动本保的适龄的壮丁，徐烂狗道地的光棍调门等等，都富有生活气息，反映了作家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深入把握。小说写将年老的盐巴客打扮为壮丁，保长无可奈何地骂那几家有壮丁却动不得，于沉重的基调中增加了喜剧性的色调，平添了许多苦趣，使悲剧气氛更为浓烈，艺术的震撼力也更加强烈。

《两兄弟》是应叶圣陶的约稿赶写的。沙汀在寄叶圣陶的附信中说 he 这是急就章，如果发表后对刊物发行不利，可以退回，不必客气。叶圣陶阅后，确实觉得不便刊登，校改了个别错字，原稿璧还。后来此稿寄《中原》月刊发表。《春朝》寄《文哨》刊登。《替身》经以群改名为《胜利在望年即景》，先在《华西晚报》连载，后来在《文哨》上刊载。

这些时日，沙汀还为前妻所生的大女儿刚俊和大儿子刚锐操了不少的心。刚俊一直随生母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她在安县中学女生部念完初中，考入绵阳县丰谷镇师范学校就读。因闹学潮被校方斥退，回安县后在秀水、花菱小学教书。她以职业为掩护，为地下党做了大量的通讯联络工作。绵阳

特委会发现了她的活动，密令将她逮捕，她只得回安县隐蔽。她此时正患九子羊（颈淋巴结核），多方治疗不见好转。沙汀了解到沸水乡有个乡村医生，能用祖传秘方“千锤膏”治此顽症。就写信叫刚俊来睢水住下，延医诊治。医生用灸条灸了患部，开具五剂药方，由刚俊捡好药，用铁碓捶成膏状贴敷。此孩子好强，治病期间也不愿在家吃闲饭。听说睢水中心校有教师误课，主动请求代课，增加一点收入。刚俊病愈走后，沙汀又想念起刚锐。这孩子小学毕业后，两次考中学落榜，一直闲居在家。沙汀给陈翔鹤写信，托他转致李劫人，在嘉乐纸厂谋一个职业。纸厂本不招工，但李劫人破例答应安置。于是沙汀就叫来刚锐，为他备办行李，叫他去成都找林如稷带去见李劫人。此时刚锐年仅15岁，小小的年纪便独自出门谋生。他搭乘李劫人招呼的货车到乐山，进纸厂当了童工。每天搬运造纸用的谷草，在苦难中长大。

第八章睢水十年（下）：创作的黄金时代 （1945年秋——1949年冬）

黎明前的夜是最黑暗的。从抗战胜利到川西北解放，沙汀在睢水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

他不畏劳苦继续艺术攀登。他完成了著名“三记”的最后一部。《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三部长篇构成一个艺术整体。它们透视了川西北城镇乡村社会生活的三个重要层面：上层的丑恶与黑暗，知识阶层的挣扎与幻灭，基层农民群众的苦难与抗争。它们创造了中国内地社会的政治经济、世态人心、乡土习俗真实、生动、完整、丰富的人文景观，使人们从这里看到中国社会发展严重的不平衡给民族自我改造带来的沉重负担，唤起担负艰巨的变革现实的历史意识，并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富有特色的画卷，丰富了文学发展的史册。他创作了一个又一个短篇小说。其中不少佳作，反映了短篇小说艺术的愈益圆熟；也有一些作品，由于急切地追随大变动的时代而步履匆促，有一种直奔政治命题、缺乏充分的审美转换之憾。

四十一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注

1945年夏秋之交，形势急剧变化。德国法西斯政府投降后，日本帝国主义还妄想垂死挣扎。8月初，苏联出兵关东，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中国抗日军民大举反攻，日本政府不得不于8月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艰苦的八年抗战终于结束。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安县，传到了睢水场，人们欢欣鼓舞，昼夜燃放鞭炮庆祝。沙汀也与民同乐，带着家小在睢水岸边放了鞭炮。

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中国向何处去？人民的愿望是走向和平、民主。为实现人民的心愿，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于8月28日赴重庆参加和平谈判。这个喜讯传到睢水，进步人士都十分振奋。可是没有多久，报纸上又披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消息。人民引颈以待的和平、民主将遭到挫折，场镇上的知识界又纷纷议论。

沙汀大胆地在场上露面。中秋之夜，睢水中心校举行晚会，他还登台唱了一段《武家坡》。城里郑慕周嫁女，他赶去贺喜，还充当送亲客，送表妹到江油县男方家里去。

这年深秋，他创作了短篇小说《访问》。冬天，又写了《范老老师》、《呼嚎》。

《访问》写开明士绅、县参议员苏子隅带领有正义感的学生访问小商、摊贩，要他们检举乡镇当权人物勒索壮丁费、验送费等贪污舞弊行为。这些受害者却胆小怕事，不敢签名作证，以至狷介耿直的参议员下不了台，终于决定辞去职务。作品写了参议员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从一个特别的角度的反映了征兵中的弊病，撕破了国民党政府假和平、假民主的外衣。但作品按照主观意念讲述和交待事件的笔墨较多，情节也比较单调。

《范老老师》、《呼嚎》表现了抗战胜利后下层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真切愿望。前者写范老老师从报纸上看到重庆人民反内战的报道后，认为内战必然停止，和平必然有望，带动群众燃放鞭炮以抒发欢庆之情。谁知时局的发展与他的愿望恰恰相反，于是他便第一次被认为是扯谎和放空炮的人。

这个忠厚、执著的老教师绝不甘心，一再利用身边的事实印证他的认识可信。作品揭示这个教师的心理精细而有特色。他认为内战不得人心、和平必定有望已近于痴迷，所以一再以主观愿望附会客观事物，用客观事物来印证主观愿望。直到接连两天的报纸报道内战已全面展开，他还认为他所说的不会打内战并没有错：“只有那些混蛋才愿意打下去！”表现了一种近于迂讷的昂扬和专注。后者写农村妇女廖二嫂在抗战胜利后巴望着被拉壮丁的丈夫从前线归来，不料国民党反动派挑起了内战，调遣他的丈夫充当打共产党的工具，使她大失所望。她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却被认为是“耍横”，关了禁闭。作品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农村妇女的单纯和倔强。她的认识的逻辑是：因为乡公所绑廖二去当壮丁时就说好了打完仗就回来，所以抗战胜利了就应该向乡公所要人，而廖二也说打平日本就回家，现在就应该兑现，她质问乡民代表主席，为什么说话不算话。她被关进了禁闭室，仍然不停地叫喊：“我们说清楚打平日本就回来的！”这两篇小说是当时形势下的“趋时之作”。但它们截取了两个生活侧面，在描写人物上下了功夫，又善于烘托气氛，因而给人真切之感。像这样的逼近现实而艺术稔熟的佳构难能可贵。它们标志着作家在创作上已转于贴近现实，并显示了艺术的活力。《范老老师》经以群交《新华日报》连载。《呼嚎》在《中原·文艺杂志·希望·文哨联合特刊》和《文联》上同时刊登。由于作品现实性强，《新华日报》和《大公报》曾发表文章予以高度评价。

1946年新春，沙汀在长时间构思的基础上考虑了长篇小说《还乡记》的详细提纲。暮春时节，山乡风和日丽，他兴致勃勃地提起了笔。此时茅盾来信说，他正应上海一家出版社之约，编辑一套长篇小说丛书，望沙汀也能提供一册。沙汀创作的劲头更大。他正写得顺利，写到第六章，冯大生归家后，听说保队副徐烂狗欺骗和霸占了他的妻子，提起斧头就朝仇家的院坝走去，何其芳又来信，通知他到重庆去工作。

他于5月底启程去重庆。当时国民政府已迁回南京，周恩来也率中共代表团于5月3日去了南京。四川新设立了省委，由吴玉章任省委书记，王维舟任副书记，何其芳任省委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省委设在中山一路重庆谈判时中共代表团住过的一幢楼房里。他在那里见到了何其芳和冯乃超。他们告诉他，组织上要他来重庆，是因为“文协”总会已迁回上海，由他负责筹备重庆分会，接着就同他去见了吴玉章和王维舟。

沙汀来重庆之前，收到艾芜的一封信。艾芜告诉他，重庆的《希望》和成都的《泥土》杂志接连刊登文章，批评他的《淘金记》、《替身》等作品的“客观主义倾向”，扣上了“典型的客观主义”、“客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结合到一起”、“机智的卖弄兴趣主义”等帽子。所用的有些措词之刻薄，为过去的文艺评论所少见。沙汀窝了一肚子的火。他见到何其芳、冯乃超时，就发泄了一通，到了吴玉章、王维舟那里，忍不住又说了要驳斥的话。吴玉章、王维舟劝说了一阵，还告诉他，周恩来离开重庆头一天晚上，曾一再嘱咐要以团结为重，避免在一些非原则问题上纠缠，以免抵销力量。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求他主动去与《希望》杂志留渝的人接触，增加了解，消除分歧，他这才冷静下来。

他仍住张家花园原“文协”总会旧址。总会的许多人到上海去了，只留下梅林办理一些善后事宜，显得空落落的。到了晚上，他就到艾芜家里去。恰好何其芳也来了。他们一起研究了分会理事会组成人员名单。

此时梅林正在发放救济复员贫病作家的复员费。他要给沙汀一份。沙汀说：我家在四川，并不复员去上海呀！梅林说：你总算个贫病作家嘛。即使不算病，也算贫嘛！还说这是早已研究决定的。其时沙汀正需要钱，也就不再推辞。这笔复员费来自美国提供的援华经费。

没有多久，重庆分会就筹备成立了。分会由何其芳、沙汀、艾芜、聂绀弩、沈起予、力扬、萧曼若等任理事。会址仍设在张家花园 65 号。分会的具体工作由沙汀负责。一些大事则与何其芳联系。在沙汀与何其芳之间作联系工作的是王觉，一个经常穿一身灰色西服、思想活跃的青年。分会成立后组织京剧团、川剧团在宁波会馆举行了义演，所得收入作为活动基金。

夏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又是诗人节。分会根据王亚平的建议举行了一次诗歌朗诵会。朗诵会由沙汀主持，王亚平和一些青年作者朗诵新诗。初露头角的沙鸥朗诵表现农民苦难生活的诗引起热烈反响。次日许多报纸报道了朗诵会盛况。有一家报纸在涉及到主持人时，说这个穿蓝布褂子的人像一个呆头呆脑的中医大夫。还说：呆头又呆脑，如何写小说？这一句幽默的评语与沙汀的形象大体相符。他从山沟里到大城市，装束带着几分土气，讲话也十分拘谨。在衣着时髦的诗人济济一堂的场合，当然显得土头土脑。但恰恰是这位“土著”作家写出了《在其香居茶馆里》、《淘金记》等令人侧目的小说。

7 月中旬，何其芳主编的《萌芽》创刊，刊登了何其芳化名傅履冰与吕荧的通信《关于“客观主义”的讨论》。其中吕荧说：“今天，也可以说近些年来，在文学上广泛流行的是一种‘革命教条（或公式）+ 技巧 = 作品’的创作，就是称为客观主义的倾向。客观主义是师承自然主义的。”傅履冰认为：“与其说自然主义，客观主义，还不如说他们还存在着很多旧现实主义的弱点（当然，也不能说全部就是旧现实主义）”。“被具体地举出来代表客观主义倾向的作家（如沙汀），据我所知，似乎并不是用这样的创作方法。至少主要的不是用这种方法。就以沙汀为例吧，我读他的作品，觉得他并不是仅‘铺张偶然的情节现象来代替本质’，他倒是企图‘集中地有意识地把握要害或本质’。而且他也相当成功地写出了若干真实，如大后方基层统治阶级的黑暗等等。然而，我们对他的作品仍感到不足者，或甚至如兄所说，‘仍不能深刻而感人’者，我想主要的并不是他师承了自然主义的收集材料方法，而还得另外去找原因。如沙汀，我想主要的是由于他的生活太狭窄。虽说他未必不想集中地有意识地把握这个时代，把握这个时代的要害和本质，然而由于生活与实践的限制，这企图就难于实现。”何其芳在参与客观主义问题的讨论之前，曾与沙汀交换过意见。沙汀对他的看法也并不完全赞同，可是沙汀坚持不公开表态。何其芳通过作具体组稿、编辑工作的王觉向他约稿，他也表示不参加这场讨论。不仅如此，他还经过卢鸿基约《希望》杂志的一个主要成员见面。此人身着军装，乍见时令人咋舌。但他们谈得较为融洽，消除了一些成见。在处理与《希望》的人员的关系上，他算是遵循了以团结为重的原则。

高尔基逝世 10 周年，沙汀和分会的几个人组织了一次纪念晚会。阳翰笙应邀主持了会议。许多在渝的文艺工作者都参加了。担任省委宣传部长、新华日报社社长的傅钟也到会了。诗人王亚平朗诵了《海燕之歌》。他用了本地口音，吐字清楚，感情充沛，受到好评。

这年 8 月，蒋介石发动内战达到了高潮。重庆当局经常制造事端，压制民主运动。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共产党员、民主人士被绑架、被杀害的事时

有发生。四川省委不得不把工作重点转到采取对策上来。这天晚上沙汀得到已在民生轮船公司工作的何迺仁的密告，国民党当局和警备司令部正阴谋策划一次类似当年成都“抢米事件”的丑剧，他立即作了汇报。省委通过《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并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社会团体的代表举行招待会，表达了促进民主和进步的诚意，赢得了人心，使敌人的计划破产。

由于局势越来越严重，省委决定组织必要的疏散。何其芳通知沙汀，要他仍回安县隐蔽。他陪沙汀去见了吴玉章。吴玉章对他说，看来内战要打下去，我们在国统区的同志怎么办呢？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抗争。几年来征实（粮）、征兵，人民吃够了苦头，抗战胜利后以为不再吃苦头了，可是反动派发动内战，继续征实征兵，我们就发动群众，制造舆论，进行斗争，搞它个稀巴烂，看他怎么打内战！他嘱咐沙汀回家乡路过成都时，去找找张秀熟、王干青，要他们也造这方面的舆论，并且争取在即将召开的省参议会上搞个吁请政府停止征实征兵的决议。吴玉章思想明快，语言明瞭，特别是一再强调搞它个稀巴烂，给沙汀印象很深。

吴玉章谈话后，张友渔进来。他告诉沙汀，漆鲁渔已由雅安转到成都工作，急需一份成都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名单。他已叫人用秘写药水写在一本书的空白处，需要妥为送到。沙汀感到这个任务重大，不敢接受。他说他几次往返于成渝两地，都不带任何书籍，避免引起麻烦。张友渔转念一想，又说，或者这样：把名单用药水写在一叠信笺上，夹在一叠信笺、信封里，可以避免嫌疑。何其芳也说，这个办法比较稳妥。沙汀点头表示答应。第二天，何其芳给他捎来了一叠信封、信笺，其中有一页秘写的名单，但看不出任何痕迹。他受舅父之托，在补益大药房买了一些瓶装的补药。就用这些信封、信笺包裹和隔离药瓶，不露出丝毫破绽。

沙汀在何迺仁的精心安排下，悄然离开了重庆。到了成都，他便在刘开渠家里住下。然后找到漆鲁渔，交付了秘密名单。他找了王干青，又一路去见了张秀熟，把吴玉章谈话的精神传告了他们。诸事办完，返回睢水。

沙汀这段时间写了短篇小说《苏大个子》、《催粮》。前者写被迫卖壮丁的苏大个子，于1944年国民党军队大溃败中因重病被遣散回乡，在家乡陷入走投无路的悲惨境地。他的妻子贫病而死，压迫和剥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眼前没有任何出路，却又甘心于奴役的命运，心里充满矛盾惶遽。作品通过苏大个子的个人遭遇和苦闷，反映了国民党军队的腐朽，农村的凄凉凋敝，向人们揭示仅仅凭个人的挣扎，无法改变自己的困苦境遇。后者写抗战刚刚胜利，可恶的内战却又打响，粮户李扯火免粮一年的希望完全落空，重又被征实逼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为了从警丁的纠缠中脱身，把交粮的任务转嫁给了佃户汪二。骨骼宽大、气色却很萎靡的汪二再也无法推脱，陷入无可奈何的困境。作品通过当时农村生活状态真实的描写，展现了中小地主因粮款催逼而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政治压迫转嫁到佃户身上的阶级关系。这两个短篇小说，一个以个人命运来折射现实生活，一个用生活的断面来显示社会关系，都可以说是各具特色的完整意义的短篇。它们的主题鲜明，结构谨严，文字简约。但是也看到一种苗头，那种急切配合形势的观念也多少制约了对人物个性的充分展示和情节的生活情趣化，影响到作品的艺术效果。

四十二著名“三记”之三：《还乡记》

1946年8月中旬，沙汀回到了睢水场。

他没住多久，就感到不能在场久留。由于内战扩大，县党部的党棍又十分嚣张。他们探知沙汀在睢水一带，扬言要缉拿归案。他又过着不安定的生活。一听有什么风声，就赶紧上牛市坎前去苦竹庵，或沿睢水而下，经红石滩、邓家碾转一圈去苦竹庵。

郑慕周捎来了信，叫他务必转移下乡。这次他采取了“反常之举”，不再往远离县城的方向走，而是到距城近的地方，到较大的秀水镇。他在郑慕周向秀水乡乡长曹泽川打过招呼以后，于一天中午同马之祥在秀水镇附近一位朋友家里逗留到黄昏时分，到新的居停主人家里去。

主人名叫谭海洲。兄弟三人在镇上开了一家锅厂。住房就在厂房后面。房间虽然不多，排列却错综复杂。沙汀被安排在一幢绿荫掩映的小楼的底楼。楼上是谭母供奉观音的经堂。

谭海洲一再拍胸口，他要遵照郑旅长的吩咐把沙汀照顾好。可是他却违反沙汀避忌一切生人的要求，随意带客人前来见面。有一次还带来一个成都的客人，邀沙汀与客人共进晚餐。沙汀只得硬着头皮应酬，心中暗暗叫苦。客人走后，沙汀再次强调“避相”的必要。谭海洲仍然毫不在意地说这些都是讲交情的朋友，不会走漏半点风声。不过这以后他就很少领生人来见面了。沙汀在谭家锅厂后面的那间昏暗的小屋里住了两个多月，续写完《还乡记》初稿。

《还乡记》同前两部长篇小说一样，也有一个构思的过程。早在1942年冬天写完《闯关》以后，他就开始思考农村生活的感受，有了反映农民生活的打算。1943年他在睢水场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听保姆王大娘讲儿子王大生被迫卖壮丁的种种不幸遭遇，心里活跃起一个被压迫的、富有反抗精神的青年农民形象。后来他在构思《困兽记》时，又一再产生过表现农民反抗斗争的创作冲动。他逐渐形成了一种认识：如果他仅只写了恶霸地主的贪婪狡诈，贫苦知识分子的苦闷挣扎，无论如何是不够的。他还得尽可能反映当时农民群众的生活，他们在反动政权层层压榨下的呻吟、挣扎和反抗，让读者从三部长篇中看到四川农村社会几个重要方面的真实面貌。当年冬到次年春，他在深山刘家沟写作《困兽记》，有意识地扩大了生活视野。贫瘠荒凉的山地，麋子出没的林莽，原始性的耕作，打笋卖笋度荒等等深深地吸引了他。山民们的勤劳、淳朴、强悍、机智给了他强烈的感染。曾经经常往来的刘荣成等留给他深刻的印象。他对自己的创作打算有了充分的把握和信心。1944年他在重庆参加整风学习期间，读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听了一些同志对《淘金记》、《困兽记》的意见，愈加感到表现农民被压迫和反抗的极端必要，推进了《还乡记》创作的设想。回到睢水以后他加紧了艺术构思，于1946年春未动笔。刚刚写到冯大生提刀走向仇家，因奉命去重庆暂时辍笔。9月初至11日底，在谭家锅厂后的小屋里续完。

这部作品以山区农村为背景，以青年农民冯大生被迫卖壮丁后还乡的一段遭遇为基本线索，着重写了农民群众同国民党农村基层政权代表人物保甲长之间的一场斗争。当冯大生逃回家乡时，痛心地发现妻子金大姐已被保队副徐烂狗霸占，燃起了复仇的怒火。此仇尚未得报，“太上保长”罗敦五又勾结乡长老咪阴谋掠夺农民经营竹笋的经济利益，同时危及冯大生的生活出路。冯大生不得不奋起反抗，并将个人的复仇纳入集体斗争。由于冯大生的反抗和农民斗争的局限性，最后以冯大生离乡出走而告终。作品的主要情节

一是“霸妻”事件，一是“笋子”事件。它围绕着这两个事件，一方面描写了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一方面表现了乡保甲长鱼肉乡民的罪恶。它将冯大生反抗性格的发展，张逢春、冯么爸等沉着机智、倔强乐观的斗争精神跃然纸上，同时把徐烂狗、罗敦五、罗懒王、老咪之流的丑恶嘴脸和他们之间互相倾轧又互相勾结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勾画出来。冯大生为代表的农民们的反抗虽然带有个人反抗和自发经济斗争的特点，但他们是为了一种共同的利益而抗争，多少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徐烂狗等人尽管各怀鬼胎，但他们玩弄的都是在一定的政策法规掩护下的强权，代表着一种政治势力和政权。这两方面的斗争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作品正是立足在这样的思想高度，通过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揭示了农民的某种“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认识价值。

这部作品创作了众多的农民形象。它所着意刻画的正直坚强的冯大生，稳重老练的张逢春，倔强孤僻的冯么爸，忍辱退让的冯有义，温驯善良、知过能改的金大姐等，都各具特色，留给人较为深刻的印象。其中写得最成功的是主人公冯大生。作品把握着这个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真切地写了他的遭遇和命运。他为寻求活路而被迫卖了壮丁，不堪忍受当兵的非人生活逃回故乡，在发觉妻子被霸占以后愤而提刀大闹徐家院，面对强大的敌对势力无能为力和自身的蒙昧，因而乞求“老太爷”罗敦五和乡长老咪之流为之主持“公道”，当这一切遭到失败，当乡民们为打笋子的经济利益群起抗争时，他又燃起新的斗争热情。他的性格在波澜起伏的矛盾冲突中逐步展示，在必然的逻辑中逐渐发展。作品没有脱离历史条件把他写成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而是置于当时具体环境中，塑造成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的普通农民。他有成长的过程，有小生产者的狭隘，对斗争的目标和未来的前途没有清醒的认识。这个人物真实可信，给人以艺术感染。这是作品最主要的艺术成就，是作家又一个新的艺术成果。

《还乡记》在追求积极的主题和创造农民形象等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它总的艺术成就比不上作家的前两部长篇小说，尤其不如《淘金记》。何其芳在正确评价《还乡记》主题积极、明确，主角冯大生写得很好的同时，认为它是三部长篇中最好的一部未免过誉。事实上，这部作品无论开掘主题的深度、社会批判的力度，还是对社会生活、社会风俗真实细致描写的完美程度均不及《淘金记》。作家追求主题的积极、明朗、重大，热忱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前进的趋向的创作意向是好的，但忽略主题的深入开掘，忽视生活环境精细的描写就会影响到艺术魅力。《还乡记》前半部分写得较好，艺术性较强。它围绕“霸妻”事件，围绕冯大生复仇安排情节、场面，紧凑集中，波澜起伏，引人入胜，人物的言语行动有光彩，人物性格有冲击力。可是后半部分，特别是进入“笋子”事件以后就黯然失色。人物的共性活动代替了个性刻画，一般性的叙述代替了社会生活习俗生动的描绘，主人公冯大生也逐渐失去了血肉，失去了生气。这个普通农民甚至老练地去“说服着那些还在动摇的邻居”，登门做“亮油壶”、陈国才等动摇分子的思想工作。他的思想行为超过了觉悟程度，与这场自发经济斗争的水平很不协调。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马恩列斯论文艺》第101页。

参见何其芳：《致沙汀》，《何其芳选集》第3卷。

尽管《还乡记》也有不足，但它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它是作家创作的新收获，在三部长篇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有些现代文学史家从另一种角度贬低它的价值，认为正是北方农村在党的领导下酝酿着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的时候，《还乡记》却写了一场农民的自发斗争。在他们看来，一个时代只能有一种本质，只能写一种题材，否则就没有时代特征，就没有认识和审美价值。这显然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是从写本质即写主流的理论模式出发作出的片面的评价。

沙汀在写《还乡记》的过程中，还应《民生报》副刊编辑刘沧浪之约，赶写了短编小说《烦恼》。写青年农民刘久发在抗战期间，以到乡长家服役为代价免于当壮丁。日本投降后，他回家完了婚。可是刚刚才三个月，又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又开始征兵，可怜的父母不得不再次送他到乡长家里去。他无论如何不愿再去挨打受骂，不愿离开新婚的妻子。于是全家人都陷入了烦恼。与此同时，同村的另一家农民也因为听到内战的消息，要替一个年仅十六七岁的儿子完婚以保住香烟后代，而女家却怕男方被拉壮丁误了女儿的青春，同样陷入了苦闷。这篇小说把笔触伸入贫苦农民的日常生活，切入夏夜的景色，将自然景色的宁静与人物的烦恼、苦闷相互反衬，既富有生活气息又有时代特色。

沙汀写完《还乡记》以后，回到睢水休息了一段时间。此时已是初冬，天气渐渐寒冷。他过去常有胃病症状：暖气、嗝逆、反酸。在谭家锅厂的小屋过了两个多月囚居一般的生活，胃部不时出现痉挛现象。他在家闲居，听到什么风声，就到苦竹庵去住两三天。但是他仍闲不住，在将《还乡记》修改寄出的同时，又穿插写了短篇小说《意外》。这篇作品的创作也是一种“意外”。他暂避在苦竹庵，想到黄玉颀即将分娩，心神不安，摸夜回家探望。适逢玉颀一个过去的学生，在重庆上大学受迫害逃往老家茂县，在此暂住。他向老师讲了许多反饥饿、反压迫学生运动的情况。玉颀无意间向沙汀谈起，沙汀却觉得很有价值。他要玉颀问这个学生，以补充若干细节。玉颀一一向学生提问，他在隔壁注意听取。经过这些了解，加上过去的的生活积累，他很快就构思了《意外》。在转去苦竹庵时动笔。快到结尾，听到王颀临盆的消息，带着稿纸夤夜回到家里。他亲自充当地称为“稳婆”的接生员，顺利接下了婴儿。到雄鸡报晓，母子安然入眠，他铺开稿纸写完了结尾，与作品主人公李涛意外脱险一样“吁着气嘻开嘴笑”，注上时间：1946年11月13日夜。小说《意外》就这样与小儿子刚宜一起呱呱坠地。这篇小说通过大学生李涛的一段生活，反映了国统区城市民主运动中学潮的声势。它采用侧面表现的角度，把李涛与王南碰头的地点放在熟悉的少城公园内。李涛与王南经受追捕的惊恐。后来发现不过是一场抢劫。这个“意外”的惊喜的结局新颖别致。小说的构思缜密。基调与以前一些青年学生题材的作品不同：积极、鲜明、昂扬。

冬去春来，沙汀适当休息。到1947年春末，写了短篇小说《李虾扒》。这以后解放战争进入全面反攻，国统区加强法西斯专政，四川省政府明令通缉沙汀，要求安县当局“缉拿归案，就地正法，以烟匪报闻”。沙汀只得长时间潜居苦竹庵。在初冬，接连写了短篇小说《生日》、《钟敖》，次年春写了《选灾》。《李虾扒》是由青年农民抗拒兵役而剃断食指的骇人听闻的事件触发构思创作的。写保长李虾扒领人去抓一个多次躲避壮丁露宿山林、偶因生病回家的青年么蛮子。正当他们得手时，么蛮子突然用柴刀砍断了食

指，使他们的如意算盘顿时落空。作品表现了保长在内战中征兵的罪行和所加给农民的苦难，也反映了农民各式各样的反抗。《生日》、《选灾》旨在反映国统区伪国大代表基层选举中的丑态和带来的灾难。这两篇作品采用作家常用的侧写的手法。前者截取寿母生辰郎舅斗气、妇姑勃谿的生活片断，表现两个落选者的嘴脸，特别是顶着参议员招牌一贯徇私舞弊的黄育生假道学的丑恶面目。并且通过蔑匠二爸逃避选举和他的媳妇硬被拖去投票惨遭杀害的生动情节，嘲弄用“民主”、“民意”粉饰起来的选举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两篇作品的现实性、社会性都较强，但惜乎都过于急切地直趋政治命题，人物的描写较差。《钟敖》创造了一个富有特色的开明士绅钟敖的形象。这个人物依据的原型就有相当的特点。这是一个从戎多年、阅历丰富的“在野”的绅士。他在睢水场西的山坡间建立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农场，饲养荷兰种牛，繁殖来亨种鸡，倡导新法接生，致力于用科学文化来改造农村，向愚昧和落后宣战。他在沙汀避居睢水不久就成为常客。沙汀怀着极大的兴致，以他为基础创造了钟敖的形象。非常熟练地用散文的笔法，写“我”与钟敖的认识和熟识，由谈到浓，逐步加深，完成了形象的塑造。作品没有回避钟敖阶级的、特殊的地位带给他的偏见，写他具有用新的科学技术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却又有把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仅仅归咎于文化水平低的片面的认识。但作品也没有陷入机械的阶级论，没有避忌钟敖的生产实践、他的新法接生造福乡里和农民的事实。钟敖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独特的形象。

四十三艰辛的岁月

到了1948年秋，沙汀不得不把创作的节奏放缓。这时他一直感到胃部不适，常有胸口隐痛之苦。他注意调节自己的生活，适当注意休息。但有时又无法完全摆脱袭来的创作冲动，难以平抑自己的情绪。他的心情常常处于矛盾之中。熟悉他嗜好的居停主人爱做一种名为“扑水蒸蒸”的碎玉米干饭，热情款待这位上宾。谁知这种粗砺的食物对胃部的溃疡面往往造成强烈的刺激。9月，医学上认为容易出血的时节，他的胃溃疡恶化，造成大出血。

这天晚上，沙汀正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香酥的“扑水蒸蒸”锅巴，突然感到心口的痛，撑持不住，放下碗筷，到卧室的雕花床上躺下。可是疼痛并未缓解，而且感到异常恶心，频频作呕。接着就有腥臭的东西从胃里一涌而出，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下完了！”随即不省人事。当他醒来，恢复了意识，觉得面前油灯飘忽，人影晃动，身体像躺在软软的云团里。萧业贵的母亲告诉他，他吐了那么多血，有的还是血块，幸好是敞口吐的，若强行忍住，就很危险了。她叫他不要害怕，已经去给他弄药去了。不多一会，药端来了，萧老太婆就用调羹给他喂药。他顺从地一口口服下，没有精力去分辨服的什么药。后来才知道她们是将吐出的一些血块放在瓦片上用微火焙干，研成粉末，用童便调成汤药。她们认为这是最好的止血汤。

接着几天，萧业贵一家人都围着沙汀转。萧业贵两兄弟用滑竿抬他去请萧懋森老中医诊病。萧业贵的妻子罗惠如为他熬药。萧老太婆给他喂药。她们接连几天给他服用了“回龙汤”，即童便。所有童便都由萧鸿发供应。这家人还请来了端公道士，为他祈神禳星，祈求神佑，消灾去邪。这种办法原始落后，有的人也并不赞成，但仍旧热心地采用了。经过救治，濒于绝境的病人终于转危为安。

沙汀咯血的当天晚上，萧业贵就到睢水场向黄玉颀报告了。玉颀通宵不眠，于次日傍晚到了苦竹庵。这还是她第一次下乡看望沙汀。为了保密，她从不到沙汀的避居地去。到这丘陵地带，爬坡下坎，拐弯抹角，路途迷离，幸好叫了外侄黄国权带路。这孩子一直充当她与沙汀的联络员。玉颀见沙汀神智已清醒，咯血已止住，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萧业贵向袁寿山报告了沙汀的病情。袁寿山很快向郑慕周告了急。郑慕周立即派人到成都与医务界的朋友陈序宾取得联系，找好了医院，准备送沙汀去住院治疗。后来考虑到安全，而沙汀的病情已经稳定，便取消了这种打算。郑慕周叫人送来了鱼肝油、人参、奶粉，嘱沙汀悉心调养。

沙汀长期疏散在贫瘠的山乡，作伴的不只是寂寞，而且有清贫。他前妻所生的刚俊、刚锐倒已经就业，不再操心。玉颀生的两男两女：杨礼、刚颀、刚虹、刚宜，最大的13岁，最小的尚在牙牙学语。妻兄的两个孩子黄国权、黄国秀又寄养在他家。这样一个以吃长饭的角色为主的家庭，仅仅靠岳母、妻子的两份工资，加上他不可靠的稿费收入，生活当然是窘困的。一旦他身染重病，需要治疗和营养，就十分困难了。

幸好此时朋友们伸出了温暖的手。艾芜生活本来拮据，寄来了一笔钱，在附信中说：这点钱姑且用来买点鸡蛋吧！他还代沙汀催收了出版社的几笔稿费。以群一直是沙汀书稿的忠实的代理人。他很快寄来一笔稿费，向沙汀表示亲切的慰问。仅仅与沙汀在鲁迅追悼会上有一面之缘的蒋牧良从朋友那里知道沙汀重病的消息，寄来了慰问信和钱。蒋牧良随后又受一位电影工作者之托，转寄来一笔钱，而且遵嘱没有告诉姓名。

经过调养，沙汀的健康渐渐恢复。他开始坚持早晚散步。自备了一个炉灶，熬点花生粥少吃多餐。稍后烧点蛋汤、猪肉，补充营养。玉颀也炖些猪心肺、猪肚之类，叫黄国权送下乡。养病期间，他随意看了些医学、佛学方面的书，如《寒论浅说》、《六祖坛经》、《难经》，聊以消遣。

严冬来临，风声又紧。安县当局再次奉四川保安司令部密令，下文到睢水追查沙汀行踪，说如此人确属已远离他乡，必须具结担保，一经查获，严惩不贷。县政府的头头还问及郑慕周，说上峰认为沙汀只有《困兽记》有“攻击诽谤”之嫌，如投案自首可从宽发落。郑慕周说，我怎么知道这等情由？怎么知道此人下落？他随即通过联系，要沙汀火速转移到永兴乡去，由睢水乡派可靠的人护送。于是1948年底的一个寒冷的深夜，萧业贵按照袁寿山的通知，护送沙汀去睢水乡中心校，接着由袁寿山派乡队副简毅护送到永兴乡熊仁卿家里住下。住不到一个月，沙汀见主人忽然面有难色。原来又有通缉的消息传来。一个是保安司令部的简报：“综合一周匪情”：“安县奸匪杨子青（即沙汀），用川西北籍地方亲属关系掩护其工作，以睢水一带为根据地，……”一个是成都出版的小报刊登了一则报道：“沙汀在其亲戚掩护下，以睢水为根据地，在川西北一带大肆活动，一般都叫他杨二哥，……”这些都只是一般性的消息，可是熊仁卿却忧心忡忡。于是经过商量，沙汀又转移到邹家抱房避居。到了春节，家家团聚，沙汀感到格外寂寞。还未破五，他就托人给黄玉颀带信，派人接他回家。10多天后，便由睢水中心校工友杨志远接他回到家里。永乡距睢水70余里，重病之后辗转于此隐蔽，生活动荡不安，使他吃了不少苦头。当他摸夜回到家中，已疲惫不堪，喝了几口热茶，就倒头沉沉入睡。次日凌晨醒来，他的心情十分愉快。他向玉颀唠唠叨叨，讲熊仁卿的虚情假意，讲熊的女人孤苦伶仃，讲抱房的邹氏艰难守业。接着

打听解放战争的消息。当时已是 1949 年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胜利结束，解放大军正准备渡江南进，蒋介石已被迫宣告“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沙汀兴奋不已。

沙汀想多住些时日。玉颀的体贴，孩子们的亲近，善于烹调的岳母常常亲自入厨做些可口的菜肴，所有这些天伦之乐都使他留恋。可是不到两个月，郑慕周又派人送信，叫他转移下乡。郑慕周认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之时，各种意外的情况都可能发生，万万不可麻痹大意。沙汀觉得舅父所言极有道理，便在与袁寿山商量以后，于 5 月 21 日随吴瑞卿到板栗园隐蔽。

吴瑞卿是板栗园的村小教师。板栗园在睢水场东南 10 里，睢水乡与拱星乡的交界处。那里青山渺远，平畴交风，眼界开阔。吴瑞卿的家在一片板栗树和翠竹的林荫深处。住房不多，一排四间正房。其中三间卧室，一间堂屋，一间相当宽敞的厨房。与正房相接，有一间偏房，堆放柴草、箩筐、晒席、犁耙之类的杂物。全家只有 5 口人，结构却比较复杂。除吴瑞卿夫妇、一个 5 岁的女儿，有一个 50 多岁守寡的嫂子，一个近 50 岁鳏居的幺哥。沙汀去后，不得不屈居偏房。可是沙汀十分满意。尽管一片茅屋，一半堆杂物，一半安床铺，还权且用木板当门，屋外的环境却很幽雅。右侧有板栗数株，亭亭挺立。门前有桃、李、枇杷、百合 10 余株，争妍斗媚。稍远有一片苗圃，有绿茵茵的树苗、红红绿绿的花草。每天早晚，沙汀都要在林间散步，饭后在苗圃前流连。

吴瑞卿生活贫苦。他家有地 3 亩，不能养家糊口，得由他教书挣钱，补贴家用。他身兼教师、校长、工友一切职务，还为农民代写书信，雕刻图章，拿脉处方。他很有正义感，对乡保长表面恭顺，背地里切齿愤恨。他对沙汀十分崇敬。几乎每天上课后都要来同沙汀闲谈，将所见所闻推心置腹地讲给沙汀听。村小没有钱订报，他隔几天就到睢水或拱星中心校去看报纸，将有价值的新闻告诉沙汀。沙汀也给他讲些革命道理。他还把创作的《减租》、《退佃》念给这个乡村知识分子听，看看他的反映。在解放前夕的暗夜里，他陪沙汀度过了许多焦灼、寞寂而又兴奋的白天和夜晚。

吴瑞卿的妻子李芳群，比丈夫年轻 10 多岁，却高出半个头。她成天屋里屋外辛勤劳动，极少谈笑。可是她的心却像一池纯净的水。她每天早晨给沙汀端来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百合熟了，经常熬百合稀饭，给沙汀大碗大碗的添。她只觉得这客人是丈夫的贵宾，是很苦的读书人，是需要养好身体的病人。吴瑞卿的嫂子、幺哥也是沉默而善良的人。幺哥罗圈腿，大舌头，留着辫子。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和睦相处。对动荡的时局，偶尔也关心。附近的农民赶场归来，谈粮价涨到了多少，金元券没有信用，张跛子的么儿被拉去当了铁肩队员，……他们听了，也凝神思索，都不言语。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情趣。

四十四从他的角度迎接黎明

1949 年冬，解放大军从川北、川东两路入川，川西北曙光在望。

黎明前的山乡唯水，社会秩序更加混乱。溃逃的散兵流窜乡间抢劫财物，用武器、军服交换便衣、食物。土匪打家劫舍，乡民传告抢劫信息的梆梆声彻夜不停。场镇的商贾粮户纷纷下乡，地主家的小姐草草出嫁。所有这一些都使人感到旧时代即将过去，新时代即将来临。沙汀经常处在激动之中，而

且觉得健康也渐渐恢复，精力也日益充沛。他将养病以来的构思和过去积累、近期触发的感受写出来。他认为这是从他的角度来迎接解放。写作劲头之足，进展之快，连自己也感到惊喜。当时的作品谈不上寄出去发表，但他并不在乎。为不致让心血凝成的稿件被发现被抢劫，他用防水纸包扎好，埋在门外的苗圃里。

12月27日，安县解放。安县人民沐浴在晨曦中，沙汀无比欢欣鼓舞。他趁兴头上继续写作。他以此作为表达心情的一种特殊的方式。

1950年1月，郑慕周奉安县首任县长赵鸿图之命，前去接沙汀进城。他乘马车到秀水镇，派人通知沙汀。沙汀于次日一早从板栗园出发，步行20里到秀水，东方刚刚发白。

他到栅门外马之祥家里，马之祥才洗漱完毕。两位知心朋友，相逢在黎明时刻，都非常兴奋。马之祥一面高声谈笑，一面将一碗煮好的糍粑蛋端给沙汀。马之祥的妻子听见开心的谈笑，挑帘出来，也大声笑道：原来是你啊！早饭后，马之祥就陪沙汀去见郑慕周，几年不曾面晤，舅父已两鬓染霜。对舅父不畏风险的保护，沙汀自是感激不尽，郑慕周接沙汀进城的消息顿时在秀水镇传开，许多熟人前来看望，很少露面的周树乾也赶来送别。大家高兴地谈了好一阵，沙汀才得脱身，随舅父乘马车启程。

沙汀进城后，在舅父家里稍事休息，然后去会见了赵鸿图。出乎他的意料，这是一个30来岁的年轻干部，一个有工科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他身材高大，脸膛宽阔，操一口浓重的山西地方话。他告诉沙汀，是王维舟路过绵阳时打了招呼，叫通知沙汀尽快到成都的川西区党委文管会报到。他还向沙汀了解安县的社会状况，征求沙汀对安县工作的意见。

鉴于社会秩序不安定，沙汀由舅父亲自护送到绵阳。他们在城里长林春茶叶铺下榻。次日上午，沙汀去绵阳地委见了地委负责人刘文珍、彭华。他向他们谈了自己的一些情况，谈了安县的社会情况，县城和一些场镇头面人物的情况，谈话到晚上才结束。彭华派了两名警卫人员送他回住地。第二天早晨，沙汀乘地委派人联系好的一辆邮车去成都。

舅父一直送沙汀到车站，扶他上邮车，看他在驾驶室的司机旁边坐好，望着汽车徐徐开动。他那深情的眼睛，深深地留在沙汀的记忆里。

沙汀这段时间写了5个短篇小说。

《炮手》的构思是由报纸上的一则启事触发的。那是他从永兴乡回到唯水的时候，他成天翻阅旧报，忽然在两月前的一张《新新新闻》上看到一则县参议员的“启事”：鄙人年迈力衰，已多年未当公事，更从不过问政治，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也没有参加过民主同盟，现任县参议员一职，则已呈请免去，另举贤能，……他读后不禁大笑，笑罢又陷入沉思。他觉得他捕捉到了什么东西。在他接触过的人中，不也有以党员、盟员为名来加害于人的吗？不也有被罗织罪名受到迫害的开明士绅吗？他开始进行着艺术构思。到板栗园后，人物已呼之欲出，故事框架也同时搭好。这就是《炮手》。它创造了老派士绅、参议员彭玉书这样一个有新的特色的人物形象。这是一个“好好先生”，处世“以不得罪人为原则”，在代表党团的新派与代表绅耆的旧派之间的斗争中，他“不下深水”。当新派按有关“密令”要求通过决议，通电呼吁南京对延安“明令讨伐”时，他凭印象认为“既然‘领袖’都要贯彻和平解决的初衷，明令讨伐的话是值得审慎的”。他的诚恳受到了旧派的欢迎，引起新派的敌视。他被新派加上有烟瘾的罪名逼迫辞职，扣以共产党员、

民盟盟员的帽子逼上绝路。他也有挣扎和反抗：戒掉烟瘾，洗刷罪名。但所有这些都无济于事，最终只得草拟公文辞职。这篇小说通过彭玉书的遭遇的生动描写，展现了地方官场的世态，反映了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本来面目以及内战的不得人心。

《医生》也是去板栗园之前就开始构思的。当时沙汀听说有个医生把不断贬值的金圆券剪来作摊膏药之用。说的人当作饭后谈资，他却感慨万分，觉得这种现象反映了市场混乱，民不聊生。可是这位医生应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联想起接触过的一个又一个医生，接着进行种种推测：会是一个可怜的、吝啬的医生吗？可是他舍得这样毁坏金圆券？是一个善良、节俭的医生，由于气愤将金圆券用来摊膏药吗？但在几千字的篇幅内写出他的心理、情绪的变化谈何容易？是一个慷慨、耿直的医生吗？对了，就是这样一个医生！他到板栗园以后写了这篇小说。作品以曾给他治过疮的那个医生为描写的主要依据，创造了彭春山的形象。这是一位身材瘦小、面色自净、胡髭浓黑的外科医生。他过去对病人的惧怕疼痛总是耐心地安慰，现在却变得来有些暴躁，喜欢饶舌、打趣。他怜恤病人，不计报酬，但又不能不因为金圆券不断贬值，在拿到酬金之后奔忙于市场买米、量布，最后不得不把几叠毫无价值的金圆券用来裁断摊上膏药。作品在写这个人物时，于悲剧色彩中增加了一些喜剧性的笔墨，透出一种苦趣。如写彭春山眼看金圆券贬值，仍一声不响地收下病家付与的酬金。当他为处理这些无用的废纸时，他忽然想到糖房老板的打趣：“横竖纸也贵，裁起来摊膏药吧！”于是他“忽然邪恶地笑起来，同时叫道：‘对！搞不好我硬要这么做！’”当布匹商人对他托付的买布的事表示无能为力、退回金圆券时，他也“干笑说：‘没关系，——我有支销！……’”“‘它再多些，我都有法支销！——一点关系没有！……’”当他裁断那些金圆券时，“现在，照旧显出一副严肃紧张的表情，他凝神看罐儿里的膏药，等待它全部溶化，但他出乎意外地悄声笑了。因为他忽然记得他所熟悉的种种疮症，又立刻联想到钞票上那张蓄着一横胡子的突颧骨丑脸。”这些充满谐趣的描写，饱含着浓重的苦涩味。这篇小说最重要的特色，正在于通过正面人物的刻画深刻地嘲笑了反面的事物，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物价暴涨、金圆券贬值的社会情态。

《酒后》也是早经酝酿，在解放川西北的隆隆的炮声中诉诸笔端的。它用讽刺的笔调描写了保长王大廷在解放军进入四川，乡村一派风声鹤唳的情况下矛盾惶遽的典型心态。向来老练、毒辣的王大廷在烦躁中好酒贪杯，在酒后更加心烦意乱。他以为把“光荣表征”的联对烧掉就销毁了一切罪责，经老太婆提示才懂得“物证可以销毁，人口却是封不住的”。他省悟到早该多结人缘，但一觉醒来又加以反悔：啥事都是说起来凶！可是即使在醉中。他对待长工也是刻薄的，酒醒以后也没有忘记启用那摔掉了的坑害农民交壮丁米的合升。这篇小说真实地表现了特定环境下特定人物的心理。从对人物心理的准确把握中真切地表现了人物的阶级特征。

《减租》、《退佃》则是沙汀在和儿子杨礼的一次通宵达旦的谈话之后即兴创作的。杨礼在放寒假时随吴瑞卿下乡来看望父亲。父子俩坐在床上畅谈。这个10多岁的中学生讲的一些趣闻加深了他对农村生活的感受。当时的许多地主乡绅在推行“二五减租”中玩弄着种种花样。他们一面减租，一面变本加厉地逼租，使得农民背井离乡。他们在减租之前更换佃约，写上除“二五减租”外应实收租多少，减小数加大数以盘剥农民。这一切都表明国民党

政府企图用减租来缓和矛盾，结果适得其反，他联系到熟悉的人物，很快构思好这篇小说：农民张二向赵大爷提出，宁肯照旧交租也不愿减租，因为减了租却不能拖欠，而他家已经断粮。他的哀求遭到赵大爷的拒绝，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悄悄设法搬到地旷人稀的水磨沟去。可是当全家人像渴望挣脱锁链一样向往着迁徙时，有消息说赵大爷已经布置人上山把守了。他一气呵成地写完了这篇作品，接着又构思了《退佃》：当许多农民都把减租的把戏看穿时，老实、固执的勾兆安却仍然轻信它会带来好处。他哪里想到吝啬、刻薄的陈永发抢在减租审议之前忽然提出要换佃约，写上除减租外应实交租若干的字样。他终于看出这是愚弄和欺诈。但是不由他分辩，陈永发强硬地提出退佃。勾兆安无可奈何，只有另行佃地。沙汀也是一鼓作气写好了这篇小说。

沙汀的这几篇小说，都是与当时现实和形势密切配合的“趋时”之作。其中有的作品虽早经反复构思，但大体上都可以称之为急就章。它们反映了作家在迎接解放时的政治热情。即令在那种急就的情况下，它们在拓展新的生活面、准确地把握特定环境下的人物和人物关系方面，熟练地运用喜剧手法方面，都显示出了一定的艺术特色。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可是其中有的作品毕竟写得匆促了些。它们直奔社会命题，束缚了对人物的充分描写和艺术追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单调、粗糙的缺陷。像《退佃》这样的作品，还插入不少关于“二五减租”不得人心的空泛的议论，用控制不住的说理代替生动的形象的描写。这种状况在沙汀前些年的创作中是很少有的。作家也曾谈到这时的“一些作品文字上未免粗糙”。——

第九章建国十六年：热忱而艰难的过渡

(1950年春 1966年秋)

沙汀在谈到建国以后17年的创作时说：

十年动乱以前，尽管自己可以在祖国大地上自由行走了，但却长期陷没在文艺社团的行政组织工作中，加以自己不够振奋。仅仅写了二十多个短篇小说和散文报道。

建国后的17年里，沙汀个人生活是满意的，创作却是失意的。他只有一本汇集20多篇小说、特写薄薄的《过渡集》。

他曾经满腔热忱地“过渡”。他向自己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面临一个崭新的时代，对于新的生活和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都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探索。”可是他却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他总是在激流中回荡。

他并非没有可能到达彼岸。他只恨自己没有努力划桨。例如责备自己“不够振奋”，还是“那个老毛病：懈怠！”等等。他却忽视了风向和流向。

他的勉强的“过渡”是根本性的失算吗？这似乎不能简单作结论。假如风浪不同他开玩笑，他完全可以自由往返于此岸和彼岸。假如他看清了风浪，意识到没有可能“过渡”，应该迅即返航，所谓伊人，并非都在水之涯。这边也有他熟悉的、足够他毕生垦殖的沃上。

毫无疑问，分析历史现象必须提到一定历史范围内。沙汀的尴尬，有他个人的缺陷和失算，更有历史的局限和责任。

这对后来者无疑是宝贵的教益。

四十五最初的喜悦

1950年1月中旬，沙汀从故乡安县到了成都。

刚刚解放10多天的成都，到处洋溢着喜气。街头不时有秧歌队载歌载舞地经过，新换的门对大多是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的标语，不少墙壁上张贴着上演《血泪仇》等话剧的广告和警备司令部关于严惩国民党散兵破坏活动的布告。连日天气晴好，虽是隆冬，却有一种春光融融的气氛。

沙汀到童子街林如稷家里住下，然后去商业街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见了王维舟。王维舟正要去参加招待起义将领的宴会。他高兴地欢迎沙汀的到来，叫沙汀直接去文化接管委员会报到，他已通知文管会安排工作。他同沙汀一面谈话一面下楼。他叫沙汀上车，顺便送沙汀一程。在车上，沙汀不待询问，谈起了离开重庆回家乡避居的情形。王维舟听他说到利用舅父在袍哥中的影响隐蔽自己时，不由得看了看他头上的毡帽和身上半旧的灰布长衫，带点严肃的口气说：“共产党员不能操袍哥啊！”沙汀连忙向王维舟解释，由于他舅父是有名的袍哥领袖，他又经常同袍哥打交道，确曾被人误认为入流了。其实他舅父从来反对自己的子弟当袍哥。王维舟笑着说：“前些年为了隐蔽，在袍哥中混混倒还可以，现在可不行了，现在是当干部了！”

次日一早，沙汀就去学道街的文管会报到。这里过去是有名的益都公寓。

沙汀：《<走出牛棚之后>题记》。

《沙汀选集》序

《沙汀选集》序

有一座小巧、幽雅的院落，中间一幢一楼一底的建筑，两旁几间低矮的平房。沙汀穿过院坝上楼，见了文管会负责人杜心源、张非垢。两人对人都十分热情。曾经是“鲁艺”学员的非垢对老师更是格外尊敬。他们详细问了沙汀的生活情况，欢迎他一道工作。叫公务员安排好住房，发了一套崭新的干部服。当天下午，沙汀就从童子街搬到益都公寓。

晚饭后，沙汀换上干部服，心情十分舒畅。他看了看旧装，不由得好笑。王维舟说不要操袍哥，显然同他的装束有关。更为有趣的是，他去童子街取行李时，还看见曾来看望他的老朋友夏正寅留下的一张纸条，问他什么时候“过瘾”，不妨告诉他一声，可见朋友们还疑心他染上了烟瘾。夏正寅引起反动当局的怀疑以后，曾混迹于赌场烟馆，以掩人耳目，他以此推测沙汀也在所难免。沙汀在袍哥中往来，确曾靠过盘子，可是他从来没有参与吞云吐雾。现在梦一般的日子都已过去。全身衣着一新，精神也为之一振。这以后，沙汀就在文管会协助文艺处处长工作。不多久，妻室儿女也迁来成都，住在文管会后楼。

在沙汀到成都后的一个星期，李劫人、沙汀、林如稷、刘盛亚等本地的文艺工作者，和随军南下的文艺工作者常苏民、白紫池、羊路由等举行了会师座谈会。大家互祝今天的胜利，回忆昔日的艰辛，增进革命的友谊。在一派欢乐的气氛中，沙汀高兴地发了言。之后不久，成都文艺界人士又参加了成都各界欢迎贺龙、周士第等领导同志的茶会。沙汀也去了。不过他却在离主宾席远远的座位上不声不响地呷着酒。刘盛亚前来约他一起去给贺龙敬酒，他也装做未解其意。正在这时，那边贺龙高声笑道：“唉，沙汀呵！我们还一道打过几天游击啊，怎么不来见见面。”几乎全场的人都听见了这爽朗的声音，把目光转向了沙汀。沙汀更加觉得尴尬。他只得举杯走上前去，当着贺龙说了些什么，连自己也不明白。春节前夕，杜心源按照老区的传统，去拜望贺龙等领导同志，叫上了沙汀。他们到了商业街办公楼。当时贺龙正在接待起义将领董长安。他们在会客室等了一阵，杜心源拜见别的领导同志去了，留下沙汀一人。贺龙送走客人以后，热情地拉他入室就坐。贺龙谈不多久就转到工作上去。他要沙汀作好准备，到重庆筹备西南文联。直率的将军根本不考虑对方有无意见，只是循着自己的思路讲话。说去重庆的路还不清静，会遇到土匪的袭击，部队的车辆已遭到过伏击，等等。到了中午，贺龙留沙汀在食堂吃饭。贺龙，薛明，沙汀，还有几位同志围着坐了一桌。席间，贺龙的话最多。提到当年沙汀离开冀中，他幽默地说：“别人都是老婆跟着老公走，我们的沙汀是老公跟着老婆走！”他的话把全桌人都逗笑了。沙汀也脸红红地笑了。

当时文管会文艺处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联络文艺界人士，筹备成立川西文联。文艺处组织了几次学习座谈会，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有关文艺方针政策的文件；举行过一些茶会，由解放区来的同志介绍文艺工作的经验。在这些活动中，沙汀同李劫人、陈炜谟、林如稷、刘盛亚、邓均吾往来较多，借助他们的声望，联系了更多的文艺工作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又通过与各专县文艺界、部队艺术团体的联系，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准备，就提出举行代表大会的日程安排。沙汀被推举担任大会报告的起草工作。他从来没有写过这类会议文件，不知该写些什么。好在老区的同志给他找来一些参考材料，其中有刘芝明在东北文代会的报告。他按照这种报告的模式草拟了一个提纲交文艺处的同志讨论。在讨论中，发表意见最多

的是白紫池。在戏剧工作重点的问题上，白紫池还同沙汀进行了一场热烈的争论。白紫池是晋绥的老干部，曾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酷爱京戏，对成都京剧团上演老区带来的一些剧本取得成功极为满意，认为京剧适合表现格调高昂的现代题材，戏剧工作的重点应当是京戏。沙汀则是一个川戏迷。他深知川戏在四川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而且成都川剧团上演《小放牛》等也受到观众欢迎，认为戏剧工作的重点当然应该是川戏。在争论激烈的时候，好激动的沙汀忘记了场合和自己已年将半百，一跃跳上椅子大声叫嚷。白紫池早已摸清他的脾气，只是觉得很有趣的笑。最后，为人诚恳的白紫池觉得沙汀的意见确有道理，放弃了自己的主张。筹备工作最后的阶段是酝酿文联主任、副主任、委员人选。在这方面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只是在提名男旦角周慕莲的问题上，统战部门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位川籍的负责人认为周慕莲在旧社会对军阀、官僚的压迫缺乏反抗精神，如果安排作委员社会影响不好。沙汀则认为不能苛求艺人，应当归罪于旧社会。这次争论他也动了肝火。反映到川西区党委书记郝德青那里，这位精明干练的老同志明确表示同意沙汀的意见。经过充分准备，川西文代会顺利召开。大会给每位代表赠送了一册赵树理的小说集《李有才板话》，与会代表爱不释手。大家在和谐的气氛中通过了川西文联的人选。常苏民担任文联主任，沙汀担任了副主任。

因为工作需要，沙汀还向组织上推荐了一些干部。他推荐的第一个人是陈翔鹤。解放前夕，陈翔鹤在成都文艺界中做了许多工作，遭到反动派的迫害，易名陈竞波，在李劫人的掩护下潜往乐山嘉乐纸厂工作，他在致友人陈自尘的信中曾有“岁寒岂易污”的语句表明心迹。沙汀写信要他回成都。文管会先安排他在文教厅任副厅长，以后调到川西文联工作。他是经周文介绍入党的。可是当时在北京的周文写信说他已在白色恐怖中退党。他为此非常气恼。他对沙汀说，事实上是周文要去延安，向他提出，反动当局的迫害加剧，是否暂时不要过组织生活，怎么说他退党。沙汀将这个情况告诉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兼成都市委组织部部长马识途。马识途早认识陈翔鹤，认为可以叫陈翔鹤重新入党，不要候补期。沙汀将此意转告陈翔鹤，陈翔鹤表示同意。沙汀还介绍了同乡人周光复。这人有一定的创作才能。由于安县当局的迫害，流落到了成都，在亲戚家闲居。但在解放前夕，在安县来成都受特训的党棍的胁迫下参加了反共游干班。他几次上门找沙汀介绍工作，如实谈了自己的经历，表示沉痛的忏悔。开初沙汀不由分说加以痛斥，后来了解到他并没有任何反革命活动，被列入游干班名单也出于无奈，便托陈翔鹤向马识途推荐。马识途回复他们说：你们真的相信这个人吗？那么我也没有意见。周光复参加工作后，编写抗美援朝通俗宣传材料，担任《川西说唱》编辑，表现还不错。1951年肃反遭到了逮捕，后来在保外就医中病死。沙汀对此事一直有一块心病。直到在土改工作团期间，听成都市公安局负责人刘传蕪谈了审理周光复案件的情况，据查周光复确实没有反革命罪行，公安部门早准备无罪释放，这才放心。沙汀到文管会工作不久，就向党支部提出恢复组织生活。他在安县9年多，除1944年、1946年两次去重庆时参加党的会议，在党的领导下工作，长期没有过组织生活。组织上交待得很明确：为了隐蔽，不带组织关系，不同当地党组织发生联系。党支部根据他的情况，函请周恩来同志指示。周恩来批转给徐冰办理。徐冰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同时附带说明，由于该同志长期未过组织生活，需要加强学习。这以后沙汀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

还在筹备川西文联的时候，沙汀就准备一俟文联成立就抽身去搞创作。谁知文联刚刚成立，就来了调动通知，要他去重庆筹备西南文联。一次二次通知，他都表示不接受。接着又来通知，秘书长郝德青还叫他去谈话：“同志，这是西南局的第三次调令啊！”他才只得服从。他去做黄玉颀的工作，却怎么也做不通。玉颀任性地讲：你要去就去，我不去！他无可奈何，又把这事拖了下来。后来负责筹备西南文联的邵子南专程前来动员，黄玉颀才勉强答应。

沙汀到重庆后，见了西南局组织部、宣传部的领导同志张际春、陈野苹、张子意，印象很好，心情很快安定下来。他又同离别4年多的艾芜重逢。艾芜在解放前夕，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重庆国民党当局捕人杀人，炸毁工厂，枪声爆炸声不停。他曾多次抱着书本通宵达旦。蕾嘉一再劝他休息，他只是闷声不语，解放军入城那天，他率全家老小挤在欢迎的人群中，热泪盈眶。当时艾芜任重庆市文化局长、市文联副主任。由于西南文联筹备组与市文联合署办公，沙汀和艾芜常常在一起。

西南文联筹备工作的负责人邵子南，原是《新华日报》记者。

1946年沙汀在重庆时，他曾就创作问题请教过沙汀。后来由于创作了通俗小说《李勇大摆地雷阵》，饮誉解放初期的文坛。他常常以解放者和有成就的作家自居，引起艾芜的强烈不满。开初沙汀竭力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后来他对邵子南的盛气凌人也很有看不惯。在一次会议上，沙汀希望邵子南多倾听党外一些有资历的文艺工作者的意见，邵子南昂着脖子、两臂往胸前一架：“这点责任我还负得起！”有一次邵子南到沙汀家里通知开会，黄玉颀招呼他，孩子们叫他邵叔叔，他却爱理不理的，使全家人非常扫兴。

沙汀和艾芜多次在一起发泄对邵子南的不满。艾芜尤其苦闷，曾气愤得想自杀。西南局宣传部领导同志觉察到他们之间的隔阂，由张子意亲自出面召集双方谈心。沙汀直言不讳地批评了邵子南的自负和主观。他说：我们每个同志都得想想，我们有多大能耐？在文学事业上有多大建树？人们之能尊重我们，首先是因为我们背后有党。他说得十分激动，以致两眼盈满泪水。最后张子意表示了对艾芜的信任，称赞了沙汀的诚恳，批评了邵子南。以后不久，邵子南调离了文联。

即使领导人之间存在隔阂，沙汀、艾芜仍然在邵子南的支持下做了许多工作。他们创办了《说古唱今》、《西南文艺》。沙汀作为《西南文艺》的主编人，还发动编辑部的同志按照当年“鲁艺”开展“秋收一日”创作活动的办法，组织过两次反映现实生活的报告文学征文活动。成渝铁路通车，四川人民实现了辛亥保路运动以来修路的愿望，重庆市委指定重庆文工团石玺等创作了多幕话剧《四十年的愿望》。沙汀满腔热忱地参加了剧本的修改和定稿。这出戏后来在文化部的关怀下进一步加工修改，演出时受到好评。在此期间，沙汀还兼任了西南艺术学院副院长。

四十六潜伏的危机

1951年春天开始，四川农村分期分批进行土地改革。沙汀得到组织上的同意，于1951年3月到重庆附近的巴县农村生活了半个多月，又于同年8月到成都附近的石板滩参加土改工作。石板滩在春末发生了土匪暴乱，沙汀曾叫周光复前往采访，由他主持创作过一个剧本，因此他对这里的情况有所

了解。他是随川西区党委书记李井泉去的。这里的土改第一步是打政治仗：发动群众，清查土匪，镇压匪首，教育受蒙蔽的人，第二步是打土豪分田地。由于卷入暴乱的人不少，工作队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开展“洗脸擦黑”运动，号召胁从的人洗心革面，检举首恶。那些被裹胁参与杀害解放军和工作队同志的贫苦农民，受到教育，痛哭流涕，成了斗争匪首、恶霸地主的积极分子。因为第一仗打得好，斗争地主、分田分地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沙汀在土改中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其中翻身农民为保卫土改胜利果实踊跃参军抗美援朝的生动事迹不少。稍后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即取材于这时的积累。后来写《木鱼山》那个老雇农在激愤之下用随身携带的镰刀割掉恶霸地主耳朵的细节，也是此时了解到的真实材料。

石板滩土改结束后，沙汀回到重庆。他一心想坐下来写一部反映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他设想通过几户农民多线索多方面地表现这场翻天覆地的运动，尤其对刻画土改中农民。“新的性格”作了精细的考虑。他在日记里写道：“首先是人物问题。我该如何来表现所谓新的性格呢？在偶一想到时，我常常感觉到：茫然！这大约是因为我也同样把新字啃得死，而没有这么理解：新的是旧的发展来的。”“如果把冯大生那样的性格。那样遭遇的人，搁在目前条件下来，难道我不会写出一个解放后的新的农民来吗？”“这些新的人应该也多半是行动的人，真诚的充满信心的人，因而也应该以动作、场面为主。”他对这部作品的写作充满信心。但由于忙于行政领导工作，始终没有动笔。当然，也谢天谢地，幸而他没有踏上这支难于驾驭的船。他对农民“新的性格”抽象的认识多，形象的深切的感受毕竟很少。

当年年底，“三反”、“五反”运动全面展开，沙汀不得不忙于领导本单位的运动。召开大会小会，研究分析“敌情”、每两、三天向上级送一份简报。在当时的情况下，文联机关也错整了人。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老虎”。后来又不得不平反。

在解放初的三年时间里，沙汀就是这样度过的。除了参加土改，大多数时间忙于领导机关的运动，忙于各种会议。作为文艺界的头面人物，他还不得不出席一些大会并讲话。如动员文艺工作者抗美援朝座谈会，中苏友协、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分会成立大会，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大会，纪念鲁迅大会，纪念果戈理、雨果、达·芬奇、阿维森纳四位世界文化巨匠大会，声援法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抗议法国政府非法逮捕杜克洛大会，等等。当然，一个有声望的党员作家不能一概拒绝行政领导工作和社会活动。在当时的政治、社会条件下，这些工作和活动又难以避免。但过多的行政工作和会议必然会造成时间和精力分配的困难。不恰当地对待出头露面也会滋长盲目的优越感，导致艺术探索的怠惰和深入生活的疏懒。而创作正是靠不懈的探索获得活力，靠不断的创新充满生机的。

沙汀更大的潜伏的危机是“左”的文艺思想的影响。建国以前，解放区的文艺事业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引下开拓了崭新的局面，文艺在为政治斗争、为宣传党的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所有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不可磨灭的。但是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文艺思想也有待于深化，文学创作也还存在着粗糙等许多缺陷。建国以后，文艺战线不仅没有全面总结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按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根据作家队伍、描写对象和读者对象结构改变、层面扩大的新形势，适应繁荣人民文学艺术的需要作出新的调整和部署，还不加分析地

全盘照搬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政策和具体作法。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便是在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只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文学创作与宣传党的具体政策相配合。文艺领域的这种思潮集中反映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文件中，贯穿在周扬、茅盾等著名的批评家、作家、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中。这些文件、讲话、文章很快影响到了沙汀。1950年，他在川西地区文学创作活动的总结报告中就认为文艺要“为政策服务，展开宣传工作”，“九个多月，成都文艺创作活动大半是和赶现实、赶任务的突击工作分不开的”。1951年，他在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诞辰75周年、逝世15周年的讲话中，对他在创作上几经反复、终于肯定了讽刺和暴露的创作倾向重又表示“检查”，认为“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简直可以说是时代的错误”，就是鲁迅也“何等热望中国能有反映革命实际的作品出现”，把希望和实践混为一谈。1953年2月下旬，他在《西南文艺》通讯员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是用“左”的观点对自己过去的创作作了不恰当的评价。他在谈到曾经认为比较满意的《范老老师》时，说这篇小说“首先是人物选择不恰当，范老老师这个人物不过是自由小资产阶级，并不是工人、共产党员，由于这样，这个人物对于和平的企求只是止于口头的宣传，热切的盼望和欢迎，他没有积极主动的行动起来，用切实的战斗去争取，因而也就减低了这篇作品的战斗性”。这种认识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不符合创作规律的。

沙汀把有限的创作，纳入了从属政治任务和政策宣传的轨道。本来他在解放前夕的有些作品中就有了为“趋时”而“以意为之”的苗头，但当时他毕竟是从非常熟悉的生活出发或以之为依托的。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真切的生活感受调节着他的审美走向，保证了作品生活层面的独特性和艺术表现的独创性。可是一旦急功近利而又脱离所熟悉、所感知的生活，即使卓有成就的优秀作家也很难不陷入尴尬和侷促。

这段时间，沙汀只创作了三篇小说。《归来》写一个机关通信员、“大家心目中的英雄”第一个报名参加抗美援朝。他回家将此事告诉了母亲，具有翻身感的母亲很容易克服了思想上的矛盾，以一种“庄严的自豪感”支持儿子的行动。《控诉》写一个母亲对弄得她家破人亡的美国兵的血泪的控诉，反映抗美援朝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母亲》写一个积极开朗、深明大义的母亲为儿子报名参军，鼓励儿子保家卫国。三篇小说都是配合抗美援朝宣传的“赶任务”之作。着重描写的三个母亲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身份和觉悟程度，带有鲜明的时代的烙印，可是三个人物都缺乏独特的个性，用以表现人物的生活面也因经过意念的过滤显得过纯而没有特色。其中还有靠大道理解决思想矛盾的描写，枯燥的说教，过去的作品没有过的干部腔。

那些时候，沙汀也常常忆起睢水蛰居的日日夜夜，多次激起文思往复。特别是袁寿山、萧文虎这些人物，他们在解放前夕的所作所为，他们的精神矛盾和崩溃，以及那偏僻的场镇的文化气氛，几乎可以呼之欲出，可以铺陈为引人入胜的情节。他曾酝酿创作一部中篇或长篇小说。当安县传来吴瑞卿在征粮工作中被杀害的消息后，他创作的欲望更加强烈。他决计写一部中篇小说，真实深刻地写出那偏僻场镇在黎明前的生活情景。他将这个计划告诉陈翔鹤，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但后来他又动摇了，认为文学创作应当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特别是他这样的文艺界的领导人更应作出表率，也就搁置下来。不久，他再度燃起创作的欲望。构思好暂名为《应变》的中篇，写解放前夕袁寿山、萧文虎之类怎样应付解放战争翻天覆地的变化。写了两章，仍

然觉得题材“旧”了，又束之高阁。

沙汀配合抗美援朝的三个短篇小说发表以后，也曾获得肯定的评价。可是张天翼却有不同的看法。他直言不讳劝告沙汀还是以写过去熟悉的生活为好，新的生活、新的人物让那些在生产战线上的作家，建国以后从基层涌现的青年作家去写。沙汀没有听取这个意见。

四十七新的探索和转机

1952年秋末，“三反”、“五反”运动基本结束，沙汀应邀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

出国前夕，他在北京停留了10多天，看望了中国文联、全国政协、中宣部的一些领导人，当年在上海、延安的朋友周扬、严文井、丁玲。他同何其芳见面的次数最多。何其芳向他介绍了出访东欧的经验，给了一份概要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材料，供他在国外讲话时参考。这个热情的诗人还滔滔不绝地向挚友讲了参加平山县土改的见闻和反映这段生活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思。沙汀为他的激情所感动，但也明显地感到他捕捉的生活素材与他的理性认识、他的愿望与他的能力之间存在着差距。沙汀也由此返观自身，反审自己对石板滩土改生活思考的成熟的程度，对艺术的驾驭能力产生了怀疑。他还见到了赵树理。这个颇负盛名的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开拓者“人如其文”，一副山西农村干部的打扮。当沙汀向起他手臂受伤的情况时，他竟然很有风趣地唱了一段上党梆子《三卖武》，说他就像这出戏曲中的人物一样。他的质朴，他对民间文艺的熟悉给沙汀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此时给沙汀最难忘的是胡乔木和严文井关于他的作品的一段对话。那是在他们送沙汀去车站的路上。他们很自然地谈到了沙汀的作品：“你是现实主义作家，你的简练的文字，足以准确地再现生活”。“你的《淘金记》出色地描写了那时‘地狱’的生活，可以说是一部地方风俗史”。“你的人物很多是果戈理笔下的人物，但你对反动人物的鞭挞不够明快，你太吝啬夸张，普通读者要懂得你那含蓄的用意，会感到吃力。有的读者将因此望而却步”。“你作品里出现的劳动人民给人的印象不够鲜明，和那些反面人物容易混同”。“你的讽刺缺少一种刻毒的力量，不能激起读者足够的愤怒”。这些肯定的评价和严肃的批评，给了他以鼓励，引起他深深的思索”其中有一些话也使他困惑。他应该放弃自己的个性去追求“明快”、“夸张”、“刻毒”吗？这次的听取批评，促进了他讽刺艺术的褪化和萎缩。

同沙汀一起出访的有山西作家马烽。这个年仅30岁的青年作家也是文学民族化、大众化卓有成效的实践者。他的健壮同沙汀的瘦弱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一见如故，一路上很谈得拢。他们于国庆后启程，乘国际列车途经莫斯科到东柏林。接着去波茨坦、德累斯顿、莱比锡等地，访问了北海造船厂，参观了魏玛的歌德、席勒故居，会见了安娜·西格斯、弗里德里希·沃尔夫、泰渥·哈利希等作家，于12月回国。1953年1月，沙汀写了访问记《记德国工人作家泰渥·哈利希》等散文。

回国以后，沙汀又忙于四川省、重庆市文艺界的组织领导工作。1953年1月，他出席了四川省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省文联主席。同年4月，他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西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西南文联副主任。

还在沙汀出国访问前在北京时，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严文井就告诉他，全国文联将成立创作委员会，负责指导全国的文学创作，准备调他到创委会工作。3月下旬，文联常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正式决定成立创委会，老舍、丁玲、邵荃麟、沙汀等11人任创委会委员，邵荃麟任主任，沙汀任副主任。4月中旬，西南文代会一闭幕，他就奉调进京上任。待工作走上正轨，将玉颀和最小的儿子刚宜接到北京。岳母黄敬之以及杨礼、刚颀、刚虹仍留四川。他仍旧意识到，他终归是四川人，他的根在四川，其他任何地方只能暂时栖身。

创委会的成员大多是熟人。文联党组书记是周扬，成员有邵荃麟、丁玲、冯雪峰、萧三、沙汀。沙汀对几位同志都很熟悉。他住家在东总布胡同22号内院，屋宇雅致、整洁。邻居恰好是张天翼，是老交情。初入京华，他的心情很好。

创委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根据文联常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的决议，组织在京作家、评论家和文艺工作领导干部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学习的主持人是邵荃麟。邵荃麟生病后，由冯雪峰召集。沙汀作为副主任协助做了许多工作。他领导筹办的《作家通讯》又负责反映学习情况，向全国文艺界传播。这次学习历时两个月，阅读了马恩列斯毛的有关论述以及马林科夫、日丹诺夫的有关报告共20多种文件，举行了14次讨论会。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从马恩列斯毛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及对文艺的指示来认识现实主义的发展；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典型人物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党性、人民性问题；第四个问题是：关于目前文学创作上的问题。林默涵、陈涌、陈企霞、王朝闻、严文井、钟惦斐、马烽、陈荒煤、光未然等作了重点发言。这些发言有不少真知灼见，例如陈涌关于马列文论的基础是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关于真实性问题的理论，王朝闻关于讽刺美学的见解，钟惦斐关于文学的人民性的理解，等等。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并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学多样化的理论主张，如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我国文艺批评唯一正确的原则，强调“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着本质上没有缺点的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因而主张创造“完美无缺”的英雄典型等等。沙汀很少发言，但是他对不少观点，包括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都是接受的。

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召开。会前，沙汀和创委会的同志忙于会议筹备。会后，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创委会成立了有委员和有关作家参加的小说散文、诗歌、电影、戏剧、通俗文学、儿童文学等创作组。这以后，由这些创作组组织了《三千里江山》、诗歌形式问题、《宋景诗》、《张羽煮海》等作品和创作问题的专题讨论。1954年，艾芜在鞍钢生活以后回到北京，拿出了《百炼成钢》的初稿，创委会又组织了一次讨论，帮助艾芜增强了信心，决定再次去鞍钢补充生活，重新构思和写作。

1954年10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联合召开第八次扩大会议，对《红楼梦》研究进行批判，次年1月，《文艺报》公布了胡风的《意见》中关于文艺思想和组织领导两个部分，眼看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就要到来。此时沙汀愈来愈感到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一个个漩涡的中心。他对每一次批判运动都是先迟疑而后紧跟。他觉得应该遵从号令，但又感到太累太令人喘不过气。他念兹在兹的是创作。讨论《百炼成钢》时他已深悔自己没有收成。他回四川的念头又产生了。在作协任秘书的黄玉颀早已吵嚷着回川，并于1954年底

先行走了。他勉强撑持着，伺机请求离开北京。他在同事们的心目中忽然变得少言寡语和焦躁不安。批判胡风，他还发表了足以使他后悔的意见。正在这场风暴方兴未艾的时候，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组织作家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他被准予回四川农村生活和创作。

沙汀到成都时，已是春节前夕。当他听说省委统战部正举行座谈会，由民主人士谈下乡参观合作社的感想和体会，便立即赶到会上听发言、看材料。他对过去较熟的绵阳的情况很有兴趣。座谈会一结束，就去了绵阳。在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他会见了县委书记吴儒玠。经由这位非常熟悉基层情况的女干部的介绍，会见了几个合作化运动的积极分子。随后他又到三个乡社走了一趟。在三台县尊胜乡的木鱼山，他同一见如故的社长王达安作过长谈。回到成都不久，他一连写了三个短篇：《卢家秀》、《幺木匠》、《过渡》。以亲切的第一人称的笔调，写了农村女青年、手工业者要求入社的心情，表现了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愿望和热情。这些作品尽管还停留在单纯歌颂性的单向、表层描写的浅层次上，有的还带有图解思想认识的痕迹，但却写得清新朴实、情感真挚。它们比起《归来》等三篇小说在艺术上有所进步。三篇作品几乎在一个月內，由《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新观察》发表，引起广泛的瞩目。《卢家秀》发表后，沙汀还收到东北一个初中毕业生的来信，问卢家秀姐姐住在哪里，把作品中的人物当作愿意亲近的真人。在此期间，沙汀还写了《埝沟边》，表现一个农村干部克己奉公的品德，刊登在《人民文学》上。这几篇作品的发表，给创作上沉默已久的沙汀带来很大的声誉。第二年年年初他去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时，许多朋友向他表示祝贺。他们说：现在看来，你并不难产嘛！比沙汀早下乡却一直歉收的蒋牧良还请他介绍经验。

创作上的进展，朋友们的赞扬，给了沙汀很大的鼓舞，使他坚定了表现新的生活、新的人的信心。1956年春，他根据创委会的安排，到长寿狮子滩水电站工地采访，写了《范桂花》、《柳永慧》、《炮工班长冯少春》。前一篇系特写，后两篇取材于真人真事，有一定的虚构。三篇作品着眼于新人的先进事迹，人物和生活层面都有新鲜感。但由于对生活浅尝辄止，缺乏对人物命运的深层思索，显得简单化一般化。这年上半年和次年上半年，他多次到三台县尊胜乡、武胜县烈面乡、新繁县新民乡等地生活。每次下乡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由于不断重复，感受也就得以加深。他在有了较多的真切感受的基础上，创作了《老邬》、《摸鱼》、《开会》、《在牛棚里》四个短篇小说，把创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老邬》写社干部老邬因处理口粮分配问题引起的思想矛盾，反映农业社内部个人与集体、邪气与正气的冲突。《摸鱼》写田万有不安心农业生产的心理状态，表现农村青年在理想与事业、个人与集体关系上的思想斗争。

《开会》通过乡总支书记刘天锡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锐在对待干部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反映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与官僚主义的尖锐对立。《在牛棚里》从年轻的队长文明扬与一群孩子饶有风趣的微妙的冲突中，真实地表现了农村新一代的精神面貌和值得关注的生存状态。这四篇小说与1956年以前的短篇小说不同的是，它们不再是浮浅地歌颂新人新事，旨向性极暴露地反映时代的变迁，而是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农村社会生活的矛盾冲突，于矛盾冲突中多方面地刻画人物的心理和性格，折射时代的深刻变化。《老邬》中老邬的心理矛盾是由他与刘太和在口粮分配上的冲突引起的。可是作

品却巧妙地避免了对立两人的正面描写，而是着重写他受辱后的心态，写由他的气恼引起的与妻子张玉贞之间的风波，以此反射他与刘太和的矛盾。其主要场面集中在老邬家里，时间集中在老邬点灯到晚饭后去参加支部大会。显得富有生活气息，艺术结构也严密、紧凑。作品设置的老邬与刘太和的矛盾也并非流行的先进与落后矛盾的模式。刘太和并不是好逸恶劳的懒汉，也不是受阶级敌人刁唆或阶级异己分子，恰恰是“自以为出身好，把它当成包袱，一向又臭又硬”的贫农。老邬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先进人物。他备受指责和攻击却依旧勤勤恳恳地工作，还坦然地笑着说：“哪个不知道我叫邬奶娃！”可是他也有个人的烦恼，也一度难以承受精神上的贬损。他对刘太和的纠缠感到“委曲”，甚至说过无原则的话：“不是政策管住，我还要他的老命呢！”作品描写的矛盾具有特殊性。它不是从阶级斗争为纲、从唯成份论的概念出发的虚设冲突，而是基于生活的艺术概括。作品中的人物也正是从矛盾冲突中表现出活生生的个性。《开会》也避免了一般的线形的构思方式和结构方式。它没有循着黎元均与社员的矛盾——刘天锡与王锐在处理黎元均与社员冲突问题上的矛盾——刘天锡经过斗争取得胜利这样次第展开，而是真接切入王锐主持的一次决算分配工作的汇报会。会议已经开始一阵了，顺河乡总支书记刘天锡和乡长李世荣才到会。他们之所以迟到，路远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听取分支书记对黎元均处理的意见去了。作品接着交待了黎元均事件，同时也就随着与会者对这两位迟到的人的关注，把重点放在了他们身上。他们在关于分配问题的汇报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有能力、有经验的黎元均。于是向来对他们抱有成见的、主观自负的王锐发出了咄咄逼人的追问，矛盾冲突也就发展到了高潮。刘天锡由谨慎到激昂，挺身而出，坚决斗争。机灵却胆怯、世故的李世荣与此相互映衬。作品的布局谨严，环环紧扣，跌宕多姿。只是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稍嫌仓促，笔触较粗。《摸鱼》、《在牛棚里》则着眼在日常生活中人物的思想冲突，真切地反映所感知的重大题旨。两篇作品都带有喜剧色彩，前者还具有讽刺喜剧的意味。它生动地展现了田万有闹思想问题时特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于绘声绘色的摸鱼的场面中，揶揄地勾勒出他执拗的个性。作品写他思想问题的解决也避免了容易产生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它没有生硬地铺陈人物的转变，只是暗示他要大舅舅“带他出门当工人”的希望甚为渺茫，预示解决矛盾的走向。

沙汀的这四篇小说，尽管还未达到他解放以前许多优秀短篇小说的水平。然而它们毕竟是他探索表现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取得的可喜收获。它们标志着他在创作上新的转机和良好的势头。假如政治生活不出现重大的失误，文学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不发生大的摇摆，作家继续不断地、孜孜以求的探索，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可惜历史往往并不按照人们良好的愿望发展，作家的创作又陷入窘困。

四十八陷入新的窘困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的文艺运动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1957年夏天的反右派运动，错误地批判了“写真实”等理论主张和一些优秀作品，严重地窒息了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扼杀了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造成了浮泛粉饰之作盛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目标

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文艺工作中出现了更为严重的浮夸和“左”的偏差。创作中回避矛盾、粉饰生活、拔高人物、神化英雄的倾向越来越突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战线的这种“左”的形势，影响到了沙汀的思想和创作。

沙汀在反右派运动中，拉李劫人向“左”转，参与了对《草木篇》和张默生为《草木篇》辩护而提出的“诗无达诂”的批判。又与张天翼、艾芜联名发言，对丁玲、陈企霞的所谓“反党”进行过批判。后来在四川省文代会上作的《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报告中，他把“大胆揭露阴暗面”的提法，不加分析地说成是“反动邪说”。1958年座谈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时，在《接受历史斗争经验，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发言中，将传统的现实主义作了“左”的解释，表示与现实主义许多重要精神“彻底地决裂”。1960年在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作的题为《作家的责任》的发言中，明确表示“最近一年以来，对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创作方法，我是作过些考虑的，越来越加感觉革命的浪漫主义应该是主导的方面”，“根据我个人的体会，这个创作方法，首先应该体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所以我想，如果从这一角度去考虑革命的浪漫主义问题，我们就更能自觉地深刻反映‘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沸腾的现实生活和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更能满腔热情地歌颂那些不断战胜困难、战胜形形色色思想障碍，为新生活开辟道路的英雄人物，让广大读者跟作品中的人物一起奋勇前进”。这些发言反映了沙汀的思想认识。他当时的创作便是在这样的思想认识的指导下进行的。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薄弱，有些作品背离了现实主义。

沙汀这期间创作的短篇小说有：《风浪》、《下乡第一课》、《夜谈》、《欧么爸》、《你追我赶》、《假日》、《夏夜》。这些作品一般说来，在取材、布局、环境安排等方面都颇具匠心，技巧纯熟。茅盾在评价《你追我赶》时曾说：“从艺术的构思看来，短篇小说之所以为短篇小说而不是压缩了的中篇小说；应当有其特殊的条件。字数的限制（例如说万字左右）不能说是决定性的条件。在我看来，所谓截取生活片断，从小见大，举一隅而三反，这个说法，还是不能抹煞的。如果着眼在这里，那么，在取材、布局、描写人物、环境安排等等方面，短篇小说便自有其不同于中篇之处。如果强调这一点，不算是树立清规戒律，那么，我以为《你追我赶》（沙汀，《人民文学》）1960年10月号）是一常严守绳墨、无懈可击，而又不落纤巧的佳作。”然而，这些作品除作为随笔式的小说《下乡第一课》还真实地描写了一个老年知识分子在下放锻炼中的内心活动和感受外，其他作品都程度不同地给人一种回避现实矛盾，粉饰农村生活，拔高先进人物的虚假浮泛的感觉。《风浪》是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它所着意刻画的申大嫂这样一个普通农村妇女也有某些感人之处。可是围绕着她设置的“风浪”不过是王家福一类社员的闹粮荒。这样，她所进行的“严峻的斗争”就失之牵强，作品的基本构思就有背于生活本质的真实。《夜谈》、《欧么爸》等其他几篇都是反映“大跃进”的作品。它们也有某些有特色的情节和细节描写，可是其基本格调都是鼓噪当时过热的生活节奏，粉饰现实生活。它们用浮夸的笔调讴歌那些“沸腾的日子”，“火把把田坝照得通红的夜战”，“热火朝天的

革命气氛”，“你追我赶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轰大喻地争夺“卫星”等等。作品中的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欧么爸、龙唯灵、朱大有、朱朝中等，也过分地纯净化、理想化，其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缺乏真实性。其中《假日》写于严重的困难时期，却通过一对青年农民的见闻，把公社食堂写得来美好无比，把农村写得来到处一派欢声笑语、歌舞升平。后来沙汀在反思这些作品的创作时，也不免以沉重的心情说它们“出现差错”。

在那个不幸的年代，许多作家都曾不同程度地与现实主义发生错位。沙汀也没有幸免。这位具有饱满政治热情的作家，是真心实意地去反映那个时代的农村生活的。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是那么热忱地看取生活，描写那些理想化的人物的精神面貌。他是在武胜烈面区参与评比竞赛活动中，为那种“共产主义协作精神”所感染，调动生活的积蓄，才构思和创作了《你追我赶》的。是在三台县、武胜县参观过一些公社食堂之后才去美化食堂和农村现实生活，写了《假日》的。可是政治热情岂能代替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的掌握和运用，一时的参观岂能代替对生活深入的体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满足于生活的浮光掠影，就难免把生活的表象和假象认作生活的本质，背离生活本质的真实。当然，在当时整个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失误的情况下，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直面生活是很难的，要求一个作家独具马克思主义的“慧眼”，在创作上“反潮流”更是不容易的事。不过后来者应当从中引出值得记取的教训。

沙汀对自己创作的“歉收乃至出现差错”，后来有过深刻的反省。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低；“其次，坐办公室的时间多了，只是间或去农村生活一段时间，没有在群众中扎根。最后，就是那个老毛病：懈怠！同时也还有学识才力不足的问题”。其实，他创作的窘困和倾斜，更主要的是那个时代的局限和制约。这是他没有提到而事实如此。历史会公正地作这样的结论。

四十九在波浪中回荡

从1959年开始，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困难。藐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人们，不得不逐渐老实些了，开始按照党中央制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扭转困难的局面。

思想文化领域的左倾错误，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文艺工作指导思想的调整也未提到日程上来。但是，这个时期中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的几次重要讲话，“文艺八条”的讨论，以及《文艺报》组织的“题材问题”的讨论，却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左”的文艺思潮的泛滥。

沙汀的头脑也开始降温。当国民经济已经出现困难时，他还在第三次文代会的发言中重复“大跃进”中“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神话。当他双目失明的兄长杨朝绥从家乡来成都诉说瞎指挥、高征购给农村带来的灾难，苦苦哀求增加按月寄给他的生活费时，他半信半疑，甚至疑心是否被阶级敌人利用。后来在大量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正视严峻的现实了。全家人不惜买高价食品来重点保护他。存款用光了，只好向出版社借支稿费。完全出于拿一笔稿

《〈沙汀选集〉序》。

《〈沙汀选集〉序》。

费的目的，赶着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了一本短篇小说集《祖父的故事》。他同任白戈、李亚群去峨眉山游览，一见到报国寺前池塘里唼喋的鱼，把一切游兴抛到九霄云外。他们每天钓鱼来改善生活。妙不可言的是，每次由厨师烹调以后，都会少两三尾。

现实生活促进了他对“大跃进”的反思。联系着这种反思，他重新看待前些年反映“大跃进”的几篇小说，重新思索有过的违背艺术规律的现象。他参加了周恩来召集的紫光阁座谈会，聆听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问题》的讲话，对其中关于“大跃进”以来违背艺术规律错误作法的批评，有着较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又认真学习了周恩来在“新侨会议”和又一次紫光阁座谈会上的讲话，积极参加了“文艺八条”的讨论，仔细阅读了《文艺报》主编张光年撰写的《题材问题》的专论和该报组织的“题材问题”讨论的许多文章。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创作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题材多样化，创造典型形象等问题重新进行了思考。

1961年9月，他应《成都晚报》副刊编辑萧青之邀在成都工农兵文学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同年10月中旬与艾芜、刘真、林斤澜等去云南边疆访问途经贵阳、昆明时在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他创作思想的某些调整。他认为应该把文艺为政治服务想得宽些。长期生活在现实斗争中，能及时写出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这是好的，也是群众迫切需要的，但并不要求所有的人都这样做，否则就会助长生硬地配合任务和图解政策的概念化的倾向。作家写什么，要看他的生活体验，还要看他对生活的兴趣，不能作一般的要求，而且人们对文艺作品的要求也是多种多样的。为了满足群众的需要，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各种题材、体裁、风格、形式的作品都是需要的。文学创作有一条根本原则，那就是无论如何要从生活出发。生活中有什么事物打动了你，引起你的创作冲动和联想，然后才进入艺术构思。这样从生活出发进行创作，对所写的事物感情一定充沛，对素材、情节、人物非常熟悉而又经过细心琢磨，写出来的作品才可能打动人，至少不会公式化概念化。

随着创作思路的开阔，他再次重温了他解放前熟悉的生活，打算以《困兽记》为基础，创作表现知识分子的三部曲长篇小说。他在1961年冬天去云南时开始设想，于12月提前返回四川后加紧构思。3月中旬至4月中旬在北京开会期间也没有间断，以后更加细致地谋篇布局。他曾经记载过他的心迹：“1962年2月7日：去冬以来，长篇的构思问题，就已经一直叫我心神不安了。几乎无时不考虑它。但是由受孕到十月临盆，这个过程并不那么简单！”“1962年3月21日：在北京向张天翼谈计划的长篇小说的一些想法。他谈了谈他的计划。我们有共同的想法，彼此年龄都不小了，应该有个比较长远的计划，可以一气写它十年八年；但是在艺术构思上，彼此却有分歧，而且始终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1962年3月25日：他（立波）准备让林兰留在北京，他单独去湖南。他自己似乎打算写‘南下’的材料，但他还不想把计划公开。

我可把自己的长篇计划告诉他了。正讲到这里，林兰来了。她很赞成我的计划，还说，这是青年一代无法写的。”“1962年4月8日：周扬说一天、一年四季都搞运动总不成的。他以满清为例，虽然有文字狱，但是却让文人学者搞四部丛书等等。于是，不知怎么的，他把话头转到鲁迅，说鲁迅死的时候才五十六岁，可已做了不少的工作了。这个话使我深为感动，也很惭愧，觉得自己真该拼命写些东西了，不能再不三不四混日子了。”“1962年4月

18日：由于他（陈荒煤）的关心，我谈到了我的长篇计划，以及我的某些想法。主要是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因为他们将是我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他说他也早想写知识分子了，而且准备从大革命时代写起。现在虽然没有条件，但将来一定要写。”1962年7月13日进一步补充了写作长篇的一些想法。……我只有一个担心：变成《困兽记》的拉长。为了避免这点，显然必须做到，从二卷起，旧有的重要人物，应该有显著的发展，增加性格鲜明的新的人物，政治气氛；环境得有特点，有新的矛盾和新的故事，而且对第一部还得认真加工。”到1962年秋天，他的长篇小说的构思已经到了“十月临盆”的程度。可是他始终无法动笔。许多行政领导工作使得他“身不由己”，有些麻烦甚至使他一度心力交瘁。例如《四川文学》发生的一件麻烦事，就曾使他非常烦恼。

沙汀一直是《四川文学》的主编人。虽然是挂名，很少管编辑、出版的具体工作，但涉及到办刊方针仍不得不操心，刊物出了差错不得不承担责任。1962年年初，编辑部青年编辑葛鹏编发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郑孝胥谈文艺的一些观点，引起了种种非议和有关领导同志的批评。作为主编的沙汀感到再也不能撒手不管。他向副主编李累、履冰打了招呼，凡涉及办刊方针的大事要通知他参加讨论。

9月14日，编辑部召开汇报会，由去重庆、广元等地征求读者意见的编辑汇报情况。履冰便叫编辑何世泰请沙汀参加会议。汇报的人有榴红、蓝疆、何同心。他们讲读者对刊物的反应强烈，认为编者放不开手脚，刊登的不少作品没有触及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他们讲话以后，葛鹏接着发言。他刚刚从贵州组稿回来，补充汇报了贵州一些作者对刊物的意见。他说贵州文艺界的人也认为刊物发表的许多小说没有触及生活中的矛盾，显得平淡。贵州遵义有一位作者正在写一部反映困难时期饥饿、死人的长篇小说，这人还算有胆量，从读过的两章看，写得还不错，……沙汀越听越觉得不是滋味。他不断地出粗气，终于忍不住暴怒道：写这些东西究竟对谁有利？还要不要有一点敌情观念！他再次重复去云南边疆路过贵州时在一次座谈会上讲过的话，强调要看到红墙外面有敌人，要顾全大局，创作要对人民有利。他尽量克制自己，但情绪仍然激昂。几乎不是结束讲话，而是在盛怒之下中断了发言。

这以后几天，沙汀的情绪一直不好。加以感冒、咳嗽，心情十分烦躁。10月初，汇报会过去10多天了，心情才稍好些，咳嗽也才停止。他见连日秋光甚好，于10月4日给李劫人挂了电话，相约在10月6日即星期六去劫人居住的菱窠玩一天，以散散闷。李劫人说：“非常欢迎，可是没有东西吃啊！”他说：“做点豆花就不错了！”李说：“不行，我这里有点豆子，也尽是烂豆子呀！”他说：“烂豆子也是豆子嘛！”他们商定，除沙汀夫妇外，还邀约戈壁舟夫妇和林如稷夫妇。次日，天气忽然转坏，风瑟瑟、雨凄凄。沙汀几次观看天色，希望有可能转晴。下午他想好好休息一下，可是李累上门来谈编辑部的情况。李累说，葛鹏的思想一直不通。他对宣传部的批评也有意见，认为别人的文章引用曾国藩的话都可以，为什么引用郑孝胥的话就不行？他对沙汀说的什么“敌情观念”也想不通，认为凡文章和作品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负作用，以致遭到敌人的利用，值不得大惊小怪。沙汀仍坚持他的看法，再一次阐述了他的观点。这天晚上，他又心绪不宁。总是想到李累谈的情况，总不住摇头叹气。他真气恼：这个编辑部不管不行，管也难管，有什么办法呢？准备惹麻烦吧！考虑已久的创作，再也没有心思提笔。

次日老天作美，转向晴好。沙汀和玉颀收拾停当，准备出门。

正在这时，履冰来了。他心里不免嘀咕：糟了，又有事了！幸而履冰只是说，今天宣传部要开部务会，要你去参加，但是我已替你请了假，叫安春振去了。他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他和玉颀乘车到了菱窠，其他四人也陆续到了。此时东道主却不在，一早就进城参加成都市的一个会议去了。不过女主人一再说明：劫人是打了招呼的，他很快就会回来。大约 11 点钟，李劫人回来了。

他们相聚在幽静的院落里，避开城市的喧嚣，忘却工作的烦恼，无拘无束地谈笑。

他们闲谈一阵，就去欣赏李劫人收藏的字画。看了几种手卷和册页，到了 12 时，吃了点心，又上楼看大幅的名画。这一幅幅佳作真是夺人眼目。其中有几代相传的珍品，收藏者视为家珍。有一幅名画，前辈收藏者在画坠背后题写道：“子孙宝之”。继承者在一旁增加了一行字：“李劫人暂藏于菱窠”。沙汀见了，赞叹不已。因连日心情欠佳，头一天休息不好，且上呼吸道感染初愈，他渐觉有些疲倦，便独自下楼，斜倚在木椅上闭目养神。稍稍有点精神，又再上楼观画。但正在此时，省文联司机曾绍华来了。在楼下连声高喊沙主席，杜书记打电话来了，叫立即去省委宣传部参加部务会。一听是杜心源通知，沙汀不敢怠慢，赶紧下楼，闲玩的兴致一扫而光，未曾消除的疲劳也全然忘却。李劫人不停地叫他，打个电话去吧，就要吃饭了。他解释了几句，快步出门上车。

约莫 4 点钟，沙汀走进商业街宣传部院内的会议室。一进门，瘦高个儿的杜心源站起身来，操着节奏极快的山西话说：你来了，你来得好！你那个《四川文学》变成汉奸文学刊物了。素来直爽 of 杜心源劈里啪啦讲了一通。他对引用郑孝胥的话那篇文章作了分析批评。语带讽刺，却脸带笑容，使人感到事态严重，又觉得态度诚恳。沙汀谈了责成责任编辑检查的情况，他自己也有责任。杜心源说：你们应该把刊物收回，停止发行嘛！沙汀说：这确实是处理这件事时的一大疏忽。接着他又讲了 20 多天前编辑部汇报会上暴露的思想情况，当时他的大发雷霆。会议结束后，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叫他和安春振留下，就进一步检查作了交待。他正待出门，文艺处处长张东界走了过来，十分严肃他说：刊物出了问题，是你的责任啊！沙汀顿时火了：我早就宣布了搞创作，不再管工作了！这天晚上，他一直生气、烦躁；创作搞不成，工作也搞不好，刊物出问题，实在丢人。

10 月 8 日晚，履冰把编辑部一份书面检查交给了沙汀。次日上午，他把安春振叫来，要他根据这个检查，以文联党组的名义写一个检查报告送省委宣传部。他详细交待了还要增加的内容，涉及到错误时应采用什么提法，他本人的责任。此后几天，他几乎天天头晕。10 月 13 日上午，《四川文学》编辑部开会。他到会讲话。讲到刊物的错误，措辞照样尖锐，但态度较为冷静。他说最近一个时期，有的编辑思想动荡，指责领导上贯彻“双百”方针有点“老坎”，仅仅“半开门”。我的看法是，既然是“门”，就有“开”和“关”。对人民有利就“开”，对人民不利就“关”。不仅要“关”，还要严加防范，加强戒备。当晚，他又在日记里写道：头昏脑胀，烦躁不安。他就是在这样的景况下虚掷了许多宝贵的时光。他的创作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从 1962 年年底开始，由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

化理论的影响，文艺工作指导思想急剧向“左”逆转。康生制造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冤案，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对周恩来领导的调整时期的文艺工作进行否定和倒算。它们既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又直接左右着文艺工作，造成极左的文艺思潮泛滥。沙汀也受到了影响。他放弃了已经成熟的创作打算，把精力转到对现实“阶级斗争”的关注。他去了三台县尊胜乡、武胜烈面区等地，带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观点去观察生活。出于配合的目的，于1963年初和1964年初写了《一场风波》、《煎饼》。夸大农村的阶级斗争，图解极左的口号和政策。此时他的生活和创作都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好在他去的都是熟悉的地方，尊胜、烈面的朋友们给他讲了大量困难时期的生活情形，这些当然不符合“阶级斗争为纲”的要求，但对他后来的创作却大有裨益。

五十十年噩梦

沙汀在1963年以后，很少写作了。这年4月，他去京参加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讨论“大写十三年”问题，这使他完全打消了写解放前熟悉的生活的念头。月底，他应巴金盛情邀请，到上海中山医院检查身体。在这阔别25年的创作发迹之地安闲地度过了些时日。当他被大夫告之并没有神经官能症、肠胃亦无异常现象时，乘兴重游了德恩里故地，与巴金相伴畅游了西湖，寻访了当年与玉颀留下的足迹。但此后文化界开展对陈翔鹤《广陵散》的批判，又使他惶惑、烦恼，甚至想起陈翔鹤过去引用过的陶渊明的话：“人生实难，死之如何？”11月，玉颀的病势沉重，陪同诊病，托巴金购药。确定手术，忙得他席不暇暖。1964年3月8日，玉颀终因医治无效，溘然长逝，使他陷在深深的悲痛之中。当他只身前往重庆，将逝世的消息告诉孩子时，父女一起相对饮泣，悲恸欲绝。个人生活上的不幸，文艺空气的窒息，使他难以进行任何构思和创作。1965年，艾芜回到成都以后，两位挚友互相鼓励，他才又萌生了根据尊胜、烈面的生活，以《在困难面前》为总题目写一组短篇小说的打算。然而这仍只不过是一时的念头。这些时日，他除了奉命帮助修改川戏《许云峰》，没有心思写别的东西。

1966年4月，沙汀被通知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协召开的专业创作会议，“学习”林彪、江青的《纪要》。会议名义上由周扬、林默涵主持，但他们都被迫以检查的面目出现，特别是周扬，始终以沉重的心情反省自己的文艺思想，包括30年代的文艺思想。调立波还遭到了批判，被认为有过严重的错误。沙汀的心情异常沉重，他几乎没有任何欢声笑语。5月初，他回到四川后，也郁郁寡欢。他向省委文教书记杜心源写了一个简短的报告，汇报北京的情况，说了许多自责的话。

此后不久，沙汀开始被迫在省文联作检查。当时的四川，马识途被点名批判了，李亚群被点名批判了。在经过精心策划之后，7月13日的《四川日报》上，刊登了省文联王聚贤等31人的一封公开信：《四川省文联一伙黑帮压制群众批判马识途毒草的来信来稿的事实真相》，公开点了沙汀的名，给他戴上了黑帮分子的帽子。这以后，显然是组织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仅7月下旬的半个月，在《四川日报》、《成都晚报》刊登的批判文章就有16篇。从7月下旬到9月下旬，不到3个月时间，刊登的批判文章达50余篇。这些文章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无中生有，无限上纲。说沙汀是“老牌

的反党作家”，“周扬文艺黑线上的人物”，“早在三十年代就充分暴露了反党面目”；说沙汀“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对工农兵作者的讲话是反对毛主席文艺路线的毒箭，担任《四川文学》主编“是把持刊物进行反党活动”，讲“广阔题材”的“贩卖黑货”，到武胜等地生活是“进行罪恶活动”；说《在其香居茶馆里》是“反共反人民的一块黑招牌”，《兽道》是“污蔑我们的工农红军”，《归来》是“反对革命战争的一株毒草”，《摸鱼》是“配合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又一支毒箭”，等等。在点名批判的同时，沙汀继续被强迫在群众中作检查。随后红卫兵、造反派进驻文联机关，与机关内的造反派结合，对沙汀实行事实上的监禁。沙汀住家的大门口，张贴出一张令人恐怖的骷髅像。家里的书椿、笔记本被洗劫一空。

不久，沙汀被管制，被任意揪斗。批斗罗织的罪名，使用的语言，采取的方式，五花八门，无所不用其极。他被污蔑为反共的老手，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革命战争年代的怕死鬼，连抗战胜利后接受“文协”理事会转发的救济金，也被追究是否与帝国主义有联系。一个头戴五角星帽的人还公然叫他老实交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给美国当特务的？年底，沙汀同戈壁舟、安旗、李累等一起被送到名山县软禁。次年又被押回成都。一路上被当地造反派批斗，叫做“放一把火”，以点燃当地“革命的火”。1968年4月，沙汀被作为30年代黑干将、四川省文艺黑线大头目，关进成都北郊昭觉寺的临时监狱。

被监禁在昭觉寺的有西南局、四川省、成都军区的党政军要人和文化、文艺界的领导人李井泉、邓华、程子华、许梦侠、杨万选、杨超、赵苍壁、杜心源、刘文珍、马识途等。稍后艾芜也被押到这里。他们都披编了囚号。沙汀为17号。互相见面，都只能叫囚号，不能叫姓名，更不能交谈。饮食起居，被一个个满脸稚气、胸怀“阶级仇恨”的解放军战士严加管制。开始，沙汀异常烦躁。一次“放风”时，省委统战部长程子健小声提醒他，无论如何要稳住，情绪要安定。这句金玉良言给了他鼓舞。他望着发黄的墙壁，想象沙皇时代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革命者，勉励自己要坚强地活下去。他开始练气功，医治长期形成的失眠症。他吟诵陶渊明的《读山海经》：“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用以增强自己的斗志。他把写交待材料当做写回忆录。从自己的家庭出身，初期革命活动，一直写到与茅盾、周扬、艾芜、陈翔鹤的交往，共10多万字。他被难友们认为“老实”，其实他有自己的打算。他被监禁期间，孩子们都被认为是“黑帮”子女，受到歧视，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们都比较坚强。有的写信告诉自己的生活 and 婚姻，有的还多次来看他。最使他感动的是在灌县青城山纸厂的长子杨刚锐，几次带着孙子来“探监”，给他带来无比的温暖和欣慰。

沙汀被关了4年零7个月，于1972年11月13日释放。他先被安排独居了一段时间，新巷子的住房退回后，才同女儿、儿子团聚。但是他仍被告之不准离开成都，有事出门必须向文联“革委会”的专案组请假。他过着孤寂的生活，除了孩子，几乎没有人同他接近。有时听见叩门声，油然产生一种欣喜之感，开门一看，却是女儿刚虹归来。也有令他难忘的事，一天，开门看时，多年不见的好友冯诗云来看望他。冯诗云是解放前成都“星芒社”的领导人，与车耀先有过密切往来。解放初期沙汀在重庆工作时，冯诗云在西南总工会工作，主编《西南工人报》。后来调到北京，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工人日报》总编辑。他毫无顾忌地向沙汀问好。他告诉沙汀，他被撤

职回四川以后，到处打听沙汀的下落。当听说在昭觉寺时，曾打算前去探望，但朋友们都劝他暂时不去为好，避免增加麻烦。现在他要和沙汀好好聚一聚。他约沙汀到成都附近新都县宝光寺游览。沙汀说他离开成都必须请假，冯诗云却说：管他妈的！他们到宝光寺玩了一天。这年入冬以后，天气严寒，省文联分炭，不理睬沙汀。冯诗云得知后，叫人送来了木炭。当沙汀燃炭取暖时，不禁深为感叹：关键时刻见人心啊！

1973年，沙汀被准予稍有自由。到1976年冬才获得“解放”，恢复组织生活。

第十章新时期：历史笑了：还我沙汀

(1976年冬——)

历尽劫波的沙汀，深感新时期阳光的温暖。当“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之时，他岂能无佳作以酬盛世。他不顾年迈多病，重新驰骋径寸之翰。

他写《青桐坡》，写《木鱼山》，写《红石滩》，一步一个脚印。一步步回归，一步步重现“自我”。

《青桐坡》，不免赦颜；《木鱼山》，回眸一笑，《红石滩》，十分欣喜。

《红石滩》，一个优美的定格：85岁的沙汀焕发了青春。

五十一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粉碎“四人帮”以后，沙汀的处境并没有很快得到改变。1976年冬天，他才被准予在《四川文艺》编辑部过组织生活。1977年初他写了一篇《回忆贺龙同志》的文章交编辑部，竟遭到了退稿，不得不找关系交外省的一家刊物发表。然而，对“四人帮”的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和自己的劫后余生，他是异常欢欣鼓舞的。他曾表达自己的心情说：现在可以做到死而瞑目了。

随着揭批“黑线专政论”的深入开展，他又燃起了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的热情。他在1977年8月四川省、成都市的一次文学作者的座谈会上表示，要继续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贡献力量。在这个期间，他写出了中篇小说《青桐坡》。

1977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严文井、韦君宜邀请沙汀带《青桐坡》书稿进京。在四川幽囚10余载的沙汀欣然前往。

他于9月13日乘飞机到达北京，在出版社的招待所住下，次日上午会见了严文井、韦君宜，交了书稿，共同回首了10年噩梦般的岁月。

当天下午，沙汀就去看望了何其芳的家属，他在何其芳遗像前失声痛哭。何其芳在一个多月前逝世，他九死一生，刚刚扬眉吐气了几天，就不幸去世了。

第三天上午，沙汀去看望冯诗云。冯诗云已经恢复工作。沙汀一再感谢冯诗云患难相顾。他在那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同冯诗云一起进餐饮酒，无拘无束。饭后还美美地睡了一觉。他第二次去冯诗云家，主人正在宴请宾客。第三次去，别无客人，又抵掌相谈，饮了一阵沉缸酒，然后又睡了一个钟头，睡得很香。

由严文井、韦君宜陪同，沙汀去看望了周立波。立波面容无多大变化，只是两鬓已经染霜。他们畅叙了一阵，张光年来了，谈话更加热闹。话题从30年代文学，一直到时下的一些文章。立波透露，他正在为沙汀寻觅一合适的伴侣。沙汀婉言谢绝了。一个星期后，沙汀再次前来，一进门，立波、林兰就对他说，介绍女伴的事告吹了。他心里颇为高兴。他就怕他们过分热心，弄得他左右为难。立波为未牵好红线很感抱歉，转而又建议：不结婚也可以，只要有一个说得来的女友就行，巴尔扎克就是如此，可惜中国没有那种风俗。沙汀与立波后来的一次见面，是他搬到国务院二招所住下不久。立波找上了门来，他齿龈肿痛，不住地晚气。闲谈一阵，他郑重其事地向沙汀介绍湖南长沙一位居孀的女干部的情况，要沙汀留京修改《青桐坡》，以便电告女方

前来相亲。沙汀当即明确表示不考虑这类问题。他说：“不要给我制造矛盾吧！”立波见他口气非常坚决，只得作罢。

沙汀和周立波一起到了周扬那里。周扬历尽劫难，幸喜身体还不错。周扬问他几年来的情形，子女的情况。闲谈了一阵，兴致勃勃地谈起他近两三年读马列著作的情况。他已反复读了《资本论》和马恩全集中所有的书信。他领沙汀去看卧室内的藏书。他们谈到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一些著作，谈到恩格斯与易卜生的通信，然后又谈到目前的一些作家作品。沙汀顺便谈了谈《青桐坡》的内容。沙汀第二次到周扬家里，稍事休息以后，主人就拉上他，带上外孙女，约了立波夫妇一起去莫斯科餐厅吃饭。周扬这次的气色不佳，脸色苍白，步履飘忽。在对饮中，沙汀很惭愧地谈到“文革”中顶不住压力，写过一份“揭发材料”。周扬笑了笑，指着苏灵扬说：连她也写过我的材料嘛！最后一次，已是国庆节过后，沙汀和周立波一道去周扬家里。此时周扬的精神稍好些。他从杨超的一本哲学著作谈起，谈到《资本论》与辩证法的关系。他引用列宁的话说：读不懂《资本论》是由于不懂辩证法。当话题转到党性、党风时，他很有兴趣地谈到为人胸怀要宽广，要搞五湖四海，还引用了《水浒传》中的一句话：量大福亦大，机深祸亦深。晚饭后，周扬夫妇送沙汀出门，一直走到街口。沙汀说，他原准备去一趟上海，现在决定不去了，想抓紧时间，在80岁以前再写一两本书。周扬夫妇鼓励他努力实现。

沙汀和臧克家一起去看望了郭沫若。他们在会客室稍事休息，郭老就由秘书王廷芳扶着出来了。他已一副老态，背已伛偻，步履颤颤巍巍，脸上的寿斑清晰可见，沙汀想起于立群说过的一句话：对郭老，是见一面算一面啊！心中不禁一阵难过。可是他对郭老说：你的面容看上去还比较好嘛！郭老笑着说：虚有其表啊！接着，郭老握着沙汀的手说：你的手比我的手暖和。又说：你看上去不过40岁！沙汀说：因为我刚刚修过面，其实我转眼就73岁了。郭老摸着沙汀毛衣的袖口问：是夫人织的？沙汀说：是女儿刚虹织的，玉颀已去世10年多了。郭老便从人的生与死感慨地谈起一生没有做多少事。沙汀从《女神》、《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甲骨卜辞研究到历史剧作，谈到郭老作出的贡献。郭老说：十个手指按跳蚤啊！由于郭老问到沙汀的近况，他扼要谈了谈《青桐坡》的创作。臧克家也同郭老谈了一阵。他们估计已谈了半个小时，便起身告辞。郭老挽留他们，又谈了一阵，才依依惜别。

沙汀还碰巧同巴金见了一面。巴金是随上海瞻仰毛主席遗容代表团来京的。他们上午进纪念堂，下午5时就要乘原车返沪。趁他午休的时候，沙汀、严文井、韦君宜、卞之琳、罗湘初相约到了他的住地西苑。当时的西苑门禁森严，只能在一间临时搭的棚子内会客。他们相聚在棚里的一角纵意谈笑，惋叹被耽误的宝贵的时光，互相勉励要补偿起来。沙汀说要在80岁以前写点东西，劝巴金也写点小说，把翻译放在80岁以后，而且少搞点“打杂”一类的短文。但他话刚出口，很快就觉察到“打杂”之说不妥。当巴金说写点短文也是给自己下的任务时，他立即点头称是。不过巴金也说，他很想写一部反映“四人帮”肆虐的长篇小说。他认为他有很深的感受，只是担心不容易写好。

沙汀在北京的一个半月时间里，会见了许多朋友，还参加了《人民文学》编辑部举行的为期一周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是他10年以来最舒心的日子。10年浩劫，10年忧郁，现在长长舒了一口气。

五十二找回“我的世界”

1978年2月，沙汀由四川省委宣传部任命为负责恢复省文联各协会的领导小组成员。3月，奉调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他进京以后，除了负责文学所的工作，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开始构思和创作中篇小说《木鱼山》，撰写回忆录。

从1980年开始，特别是在卸去文学所所长职务，只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以后，他几乎像候鸟一样，每到春末或夏初就回到成都，到秋末或冬初又去到北京。在成都，他同女儿刚虹一家住在一起。在北京，同儿子刚宜一家朝夕相处。孩子们尊敬父亲，父亲热爱孩子。他过着安静的晚年。无论在成都新巷子19号的小院，还是在北京木樨地的高楼上，每当晨光熹微，他就起床出门，在庭院或楼下踱步。早饭后就坐下写作。下午午睡后，记日记，处理信件，看看报纸，生活极有规律。

他之所以连年返川，是为了在一个适合身体状况的季节和环境里写作，是为了感受创作所需要的家乡的文化气氛。只要健康状况允许，他还要下乡。他去过安县、绵阳、广汉，在农民家作客，同县、乡干部长谈，与过去结交的朋友相见。

他非常关心四川的文学事业。热心参加作协、刊物举行的座谈会，接见作家、青年作者，浏览一些地方文学刊物，发现文学新人。在一次访谈中，话题一转到四川的文学创作，他就兴致勃勃，滔滔不绝。

他说：“文学是把创作当做生产力的。繁荣文学事业，就要保护文学的生产力。做组织工作，包括办刊物的人，要注意扶持创作，扶持新生力量。对搞创作的人，要让他们专心创作，不要挂起来搞行政工作。”

他谈到了周克芹：“一听说要周克芹进作协领导班子，我就向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人说，可以让他进，但不要他搞行政工作。现在作协比较照顾他，尽量让他少参加会议。但是找他的人太多，搅得他没法安静，这很不好。”

他谈到了克非：“对克非采取的方式很好。拨点款，在乡下盖个房子，让他在那里住下。不过也要提醒他，有些作品堆砌生活知识。”

他还谈到好几位作家，对他们的情况都非常熟悉。他希望他们拿出更多的好作品。四川不少作家和作者程度不同地得到过他的关怀，受到过他的教益。

1985年6月初，沙汀以81岁的高龄，由周克芹等陪同，重返阔别多年的故乡。他不顾年老多病，拄杖重游故地。他在县城的十字街口伫立，在城外安昌河边的堤埂上久久静坐，在睢水场旧居前的核桃树下留影。他浸沉在往事的回忆里。他对周克芹说：

四十年代我在这里生活，可以说叫做“逼上梁山”。当时反动派要打我的麻烦，我不能露面。我和文艺界也没有接触。

除了和少数人有通信联系外，不可能接触。而当时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我只有单线联系，和地方党组织不发生往来。我有时也感到寂寞，然而正好静下心来进行创作。

毕竟因为年迈力衰，不能下乡上山拜望当年避居的居停主人，他便嘱咐随行的人代为前去问候。他们带着他的情意和礼品，先后去苦竹庵拜望了罗惠如，去板栗园拜望了李芳群，到刘家沟拜望了邱大娘。他们将情况一一向他汇报，他欣慰地点点头。他的感情得到了表达，心情得到了安慰。

从沙汀故乡之行中，周克芹看出他正酝酿着一部作品。果然第二年他返回成都时，高兴地告诉周克芹，他的一部反映解放前夕睢水场生活的中篇小说《红石滩》已经脱稿，将在《中国作家》上发表。

《青桐坡》、《木鱼山》、连同《红石滩》，他在找回他的艺术世界。

《青桐坡》取材于他过去的一次访问札记。是在1958年7月，他听说他年初去过的三台县有个双龙乡，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多年梦寐以求的旱地浇灌。他立即赶赴那里，在20多天的时间里跑遍了双龙乡的山坡田野，看了正在兴修的水库水渠，参加了修渠和改土的劳动，听高峰社主任赵复祥讲了他同父亲为“超支”发生的矛盾，团支书文素芳倾诉了她的婚变，他记了整整一大本笔记。1972年他被释放回家后，有关方面将抄走的一些笔记、日记、书籍归还他，他猛然见这本双龙乡札记完整无缺，无比欣喜。从那时起，他就萌生了用其中的素材写一部作品的念头。1977年夏天，他用两个月时间写出了《青桐坡》初稿，于次年春修改定稿。

这部作品写1958年春节前夕青桐坡前锋农业社的干部和社员在社主任、党支部书记邵永春的带领下兴修水利的故事。它再没有像以前写“大跃进”的那些作品那样着眼在政治生活的虚浮上，而是瞩目于农村因地制宜的生产建设。写生产建设也没有停留在生产劳动、生产技术的层面上，而是把生产斗争与人的思想矛盾交织起来，在生产斗争的背景上展开人的思想冲突，以人的思想冲突推动生产斗争，从而刻画人的思想风貌，塑造人物形象。作品较有生气的章节是写邵永春在带头交超支款问题上与父亲邵业隆的矛盾，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妇女队长文素芳与丈夫的冲突。邵永春的大公无私、文素芳的泼辣开朗正是在冲突中得以展现，前锋社的兴修水利，改良土壤也正是在这样情况下顺利开展。然而，这部作品却明显地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它的基本意向是表现1957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农民振奋起战天斗地的热情，以至春节前夕也冒着严寒挑灯夜战，立志改变山乡穷困、落后的面貌。作品循着这种观念设置情节，并于情节的发展中摆布人物，情节和人物都不免单调和概念化。尤其作品的前半部分，通过记者的采访来说明人物、解释事件，运用概念的笔调来叙述生产劳动情况，特别使人感到生硬、牵强、枯燥。作品的叙述语言也夹杂着大量的报章语言和干部腔、例如：“于是，就从这一天起，为了认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青桐坡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挖塘运动，花了几个冬季，就基本上解决了旱地浇灌问题。而在这个冬天又轰轰烈烈搞起改土运动来了，决心把那些下劣土升升级了，同时让一些沉睡多年的荒地复苏。”这些语言加重了作品的沉闷感。

沙汀在谈到这部作品时也曾说有“不少败笔”“主要是它有新闻记者进行调查访问的痕迹。这是对素材消化不良的结果。同时酝酿的时间太短促了。虽经七八年，八一年两次加工，那位‘记者’的身影仍然触目”！其实，这部作品的“败笔”恐怕是由于作家认识与生活的局限。是在积累素材时就带着“左”的眼光“取其所好”，并没有注意到许多表面现象背后的东西和生活中“原生”的状态，后来构思和写作也没有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处理有限的素材，通过形象的描写揭示生活本质的真实。

不管怎么说，《青桐坡》毕竟是沙汀“走出牛棚之后”的第一次“欢声笑语”，是沙汀被迫搁笔10年之后重新提笔的标志，是他回到现实主义道路

上来作出的努力。

《木鱼山》比《青桐坡》酝酿和写作的时间长得多。早在“文革”以前，沙汀每一忆及与“大跃进”俱来的“三风”给农村造成灾难的情形，想起熟知的三台尊胜，武胜烈面的朋友们为抵制种种歪风而“阳奉阴违”地斗争的事迹，就油然而生创作的冲动。粉碎“四人帮”以后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传达，给了他很大的启迪和鼓舞，使他更加觉得那些熟悉的朋友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可贵，更加坚定了要表现那种精神风貌的信念，少加紧了艺术构思。1979年夏天，他提起了笔，在《抵制》的题目下，尽情地描写所敬重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对省委工作组瞎指挥进行的韧性的“抵制”。但他大约只写了5万字，就没有写下去了。1980年从北京回到成都消夏，他试图续写，也没有继续下去。他所写的“抵制”，涉及到省委主要负责人封锁《党内通信》的严重错误，会不会引起麻烦？不免担心和犹豫。他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后来他终于拿定了主意，他决不能回避当时的真实情况，必须大胆地写省委主要负责人对传达《党内通信》的错误态度，但同时又突出地写基层干部和党员对《党内通信》的衷心拥护，写省委部长，新任工作组组长的体察实情，与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息息相通，不多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达，他反复研读，认识更加坚定，艺术把握的重点更加明确，正如他后来所说：“应该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下决心写作它，并能以在不违反历史真实这一点上起了决定性作用。而在构思当中，我还一再提醒自己，决不能像个别同类题材的小说那样把我们的社、队干部写得只会逆来顺受！”1982年秋后，他继续写了下去，写得十分顺利，在写到王部长的心理气质时，还情不自禁地融进了他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接触的感受和自己的生活体验。此后，纯系健康的原因，写作有所停顿。1983年春节，继续写到尾声，在接到熟悉四川农村生活的克非来信后，根据提供的情况改定了结尾。这部作品送卞之琳，陈荒煤征求了意见，于1983年7月最后修改定稿，并将篇名改成了《木鱼山》。新的篇名，比起原拟的《抵制》、《汪达非同他的伙伴》等更为响亮、含蓄。

《木鱼山》写困难时期木鱼山干部和群众在社长汪达非带领下与工作组个别领导人的瞎指挥周旋和斗争的一段艰难的历程。它与《青桐坡》明显不同的是站在了新的历史高度，把握着生活本质的真实，再现了那一段农村生活的真实状况，再现了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艰难处境和所进行的抵制歪风的艰苦奋斗。它在总体构思上比起一些同类题材、包括某些“伤痕”文学作品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没有回避农民的饥馑、肿病、非正常死亡等生活真实，但又没有沉缅于苦难，而是以“灾情”为背景，突出表现干部和群众为“救灾”所进行的艰苦的努力；它没有回避工作组个别人和省委主要负责人脱离实际，违背党中央指示的严重错误，但又没有将阴暗面以偏概全，而是把它作为非主流方面，着重描写基层干部和群众实事求是，积极而艰苦地进行抵制，描写省委内头脑清醒的高级干部的警觉。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在引人回顾那一段困难的岁月时，使人瞩目战胜困难的人们；推动人认识那一段扭曲的生活时，激起认真而严肃的思考。它写“伤痕”，着眼点在引人反思，写失误，同时展示光明的前景。

这部作品最为成功之处是写活了那种特殊，复杂环境中的几个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例如那“一阴一阳”，性格爽朗的赖体臣，那胆小怕事却正直

善良的霍干人，那受到不公正批判并不灰心的贺永年，一个个都跃然纸上。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他们的带头人、社长汪达非。这是一个从“左”的路线“夹缝中求生存”的许多农村基层中概括出来的典型性格，一个能体现中国农民传统的韧性斗争精神的真实性格。他不是同类题材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李铜钟那样的“青松”，而是川西北农民最熟悉的，能入嵯峨的山石中曲折生长的“翠柏”。他不是那种举世浑浊而我独醒的“超人”，而是一个质朴，忠厚却又有头脑有主张的真实感人的基层干部。他作为合作化的带头人，有过值得自豪的经历，但从1959年反右倾起，田为敢于讲真话，“经常被当作右倾保守思想的典型挨批”。他尽管受到委屈，却从来没有悲观失望，而是以群众的忧乐为自己的忧乐。而对来自上面的瞎指挥和精神压力，他忍辱负重，“主动地承认错误，主动地进行检查”，与此同时继续带领干部和群众从实际出发“做贼娃子活路”。他这种“阳奉阴违”的行为是一种被迫采用的对付瞎指挥的策略。这是特殊情况造成的反映群众机智、体现农民优秀传统性格的特殊手段。作品一开始以感人的笔墨写他参加充满浮夸的具季扩大会以后回到满目饥荒的木鱼山，见到濒于饥馑的刘大旺一家人时无比沉痛的心情，结尾又以悲壮的情调写他听了七千人大会的传达后高兴地回乡，不料正赶上刘大旺因肿病加剧而辞世，陷于极度悲凉的情景。这样首尾连贯的精心安排，反复展示这个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深刻揭示他敢于抵制来自上面的歪风的精神支柱和力量的源泉，增强了人物的思想蕴含和感染力。

《太鱼山》具有较高的思想力和历史感。它的创作为文学创作如何正确地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中可能发生的失误创造了值得寅视的经验，它为沙汀的艺术世界拓展了一个新的境界。不过这部作品仍未完全摆脱单一的社会政治主题出发提纯生活的构思方式和表现方式，情节单调，生活画面稍嫌单纯，用笔过于拘谨。紧接这以后创作的《红石滩》，改变了这种状况。

沙汀说过：“单从酝酿时间来说，最长恐怕要数《红石滩》了。”早在解放前夕睢水的那些日日夜夜，他就认真积累了丰富的素材。50年代初，他在石板滩调查恶霸、豪绅曾有过的应变活动时有所触动，试尝以原有的生活积蓄为主，补充新调查的情况，构思一部名为《应变》的作品。1955年离京回川前夕，他去见了曾在解放初担任过川北行署主任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了解了当年川北农村的一些情况，谈了他的写作计划，得到了热情的鼓励。回到成都，他多次向张秀熟、李劫人、艾芜谈了他的构思，听取了有益的建议。1956年8月，他由长女杨刚俊陪同回到难水，寻访旧迹，重温过去的生活，并详细了解解放初期此地的社会状况，作了数十万字的笔记，草拟了创作提纲。在“文革”以前，因为题材问题上“左”的思想和行政领导工作的影响，他未能进入写作。正如他后来所说：“我原本也能够挤时间写它的。可是当时创作思想上有个相当大的障碍，总认为我们应该歌颂新生事物。而建国以后，新生事物又层出不穷。结果有时能挤出来的有限精力，全用在写作短篇小说、散文报道上了。”到了新时期，他才得以欣然实现已久的打算。1979年底，他扩充和修订了一个较细的写作计划：

结构，三种力量：袁一伙，杨、萧、唐一伙，市井商贩。这三种力量也

沙汀：《〈走出牛棚之后〉题记》。

沙汀：《〈走出牛棚之后〉题记》。

是三条主要线索，穿插于这三条线索之间的，则是附属于、动摇于三者之间的帮闹、帮忙。

总题：《流氓皇帝》或《胖大爷》，可设想为三部：1.抗战胜利前夕，2.在解放战争中，3.解放前夕。

第一部：起于独山失守，乘机大拉关系。因为一些有政治野心和爱国思想的大人物，都认为该地是避难和打游击的好地方，结果，敌未入川；修建学校，沽名钓誉。

第二部：抗战胜利了，卖壮丁不成，大烟生意也可能成问题，特别盗卖了那么多公粮，怎么办？人心惶惶。可是内战起来了，高兴：转危为安，特别继续征粮和拉丁，更合口味。在此期间，胖子派头、手面更不同了，也更醉心名利。

第三部：四川解放前夕。国民党看着失败了，慌了。伪装开明，笼络青年知识分子、劳动人民，但却准备应变，同时又以应变为口实，向一些土粮户吓诈钱财，并继续盗卖粮谷，兑换硬洋、金条。

这三部，每一部可独立成书，主要人物不动。书名也不标上、中、下，各自有一题目，等到出齐了，或者最后一部写成了，在序上说明。

这是个宏大的计划。它反映了这位老作家复出以后的雄心壮志。次年8月，他开始动笔。倒着从第三部《应变》写起。于1982年写出12章，将第一章《夜市》交《现代作家》发表。这以后插入《木鱼山》的写作，有所停顿。到1984年夏秋之交，陆续写完最后七章和尾声。于第二年回睢水之后，再行加工润色。1985年冬定稿，篇名定为《红石滩》。

《红石滩》以解放前夕川西北一个偏僻的乡镇红石滩为背景，描写新旧交替的社会大变动中的世态人心。这里有社会生活的纷坛复杂，有社会思潮波澜起伏，有各阶级各阶层人物的形形色色，有欢欣鼓舞、怀疑猜测、矛盾惶遽、阴险狡诈，图谋应变等各种各样的社会心态。这部作品的主要特点，是作家充分发挥了川西北地域文化专门家的特长，描绘了解放前夕川西北乡镇富有动感的社会风情画。它展示给人们的那乡土风味浓郁的红石滩乡场，那十字街口热闹而人心动荡的夜市，那帮会“公口”上的茶馆，那场上形形色色的众生相，等等，都是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面。

尽管作品在总体把握上，因忙于全景的布置，相对放松了对人物细致的刻画，但几个社会大动荡中的人物的基本特征，都一一勾画了出来。如兴风作浪、阴谋破坏的乡长焦继聪，惊惶万状、老谋深算的“土皇帝”胖爷，开明士绅唐简斋，进步、正直的小学教师伍茂卿，都各具特色。这些人物中，反面人物比正面人物更有个性。反面人物中，胖爷又最有典型性。这个人物是作家以他接触最多，最为熟悉的袁寿山为原型进行艺术创造的。这是红石滩的地头蛇，场镇上的一霸。他在外甥任乡长以后，仍然是“太上乡长”。面临社会大变动，他惶恐不安但又满怀仇恨，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为免遭灭顶之灾，他准备了几手“应变”措施。当县城解放时，他伪装积极，策划成立“解委会”。在红石滩接管后，他坐地使法，让焦继聪利用“合法”身份与接管人员周旋，暗地里却勾结土匪“放五猖”，试探解放军的态度和实力。到焚毁粮食的罪行即将暴露时，狗急跳墙，密谋派土匪头子暗杀了积极分子伍茂卿。作品刻画这个人物，采用了许多富有特色的细节，如写他作为地头蛇的估吃霸除，写他与焦继聪、骆渊几乎是在不当一回事的情况下就密谋了一项杀人的罪恶计划，把一个不露凶相、心如蛇蝎的恶霸写得栩栩如生。

这部作品在艺术结构上也不再是循着主题单线直进，而是按照生活本身的丰富多彩多方面地展开；在叙述方法上，不再借助穿插说明来揭示思想倾向，而是运用富有生活气息的描写和带幽默的语调表现意蕴；在语言上也不再袭用那些报章语言和干部腔，而是恢复属于作家特有的文学语言系统。

从《青桐坡》到《木鱼山》、《红石滩》，可以看出沙汀在回到现实主义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步步前进，在艺术探索上一步一个台阶地步步上升。如果说《青桐坡》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影响，还有小真实、大虚假之憾，那么《木鱼山》则在思想上有了重大突破，站在了新的思想高度把握了历史和生活本质的真实，仅仅在审美观照上还没有放开手足，限制了艺术个性的充分发挥。而《红石滩》则在思想、艺术各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它通过社会的、审美的多种角度认识和把握生活，创造了一个富有特色的艺术境界。

沙汀仍在不停地写作。他在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的一个录音讲话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决心继续辛勤地耕耘。他说：“巴金曾对我说，活着就要写作，不写作，活着有什么用，这句话我很赞成。”

后记

我和沙汀同是川西北地区的人。早在中学时代，我就知道沙汀的名声，并为我们这片土地上出了一个杰出的作家而自豪。我们这里的人不是曾经被大城市的人称为“乡茗狗”吗？青年沙汀初到上海时不也被叫做“茗哥儿”吗？岂料吃红茗长大的人也能成为大作家！

后来我上大学，系统地读沙汀的著作了。我多半是凭着兴趣读的。我对许多作品的人物、环境、语言都感到非常亲切。我常常读出笑声或哭声。有时还由作品联想起我童年、少年时代熟悉的家乡的人和事。例如读了《丁跛公》，我就立即想到我的一个伯父。他也当过乡约、当过甲长，也经常背着褡裢走家串户勒派款项。山湾里的人把他比做打猎的“撵山狗”，说是：乡长吃肉，保长啃骨头，甲长当撵山狗。这类角色在追捕猎物时疲于奔命，最终却什么也捞不到。

时序进入 80 年代，我们的人文环境阳光和煦。我和仲呈祥同志在合著一些文学评论之余，动议写一本关于沙汀的书。我们搜集资料，探讨作品，并且很快形成了一种认识：研究沙汀这样的作家，必须熟悉他家乡的文化环境。沙汀家乡的文化环境影响到他艺术个性的形成，是他艺术的活力和基础所在。于是我们于 1984 年 4 月到了沙汀的故乡。我们寻觅沙老童年、少年、前期青年时代和 40 年代回乡蛰居的足迹，访问沙老的亲戚、朋友、校友以及所有同他有过往来、有过接触的人，查阅几种版本的县志和县公安局尚存的有关档案材料，调查当地的风俗民情和方言。我们的工作得到安县党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县党史办的同志为我们提供了资料。宣传部长何子恢同志为我们创造了条件。文教局长高一旭同志还陪同我们访问。我们返回成都后，又接着访问了萧崇素等沙老的旧友。此时沙老从北京回到四川，我们立即前去汇报了赴安县的情况。沙老听了，十分高兴，给了许多鼓励。当他听说他在解放前夕蛰居板栗园的女房东李芳群家境困难时，当即从刚领的工资中抽出 50 元，嘱仲呈祥寄给季芳群，以表达他的关心和想念之情。

也许是造化的有意安排，1985 年 6 月，沙老由周克芹、萧崇素、郑子超等陪同回乡，我和仲呈祥被叫去随从，我们再一次去了安县。一路上沙老不断地回首往事。到了县城西街，认证诞生地并深情地怀念母亲。徘徊十字路口，回忆少年时代的印象。在安昌河堤上长久静坐，畅叙如烟的往昔。到桑枣、秀水、睢水，忆起一个个人物原型当年的生活情形，寻觅过去的旧居，追忆流逝的艰辛的岁月，……他的回忆由仲呈祥录音，仲呈祥和我整理。我们几乎天天通宵达旦地工作，生活紧张而愉快。大概我们的录音、整理工作做得不错吧，在返回成都后，沙老系统地回述了自己的一生和创作的体会，并且将他随身携带的一只皮箱中的全部材料交仲呈祥查阅。这真是一箱珠玑闪烁的“财宝”啊！其中有他未发表的自传，有单项回忆材料，有大量的“文革”中写的“交待材料”。这些“交待材料”有他从 1926 年到 1949 年的全部情况，有兴办辛垦书店的始末，有他与刘愿庵见面、与艾芜、陈翔鹤等交往的材料。我们顾不得请示他老人家了，将这些材料一一复印。冬天，沙老回到北京。他应我们的要求，特别详细地回述了他从延安到重庆到安县蛰居的一段经历和长篇小说“三记”创作的经过，由仲呈祥录音，交我整理。

1986 年夏，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吴福辉同志为搜集沙汀的资料专程来川。此时在成都的沙汀把我叫了去，要我陪同吴福辉同志去一趟安县。我虽编务

缠身，仍欣然从命。坐在一旁的沙老的女儿杨刚虹说：你怎么叫他去，人家是一个刊物的主编！沙老微笑着，那意思是说，就是要他去。于是我又第三次去沙汀故里。我和吴福辉同志约上在绵阳的沙老的长女杨刚俊同志，踏上了沙老故乡之路。我和杨刚俊同志为吴福辉同志作了忠实的向导。吴福辉同志也热情地向我们讲他对沙汀艺术个性的种种认识。他后来还将获得的一些复印资料给了我。他是一个严谨而真诚的学者，采访深入，思考精细，对沙汀著作时有灼见。这个北方长大的江浙人，还满怀兴致地约我坐了半天茶馆。他说：不认真考察四川的茶馆文化，就谈不上对沙汀作品的深入研究。

我和仲呈祥同志搜集沙汀研究资料的工作正顺利进行，仲呈祥同志正式奉调进京，没有可能继续合作了。1986年10月，他在尽快购到一本黄曼君、马光裕同志编的《沙汀研究资料》寄我时阶函说：“评传”之事只有你独自完成了。我读完信闷了半晌。仲呈祥同志是一个有相当思辨能力的青年，他对撰写这本书又有不少好主意。他不能参与合著，不能不影响到写作的质量。现在，当我勉力完成此书时，我仍为没有他参与写作而遗憾。自然，我要在此一再说明：他是为这本书的搜集材料付出了心血的。

我继续进行资料积累。我尽可能搜集了散见于解放前后各有关报刊的资料，寻访了沙老在成都、重庆、上海的踪迹，遍查了“文革”期间对沙老的各种所谓“揭批材料”，翻阅了得到的沙老的日记。沙老也不时寄给我一些资料。如汇集他回忆文字的《杂记与回忆》，安县陈兴荣同志赠给他的《安县党史资料汇编》，1988年秋到1989年夏，我利用到四川社科院文研所工作的几个月时间，写出了《沙汀评传》初稿。1989年11月下旬，沙老住四川省人民医院，我将初稿的几节请他审阅，聆听了他许多宝贵的意见。此后，我一再作了修改。这几次修改都是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断断续续进行的，所以延续时间较长。

沙汀对有关他的研究曾经说过自己的意见：“艾老和我虽然都是四川人，但两人的情况不同。艾老的家乡在川西坝子，离成都只有三、四十里。我的家乡较偏远，在川西北边边上，半山区。艾老长期离开家乡，写的作品大多不是反映家乡的。我和安县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写的作品也主要是反映家乡的，我认为搞评论的，研究作家作品，一定要把作家所扫写的那个省、那个县的风土人情了解清楚。全国的全省的政治形势要通过那个县才反映得出来，这个意见。我曾向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现代室的马良春同志谈过。”沙老的这段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从沙老的生平和创作中看到一条重要线索：川西北文化环境孕育了一颗特殊的文化种子，当这颗种子在汲取了现代思潮和左翼文化思想之后便在那一片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沃土中萌芽生长成大树，后来经过不断地培土深耕，这颗大树更加枝繁叶茂，闪耀独自的风采。

沙汀在建国后的17年中也有过挫折。他曾满腔热忱地跨到新的时代，努力进行新的艺术“探索”。在1957年前也曾写过一些较好的作品。但从1958年到“文革”前的几年，创作出现了滑坡。1962年前后创作思想有了调整，可是八届十中全会后又陷了窘困。他对创作上艰难的“过渡”和“歉收”也曾十分“苦闷”、“烦恼”，在一些创作集、尤其是新时期的创作集《走出牛棚之后》的序言中作过反思，然而他处在他的位置上作的所有自审都有难以避免的局限性。我在这本书中没有回避沙汀创作的滑坡现象，并且试图联系到许多事实来分析主客观的原因和总结经验教训，我不能说我的认识都十分正确，但是我觉得应当面对事实，引起研究的兴趣。我们应当实事求是，

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每一个有成就的作家都是一本丰富多采的书。沙汀是一本博大精深的长篇巨制。我数遍，数十遍读了这本书，我觉得它给了我很大的教益，我是个文学期刊编辑，当我怀着编辑的责任心同文学青年交谈为文为人之道时，谈到那些前辈作家早已解决而他们仍感困惑的创作问题时，我就一再想，要是让他们都来读读沙汀这本书，从中汲取力量，受到启迪，寻找借鉴，该是多么好啊！我现在就把我对这本书的了解和认识贡献出来。可能我对这本巨著还未完全读懂，但是我的心是真诚的。我愿意同文学青年们一起来继续探讨它，而把我的这个阅读体会当作一个起点。

作者

出版说明

为了总结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成就，继承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的优良传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更加繁荣昌盛，我们特组织出版了这套《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书》。

在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们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以下几个原则：

一、本丛书所撰写的“中国现代作家”是指在建目前就已取得较大的文学成就的作家（包括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等），文艺理论家和建国后才成名的作家不包括在内。

二、本丛书拟出版 50 本左右，每年出 1 辑，每辑 8—10 本。由于中国现代作家人数众多，故本丛书只选收比较著名的作家的评传，原则上是一人一本，但也有少数是一个流派一本或几位作家一本，如《东北作家群评传》、《左联五烈士评传》。

三、本丛书在撰写上要求贯彻科学、全面地评价作家的原则，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评价作家的成就：既要分析作家、作品的思想倾向和社会影响，又要分析他的作品所体现出的艺术风格和语言特点；既要指出作家对文学的贡献，又要指出他的不足，力争科学、全面、公正。

四、本丛书在具体的撰写形式上来作统一的规定，因此，撰写者都是根据自己的写作习惯来进行写作和分章节的。这样，虽然在整套丛书的形式上显得不够统一，但解除了撰写者在形式上的束缚，撰写起来可以自由一些，整套丛书的形式也要丰富多样一些。

五、本丛书在分辑时也未作专门的筹划，而是根据完稿的先后，进行了一些少量的调整。

重庆出版社
1993 年元月

